分組論壇發言全紀錄

Topics Discussion

A1 場次：地方需求與社會創新

主持人：

江明修　國立政治大學社會科學學院院長

主講人：

陳一強　活水社企投資開發公司總經理

與談人 ：

沈建文　國立中央大學尤努斯社會企業副教授兼主任

陳秋政　東海大學行政管理暨政策系副教授兼主任

蘇睿弼　東海大學建築系助理教授

王威中　台北市議員

許毓仁　立法委員

蔡金晏　高雄市議員

江明修院長

江明修：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第 2 屆的亞洲地方議員論壇，下午的分組討論現在開始，我們是 A1 組，主題是地方需求與社會創新，我相信對這個題目，今天來參加討論的貴賓，都有萬全的準備。

我們在開始之前，先介紹一下與會的貴賓，今天的主講人是陳一強陳總經理，再來是中央大學尤努斯是社會企業中心的主任，沈建文教授，第三位是台中東海大學公共行政系的系主任，陳秋政陳教授，再來，是東海大學建築系助理教授，蘇睿弼蘇助理教授。

從我右邊開始，台北市議會王威中王議員，還有遠從高雄來的，高雄市議員蔡金宴蔡博士，我想在座還有很多的學者專家先進，等一下再來一一補充，我們是不是先把握時間，先請活水社企的陳總經理，先做 15 分鐘左右的專題報告，謝謝！

陳一強：

活水社企投資開發公司總經理 陳一強

首先，非常謝謝今天有這個機會，先謝謝江老師常常指導我們，各位民意代表，今天我們分享的題目是，地方民主與社會創新，就是要講，怎麼樣一個社會創新，是由社區自己來引發起動。

我先介紹我在做的事情，活水社企投資開發叫做影響力投資開發，我先介紹一下我們在做甚麼？2014 年 4 月 10 日，我們成立了這家公司，公司只有一個宗旨，就是投資社會企業，這個好像蠻怪的，因為通常都是商業的創投，資本額有 5000 萬，我們 43 個發起人，我們是一個俱樂部式的募資，因為我們發現要協助社會企業，需要很多的技能，和很多的資源，所以我們希望我們的投資人成為這樣一個俱樂部式的投資人，我們也跟投資人講，我們的錢可能拿不回來，但是我們可以希望賺錢，賺錢要幹甚麼？賺錢要再投資出去，希望我們的投資人，都可以積極的參與。

現在我們做到甚麼程度呢？跟各位報告，我們現在投資 6 家社會企業，有些是耳熟能詳的，大家可能都聽過鮮乳坊嗎？「黑暗對話」是盲人培訓，都是目前投資的對象，我們大概投資了 3000 萬台幣，我覺得比較有趣的是，跟我們同時一起進來的民間資金是 9000 萬，加起來大概是 1 億左右，這個印證了我們一個理論，就是說民間資金，其實是很充沛的 。

他們如果看懂你的案子的話，知道這個結構，他們可以進來的話，很有資源，他們會很願意進來，如果是看不懂的話，對不起，他們就不會出一分錢。我們現在到一個轉折的階段，我們現在有啟動一個活水二號基金，一號基金就是一個實驗。二號基金，我們希望把我們的投資人，變成一個機構型的投資人，所以像信義房屋，還有很多的創意家陳五福先生，都一起跟我們來投資這樣一個二號基金，當然這個俱樂部投資金額，就稍微大一點，每一個人是一樣的金額，我希望是一億元，目前我們希望以 15 到 20 個股東，把民間的資金匯集起來。

因為我們發現，為什麼需要機構性呢？因為我發現能夠幫到社會企業是這些機構性資源，比個人資源會大一些，所以基本來講，我們是一個百分之百的民間投資，順便也跟老師報告，那個國發基金，雖然我們申請到了，但是我們最後還是認為民間自己來比較方便一點。我們就百分之百投資社會企業，我們希望是俱樂部式的，參與不是由一個人兩個人來做，主要是一群人。

今天的題目蠻有趣的，講個例子，幾年前我負責接待一個來自美國史丹佛社會創新的論壇 Charter School Review 的總編輯，我就問他說美國最大的社會創新是甚麼？講的是美國 Charter school，所以我覺得很有意思，為什麼是 Charter School，各位知道美國系統，也是有公立學校和私立學校。

為什麼這個學校會成為美國的最大創新？他說剛開始，就是有一群公民，或是 NGO 的人，他們想說我們兒女應該受不一樣的教育，在座的人可能都有這樣的困擾，不知道送到甚麼學校較好，他們就自己有一套方法來做學校，就像我們現在華德福。可是他們做一陣子以後，就得到政府的認可，聯邦預算就進來了，以後就變成一個制度，像現在台灣也很棒，也有這個公辦民營，但是這個中間，我認識一個創業者，他要去申請六個公辦民營的學校，卻遭遇到很多很多的挫折跟挑戰，這是非常有趣，這也是題外話，不過就是說為什麼，他是一個社會創新？

各位不妨想想看，其實公辦民營學校這樣一個制度，為什麼是一個社會創新？我想他是提出一個新的選擇，那新的選擇會又甚麼影響呢？他推了這個學校以後，公立學校就有很大的壓力，大家都知道那些老師都是退休金制，公立學校發現學生都去公辦民營學校，而不來公立學校，私立學校也突然發現受到影響，因為一般父母都希望以比較低的價格，去好的學校。

這兩方面都受到影響後，整個體制就逐漸由質變而產生量變，所以這是一個非常成功的社會創新案例，我要講的是創新，其實是一個選擇，如果他不是選擇

的話，很難成為一個創新，甚麼是一個新的選擇，要怎麼樣解釋？就是用新的方法來解決舊的問題。很多教育上的問題，很多人都想來解決，但是有沒有一個很好的 Idea，他可以勝過，或者比以前的方法都好，可以解決這個問題。所以想跟各位討論的，就是說幾個點，第一就是新的方法從哪裡來？剛剛講既然是一個新的選擇，新的方法，那新的方法到底從哪裡來？我想各位民代可以投票，幫我選一下幾個選項，公部門私部門或是公民部門，我這邊特別講就是公民部門，像 NPO 或是 NGO，或是像現在的社會企業這些民間的團體。

活水社企投資開發公司總經理 陳一強

大家覺得通常從哪裡來？大家覺得是公部門的舉手，覺得是私部門的？公民部門的？其實都有，但是我想可以確定的是，那個能量是來自民間，因為在一個政府系統裡面，得確是比較難去突破創新，至於如何才能導入有效的新方法，我這邊是歸納。第一個就是公民發起，像剛剛講的私部門發起，也可以公民或是私人發起，政府可以做的事情，我是覺得最好就是把那個管制可以放鬆，可是又不能圖利財團，這是另外的事情。不過我基本上看到美國 Charter School，他這樣的作法有一點像是由公民發起，政府再來放鬆管制，甚至還加碼進來。

那創新如何能夠發生真正的改變呢？這個就沒有好選的，我覺得是這樣，要看是政府計畫，還是公民運動。不管是政府計畫還是公民運動，如果他最後不是一個公民運動的話，我覺得是很難去變成一個大的改變，就像這個 Charter School，必須要很多人一起做的時候，變成一股很大的力量，讓政府聽到再放鬆管制。我想任何的社會創新，有一個檢驗的標準，就是他是不是一個運動？運動是甚麼？運動就是當你不做的時候，別人還會做，你發起以後別人可能比你還熱情在做。

接下來就講到今天的題目，就是社區，我們剛才在投資案裡面，有一個在新北市三峽，那邊有一個甘樂文創，大家聽過林峻丞先生嗎？他是我們很好的一個夥伴，我記得五六年前認識他的時候，他還講那個絲瓜小學。

就是一些高關懷的小孩缺錢，他就鼓勵人家種絲瓜，然後做成絲瓜布去賣錢，他教小孩說不是接受政府補助就是好，我教你怎麼樣去，自己能夠贏得別人的尊重，拿到資源，就有這樣一個三峽的故事，我還是放一下這個影片，可以幫助大家了解。

大家知道三峽那邊的一個狀況，是吸毒比例最高的，然後又很多高關懷的小朋友，各位想想看峻丞，好像是在做一個 NPO 的事情，因為小草書屋或者是青草學院，都是要募款來做這件事，為什麼我們會投資？他有一點奇怪對不對？其實各位如果看到這張圖就了解，他是一個混合式的，右手邊是他 NGO 的部分，左手邊是一家設計公司，所以他其實是一個設計師，他可以創造出他餐廳的收入，旅行社的收入，文創商品的收入，因為有他這家公司，所以凝聚一些年輕人進來，年輕人就會支援這個 NGO、NPO，在這邊他們是一個協會，形成一個結構公司，可以創造利潤，NPO 可以去創造他的影響力，他也可以同時募款。

所以因為這個案例，我們就覺得很有趣，林峻丞在三峽做了哪些事情？他有八十一百個小朋友在陪伴他，也有做出很多文創商品，包括紙雕的媽祖像，他當時說想讓媽祖遶境到三峽，那繞遶說要 30 萬，各位知道他如何籌到這 30 萬嗎？他說因為他發現媽祖繞境的時候，會放鞭炮，有很多的紙屑，他剛好認識一個紙雕的師傅，他請那個紙雕師傅講，紙屑雕刻媽祖像拿來賣，結果一個上午，就籌到 15 萬，他是不是很有創意？後來那個紙屑還雕成小的媽祖木偶像來賣，這個創意還很環保。後來我們就在今年 5 月 24 日，在台中辦了一個社區發展的研討會，請峻丞來。我想講的就是，我們把這架構給弄出來，其實在社區很複雜，各種問題他都要去處理，峻丞他要處理那些問題，包括空間包括教育包括文創的部分，以及我們講包容性的經濟面，他都做了很多，所以他不但照顧了人本的生活，也做了一些體制環境的提升，所以才能讓這個社區，做一個大的提升。

至於我們為什麼要支持他？因為太值得了，因為如果說我今天投資他 300 萬，那我要考慮，我明年會不會還要投資他，300 萬如果捐款的話，那我明年是不是還要捐 300 萬，我投資他以後這個團隊就會站起來，可以賺錢，然後他就會去做公益的事情，這樣各位覺得這個創業家，是不是一個很好的支持的對象。

所以基本上，假設會創新，其實後面的內涵，就像社會創業家，就是夠解決社會問題的這些，像峻丞這樣的創業家，其實他要的，不是我們給個釣竿，我們常說幫助人家，不能給魚，給個釣竿，現在給它釣桿也沒有用，因為給釣竿，你也釣不到魚，這是整個生態系統的問題，所以峻丞這樣的創業家，就可能改變整個生態系統。

我想講的是社會創業，最主要的是後面那個社會創業家，我們自己用投資的方式，在支持社會創業家的過程中，發現社會創業家，是未來台灣的領袖，為什麼這樣講，因為我們現在很多衝突，都來自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因為做社運的人，不是很了解企業運作，企業也不是很了解社會碰到的困難，這兩個在打架，可是對峻丞來講，他兩方面都有經歷，一方面他自己要賺錢來養活自己，一方面要創造社會的影響力，我們覺得這是一個最好的，很棒的支持的對像，因為他們有這些特色，我想很重要，能夠持續永續擴展。

最後我想講社會創新，會有甚麼障礙？應該是今天應該討論的主題，各位民代都非常有資源，到底有甚麼障礙？

第一個就是說，雖然社會創新是台灣的特色，但是實際上還有很多的不足，包括我們公民自覺不足，是不是可以讓更多像峻丞的人站出來，三峽如果我們不是因為峻丞，還有少數的團隊，也沒有更多的團隊站出來，成功的典範太少了也很難，像峻丞也是做了 10 年才有現在的規模，因為這需要時間，所以必須要有一些耐心。但事業需要有一些中介組織的協助，因為很多中介組織也是政府資源有進來，有資源進來就做一點事情，沒有資源就沒有做。所以怎麼樣有更多的中介組織，中介組織就像輔導設計的，投資設計的，支持設計的，像這些中介組織非常的重要，怎麼樣支持這些中介組織可以到位，我覺得很重要。

另外就是過時的法規，這個我也要講一下，這個社會企業立法等等的問題，我自己覺得社會企業是一個普通名詞，大家誰用都可以，你也不能說他不是，對不對？而且社會企業像雨傘一樣，他下面有很多的法律的架構，像協會、基金會，合作社等等，都是社會企業的法律名稱，可是現在碰到比較大的問題是公司，像峻丞雖然他公司內部章程，有訂定說盈餘的百分之多少不分配要留下來，但是事實上，還是會碰到一些挑戰，究竟你是怎麼樣的單位，如果你是公司的話，為什麼要支持你，所以怎麼樣讓這些公司型態的社會企業取得法律的位格，我覺得相當重要的議題。另外就是補助獎勵很好，有時候也會成為毒藥，政府資源進來以後，會有兩種副作用，一個就是會依賴他，一個就是他自己本身的熱情會失去。

最後就是生態系統不健全，我想其實各位聽我講，好像我們在亞洲是非常領先，但是以生態系統建立為例，有兩種選擇，一種是以政府為中心整合促進，或是以民間為中心連結演進。很明顯我是比較偏向以民間為中心連結演進，政府要扮演一個剛剛講的管制鬆綁，或者是提升的角色。　　我一直認為，台灣是非常有社會創新的機會，我們有民主政治、公民的社會，我們有很多中小企業，這是很好的環境，如果由民間來連結，我想可以做很多的事情，我想會有很大的發展潛力。

最後就是如果要討論議題，簡單講我覺得就是社會創新的後面，是社會創意家的靈魂，他需要血液，不然就變成空氣在飄了，血液可能比食物更重要，食物你可能餓兩餐沒有關係，但是如果有血液，有靈魂你可以去創造出營利，把食物

再吃回來。所以我覺得簡單講，就是怎麼樣引進民間耐心的資本(patient capital)，來支持社會創業家的血液及靈魂，這個可能是我們最大的挑戰及議題，我就報告到這邊，謝謝大家！(主講人演講簡報檔資料，附在本文後面)

江明修：

謝謝剛剛一強所提的，他的立場很清楚，他是社會中心論的，事實上，對我們的國家來看，我們國家的政府、社會、企業三大部分，有一種理論講，當國家強的時候，社會就很弱，另一種是社會很強的時候，國家就很弱，但是也有一種情況是雙強，國家強社會強，目前我們國家面臨的情形，應該是國家弱，社會弱，企業弱三輸，所以不管如何，是社會中心論也好，是國家政府中心論也好，企業中心論也好，我們都不要懷疑，拿出辦法來，我們也希望國家強，企業強，社會強，所以說一強剛剛很多的論點，真的有針對地方的需求呼應到，我覺得非常的肯定，也非常的支持，我知道你們做很多的事情，我們也希望將您的經驗，有學界來呼應一下，我們請尤努斯中心的沈主任來做回應，謝謝。

沈建文：

沈建文教授

謝謝一強兄的分享，我知道他在這個部分，其實長期的經營，我在他那邊也學到很多的東西，有些東西也在學界獲得建議和支持，我這邊就講一下我們學校的狀況。

學校的創新，目前在各個學校比較推的，比如說創新的來源會像設計思考的部分，所以我們長期在學校部分有這樣一個所謂的虛擬的單位，就是 Idea school，當然在學校裡面我們既希望去推廣設計思考，設計思維這樣的 approach，尤其我們在尤努斯中心，我們每一年都有辦一些設計思考的工作坊，像我們 9 月 2-3 日，我們會辦一個怎麼樣活化桃園後站商圈的設計思考活動，我們主要的對象，也就

是年輕人，年輕人其實是以創意的希望去找，或是去吸引更多的年輕人，來自不同的領域，然後再用一些方法，因為我覺得創新不能沒有方法去做這件事，只是他還必須要有一些方法，讓這個創新的部分，能夠去實踐，去驗證這個創新的東西到底能不能用？

我們有很多課程在做這件事情，但是學生也覺得這個課程很好，他其實不需要聽我們一學期，但是問題是學生玩了一個學期之後，他們有一些創意的東西好像很不錯，但是到了最後，卻沒有辦法去落實，只是覺得那是一個好玩的課程，他們不見得想要把他們想到的，好像還不錯的創意的東西去落實，所以怎麼去落實。

剛剛一強兄也有提到，怎麼樣去落實？讓學生有這個動機，他們可以知道落實以後，我可以得到更大的成就，我覺得現在課程的設計，會讓他們覺得好像他只是一個課程而已，課程之後，怎麼樣繼續去燃燒學生的熱情，讓他們願意去把它這個創意的東西把它實踐，我覺得這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

當然最近很多學校的老師，也在忙有關教育部最近推出的很多跟社會創新有關的計畫，比如說跟設計思考有關的計劃叫苗圃計畫，苗圃計畫就希望各個學校利用設計思維方式，報到各個學校去，我覺得那方法應該是教育部來主導，那個方法實施部份，我都覺得有很多的限制，方法的本身限制很多，你就會發現你要怎麼去落實？到最後我的猜想，這個計劃到時候執行完畢之後，他可能還是沒有辦法達到他預期的效果，也就是說教育部在設計這些相關的計畫的時候，他就有很多的限制，在這個限制之下，你去做有關設計思維的一些課程，我覺得本身就會有很大的限制。

在最近很多學校，在推明年開始大學生根計畫。還有最近很多老師，也在寫的這個大學的社會責任計畫，當然教育部會希望看的是，那些社會創新部分，能夠放到所謂的大學社會責任之下，所以在裡面來講，我們也希望看到各個學校，怎麼利用社會創新，累積想法，落實到地方的紮根。這個計劃我看大概是 3 年的時間，這個想法本身，我覺得是一個好想法，他可以鼓勵更多的老師，帶著學生然後去深入社區，至於會不會用到創新的方式去做？其實就要看相關計畫主持人，或他們團隊的努力了。

當然還有很重要的一部分，是 3 年之後，這個計劃不再繼續的話，這個計劃能不能再推動下去，那能不能推動下去，我覺得很重要的一個關鍵，就是如果在這 3 年之間，這個 Team 能夠找到一些創新的模式，讓他這個計劃得以延續下去，我覺得就是他這個團隊，可以成功很重要的關鍵。

所以他這個社會責任計畫在執行的部分，他這個動機是好的，但是在教育部這邊，有沒有去看到社會創新的部分，真正落實在計畫中，這部分恐怕我覺得我們要去多了解一點，我是覺得，就我自己每年，都會帶很多的社會創意專題計畫

團隊，每一個學生都要去學習社會創意的方法，一年下來，可以看到很多不錯的創意，但是學生寫完一些創意以後，他也許可以拿到一些獎金，但是那又如何呢？

對我們學校的學生來講，他畢業以後，可能可以找到不錯的工作，尤其是管理學院的學生，在這樣的情況之下，他可能就不會想要冒風險搞這些事情，所以這點也是我們在大學教育裡面，除了社會創新，教他們讓他們知道 Know-how 之外，其實也要幫助他們的 innovation，怎麼樣能夠落實，持續去燃燒，我覺得是我自己目前所看到，要跟各位先進多討論的地方，以上是我的一些分享跟報告，謝謝！

自左至右：沈建文、陳秋政、蘇睿弼

江明修：

謝謝中央大學尤努斯中心沈教授。他們長年在做一些青年社會創新的競賽，我在旁邊看，覺得非常的感動，我非常同意你的看法，青年都不願意加入，加入以後計畫都做得很好，將來要他冒風險的時候就退縮了，就是整個社會的氛圍不好，所以他們的壓力也蠻大的。我也看到說，其實不必太悲觀，社會企業家創意家，本來就很少的，事實上你們的空間還是很大，我們也看到很多的校園，很多對社會具有責任感的青年領袖都出來了，我蠻期待你們中心要繼續做下去，還有很重要，就是政府資源的部分，政府資源很間斷，沒有長期規劃的時候，當然我們也知道民間跟政府的關係，本來就不是非要政府的資源不可。

但是我們今天整個國家跟社會的互動關係，政府出了很大的問題，民間的需求創新的程度，已經刻不容緩，結果政府還是不動如山，這個部分，其實政府只要做一點事情，就有很大的影響力。

所以剛剛有提到說地方創新，日本現在做得如火如荼，不管是地方政府，或是中央政府，對地方創新不斷的在投入，我覺得我們在討論這個社會創新的時候，確實有忽略政府的情勢，當然民間是做得非常的棒。最近陳秋政陳主任在做跨域治理的研究，也有看到說民間如何透過這個活力進入到政府，觸動政府的整個創新，這方面是不是也可以跟我們做一些分享。

江明修院長

陳秋政：

謝謝主席，很榮幸今天有那麼多的先進在這裡，大家一起就社會的創新，如何回應地方的需求這個主題來做探討，不知道為什麼我設定要講的東西，在主持人介紹的時候，已經一語道破了。因為我是公共行政背景，踏入到做 NPO 研究，所以不同的學科背景，來看這個主題的時候，探討民間力量的被激發或者被運用，基本上觀察的切入點，真的有所不同。

我們也曾經接觸到有若干有企業背景濃厚的朋友，當他們看到這個議題時，他們的觀點可能是甚麼？我們也接觸到，因為學科屬性的關係，可能是高比例可以接觸到政府文官體系的成員，或是乃至於在政治領域實務的參與者，他們對這事情的看法又會是甚麼？而這只是一個大分類底下的看法，在這個大分類底下，自然而然的所謂意見的強度和偏好又各有不同。所以在這個結構下，回應到像一強總經理所說，就是說，舊問題，會隨著時代的改變而有新的展現，所以過去管用的方法，慢慢的就已經出現了一些瑕疵，或者是不夠。可是新的方法，又要從哪裡出來？

剛剛我做了一些小小很簡短而即席的投票，那時候我不太敢抬頭看，因為我不知道今天在座的，投出來的結果會是如何？我剛剛有稍微瞄到，台前這裡面大

概學科背景的，大概都投 C，就是公民部門，剛剛這個角度，我不太敢看，我真的沒有把握，我不好意思占用大家的時間，再舉一次手，剛剛我想各有比例的差別，所以就算這個創新的方法，來自於企業，來自於社會，我就觀察到一個現象。

在昨晚(歡迎晚宴)我也做了一個冒昧的詢問，詢問誰？比如我左手邊來自於香港的區議員，我就問他說這次有不少區議會議員的朋友來，坦白說，有看到他們各自歸屬不同的政黨，我跟他談了一段我的觀察，我說由年輕的一代區議員參與的角度來看，我覺得他有一個特色就是能溝通。再來就是他們相互尊重，知道自己認同對方，或彼此是從某一個角度，認為他在服務他們所在的香港的朋友們，也就是說，approach 也許不一樣，各有所長各有信仰，可是大家也會基本上相互尊重，也認為這是對的事，這是我觀察他們的現象。當下區議員有給我一個回應，說基本上就是這樣子沒錯。因為是很簡短的對話，不敢說能夠來做多大的推論。

同樣的道理，這個創新的東西，到底從何而來？從公共行政的角度來講，還是像主持人所講的，跨部門的治理。最近台灣有一個非常夯的媒體報導熱點，就是我們首善之都的大家長所說的一句話，各位好像都知道那句話是甚麼？我都不好意思說出來，看在座的人不知道有沒有哪位有勇氣，因為台灣有很多現象，有時候碰到大人物講話會發抖，我就想我們的教育出了甚麼問題？所以我怕我等一下也發抖不太好。

自左至右：沈建文、陳秋政

但是我要講的是甚麼？如果說我從跨部門的角度來講的話，如果你是一個叛逆，有能力的文官體制，那就是我要的，因為那可能是創新的來源。相對我們公行的背景，接觸到看到很多的文官系統，我相信各國都一樣，只是程度的差別而已，公部門同仁他被法規的限制，他被組織文化的侷限，他整個系統當中的傳承，還有他被整個制度裡面所謂的無形的懲罰，慢慢他被同質化之後，我都覺得他不

是不創新，他就講創新對他來講是一種懲罰，他會認為我為什麼要創新？所以我向來不會覺得說公部門的同仁是怎麼樣，我會認為這個部分是制度的問題。

我當然沒有辦法每一個部門這樣舉例，但是我要講的就是，就這樣看起來，我們談地方需求和社會創新，有一個很大的問題，那就是我們怎麼支持他，換言之，怎麼支持在政府部門裡面，或者是政府部門這個系統，怎麼支持企業這個部門，去正視且願意去參與到這樣一個社會問題的解決，同樣的問題是怎麼樣去支持到第三部門，或是公民社會部門。

所以我認為建立一個支持性的環境，來有利於社會創新的推動，那就是各位在座目前共同努力在做的事情。所以剛剛沈主任他提到，他做了很多這樣的工作，我是覺得他的意涵很大，光是在教育的意涵來講，收穫就很大，如果說要從很多的競賽，因為台灣很多事情是一窩風，如果我們每一年要去算這個海報的話，當中像陳主任他們做得這樣好，做得這麼持續，做得這麼所謂反思性的，當然不見得是都有全部達到這個境界。但是都一窩風，當中出現很多的競賽，提供很多的刺激的場合，我覺得貢獻是不可抹滅的。但是你如果要講這當中的拔尖，我又要回過頭來剛剛那個問題，因為每一個部門當中有他的限制。

所以我是覺得另外一個觀察，就是知識分子碰到的限制是甚麼？或者說不見得是知識分子，我們講公共知識份子，關心公共事務問題的各界知識分子，政治領域的知識份子，企業領域的知識分子，學術領域的知識分子，我們的養成的過程是甚麼？我們所感受到的支持環境是甚麼？今天你可能有一些創意，你要做某一件事情，旁邊就可能會出現很多關懷的聲音，很多希望引導的聲音，你的創新可能還沒有冒出頭，就已經被淹沒掉了。

這個東西會延續到我們很多東亞文化的問題，就是說他本身有三個基礎，他不見得可以引導到問題解決的結果。所以碰到這個癥結，應該怎麼做？歸納起來我發現，大家可能可以思考幾件事情，或者是說我們看到很多方法，像剛剛甘樂文創或者是林峻丞，那邊同屬性的，那怕是在偏鄉教育，全台灣又那麼多的團體或是機構，那怕政府也不乏對這種偏鄉教育做得備受好評的案例，整個看起來，我發現幾個事情，這個跟所謂支持性的環境，有很大的關係，那只要在做創造這種支持性環境過程當中，做這三件事情有時候相當程度的辛苦，需要被大家廣泛的認知，就是說當你看到他採取第一步做一個象徵性的動作。

象徵性的動作有時候刺激性很大，可是象徵性的動作，有時候目的是要增加能見度，做一些意見的交換跟刺激。可是有好多的社會創新，踏出第一步，要做象徵性的動作，那怕是一個宣示的時候，可能他就胎死腹中了，這是一個我是覺得我們對象徵性的動作，包含語言包含具體的措施行動，我們的對話能力和尊重彼此，嘗試創新，接受錯誤的風險，在象徵性動作這一關，我覺得可以反思一下。

另外一個，就是說可能我們在我象徵性動作以後，需要一個短期而有效的措施，因為就算我們走了第一關，能夠接受這樣一個象徵性的宣示，大家的耐心是有限的，也就是說你接下來，要花多少的時間讓我能夠看到你的成果，所以從方案設計及成果展現來講，帶來一個很大的考驗。

第三個部分，我是覺得最重要，那就是長期願景的堅持跟擴散，堅持很難擴散更容易出錯，這個三部分，是我要講的。歸納起來，我們現在整個狀況，這個跨部門的底下，我用一句話來解讀，叫因小而失大，因小而失大我們怎麼去解讀這句話，可是我現在的解讀是，這個跨部門當中，有好多的考慮，充滿由小而失大的狀況，就因小錯誤而沒有勇氣去規範，沒有勇氣去說出你的主張，任由他發生，然後繼續去盤根錯節，小問題最終沒有辦法解決，可是我願意去創造一個新的體制，把所有沒這小問題的一大群人都綁住，這是我的新解讀，就是由小而失大，小的東西你沒有魄力去解決處理，然後任由他去發揮發酵，然後我們真的要解決的時候，卻去創造一個新的做法，新的想法，然後去把其他的都約束住。如果這個現象，我的觀察是存在的，那我所謂的社會創新跟地方需求的滿足，未來會是怎麼樣一個操作環境！所以這是我一個初淺的說明，還有一些細部的案例，但是第一輪兼顧到發言時間問題，我就先講到這邊，如果還有機會，再跟大家做一個分享，謝謝！

江明修：

謝謝陳主任，從陳主任的發言裡面，其實很重要有談到一點，這一點就是我們知道，科技創新擴散是非常快速，而且非常的深，但是制度跟觀念的創新，包括社會的創見，這個是沒有甚麼，因為要跟整體的文化在作戰，因為改變一個宏觀的文化，改變一個社會家長式的，都是非常困難的，這也是為什麼許委員在作戰的時候一直努力想跟社會溝通，這部分其實是社會創新關鍵的地方，也就是政府改革面臨到最大的問題，也就是觀念和制度的方面，如果我們在這一關可過去的話，我相社會的政策品質提升可以得到改善。再來請我們東海大學的蘇睿弼老師，蘇教授長期在社區再生的部分，因為在大墩社區，可以跟我們來多介紹一下。

蘇睿弼：

主持人，各位貴賓，大家好！時間關係，我本來有準備 power point，我想我還是用口頭來分享一下。我其實是東海建築系的一個專任老師，然後我也從 2012 年開始，主持了一個中區再生基地，就是台中的舊市區，可能大家知道的公園的舊市區的一個所謂的都市再生的一個據點。因為從 2012 年參與，剛開始只是政府一個研究計畫，可是計畫結束之後，我跟我的團隊還是在那個據點持續經營。

經營這 5、6 年下來，慢慢接觸到很多的年輕人，然後有很多的年輕人，想要到舊市區，因為舊市區有非常多的空屋，台灣這幾年各地都在流行返鄉經營，

年輕人回到他們的故鄉，找到一個閒置的空間，做一些老屋活化，開咖啡店還是做一些藝文空間，我覺得這樣的現象，其實是說明了台灣的經濟發展，其實已經到了一個資本主義，一直往外擴張，然後造成老的城區一直的空洞化，這個現象，在台中特別的嚴重，所以一些年輕人，在這個時候回到他們的故鄉，回去舊市區，去尋找他們可以做一點事的空間，就是說台中舊市區，不光只是舊市區的問題，他也是一個台灣各地形成的一個問題，這也關係到台灣社會高齡少子化的這樣的一個現象。

蘇睿弼教授

高齡少子化的時代，其實原有的舊市區生活功能算方便，在舊市區裡面，非常多的社會議題，包括銀髮族的議題，或移工的議題，或者一些開放空間的議題，在中區站基地，2012 年成立之後，陸陸續續我們做了非常多購物調查，也做了當地文資源的調查。

這個基地在做再生的時候，從願景調查媒合行動這樣的一個步驟，我覺得今天的主題，就是地方需求與社會創新，我覺得地方需求到底需求在哪裡？我覺得學術單位，其實可以扮演一個綿密調查的功能，透過綿密的調查，就以我們在台中舊市區，去所進行的這個空屋調查，從 2012 年開始，所以我們掌握了非常多的空屋的物件，當然我們不是一個不動產的代銷公司。

可是台灣有非常多的社會剩餘，我們稱它是一個社會剩餘，這個社會剩餘對上個世代來講，他其實沒有擺到資本市場裡面來，這類的社會剩餘，其實非常的多，我覺得藉由學術的力量，去了解這些社會剩餘，這些社會剩餘要重新導入新的資源，我們的作法是在台中舊市區，找到些社會剩餘，然後我們讓年輕人短期的去活化它，比如說，我們曾經讓一個南夜歌舞廳，然有中興大學的學生，以及德國的藝術家，把那個歌舞廳短期活化，把他變成一個藝術的展場，完全沒有用

到公部門的預算，他其實是一個滾動式，滾雪球式的這樣的藝術策展的活動，同樣我們也在前年，媒合了東海建築系的學生，把一個 400 多坪的廢墟的銀行，變成畢業設計的畢業展。

所以介入這樣的一個行動，其實學生他在這樣的一個行動當中，開始去學習到怎麼樣踏出校園，去面對社會的真實，我還得印象蠻深刻的，是學生要在兩個禮拜，把那個 400 多坪的廢墟打掃乾淨，而且辦展覽的時候，沒水沒電，學生雖然很累，可是學生那個眼神卻是非常有活力的，而且開幕的前一天，那個廢墟的表面還有一個很大的看板，學生們覺得說這個看板，在開幕的時還留著不是很好，想要去募資把它給拆掉，所以我印象很深刻，那天早上我在臉書去公布，之後到了下午，就有五萬多塊的錢進來了，所以他們就把那個看版給拆掉了，所以我是覺得，這是透過一個簡短的，讓學生在這個行動過當中，他們也知道哪些社會資源，他可以運用，所以我們像這類的短期活化去媒合了一些企業，甚至媒合了一些像建築師進舊市區這個部份，也包括大家也比較知道兩個女孩子，他們所創立的好伴共同工作室，也是透過我們的空間媒合，然後提供他們一些空間整修的建議，這個是我們在舊市區作的一部份。

另外一個，就是我們做了很多人文地理調查，了解當地的故事，我們用另外一種敘事性的方式，來重新行銷台中舊市區，然後出版大墩報，我們從 2013 年到現在，出版了 9 刊，所以也培養了很多的導覽產品，很多的導覽就依據我們的大墩報，組成了很多的小團隊，這些導覽團隊就去幫很多的旅館，因為舊市區有很多的旅館，他們就去做一些外語的導覽，甚至他們也可以做一些收費的導覽，

然後甚至有一些團隊，他們是去訓練街友去作導覽，叫「角落微光」。這些團隊目前都進駐在我們的基地，除了這個之外，我覺得就是透過學校的力量，怎麼讓學生去做自組學習的社群，他可以和學校在學的學生做對接，可以讓學生學習到實踐，可以有一個實際參與的過程，我覺得這是從了解一個地方的需求，再想怎麼樣去達到這樣的需求。

因為在校的學生，不會想到那麼遠，我印象很深刻，是我們問題解決導向的課程，其實可以希望學生去解決社會問題，沒有想到學生竟然跟我講說，我們還是學生，我們又不是要創業，我們只是要創作，所以他只是一個來表現，去做一些創作，這個過程當中，開始讓他們看到有一些比他們年紀稍微長，一些開始實際踏入社會的一些公民團體也好，或者是社群也好的一些行動，由這些社群帶領這些學生，其實是形成一個自主學習的社群。

最後我要講的是，其實創新只是在整個社區，或者學校的這個平台，在行政上也需要很多創新，我覺得我們行政的體制，到目前為止，地方政府都是一種科層式管理體制，可是台灣現在越來越多的這個問題，其實都是要跨局處的，特別是在台灣經濟發展的時候，你要去大量建設，其實科層式是有效的，可是我們慢

慢的發現，在很多要解決現在的社會問題，光這樣一個科層式的制度，是慢慢沒有那個能力。

所以我覺得行政創新，是要解決很多社會問題很必要的一個條件，而且透過一個學術單位一個整合，過去學術單位大概都是在一個產、官、學的一個架構之下，可是慢慢的產、官、學，當產業界的研究開始跟社會脫節的時候，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餿水油事件，學校在某種角度，其實他也忽略了社會的一些需求，所以我覺得學校慢慢的轉向一個所謂的公民學，公部門、民眾、學校這樣一個新的三角關係，那這個新的三角關係，其實也是某種程度也是告訴學校本身，是一個社會企業，學校本身就是要扮演一個社會企業，只是這個社會企業裡面，怎麼樣讓學生可以了解從學習到實踐，各種不同的切入的一些路徑它的可能性，這大概是我的意見，謝謝！

會議現場

江明修：

學校其實真的是一個社會企業，因為常常我們上課的時候，講一些我自己做不到的話，反而學生相信以後，做得非常非常的好，我常常碰到這種情況，而且畢業一兩年，就做得非常非常的傑出了，超乎我們想像，這是我們台灣真正的競爭優勢，因為前兩年我到首爾，他所帶動一個新的治理型態，就是他們給錢給得很大方，一個是 NGO，一個是社會創新園區，他們給的場地，往往很棒，預算都是 10 年預算，都是天文數字，他們裡面的人精彩得不得了，他說這就是人性的治理型態。

但是他們跟我們台灣的經驗來比較，我們台灣就更有競爭力，他們在經費很充裕之下，他們當然也不是官僚，我問他們 idea 從哪裡來，他們說從英國從歐美，但是你看看，到目前為止，台灣的這些經驗，都是結合世界各地，但是很多

也是地方創設的，這個地方有很多的東方價值，而且將來的影響也會很大，剛剛講的首爾的年輕人，他們的自信力很夠，他是說一直看，他們就一直模仿，所以跟韓國車一樣，模仿得一踏糊塗，但是這樣人家就會認為，這就不是你的嗎？我們台灣這方面，政府的錢很少，但是有一點很重要，政府的支持或合作關係不要太短期，至少要有 10 年。現在，我們邀請下一位王威中議員。

王威中：

謝謝主席，與會的各位來賓，還有教授，我今天參與這個題目，我腦袋裡面最先想到的是負面出發，就是說理論上一個良好的 model，應該是以我們民代做一個中介，了解地方的需求，社會的需要，我們應該去整合公部門的資源，法令上的鬆綁，或者是解釋，來讓民間好做事，來成就一個讓人民生活有所改進，或是社會更加運用科技來進步的這樣一個目標。可是就我跟各位報告，我是第 1 屆的議員，我以我目前的公職才快滿 3 年，這 3 年來，我從台北市所觀察到的一些事情，通常是背道而馳，和我剛剛形容的 model 是相反的，孰令致之？

高雄市議員蔡金晏(左)，台北市議員王威中(右)

我覺得有太多的環節，需要檢討，我想剛剛主席江院長所提到的在首爾做這樣的模型，台北是應該是永遠無法達成功，光是要提出一個天文數字的預算規模的時候，就各個政黨民代開始去動腦，這中間有多少的舞弊，然後這個真的下去之後，真的有可能舞弊，所以我想台灣還是有他自己的極限。

我舉幾個實際的案例來分享，來就要因為過程當中，一方面我必須站在多協助這個科技和民間的需求，去讓生活便利，但是一方面，我又必須站在監督把關公家部門資源，不會被濫用被貪瀆等等，兩種算是有一點衝突的立場去看同一個

問題。我舉例，大家曉得 uber 在進入台灣這幾年來，就迅速的非常受歡迎，那他也激起了公部門去回應，和法令上的討論。

去年其實在台北市有客運業者,他們腦袋也動得很快,轉到坐公車版的 uber,他的型態大概是和小客車的差很多，他的主要的 idea 是說，我們有很多公車路網沒有照顧到的熱點路線，像是我的選區，北投天母必較深入的地方，到內科科學園區那裡，如果坐公車或是坐捷運就會非常麻煩了，大部分住在這樣位置的居民，他如果在內科上班，就是公車路網、捷運路網接駁不到的地方，他們也許非得開車或騎車不可了。

那一客運業者就想到說，我來提供讓大家先預約，我只要湊滿開團，意思是這樣子我來一個訊息，比如說住在這個關渡地區，那你們如果有湊 40 個人，在 8 點半的時候搭上車，然後我就把你通通拉到內湖科技園區的某個地方去，那麼回程也一樣的邏輯，只要有湊滿一定的人數，我們就一班車為你量身打造，結果迅速非常的受歡迎，所以剛開始他為了推廣是免費的試乘，本來在去年的夏天的時候就說要收費了,即便要收費,他這個費用還是會讓這個通勤的人有這個誘因，比這個開車或騎車划算。

但是他違反了很多的法令，光是我們這個公車處的交通處公運處，再來就是中央部們的幾個局處公路總局等等，每一個局處的法令他都違反了，然後他也有像 uber 一樣的問題，一個是繳稅的問題，一個是司機的訓練，還有車輛的維修保險等等,但是我不禁的把這兩件事,uber 和那個公車叫 my bus 合在一起去想，民間有需求，才產生這樣新的營運模式，那法令到底是打壓它，還是配合他去調整修改，這其中當然有各種不一樣的觀點，不過當時我個人是站在和 my bus 對立的立場。

我當時主要的考量，不是否定這樣的創意或是運作模式，我也認為法令趕快去檢討,但是在法令還沒有修改前,對乘客保障風險太大,有朝一日如果出問題，這個當然沒有人希望，但是如果出問題，責任就我們扛。

當時我反對的另外一個主因是，這樣一個脆弱的經濟模式，據我所知道像 uber 是砸了相當的財力去支撐初期的推廣，但是據我所知道是這個 my bus，沒有很雄厚的財力支撐，也許他玩了一年半年，他就撐不下去了，或是獲利不佳，就收掉這個事業，那對於這個養成習慣乘車的人，會衍生很多的後遺症，突然不開沒有任何公部門去為消費者把關。

所以綜合種種的考量就先緩緩，但是我也請我們的政府部門能不能檢討，這是我印象蠻深刻的案例。我是覺得政府公職或者是民代，甚至法令規定等等的存在，當然是為了讓人民更便利的生活。在 uber 的事件 my bus 的事件，還包括最近一個新的模式叫 obike，他是一個隨停隨借的，結合手機科技的一種模式，也

被政府部門和捷安特一起去抵制，這個中間有很多的課題是我們這些身為公職的人，必須去學習的，法令方面必須要去了解的。

其實我覺得公部門就是一個最抵抗創新的，我不知道在場的教授們同不同意，但是至少台灣或台北市的公務員，是最抵抗創新的一批人，因為大家覺得有冒險就會有風險，最好在我的任內，不要有發生任何的麻煩，平平順順的蕭規曹隨不要搞，我是覺得這樣對民間的發展是相當可惜的。

我再舉另外一個例子，這個是我去年下半年的時候，我在議會裡面財政委員會，我才了解到我平常沒有注意到的，就是我們的商業處，今年有編一筆相當大的預算，大概 1 年有 4000 多萬預算，在我們台北市 700 億的預算規模算好。

它要做甚麼事？就是他準備挑 20 間的傳統商家，他就了找一批空間設計的建築師，或調整口味的專家後，政府補貼一大筆錢給雀屏中選的商家，就找個專家來幫你改造健檢，如果你是賣牛肉麵的，過去一個月可能只能賺 20 萬，他們希望幫你改造以後，每個月能賺 30 萬，他們就是想幹這個事，這些一二十家中選的商家，前面健檢是政府補助，但是後面的改造工程，比如招牌要重做等等，就要自己花錢。

這樣一整套模式，我一聽了以後，覺得雖然這一整套的計劃，你不能說是錯了，但是你不應該只是輔導這 20 間的商家去升級而已，應該把這樣的模式給擴展出去，由政府來率先提出這種合作模式，並帶動推廣這一模式，讓更多的商家能夠了解，因為你的目的是推廣，所以應該這 20 個故事，讓大家廣為了解，如果商家願意找人來做這個，那就會以商機出現，很多作設計的做裝潢，就有機會幫這些商家作提升，大家的業績都會提升，結果這樣的一個模式計劃，卻是由政府埋頭自己幹，然後辦一個頒獎典禮，弄弄報告就結案了，我覺得類似這個案例，這樣的思維上面，政府並沒有在扮演一個新概念新模式的火車頭的角色，反而是在做文書作業的工作而已，因為他們認為做大了以後，就很難去掌握，那我把它限縮在 20 家的商家，只有一批團隊，然後弄一弄，然後每一家商家的營業額都有增加，再拍幾張照片，向議會交代就結束，這是我現在看到比較大眾心態的問題，我現在就分享到這邊，後面還要請高雄來的蔡議員，能夠提出更多的案例來就教大家，謝謝！

江明修：

謝謝，剛剛威中所提到官員的提案，很多的官員是積極的不作為，所以我們希望有一個更大的視野。我知道像毓仁立法委員，他當初到西點大學的時候，有看到一些國際的現象，後來他有很多創新的觀點，最近他提出了一個公益法人的概念，透過公司法的修改成立專章，這個可行性是很高的，這部分是不是也跟我們來分享一下

許毓仁：

謝謝江老師，還有威中和金晏，各位先進，還有老朋友一強，我想還是先從三個問題來討論，說到社會創新，我們到底碰到甚麼樣的瓶頸？該怎麼樣來突破？

我覺得這個世界，發展到現在，最大的變革，可能是過去 30 年來網路的出現。從 30 年前走到現在，網路已經成為除了基礎建設以外，最重要的帶動各種新的商業模式，可能產生新的形態，這連帶的顛覆了所有對產業的理解和認識。剛剛威中提了一個例子非常的好，就是像 uber 這樣的產業衝擊，應用在公部門和社會創新上，其實我們要重新去檢視，在角色扮演上，還有中間者，這樣一個關係人的重新被定義。

所以剛剛一強在分享的時候，我也頗有感觸，目前資本家公部門，或者是中介者，然後到最下面就是受眾，因為這個網路的出現，大大的改變互動關係還有從屬關係。

我想用以下三個問題來分享，讓大家去思考，就是說在談社會創新的時候，政府的角色應該要放在哪裡？在過去我們國家運作的方式，是一個大政府的思維，在網路的年代，我們要問的是說，我們還需要一大政府嗎？大政府所帶來是大量的行政效率的低落，然後他面對的也是比較舊時代的思維，那麼在社會創新的議題裡面，如果我們選擇站在大政府的角色裡面，那我們可能就是一個 top down 的政策，從上到下，無論是誰當政，在當政者的他有能力，有話語權的情況下，他制定他可以分配資源方式的社會創新的一個架構和論述，到下一個當政者，他進來的時候，那又是另外一套的做法和邏輯，這個我們只是會陷到無限的輪迴裡面。

立法委員 許毓仁

也就是說，當我們看到社會創新是一個改變台灣機會的時候，但若政府的角色沒有改的話，最後的結果就會是悲觀的。所以這個大政府和小政府，我們第一個必須討論的是，現在我們選擇他是大政府，我們希望他無限的給予社會創新的補助和資源，還是我們希望政府往後退一步成為小政府，然後讓社會創新者去創造需求，但是在創造需求的情況底下，可以找到法規完備的可能性，進而去產生新的產業，新的企業動能的一個驅動力。

所以第一個討論就是政府應該要退場，那這個退場最重要的事情是，政府要能認知不要去掌握每一件事情的時候，他就會讓發展的過程趨向於有機化，就是誰該留下來，他就會被這個系統整理過後留下來，然後他會被引導到一個長遠發展的可能性，就像巴菲特所說的，潮退了以後，我們才知道誰沒有穿褲子。

社會創新這件事情另外一個方法，其實就是台灣的原產業，我們都知道台灣的原產業，我們是過度補貼，然後靠著政府的依賴生存的一件事情。也就是說，如果政府沒有辦法往後退一步的話，從原本的控制者變成是引導者的話，我覺得現在我們看到的，還是一個生長不健全的生態體系，這是我第一個要提出來的。

政府在面對這個角色的轉移下，當然會有不安全感，來自於當政者他需要去維持政權，來自於社會民間給他的壓力，會有嗷嗷待哺的這些中小型企業，政府我覺得就是要提出一個新的行政創新和治理架構，一個新的願景，在這部分我認為是比較沒有看得到的。這個部分要怎麼去解決？必須要無論是地方的社會創新者，然後第二個事情是民意代表，第三個事情是學界，不斷要去呼籲說政府要慢慢的退場，社會創新絕對不能夠像以前我們在搞園區搞兩兆雙星，或是用任何一個政府，現在看起來是得分的一個話題，然後就用大量的資源灌進去，到了最後這個產業也是會死掉，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我要談的事情是，在理解政府這個角色在轉換的時候，我們的法規要扮演一個甚麼樣的角色？我覺得在過去，法規都是扮演一個規範者，就是說當一個產業出來的時候，由立法者還有行政單位制定一個遊戲規則，在這個遊戲規則裡面，去決定要怎麼玩。在過去產業的架構裡面，大概就是形成這樣一個角色，在過去硬體發展的年代，我們為了要讓規格明確，我們可以玩這樣的一個遊戲，那也就為什麼在過去的 30 年，按照各種的產業發展條例，然後不斷的在制定每一個產業應該要發展的模式。

可是我們在思考社會創新的時候，他是一個社會轉動的驅動力，也就是說社會創新，他不是單一產業，而是將來要普遍發展在各個行業裡面的心態和思維的時候，我們就不能用過去制定法規的方法，去制定新的社會創新所需要的法規。所以我跟其他幾個立法委員提出一個在政府角色轉的時候，可以協助政府過渡的新法規，那就是公益公司法。

公益公司法，他其實是在公司法的架構底下，賦予追求股東最大利益，這個公司法的一個過去的定義之外，一個新的種類品項，也就是說除了股東最大利益之外，你還要考慮到這個社會責任和社會貢獻對環境的這個衝擊，還有你在這個董事席次上，必須要這個公益董事，這個不是台灣第一個有的，在全世界包括美國已經有 6000 多個企業，甚至於是上市公司都已經是所謂的公益公司，台灣推動這個，其實是有一個重要的象徵意義，就是說幫助政府，他可以在社會創新啟動的過程裡面，他有另外一個角色，可以讓這些社會企業，可以去選擇，第二個是協助社會企業法制化和規模化，我們可以看到社會企業，除了社會之外，最重要的是後面那兩個字，就是企業。

當一個社會企業，他沒有辦法用一個公司的處理方式存活下來的時候，他還是回到一個 NPO 的角色，他還是要依賴大量的政府補助，在這樣的情況底下，我們又走回到老路去了。

另外一件事情是，我個人也覺得在這一個情況底下，我們不需要為社會企業立一個專法，因為社會企業他還正在萌芽當中，利用任何的法規，任何的方式去限制它，或是規範它，甚至告訴他你的營利所得要多少回繳到政府這才叫社會企業，我都覺得這是不對的。因為在這個情況底下，我們有可能會變成一個變態的社會企業的發展。因為當所有的社會企業要符合政府的規定，登記為社會企業就必須扭曲他原本的經營方式時，這是不對的。所以公益公司法可以賦予想要引進耐心資本，或是引進正常公司治理，或是引進正確的企業發展模式情況下，賦予他一個選項，我覺得這才是一個台灣要走的方式，透過這個方式，引導生態系的建立，由大帶小。為什麼社會企業在台灣，我們講了很多年，那個能量很大，但是我們現在講不出社會企業裡面的一個典範或是指標，我覺得在這個部份我們應該去思考，在這個制度底下，到底出了甚麼問題？

最後我想談的是，這不會是短期的 Budget，長久來說，他是一個社會工程，我們要去思考下一個 10 年，我們台灣的企業變成甚麼樣的一個樣態，過去大者恆大，大到不能倒的發展模式，其實已經不太符合台灣了，我們要去思考以一個台灣 2300 萬人，還有我們面對一個全球環境的挑戰。

包括我們的能源大量的不足，我們到底要在這一塊土地上，發展一個甚麼樣的產業？所以我覺得還是要回到三件事情，就是怎麼樣創造流動性：資本的流動，技術的流動，還有人才的流動。這三件事情，如果政府沒有辦法扮演一個引導者的角色，而是扮演從上到下控制者的角色，我覺得我們還是在討論一個與我們不相干的事情，也就是說，如果今天經濟部設定一個產業政策，是 only for 經濟部，科技部為了發展 AI，也弄了一堆錢專門發展 AI，最後大家想要的東西，變成各自發展各自的東西，沒有整合在一起。最重要的就是人才的流動，怎麼樣創造更多人才流動的可能性。

最後還是要回歸到一個治理的本質，因為所有的規範，當他開始發生的時候，第一個一定以早期的使用者，就是 early adopters，在台灣我看到很多的社會企業的 early adopters，他們在這個競爭的過程裡面，可能因為環境的競爭，最後存活下來了，他們會慢慢的形成某種程度的聚集，聚集就是生態系的出現。但是我們絕對不要讓 early adopters 在早期的過程裡面，就利用錯誤的方式，否則引導到最後，變成無限制或是永遠的要依賴政府的政策補貼，也就是像剛剛有老師提到的，為什麼我們現在有太多的創業比賽，但是對學生沒有誘因？真正去創業，停止再比賽，停止再拿到獎金的階段！所以如何用這 3 個角色去思考，第 1 個是政府的角色，第 2 個是法規如何去引導，而不是去限制，第 3 個，下一個 10 年怎麼去思考，這個生態系的建立是一個必須要去討論的問題，以上是我的分享，謝謝！

江明修：

接下來我們請遠從高雄而來的蔡博士，蔡議員。

蔡金晏：

謝謝主持人，各位來賓，各位與談人，大家好。剛剛主持人叫我蔡博士，其實我是學工程的，所以對這種社會科學，不要說半夜都在想，常常都會想到幹嘛要這麼複雜？在來之前我，看到這題目是社會創新和地方需求，我一時還不知道要怎麼談，還好有各位的意見出來，針對陳總經理講的，我覺得是不是可以透過所謂創造一個風潮，讓更多的所謂的資金的需求，人才的需求創造風潮。當然這個也不是我們說做就能做的，如果哪一天電視媒體打開，都在談社會企業，對很多的資金的聚集一定很幫助，我不知道這個能不能做。

第一個當然是現有公共事務的藩籬，怎麼去把他打破？我想這個問題，可能在座各位老師，學公行的還是政治的都瞭解，台灣的政治架構，長期以來，雖然不能說是弊病，但是你一進入那個系統，就會發現難怪會有這樣的養成出來。所以回過頭來，可能會多講一些政府可以做的事情，或者說政府該怎麼做？去講社會或者去講企業，選票會跑掉，所以我就不講了，開個玩笑。

我要跟威中議員講一下，不是台北市是這樣，高雄市其實也是這樣，講到創新就卻步，也是受限於法規，也是受限於如果要他做甚麼，他會懷疑是不是有圖利，會不會是有綁甚麼規格，會遇到很多這樣的事情，當然這已經不是行政部門本身的問題，甚至是司法部門也是，現在我們遇到很多狀況是去搶標，搶不到就去檢舉，有檢舉就去辦就去查。

高雄市議員蔡金晏(左)

比如說各個單位，有他所謂的本位主義的影響，如同剛剛蘇老師講到的，至少我們現在看到的很多事情，都不是單一部門的問題，剛剛許委員有提到我們的法規，很多需要與時俱進的，就像我在正修科大教台灣的海岸海洋環境，光一個海岸法，從民國 70 幾年，就有一個草案到 104 年才通過，10 年的時間才通過一個法案，像這些問題有很多，都需要行政立法部門一起來努力。

當然我們議會本身也有很多要檢討的，我待過法規委員會，我本身又不是念法律的，當法案拿來審，我總不能坐在下面不發言，其實一個法案，他是有系統性的，如果稍微改一個字，有可能未來會窒礙難行，這些立法過程，未來要怎麼樣去調整？都需要去修正資料，這個才能去創造，不管是好的管理也好，政治環境也好，讓社會跟企業有更大的彈性。

會議現場

我不免俗要講一個案例，這個不見得和今天的主題有關，這個是政府想要去做一些創新，但是跟地方需求有一些衝突。歡迎大家今年 10 月，在我們高雄的哈馬星生態交通節，這是一個國際組織，在高雄辦的生態交通節，過去在韓國的水源寺，南非的約翰尼斯堡都辦過，他主要就是希望大家都採用生態的交通方式，用這個沒有排放的一個交通工具。但是這個框架一下去，民眾聽到的訊息是無車日，一個生態交通節，就變成無車日，大家是想哈馬星，他大概也有一萬多的人口，在高雄有很多相對小型的生活聚落在那裡，那你突然的說傳統的運具都不能用，當然就產生很多的問題。

像這樣的一個議題，當初一丟出來，我們民意代表就接到很多的陳請意見，這樣創新跟地方需求，民眾會表示這不是我要的，為什麼你要做這些工作？

剛剛有提到公民，我覺得有需要再往前再進一步，在不管是政府要做創新的工作也好，社會要做創新的工作也好，這樣才能更進一步的去推動，這公民不管是素養教育訓練等等，都需要去做提升。

跟大家報告，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去過哈馬星，要去旗津要坐渡輪就一定會經過哈瑪星，原本有個公園路橋，現在橋拆掉了，從那個橋進去，坐渡輪到整個中山大學的隧道都叫哈馬星，在整個活動期間是不能開車的，將近一個月的時間不能開車，不能騎車，後來慢慢調整只剩一兩條道路不能使用車輛，和在開幕期間外國來賓來的時候，去做管制交通。在我的立場，我常常在質詢的時候也常常

講到這個大眾運輸的必要性，歡迎大家來高雄可以來看看，以上是我的分享，謝謝！

江明修：

因為在場有很多的學者專家,也有很多的民間組織的負責人,但是時間到了，外面催我們催得很緊，所以在下一場主題是建設性衝突，也是我主持，希望剛剛其他沒有機會發言的來賓，大家可以轉到那邊繼續討論。我想今天的話題，是永遠討論不完的，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行動，我對大家剛剛的討論，非常的支持，我也會呼籲立法院，對所謂的社會企業相關的立法工作，趕快的立法完成，謝謝各位來賓。

會議現場

2017年第二屆「亞洲地方議員論壇」（ACF）
「全球地方議員論壇」（GCF）年度論壇
「台灣地方民代公益論壇」

地方需求與社會創新
Community-driven Social Innovation

陳一強 Ray
raychen101@gmail.com
2017-08-26

活水社企投資開發公司
B Current Impact Investment Inc.

過去
Past

- 成立 Founded on 2014-04-10
- 資本 Target NTD50M（USD1.6M）
- 43 發起人 Founders from Private
- 常青，可循環 Evergreen, Recyclable
- 高度參與 High Engagement

現在
Present

- 6 投資戶 Investees all Social Enterprises
- 投資 NTD26M（USD0.9M）Invested
- 合資 NTD90M（USD3M）Co-invested

未來
Future

- 活水2號基金 B Current Fund 2
- 資本 Target NTD100M（USD3.3M）
- 15~20 股東 Shareholders from Private

2

什麼是社會創新？
What is Social Innovation?

Stanford SOCIAL INNOVATION REVIEW

3

創新 Innovation = 選擇 New Choice

選擇 New Choice = 用新方法解決舊問題
A Big Idea that Trumps Existing Solutions

4

- 新的方法通常會從哪裡來？
  Where Are Great Big Ideas Coming from？
- 如何才能有效導入新方法？
  How Can A Great Big Idea Be Implemented？
- 創新如何能引發真正改變？
  How Can A Great Big Idea Be The Change？

5

三峽，有什麼需求？
What is The Need of Historical San-Xia?

[redacted]

6

7

8

9

社會創新的實踐 = 社會創業家
Social Innovation in Action = Social Entrepreneur

「社會創業家不滿足於給魚吃或給釣竿。他們不會停止努力直到改變整體漁業生態系統。」

"Social entrepreneurs are not content just to give a fish or teach how to fish. They will not rest until they have revolutionized the fishing industry."

Bill Drayton, CEO, Chair and Founder of Ashoka

10

他們有什麼共同點？
What Are They in Common？

- 創業/興業 Entrepreneurship
  The ability to do a lot with a little
- 創新/變革 Innovation
  A big idea that trumps existing solutions
- 衝擊/影響 Social Impact
  Results, pure and simple
- 熱切/渴望 Aspiration
  Thinking big, but in a pragmatic way
- 長遠/永續 Sustainability
  Built to last
- 複製/擴展 Scalability
  Replicable and/or Scalable

11

補助是毒藥？
Is Government Subsidy Poison？

12

如何有效引進民間資金/源支持社會創業家？
How to Bring in Capital from The Private Sector？

13

2017年第二屆「亞洲地方議員論壇」（ACF）
「全球地方議員論壇」（GCF）年度論壇
「台灣地方民代公益論壇」

地方需求與社會創新
Community-driven Social Innovation

陳一強 Ray
raychen101@gmail.com
2017-08-26

A2 場次：地方觀光與交通建設

主持人：

丘昌泰　元智大學社會科學學院院長

主講人：

劉坤億　桃園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與談人 ：

王保鍵　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系助理教授

邱榮舉　國立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教授

紀俊臣　銘傳大學社會科學院院長兼公共事務系教授

謝政諭　東吳大學政治系教授

高閔琳　高雄市議會議員

張雅旻　台中市議會議員

賴佳微　台中市議會議員

丘昌泰院長(左)，劉坤億董事長(右)

丘昌泰：

首先歡迎各位來參加第二屆亞洲地方議員論壇。今天這個會議性質就像是一個 closed meeting，比較沒有外面閒雜的人來參與，我們可以很深入的做一輪、兩輪的對談。我們進行的方式先請主掌機捷很重要職位的主講人，劉坤益劉董事長。

劉董事長先報告從捷運的角度跟觀光結合，接下來與談人從自己的角度提出

自己的看法，然後我就開放給大家討論。最後我會把結論，重要的論點，summarize 以後提供給大家參考。如果還有時間的話，再針對我提出的結論意見，大家可以再進一步延伸，先請劉董事長。

劉坤億：

劉坤億董事長

在座很多是我的前輩，剛剛跟台中過來的雅旻議員，我們在簡短的交談過程當中，我知道我今天的報告，最重要的應該是在財務方面，到底捷運是會賺錢？還是會賠錢？是會賠多？還是會賠少一點？這個才是我今天報告的主題

我的簡報內容，主要是回顧一下整個桃園機場的捷運，從興建到營運的歷程。截至今天，桃園捷運其實已經營運 5 個多月，到昨天已破了千萬的乘客。再從最近來看，我們機場捷運的效益是在哪裡？在通勤效益以及在觀光旅遊的效益等等，最後我會在桃園都會區的路網方面，提供大家做一個參考。

我想這條捷運大家耳熟能詳，但是大家負面的消息也蠻多的，規劃 2 年，興建 10 年，終於通車了，其實它有它的歷程，這個我就不再贅述，跟我關係比較密切的是，今年的 3 月 2 日，是正式的營運通車，之前的 2 月 2 日，我們試營運一個月。

以目前來看，整個桃園的機場捷運，從整個旅運功能方面來看，確實可以被定位成機場捷運，舉個例子，現在我們整個運量，在 3 月到 7 月是 5 萬 4 千，8 月比較高，是到 5 萬 7 千。之所以叫機場捷運，我們以去年的數據來看，機場每天服務的人次是 11 萬人次，扣掉過境的人次，大該就是 10 萬人次，當中我們負責輸運的，不管是出境或是入境的，佔了百分之 24 到 29，比較正確的數據，如果營運時間從早上 6 點到晚上 11 點，可搭乘捷運的出入境旅客，其實在比例上，

已經達到 28 到 29 左右，那這個對機場疏運的效益可想而知。

這條捷運他不只是連結機場到台北的一個快線，他也是串連北北桃生活圈的一個通勤捷運路線，全長 51.03 公里，有 21 個車站，其實在一開始營運初期，很多人都提到說機場捷運的票價是不是太貴？事實上，貴或者是便宜，它有它客觀的計算標準，當然我們也理解到，對於每一天通車去上班的人，跟偶而出國，去商務或旅遊的人，他對於票價認知會不一樣，因此在通勤方面，我們推出了一些優惠，這其中包括 369 的定期票，跟 135 的定期票，所謂的 369，其實簡單的講就是 30 天、60 天和 90 天，30 天的 7 折，60 天的 65 折，90 天的是 6 折，至於 135 專案，完全是提供給機場園區，或是沿線的企業學校機關，100 天的定期票，300 個人團購打 5 折，以這樣的推出的內容來看，事實上已經涵蓋優惠很多通勤族的需求。

到目前來講，全線使用定期票的，已經高達百分之 13，每天大概有 6000-7000 人是利用這條線作為通勤路線。以觀光旅遊的效益來看，其實我們很清楚，這條線假日的觀光旅遊的人次，假日是高於平日，為什麼？因為假日除出國之外，很多人會做為觀光休閒，不管是跑步或到坑口彩繪村去走走，各位可以看到 A2 三重站，它那邊有一個 20 公頃大都會公園，所以假日的運量，就比平日多出百分之 34.3。A11 另一個坑口站，是一個彩繪村，他假日就比平日要多百分之 45，特別明顯是在 A9(三井 outlet)，這個地方假日的運量，是比平日高出兩倍，A18 在南桃園，他也成長 32.9。

A19 是一個體育園區站，這個地方是 Lamigo 的主場，我們也跟桃猿隊合作，把車站布置成職棒的一個意象，今年的比賽是 53 場，以運量來講的話，我們跟他們異業的合作，事實上只要有賽事，每天的運量是成長 4-5 倍，簡單的這麼說，我最新的統計，去看球賽的人假使有 1 萬人，到目前為止，已經有百分之 16 民眾，是搭乘捷運來看球賽，這個 16%，一趟是 1600 人，來回兩趟是 3200，對我們的運量的增加是有幫助的，我們在異業結合的過程當中，是說你搭乘捷運來看球賽回程免費，這是一個異業結合，

桃園都會區的一個大眾捷運路網，其實很多人也在提到說，這條捷運線是不是在經營上有困難？當然依我們看，他運量如果沒有辦法達到 6 萬以上，對我們單一條的捷運路網來說，營收會比較困難，也就是說會有虧損。

但是隨著桃園都會區的大眾捷運的路網如果形成的話，我相信運量會大大的提升，其實捷運系統對一個都會區來講，我經常也藉台北市的發展來做一個比喻，20 幾年前，台北市在規劃捷運的時候，很多人也抱持不同的意見，20 幾年台北市人口才剛破 200 萬，大概在 210 萬左右，那個時候為什麼那麼需要都會的捷運路網？20 年後的今天，台北市的捷運系統每天的運量是 220 萬，當然他們是短程搭乘，跟我們的性質是不一樣。

我們來看看以 2017 年的今天，桃園的人口到達 216 萬，而且已經是接近 217 萬了，以這樣的一個人口數，並且是密集的集中在龜山、桃園八德、中壢、平鎮這些核心區域，總共是 141.2 萬。

所以以一個都會的來講，運輸需求其實是還蠻重要的，我們在捷運綠線方面，行政院極早就通過了，今年會動工，預計在 8 年後會全線通車，我們的規畫，是能夠分段通車，可以的話在 4 年後，首段就可以通車。

會議現場

未來整個桃園的路網，各位可以從這張圖，看到機場捷運是紫色的這條線，從台北車站一直到中壢車站，綠線是東西向，東西向是從航空城一直到八德，這條線的計畫在前瞻計畫中，他的延長線也被同意了，延長線就是從八德往平鎮，在往中壢接起來，就形成一個口字型的路網，這對都會區來講，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交通的規劃，再加上紅線，紅線其實就台鐵的地下化，地下化他其實就是立體化，也就是捷運化。

未來桃園的整個路網，會更加快的形成，這當中當然也包括了正在興建新北的三鶯線，他距離八德非常的近，我們在爭取把三鶯線連通到綠線，另外北捷已經到迴龍的一條線，我們希望透過輕軌，能夠接到這個桃園車站，這個是棕線。

最近爭議比較多的是前瞻計畫，我相信今天與會的學者專家，也會問到這個問題，到底他有沒有他的價值？還好目前前瞻計畫所通過的，包括高鐵桃園段的地下化，總共是投入 964 億，桃園綠線今年會動工，總共是 982 億，綠線的延長線，從八德聯通到平鎮中壢車站，是 351 億，這些算是已經通過的案子，會陸續的推出。

透過鐵路地下化的沿線的通行，事實上，很多人沒有去注意一個問題，就是

桃園車站和中壢車站，是在台北運輸當中，在運輸量出入量，是全國佔第 2 名第 3 名，鐵路地下化對桃園的都市發展是非常有幫助，這個是我剛剛有提到過了，綠線是在今年底，我們希望趕快發包三鶯線更延伸到八德，我剛剛也提到過。

這個照片是上個月由鄭市長，帶我們到日本六個城市去參訪，這個是京都車站，京都車站他非常成功的透過 TOD，也就是利用城市運輸作為導向的方式，非常的成功，我們現在也在規畫桃園火車站，希望把車站整個站體跟站區，能夠規劃得更完善，不要用一種單純的車站，而是要用一個商場的開發，包括立體的地下街等等，務必能夠讓公共運輸，能夠創造都市運輸的一個區域的發展。

最後，我的結語是，軌道建設如果能充分的搭配 TOD 的話，他是活絡在地發展，跟帶動產業繁榮以及觀光，應該說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政策手段，軌道他所帶動的經濟，就機場捷運通車短短的半年，我自己也見證這個過程。

第三個就是軌道建設經濟，他的外溢效益，通常都是被忽略了，比如說，當機場服務每天服務的人，入出境的 10 萬人當中，有 3 萬人是由我們輸運，他所造成的外部效益，就是第一個國道一號，又是中山高的塞車狀況，特別是在連結國道二號那一段，非常非常的明顯，以去年來講的話，出國旺季，國道二號是經常會塞車的，這個狀況目前解除了。

另外就是私家車減少了，對空氣品質有幫助都可以先不談，這些事實上都是軌道的外部效益，還包括我們剛剛所提到，它對於整個附近區域的發展，所造成土地價值及商業的繁榮，我想這個更不在話下，時間的關係，我知道今天的與會者，會有更多的問題，所以我的簡報就先到這邊，謝謝！

丘昌泰：

謝謝劉教授，事實上，劉教授他剛才的論點，就是對我們這個新的捷運系統，做了一個非常完整的簡報，大家了解，桃園捷運不是民進黨時代設計的，從設計規畫到最後，其實已經花了很長的時間，所以從藍軍開始，事實上就已經開始在弄了，這是大家必需要正面看待的。

既然他是在台灣土地已經長出來的孩子，我們就應該要好好的把它經營，其實我長期的來看，未來桃捷它的前景應該是非常好的，原因很簡單，就是因為桃園將來一定會成為大台北地區的很重要的衛星城市，我們在座很多的工作機會，甚至住的地方，很可能是在桃園，不是在台北，因為在台北你買不起房子，在台北你甚至連工作的地方可能也沒有。

因為現在桃園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計畫，就是亞洲矽谷計劃，事實上它就是走高科技網際網路，我們從這個角度來看，其實我是覺得前景很看好，現在我們有幾位與談人，第一位是王保鍵王教授，現任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系教授，也是以前台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局的科長，王科長請，我們照這個名單

來進行。

王保鍵：

王保鍵教授

如果從我之前是政府的觀點來看，軌道建設確實是很重要，因為桃園本身它是有一個族群關係，哪一邊必較偏閩南？哪一邊比較偏客家？所以捷運它在 A20 站，所謂的中壢的環北站，它是有做一個桐花車站的一個特定印象，這個特定印象，可以看到捷運公司很 nice 的注意到這個族群的關係，這個是就捷運的部分。

今天的主題是地方觀光與交通建設，有關交通建設，我覺得有兩個方向，看到很多的快速道路不斷地興建，還有一個，就是軌道的興建，其實，一方面希望民眾盡量不要用個人汽車，但是同時又見了很多的快速道路，一個是鼓勵大家使用大眾運輸，一個又鼓勵私人的運輸，這是兩個不同的面向，在這兩個不同的面向裡面，我想的兩個命題，就是我們一直認為交通建設會帶動觀光，那這個命題就是視交通建設必然會帶動觀光，還是也有可能對觀光會有不同的衝擊？

我想有兩個案例，可以讓大家思考一下，一個就是很有名的電影，叫做「別跟山過不去」，它講的是一個在美國的阿帕拉契山，從南邊的喬治亞州到北邊的緬因州，這個有 3500 公里，是一個很長的一個步道，每一個登山者，會把他當作一個很重要的挑戰，這個步道如果你要走完的話，要走 6 個月才能走完，但是走這個步道，發生很多的山難，所以當地人就有思考，是不是讓它比較可掬性，讓大家可以比較方便去走這步道，但從他們的發展中，好像沒有這樣的思考，因為那個步道，很特別的就是手做步道，每一個步道都是由當地的志工，用手去做出來的。

其實這個觀點，也體現在客委會，因為客委會現在要做浪漫台三線這樣步道

的串聯，我還記得我在市政府客家事務局的時候，還陪楊副主委，從龍潭一直走，走到關西，整整走了八個小時，他也是想推動手做步道的觀點，這個時候就會產生另外一個思維，就是我們做手作步道，不受傳統外來的東西進去，所以這邊第一個思考的就是交通建設會促進觀光產業。

但另外一個思維，怎麼樣的交通建設，會對觀光產業有另外的影響？會不會讓民眾想去看的東西區變質了？這個在台灣應該有很多很多的案例，所以這個命題當中，怎麼樣去取的一個 balance 是要去思考的，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從這個角度去思維的時候，因為有想到另一個案例，就是在 2012 年倫敦，辦了一個奧運，因為英國的財政不好，所以它提倡一個綠色的奧運，那這個綠色的奧運概念裡面，他希望打造一個綠色策略綠色經濟，然後永續發展，當然他裡面還有很多的細節策略，包含像老舊城區的改造等等。

回到今天的主題交通建設的部分，它的思維是盡量用大眾運輸，至於用步行，用自行車的方式，去做一個讓選手也好，觀光客也好，可以去體驗這個奧運，以及去享受這個倫敦的城市之美。

所以初步大概有兩個觀點，一個當然講的是族群經濟問題，是不是去考慮，這個部分就是所謂的浪漫台三線，浪漫台三線這一塊，是中央的政策，當然也是為了繁榮客庄，我怕時間不夠，所以只能談這一塊。

傳統的客庄有很多美好的東西，但當人群進來的時候，究竟是好？還是不好？所以這個命題就是，交通建設和觀光之間，到底是要採怎麼樣的思維，當然多數在鄉村的部分，他們會認為交通建設比較好要，要思考的是怎麼樣用大眾運輸，作為交通建設的主軸，我覺得盡量不要用私人的運具進去觀光，讓民眾比較不容易帶進大量汙染，我大概從這個命題做一個初步的報告，以上謝謝！

丘昌泰：

謝謝王保鍵王教授，他的論點就是，交通建設跟地方觀光之間是有正向的關係，但是最好是大眾運輸，這樣才不會造成很多的負面作用，特別私人運具，它所產生的汙染問題會，把整個品質弄不好。

他的另外一個觀點，我覺得也是很重要，就是交通建設一定要守住環保的底線，讓交通跟環保是整合的，剛才他提的這部電影「別跟山過不去」，將來大家有空可以去看看。

事實上，我在美國在歐洲國家的旅遊的經驗，也覺得他的這個步道，真的是完全跟當地是結合的，連柏油路的顏色也是跟當地結合，這樣就不會覺得很突兀了，這點真的是很棒，他也提到了浪漫台三線，我們謝謝王教授！

接下來，是我們邱榮舉邱教授，他是我的學長，所以今天是學弟為他服務，

學長他各方面的經驗，不論是在學術，或是實務界都是算大老級的，我們這個研討會能請到他來發言，是真的不得了，他是台灣大學國發所的教授，邱老師請

邱榮舉：

主持人，各位前輩先進，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談的這個東西，我非常佩服劉董事長所講的專題。

我從三方面作思考，第一個，從國際連結還有國家級的觀光，以及地方特色的展現，第二個，整個桃園從北部到中部，或者整個桃園地區，那個中壢現在的火車站，是一個重要的關鍵，因為中壢是整個台灣客家庄裡面最大的一個市鎮，而且整個桃園是五大族群都有，所以對中壢火車站而言，要怎麼把這個全台灣最差的火車站，藉著這個機會，把他樣子變成起碼跟松山南港一樣，甚至超越那更好,所以中壢火車站跟所有的計畫搭配很重要。第三個就是剛才我講的軌道運輸，要怎麼樣有配套跟觀光連結？我就從這三方面談。

第一個就是國際連結跟國家級的觀光,要怎麼表現地方特色呢？剛才主持人邱院長也特別提到，在蔡英文政府所推動的好幾個重要國家級的建設，包括台三線浪漫大道，跟桃園這邊和跟今天的主題都有關，還有亞洲矽谷在台灣，本來只有在桃園市為主，現在已經連結到桃竹苗，把它連結在一起，所以機場捷運的出現，又把整個桃園航空城跟其他的也連結，這種集結的營運非常關鍵，我倒是蠻想請教現階段是到桃園中壢的邊邊嗎？

劉坤億：

環北站

邱榮舉：

環北站還有兩站到中壢火車站,還大概要多久？因為這個牽涉到等一下第二個中壢火車站，所以這個整個國家的建設，跟桃園的集結，現在的營運，跟未來的發展有密不可分的關係，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是這個中壢火車站，被我們評為最差最爛的，相對的桃園火車站已經做得不錯了，我希望未來能夠總體思考，包括鐵路地下化的時候，又能集結未來中壢火車站，要由這個中央交通部及台灣鐵路，還有相關的部會共同思考，這樣才會有特色，不然的話很難，因為整個桃園市這邊，要往北往南的話，現在的桃園火車站中壢火車站，是一個重要的進出的地方，這是第二點。

第三點這個軌道的運輸很重要，剛剛王保鍵提的很有道理，早期的桃園就有好多的簡單輕軌，現在大力發展這個，不只桃園地區，而且又帶動這個桃竹苗，甚至於跟台灣，整個北部中部南部的連結很重要的關鍵，我就希望剛才劉董事長所提有集結之外，又以藍線綠線或者是棕色的等等，那現在這個東西，雙軌的是

不是跟汽車怎麼樣搭配？我希望空港跟火車站跟汽車站客運站，能夠做一個很好的連結，包括使用腳踏車怎麼觀光？這樣的話，更有助於觀光的發展和交通建設，以上就這三點提供參考，謝謝！

邱榮舉教授(左)，紀俊臣教授(右)

丘昌泰：

謝謝我們邱榮舉教授，他對於桃園非常的清楚，我很同意他的論點，打造以中壢火車站為核心的觀光區域，確實是刻不容緩，中壢其實他客家人比例應該是最多，可是在那裏卻完全沒有客家味，亂七八糟，我每一次到那裡都很難過，尤其是延伸到內壢，內壢更慘，

第二點就軌道建設，一定要搭配各種多元的景點，成為一個多角度的觀光資源綜合性建設。

第三點就是亞洲矽谷，將來範圍會擴展到新竹那裡，所以桃園捷運，它的空間會把整個大台北地區生活網，整個北部連結起來，所以將來發展的空間是很大的，謝謝我們邱院長。

接下來，也是我的學長前輩，紀俊臣紀老師，紀老師他過去在東海大學，後來在銘傳大學公共事務學系，也是社科院的院長，最重要是他實務經驗非常的豐富，曾經是我們內政部民政司司長，我們精省很多過渡型的法規，及後來的地方制度法，都是在他手上完成的，特別是地制法，到現在為止，還是一個擬得非常好的一個法制，可以看到有跨域治理的條文，考這個題目他是始作俑者和創建者，了不起！紀老師請你發言。

紀俊臣：

我們的主席邱院長，還有劉董事長，各位與會的學者專家，大家好！剛剛提到交通，台北市興建這個大台北捷運運輸系統，我可以說是最重要的催生者，因為當時本來是要對俞院長(俞國華)做簡報的，但是俞院長表示不做，後來我就和我們許市長(許水德)商量，結論是非做不可，他問我要怎麼做？因為他原來的計畫是做完 1 條再做第 2 條，所以 6 條就要 30 年，我和許市長溝通，建議我們改變 6 條一次動工，然後 10 年完成。當時他跟我講，如果 6 條一起動工，豈不會造成台北市的交通黑暗期？我說沒有關係，黑暗期時，我們兩個都離開市府了，當時我是開玩笑講的。各位想一想看，如果不是當時一次動工的話，台北市的捷運今天怎麼存活？整整要 30 年後才能建設完整路網。

所以我們就改為 10 年建設完成，後來跟俞院長做簡報，俞院長就答應了，答應以後，我們就整整半年的時間，每天 7 點鐘上班，包括禮拜六，為什麼？因為七點鐘市長要召集籌備委員會議，就當天發生跟興建捷運有關的事情，當天就要做出決定和處理，包括捷運的名稱像大眾捷運系統也是我們取的，像 MRT 也是這樣來的。

為什麼拿這個做開場白呢？因為今天報紙登了一個消息，是柯 P 說 20 年前台北市在做捷運的人像是呆瓜，我是要說明其實不是呆瓜，是有思考的，只是說有很多的決策，在客觀條件，或在某些人的堅持下改變了。

比如說現在捷運它都有升降梯，原來是沒有的，後來也是我提出來的，當時我說如果沒有升降梯，一些老人家手提很多東西，要如何方便出入？有人反對說巴黎的 14 條線中，前面的 13 條線捷運就不但沒有升降梯，而且甚麼設施都沒有，連提皮箱都只能走樓梯，但是當時我就很堅持，齊寶錚說那要花 300 億元，我就說 1000 億也要花，因為這是歷史性的貢獻，現在不做將來會後悔的，後來經許市長裁決才決定做了。

昨天柯 P 也有提到那個欄杆的問題，其實當時是一度有考慮要做的，不是不做的，只是當時齊局長認為，一般來講，捷運都是開放空間，如果有門，關起來的時候砸到人怎麼辦？當時是因為想這個才沒有做的，我是覺得當時對這事情猶豫不決是不對的，若是當時做起來，現在就省事了，因為齊局長他當時是執行者，他雖然有他的一些考量，但那些考量，也許有一些是正確的，也許也有一些可能就有問題。

我再舉一個例子，我們這個鐵路地下化，把台北火車站做起來，原來計畫的高度比現在還低，當時我代表台北市政府，去參加這個規劃會議的時候，我就對高度有意見，那個董萍講他只負責興建火車站就好了，管不到其他事情，我就提出來那個底下要準備多一點軌道，如果當時多準備一些軌道的話，後來我們的高鐵就不會延後一年了，相對來說，當初設計火車站，站體比現在還矮的，我當時就當場拍桌子，並說如果不拉高的話，台北市的配合經費就全部提出來，讓你們交通部自己去搞，所以董萍就因為有我的壓力之下，才同意加兩層，我當時的主

張是五十層，因為我認為火車站是要做台北市地標的，雖然最後的決定和我的意見還差很多，但總算是有增加了高度。

我為什麼講這個例子？我的意思就是說，未來你不管是交通建設也好，觀光發展也好，一定要有複合式的思維，複合式的觀念，我們今天很多的政策失敗，就是沒有複合式思維，只有考慮到自己本位的事情，這是不對的。

剛剛提到桃園的狀況，如果它要做高運量就不是很好，因為面積蠻大的，不像台北市，台北市是 272 平方公里，桃園除了復興區以外，至少都還有 800 平方公里，因為面積大，你如果要做高運量的捷運系統是會有問題的，還不如做這個低運量的，或是中運量的，還是剛剛講的輕軌，乃至於把汽車運輸工具再做調整，這是一個方向的問題，所以我們在思維這個問題的時候，剛剛我們保鍵也都有提到，要有觀光發展的觀念，要有環保意識等等，這都是正確的，但是更重要的是，希望我們也要有前瞻性，要考慮到這樣一個建設，對當地的前瞻發展，有多少的衝擊？衝擊有正面的，也有負面的，我們希望正面的盡量求其大，負面的盡量縮其小，這是一個方向，如果大家有這個觀念，就不會幾十年後再去後悔了，再被人家說是笨蛋，這是我的一點意見，請各位參考，謝謝！

劉坤億：

三位教授都說得非常的好，尤其紀教授有參與過台北市捷運的規劃期，特別會了解，這邊我先跟紀老師對話一下。

第一個，就是捷運跟老齡化社會的關係，這個議題非常的有趣，前一陣子曾經有一個評論者，他說台灣都已經進入高齡化社會了，蓋那麼多捷運幹甚麼？越是老齡化的社會，我們越需要軌道運輸，尤其是捷運，老人他只是活動力比較差，但是他其實是健康的，所以你要讓他願意走出來，而不是整天在屋子裡的客廳裡面。

講這個話的人，其實他是不瞭解高齡化的社會，因此在捷運的設施方面，紀老師剛剛特別提到台北市捷運電梯，當時確實有在討論這一節，有時候軌道的工程師他的腦袋比較死，他想到巴黎的捷運的情況，只想到有軌道車子能跑就好，至於月台乃至於車站怎麼規劃，不在他的想像，所以台北市的捷運，可以說是全世界進步的捷運，因此我們也是在這個基礎上，在規畫綠色捷運的時候，也都會考慮這些。

比如說目前機場捷運，有關月台上面的安全問題，我們是記取了台北捷運的教訓，所以在規劃的時候就做好了，所以在軌道建設方面，絕對要有前瞻性的思考，也絕對不要去說高齡化社會就不需要，也結合跟王教授剛剛提到的概念，特別是紀老師也特別提到的，在軌道的規劃過程當中，是要去考慮運量，還有幅員，包括都市的人口等等，其實有一個綜合性的概念，可以一併的回應這個概念。

去年我到歐洲區考察的時候，我們也交流很多，有一個概念正在形成，大家還沒有定論，就是所有的公共運輸軌道交通建設，都要回歸到人來做思考，也就是我們要把人的移動，作為一種服務，而這樣的過程當中，我們怎麼樣去結合各種公共運輸，就變得很重要了。

當中包括最高運量，以及距離比較長遠的就透過高鐵及鐵道，高鐵跟鐵道它們是快速跨越城市的，對於遠距離的，透過這些鐵道、高鐵跟捷運聯結起來，這樣旅客下來以後，可以再坐捷運做中距離的移動。接下來必須要考慮到，讓那個小城市跟小鄉鎮，也能夠有輕軌，比如說 10 萬、20 萬的小城鎮，它們有輕軌能夠接捷運，能夠把他輸運過去。接下來就是最後一哩路了，他下了輕軌或下了捷運站之後，你有沒有很好接駁車，有沒有很好的 ubike，或是更輕型的交通工具，能夠協助這些人的移動，我想整個歐洲在這方面已經做了一個比較前瞻性的思考。在台灣我們回過頭來看，我會比較遺憾，就是我們各種交通建設是切割式的規劃，未來我們必須要透過 master 的概念重新去整合，對我們會是比較有幫助的。

還有剛剛邱教授特別關心到中壢火車站，這次鄭市長特別帶我們到京都站去看，我們真的很用心，第一個把住的旅館就訂在車站旁邊，第二個就白天去看晚上也去看，然後市長比較忙看 2 次，我們要看細部，就看 4 次，這其中我們有討論到未來桃園車站，跟中壢車站規劃，希望能夠像京都一樣。京都的車站跟我的新板特區大概差不多時間都是 20 年前，但是今天的新板特區的車站舊了，老了，可是京都車站看起來，仍然是新的，所以也給鄭市長一個決心，就是在規劃設計的成本不要太省。

第二個就是開發的尺幅要越大越好，能夠結合周邊的私人土地來做連開，盡量的整合公部門的土地，讓各車站站體能夠越大。

第三個就在整個車站的規畫過程當中，京都車站你幾乎看不到計程車排隊，或私人車好像在那邊打結，因為他已經做了各種交通工具跟人移動的動線分流設計，這個是日本人在做都市計畫，跟交通規劃時進步的地方。我們也去學習，也透過這種觀摩，希望把這些成果能夠有呈現的好機會，因為中壢車站對客家族群影響特別大，全台灣人口最多的客家族群就是在桃園，有差不多 82 萬的人口，事實上，中壢也是一個集中點，浪漫台三線也是從龍潭平鎮出發。我會把邱老師的意見帶回去，就是說整個車站的規劃，可不可以融入客家的意象？能夠讓它發揮在地的特色？這個還蠻好的，以上謝謝！

丘昌泰：

我再把幾位老師的論點，做個整理，紀老師有兩個論點，即是我們做交通建設一定要把觀光把環保帶進來，也就是要有複合式的思維，要有多功能思考，不要錢砸了做一個建設，就只有那個建設，比如說汙水處理廠，就只能做臭臭的汙水處理廠，剛剛李副市長(李鴻源)說電子業跟環保的結合，就是一個多功能思考，

這個很重要。

第二個就是要前瞻，我們不是要看眼前的問題，要往前看 10 年、20 年。事實上，紀老師提捷運這件事，老實講，我今天才知道許水德，他才是真的啟動者，但是黃大洲市長任內負責執行，我跟他談了好幾次，我們台北市今天很多重要的建設工程，我覺得要還給他公道，但是因為他不會講話，選舉選輸了。事實上，他任內做幾個最難的建設工程，包括拆遷中華商場跟台北車站地下化，如果台北車站當年沒有地下化，那整個西門町一定比現在落後。我在桃園縣待很久了，桃園跟 10 幾年一樣沒變的原因在哪裡？因為它被鐵路、被縱貫高速公路切割了，讓他根本沒有辦法去溝通，所以地下化很重要。我看賴清德好像在台南要做地下化，被罵得要死，其實從長期看來，那是絕對有必要的，這個要花很多錢，所以台鐵和台北市政府要談，要做行政協調，比鋼板還難推，這種情形我也碰過。現在接下來是我們謝政諭謝教授，他是東吳大學政治系教授，也曾經是人文社會學院的院長。

謝政諭：

謝政諭教授(發言者)

主席，劉董事長，還從三位中南部來的議員，我們教授講話，一講就講很長，我希望講得簡短一點，把時間保留給遠道來的議員貴賓。

我講兩個部分，前面其實也都有人談到，這兩個部分我現在把它歸納一個叫道一個叫術。

就是說我們面對這個交通跟觀光，我們有一些方法，有一些戰術，簡單的講我就不展開論述，直接談一些標題，第一個是票價，剛剛劉董事長談到 369 跟

135，我們能不能開發更多一點的？比如說五日遊的連結，還有親子票打折，再來是敬老票之類的，我只是提一個類型，使用這樣一個方式，才能帶動更多人來運用這一條捷運。

第二個部分，其實剛剛很多人談的叫商城，或者是重要的據點，最近 3、4 年有一個台日的研究，我大概跑了日本 20 次以上，我發現日本不只是京都，他重要的車站，幾乎毫無例外，它的車站就蓋在 20 層的大樓上，這就是我待會要講的道的問題。基本上這個公跟私如果拿捏得準的話，一切的設計，上到總統下到一個執行者，這條鐵路這個站弄下來，就要使用 100 年，絕對是為公，決無私心，也絕無跟財團掛勾，我就會好好的把社會資源納進來，不怕時間稍微多個半年，多個一年，也沒有甚麼問題。

每一個標的做下去之後，就是所謂的為千秋萬世。當年梁啟超戊戌變法失敗之後，他們幾個人到日本去，梁啟超講了兩句話，我覺得印象很深刻，他說取道日本，那個道，就是日本現在能夠現代化背後的原理原則，但後一句話是回道中國，就是我看到人家國家的優點，我要怎麼樣運用回到我們的國家內部，所以取道日本，回道台灣。

劉董事長到日本看了很多，能不能邀請日本當年興建的專家，三五個核心的人，來台灣討論他們成功的地方，結合可能上千上百的因素，這些因素都納進來，作為我們將來很重要的參考，

我舉一個例子，我們不怕被說圖利甚麼人，只要你那個心是為公的。從紐約有一條火車到 Trenton，紐澤西的首府 Trenton，這條鐵路到了普林斯頓大學附近的時候，沒有辦法繞到普林斯頓大學，他特別在那個站的地方，弄了一個地方叫 Princeton Junction，在 Princeton Junction 轉乘再坐 5 分鐘火車就到世界名大學普林斯頓大學的校園旁邊來。據我所知我們桃捷，當初在蓋的時候，跟輔大就有一段差距，現在輔大設醫院又有一段差距，這個都產生了民眾最有需要的問題，到醫院去看病不方便。希望未來搞軌的前瞻計畫裡面，就大膽的能夠在人口多，有前瞻性的地方就弄一條線到旁邊來，我想這就是今天李部長(李鴻源)他早上講的多溝通，多開放到公民參與，然後取大多數的意見，我想這樣的一個狀況，才是我們未來要走的。

我過去有一段時間，到普林斯頓好幾次，我曾經在那裏待了一段時間，拿了美國傅爾布萊特的獎學金，在學校裡面，他還有一條開放給私人的高速公路，我想那都是在大公無私的前提之下，把社會資源納進來，我們現在就動用國家太多錢，結果所有東西都在「搞軌」，其實國家有很多很多其他計畫有需要，當然今天的董事長你有這個學界跟社會的經驗，應該把大政治家的胸懷納進來，我相信可以做很多事，謝謝！

丘昌泰：

謝謝我們謝老師的道跟術兩個觀念，我們非常謝謝幾位教授的發言，現在我們再請實務界三位議員來發言，先請最南部來的高雄市議員高閔琳議員先開始，謝謝！

高閔琳：

主持人，今天很榮幸來參加這個論壇的研討會，跟許多的專家學來請教，還有跟其他城市的議員來做交流，剛剛主持人丘院長，有提到邱榮舉邱老師是您的大學長，邱老師其實不只是您的大學長，還是我在台大國發所的老師，所以主持人看來也是我的學長。

我是高雄市最年輕的議員，我叫高閔琳，我的出生背景非常的特殊，我是在台北出生長大，所以我非常的了解台北市，以一個首都城市的角度，享用了各種國家的資源，包括了捷運。

我們今天要談的是交通跟觀光，我也很榮幸因為家庭背景的因素，決定到高雄去參選，因為我父親是高雄岡山人，其中我又面臨到高雄是在 2010 年縣市合併，也就是說原本的高雄市，跟原本的高雄縣結合在一起，所以我想今天，可以來跟大家分享，一些高雄市在縣市合併以後的經驗。

現在的高雄市，是一個面積非常大的大城市，往北甚至可連接到阿里山，然後連接到台南市，整個南部地區可以說都是以高高屏作為整個人口移動，跟工作生活這樣子的生活圈。我們今天要談交通觀光，大家都知道，行政院跟立法院，近期為了有關前瞻建設計畫的特別預算案在吵鬧，並互相杯葛，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了解這個前瞻計畫，如果確定通過的話，高雄市可以爭取到 1800 多億的經費來做所有前瞻的建設，其中包括了交通的軌道建設以及水的資源、綠能和城鄉建設。

今天要談的是交通建設跟觀光，剛剛幾位學者和我們捷運公司的董事長，都提到我們要做一個交通建設。過去的思維，可能都先侷限在考慮我們是否有這個需求？甚至我們會考慮到人口的增長，對於大家一直在批評我們民進黨蔡英文政府，在推動前瞻計畫的特別預算中，要花那麼多的錢，做軌道建設的必要性在哪裡？我非常的認同剛剛劉董事長提到的，就是因為人口老化的問題，所以才更需要這樣一個公共運輸的系統，無論他是捷運還是輕軌，或是任何交通的載具。

我大概分享一下高雄市目前的交通。我想大家都知道高雄市是一個南邊的大城市，也是一個港灣的城市，所以我們的交通，包括我們常常搭的捷運，全台灣第一條輕軌，就是在我們高雄市，已經開始試營運了，有一部分的路段，也已經正式營運了，其中 C12 站到 C14 站，今天要做第一階段查驗的工作，很快我們的輕軌在水岸的部分就能全線通車。

除了在捷運在輕軌，高雄市也是第一個推動公共自行車的城市。當年陳菊市

長早於台北市，借鏡法國馬賽公共腳踏車的建置。我們還有渡輪，在旗津的居民要往返高雄市區，可能都要搭乘渡輪，在愛河我們為了推廣觀光，也做了一些努力，仿義大利做了貢多拉，我們也推動太陽能為動力的水上計程車，還有很多不同的載具現在正在高雄發生。

其中特別值得跟大家分享的是，面對高高屏的連結所需要的捷運南北向的紅線，經過 15 年的爭取，往北的延伸線，現在紅線只能夠到岡山站，而且還沒有連結到岡山火車站，我剛好就是大岡山選區的議員，所以我特別關心這個議題，為了這個交通建設，加入交通委員會，一天到晚就在監督我們的交通局，捷運局還有捷運公司，我們也是爭取了 4、5 年，到最近才分別通過兩階段，第一個階段就是南岡山站，延伸到火車站前面。

第二個階段就是南岡山站未來要延伸到路竹區，我們期待連結原本的跟台鐵的共構之外，未來連結到路竹科學園區，甚至還包括一些重點的，像岡山農工這樣的學校也做一個連結，這是南北向我們所做的努力，東西向大家都知道，高雄市努力了 10 年，也才一條十字，一個南北向一個東西向。

最近在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當中，我們也努力爭取了環狀輕軌的部分，就是在高雄市區哈馬星旗津鹽埕區這一帶，很有特色的老地方，在港口邊，除了有水運輕軌，還有環狀輕軌，連結原本大的十字之外，我們還爭取到黃線，黃線就連結到很多的醫療醫院，還有包括一些學校。

回歸大家一直在談的，今天我們到底需不需要軌道建設？最後要看的就是有沒有搭乘的需求？不是只要有一個綿密的路網就可以了，我們可能還要考慮到成本的效益，考量到未來社會跟經濟的效益，當然還有對環境的影響評估，所以就像剛剛謝教授所講的，我們必須要有一個前瞻的考慮，未來 10 年 20 年，甚至 100 年這樣的交通的政策跟計劃，同時我們也要很複合式的去思考。所以我的想法是，全世界很多的大城市都在做捷運，像法國、英國、紐約很多都是百年的地鐵，所以我們未來在做捷運或輕軌之類的交通建設時，就要思考如此大規模的建設，他的公共成本，如何未來可以延續，而且可永續經營，甚至還可以延伸和拓展。

比如說，我們現在建構一個捷運站體的時候，我們可能就要預留一些空間，未來可以做共構，也可連接輕軌或不同的系統。另外一個就是，我們怎麼樣讓這個需求變得更多，比如剛剛有人提到的，我們是不是應該關注到是否可以連接到各種的大型學校，像台北市台大出來就是公館站，非常方便，在高雄市未來要發展這個軌道建設，我們也要朝向這樣的方向去努力，所以剛剛所講的輕軌建設，我們就會連結到中山大學站，還有很多雄商等等不同的學校，讓學生未來有可能持續來搭乘人口，可以繼續的使用這個載具。

除了學校之外，我們也可以和很多的商辦或金融大樓合作，就像剛剛老師所

講的，在東京等大城市都是如此，再來可能就是醫療機構，像高雄的經驗，我們未來的南岡山站附近，將會有高雄醫學院，在南機場附近，設置一個有 800 床位的長照體系的機構，這樣就把老人把長照的需求，都一併考量到這個交通的建設裡面去了。

最後談一下觀光的部分，不管要怎麼樣去發展觀光，或者是要怎麼樣發展交通，他們倆者是互為因果的，他可能是雞生蛋，也可能是蛋生雞，有了交通，才有可能發展蓬勃的觀光，配合觀光地區的需求，才有相關的交通建設。

比如像我們的燕巢區的泥火山特色，又比如說像岡山地區，現在有一個新興的建設，叫岡山之眼，他是一個天空步道，未來希望有一立委爭取天空纜車，讓大家可以坐纜車看阿公店水庫，到周邊的土雞城去觀光遊覽，像這樣新興的觀光亮點，也相對需要交通建設來搭配，才能相輔相成。要有交通建設也才能發展觀光，有觀光的亮點或在地的特色，更有需要交通來搭配，其他還有很多有趣的經驗，等一下大家交流討論的時候，再和大家分享，最後就是邀請大家今年 10 月，到我們的哈馬星，參加高雄和國際組織 ICLEI 合辦，具有環保意義的無車區示範（Eco Mobility World Festival），以上是我的分享，謝謝！

丘昌泰

謝謝高議員，現在我們請台中市議員張雅旻。

張雅旻：

主持人，我讀研究所時也是紀老師指導的學生，所以紀老師剛剛看到我時，笑咪咪的表示歡迎，我也很開心能來參加這個論壇，我想先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雅旻是如何從台中上來的。

我是先走 74 號快速道路，10 分鐘之後，就抵達了高鐵，然後我就搭上高鐵，經過 45 分鐘之後，就來到台北火車站，之後我就很開心的拿著悠遊卡，搭上捷運，就是被柯 P 認為是 20 年前笨蛋所做的捷運，總共我花了不到 2 個小時的時間，從台中很順利的就抵達了今天台北的會場。

今天我和我們台中另外一位賴佳微議員，一起來參加這個研討，我們是抱著和大家交流的心情，以及滿腹的疑惑和困擾，想來請教在場的各位前輩先進。各位都知道，上個月台中已經成為台灣的第二大城市，在這個第二大城正要蓬勃的發展的時候，我們正需要有基礎建設的時候，我們不明白為什麼還有一些，目前身處首善之區的天之驕子，表示中南部已經人口老化，再加上少子化，所以不需要太多的基礎建設，包括軌道建設，包括公路運輸建設。

我認為所有的建設規劃，都要真正的符合民意的需求，這是我的第一個主張。現在台中市有 277 萬人口，可是我們的公車網路，現在是突破 700 條，雖然公車也是很好的現代運輸工具，但是大家也都知道，公車除了對環保的影響之外，這

樣的公車網路，是否能符合台中 2018 年，要舉辦花卉博覽會對於交通運輸硬體上的需求？跟各位報告，現在籌辦花博做得最好的，只有宣傳跟廣告而已，至於所謂任督二脈的交通硬體建設，我們台中遠遠的落後其他城市，這是我們非常憂慮的地方，也借此機會請教在場的各位專家學者，舉辦像花博這樣的大型活動交通建設，要如何配合，才能使交通不會打結？

台中市從民國 80 幾年，省府時代就開始在規劃台中都會區的捷運，經過了 20 幾年，才有一條綠線的建設，目前才已經完成 73%而已，但是還沒有完工，所以對有南北東西向串聯的捷運路網，我們一向是相當的羨慕，雖然對運量和財務上會有其他困難的考量，但是這些可以以技術或後續的計畫來克服，但是我們現在的捷運建設，根本等於是零的狀況，唯一的綠線才建設到 7 成而已。

第三點想要請教各位的是，像台中這樣的交通建設，遠遠跟不上都會的發展，我們 2018 有花博，2019 有東亞青相當於奧運級的賽事，對於我們的交通建設如何追趕？在這裡除了跟各位分享我們的經驗之外，也想知道大家的意見和看法，讓我們能夠回去跟我們的民眾做一個說明。

第四點是大家知道，我們台中原來有一個 BRT 建設，後來被林市長取消改為優化公車，原來的 BRT 公司，就改組為捷運公司，那到底像這樣的公司，他的財務未來的營運，以及資本額等等，以桃捷的經驗，能否提供我們一些參考。最後一個小小的問題，我們知道桃園市、新竹市，還有台南，大概都已經有結合觀光資源交通資源，推出一個市民卡，原本的構想是想以電子商務的概念，讓市民卡能夠包括交通及各種的消費都能多卡合一，一卡全通，台中市年底也要仿效，但是我知道其他縣市，對於推動市民卡的成效並不理想，目前台中對市民卡的意見也很兩極化，想在此順帶請教各位前輩專家的看法如何？以上，！謝謝

丘昌泰：

接著，最後繼續請賴佳微賴議員。

賴佳微：

主持人，各位教授，現場的與會人員，大家午安，我也來自我介紹一下，剛剛沒有注意到我，應該是因為我看起來不像是議員，其實我現在是第 3 屆，我 23 歲就從事這份工作了。

其實我剛剛聽到各位教授談了很多，尤其是我們的張雅旻議員提到 BRT，我很有感受，再想到我們台中的捷運，從藍線、綠線、橘線，從胡市長任內到現在只有綠線，我的感觸就更深了。

我當了 3 屆的議員，從綠線高架，到抗議為什麼只有藍線，橘線為什麼沒有跑？從 3 線變成 7 線，最後只剩下現在的綠線 1 條，這其中真的有很大的曲折和變化，BRT 就更不用說了，BRT 整體的結構做好了以後，營運一段時間，我在這

屆任內有跟我們的議長，到新疆去考察，我才終於了解我們的 BRT，是借鏡於中國的南疆。但是中國的南疆他的路其實很大，他就算是最小的路，也是台灣大道一半的大小，所他們沒有 BRT 站的地方，沒有畫 BRT 專用道的地方，他們其實雙節公車要運行，其實也不是問題的，無怪乎 BRT 在台中市最後的下場會如此，這其實不是 BRT 的錯，而是要應用的地方在哪裡？這個才是關鍵。

第二，剛剛高雄議員有講到纜車，我必須講我們台中過去也曾經推過纜車，由大坑到新社，那一段的時間，我和我的同事瘋狂的去坐纜車，也瘋狂的去坐火車，為什麼呢？因為考察嘛，說穿了就是去玩，日本的纜車、瑞士的纜車，還有好幾個國家的纜車，就我看來，日本的纜車是做得最好的，瑞士的纜車也讓我印象深刻，日本的高山溫泉鄉，他們的纜車也能上去，四季的風景如畫，就算是下大雪的天氣，他們的纜車也能運轉，但是為什麼到了我們台灣，不要說是環評的問題，就算是一個設站的規畫，都是問題，我思考了很久，其實交通建設和地方觀光的確習習相關，但是我們把地方觀光放在最前面，之後呢？我們所要思考的是，台灣的每一個地方的屬性定位問題，台灣每一個地方其實它的差異性很大。我在前兩屆的時候，我就常常提到這一點，每一外國人到台灣，或者是我從台灣的台中到台北、台南、高雄，到花蓮，我不會希望我在花蓮看到台中，我也不會希望我在台北看到台中，這是很重要的一點。

但是台灣人往往會認為別人的方法會賺錢，為什麼我就不能如法泡製？如果去日本，在東京就不會看到京都，在大阪就不會看到東京，我在瑞士不會看到義大利，我在義大利我不會看到英國。台灣做不到的關鍵是甚麼？在這個各個城市的屬性還不清楚的時候，就無怪乎交通會出現問題，大家就會提出像人口不足的問題，人口不足就無法去明確的定位，到底要用哪一種公共運輸做路網？

在這種情形下，也會和我們的經濟有相關，只要有一種方法能賺錢，就會一窩風的去仿效，去設工廠，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們的精緻農業無法發展的原因，一般會錯誤的認為，精緻農業就只是廣設民宿，或是設一個溫室可以讓人去採草莓，就叫精緻農業，其實不盡然。

剛剛大家也有提到的一點很重要，日本他的設計，很早以前就做得很好，到現在更是歷久彌新，台灣的設計，只要過了幾年就會感覺很不好，甚至於我可以在馬祖看到台中的設計很類似，我才剛從馬祖回來，我看到一個廣場的舞台設計，乍看之下，我們已看到圓滿劇場(位於台中市文心森林公園)的影子。

我說實話，這個真的是我們要去思考的問題，這就是城市文化景觀美學的部分，大家聽起來，會認為這是政府系統的問題，其實不是，這是台灣人對於設計溝通的問題。

我們如何跟民眾溝通？例如民眾都知道環境保護很重要，但是民眾不會知道要如何去做環境保護，如何去面對環境保護的這一件事情。比如說我們現在的台

灣大道，民眾只會說為什麼現在機車的線道變少了，雖然我們的公車路網變多了，但是我們就只有一條綠線啊，能幹甚麼？還不如就像以前一樣，反正沒有解決之道。到底是高架化好？還是地下化好？到今天還沒有定論，我曾經思考過很久，認為也許真的高架化比較好吧！曾經很多人說台中市最適合做地下化的捷運路線的地方，為什麼不做？後來有一些地方做地下化，挖了以後地層下陷的速度的確是變快了。

剛才聽到李鴻源部長提到環境問題的時候，我不禁想了一下，覺得也許就台中的現況而言，捷運建設還是以高架比較好，是我以前沒有去思考到的點，但是為什麼這點，卻從來沒有人去提出過？我發現大家不是沒有溝通，也不是不會去溝通，而是到最後大家會陷入一個有理講不清，而懶於溝通的情況，最後就不了了之了，台灣在每一個城市都會發生類似的情形。

台北市首善之區，所有的好事都集中在台北，這樣台灣的地方發展就會失衡，我們講綠色的發展，所謂綠色的發展，是我們確實有看到田，有自己的農場和森林在發展，這才是叫觀光。觀光是甚麼？觀光就是玩，有民眾問我說去考察是去考察甚麼？我說就是去玩，玩很重要，像吃也是文化，交通也是文化，城市景觀美學，一個車站的設計也是文化。

但是為什麼大家的思考會偏差？是因為我們教育沒有落實，為什麼大家會說台中沒有需要公共運輸建設？現在高雄還有台北都正在突飛猛進發展，唯獨中部五縣市的基礎建設上，相對的落後很多，整個大台中的路網，如何連結到北部，到南部，最後到花蓮？所謂行的安全，就是要告訴民眾安全的到達比快速的到達來得重要，在安全與快速之外，就是生態環境，這些都要不停的教育民眾，只有不斷的灌輸這些觀念給民眾，台灣的建設才能有正面的發展，以上謝謝！

丘昌泰：

很不好意思，時間已經過了很久了，因為三點半要進行另外一場，所以這場就把他結束，最後大家對劉董事長還是有一些期許，所以來是請他做簡單的回應。

劉坤億：

聽過三位來自高雄和台中的議員的發言，我簡單的回應，因為時間真的非常的有限，首先，在台中的 BRT，我想你們的感觸很深，這段時間我接觸軌道業的時候，包括在規劃整個運輸系統的過程當中，我發現一個關鍵點，是大家沒有看清楚的。BRT 甚至高雄的 LRT，他在整個系統當中，我們會稱他為一個交控，他是跟平面道路的交通號誌一定要混和去做規劃的，如果這個沒有意識到的話會失敗。我覺得台中在這一塊，只重視在這個車子可以在路上跑，但是他沒有去處理到要跟平面道路的其他交通工具去做共用路面，所以他的交控系統，才是要花大錢的，後來林市長發現不對勁了，狀況應該這樣的，

至於 MRT、台鐵跟高鐵，他是叫行控，他是軌道專用，絕對不會跟你平面道路運行，所以他叫行控。桃園目前來講，我們也進入一個交控、行控的融合，交控跟行控本來是分離的，但是一旦有輕軌的時候，就要去思考到交控跟行控的融合問題，包括現在我們就已經在規劃行控中心跟交控中心要不要二合一，整個交通整合的資訊運用在一起。講這些跟大家分享，因為在軌道業我也算是一個新兵，我在看台中個案的時候，我也在從中學習跟理解一些事，未來在桃園的時候，我們會特別注意這件事

第二個是剛剛雅旻議員問到市民卡的事情，剛好我到桃市府去任職的時候，就是發行這個市民卡，在推動的過程當中，他真正的關鍵是，一定要知道市民卡背後的意義是甚麼？他不是只有一張卡，或是一卡多用，其實是一個智慧城市，他在推動過程當中，怎麼樣利用這張卡，讓我們了解數據的東西？

所以多卡合一的整個過程，關鍵點是在溝通跟協調，我花最多力氣就是在溝通跟協調，所以今天桃園的人口 217 萬，但是他花卡量超過 80 萬，當超過 60 萬之後，我就告訴我的同事說，我們的重點，是要在這張卡活用，發一張卡給他，他沒有用，就沒有意義。

所以台中市來觀摩的時候，我也提醒說市民卡不是發了卡就好，因為台北市失敗過，新北市也失敗過，重點都是因為沒有悟透這張卡，到底對市民有甚麼用？對於市民跟政府之間的聯繫，有甚麼用？這是心法，就是在推這張卡要成功，一定要這樣。

第三個，就是要更具有前瞻的思考，我甚至都會建議台中在推的時候，是不是可以考慮你怎麼樣去做到行動識別卡？我們現在思考的是虛擬卡，虛擬卡是在未來兩三年，就會很快速的取代實體卡，但是遺憾的是，國內在行動支付這方面的技術比較慢，我們都很期待中華電信跟其他的電信業者，能趕快有所突破。

所以這也會影響到未來我們在捷運，或者是大眾運輸，現在國外的旅客進來，最大的抱怨，就是我們都已經是行動支付了，你進來還要買悠遊卡、token 及電子支付！電子票證是過渡時期的行動支付產品，這個一定要先悟透。所以我祝福台中市會成功，但是票證公司不要成立，票證公司的哪一條路很長，一定要悟透市民卡要成功的關鍵點。

在整軌道發展的過程當中，最後我表達一個看法，就是紀老師剛剛提到的一個複合式的思考，其實更重要的是在複合式思考的上端，是叫做系統化的思考，如果在公共運輸沒有進行系統化思考的話，我想問題就很大。

高雄就是一個很不被公平對待的地方，他的運量之所以沒有起來，是因為沒有路網。所以柯 P 前段時間提到批判前瞻計畫講的話，是非常沒有道理，因為他竟然舉桃捷公司的現金流虧到不省人事。

我覺得今天在台北市議會講這段話，我是備感榮幸，今天是一個閉門會議，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機會，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機場捷運是在今年 3 月 2 日正式通車，我們說正式營運是只收票，第一個月還是半價，事實上今年我們法定上的預算，可以虧損 1.67 億元，其實沒有開門做生意，第一個月及第二個月加起來我們就已經虧了 1.5 億元了。

年度的預算我們就當期來講的話，3 月 2 日通車以後，到 7 月底結算我們現金流存損已經縮小到 2900 萬，意思就是說再給我一個半月的時間我就收支平衡，今年會不會有純益？今年會有，但是我不能對外公開講，因為很多的設施設備還在保固期，所以我們還沒有去真正給付一些維修的成本，但是以這樣的現金流來講，怎麼可以說是虧得不省人事？這很不公平，謝謝！

丘昌泰：

下一場要開始了，這一場我們就到這裡結束，歡迎在座的各位學者專家繼續參加下面的幾場，晚上在彭園有請客吃飯，主講人跟與談人都歡迎參加，謝謝！

會議現場

桃園機場捷運大事記

- 2006：行政院長蘇貞昌為機場捷運工程主持動土典禮。
- 2010：桃園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成立。
- 2016：9月交通部召開機場捷運監理調查委員會第1次會議。
- 2016：10月機場捷運PRSR演練完成。。
- 2016：11月機場捷運通過連續7天穩定性測試。
- 2016：12月高鐵局開始辦理初履勘檢查作業。

metro Taoyuan

3

桃園機場捷運大事記

- 2017：1月25日交通部正式核發機場捷運營運許可。桃園捷運公司對外宣佈試營運計畫。
- 2017：2月2日起機場捷運正式試營運，前2週是團體試乘、後2週屬於自由試乘。
- 2017：3月2日機場捷運正式通車營運。

metro Taoyuan

4

服務出入境旅客往返機場之效益

- 桃園機場出入境總旅客數(含過境)平均每日約為11萬人次，若不含過境的旅客數1萬人次，平均每日出入境總旅客數則約為10萬人次。
- 搭乘機場捷運進出機場之旅客約占全日出入境旅客的比例為24%。

	全日出入境機場旅客		可搭乘機場捷運之出入境旅客	
	入境轉乘	出境轉乘	入境轉乘	出境轉乘
4-8月平均轉乘比例	24.57%	24.39%	29.19%	28.71%

機場旅客可搭乘時段：
1.出境旅客需2小時前抵達機場，故取0800-0100間旅客數
2.入境旅客需1小時後離開機場，故取0500-2200間旅客數

5

北北桃生活圈通勤效益

- 機場捷運路線全長51.03公里，由台北車站往南經林口至中壢，目前共21個車站完成建置，提供沿線居民舒適快捷的便利通勤線。
- 針對通勤需求的乘客，發行369定期票、135定期票。
- 平日使用定期票的人次，占全日運量的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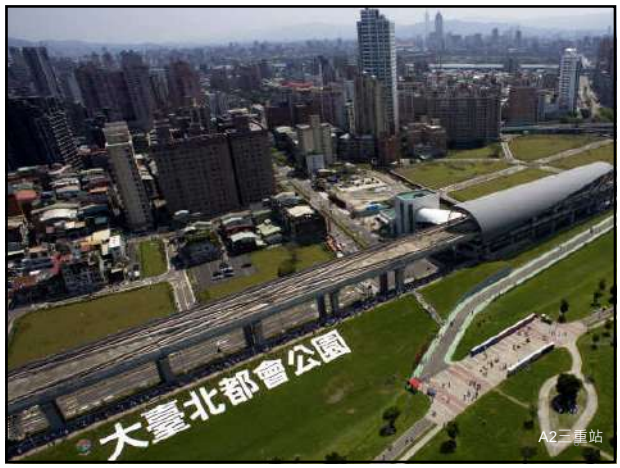
6

觀光旅遊效益

- A2三重站(大都會公園)、A11坑口站(坑口彩繪村)假日休閒好去處。
  - A2三重站假日運量，較平日運量高出34.3％。
  - A11坑口站假日運量，較平日運量高出45.3%。

坑口彩繪村

A11坑口站



A2三重站

觀光旅遊效益

- A9(林口站)三井outlet、A18(桃園高鐵站)華泰名品城，好吃好玩又好逛的購物新天地。
  - A9林口站假日運量，較平日運量高出87.8%。
  - A18桃園高鐵站假日運量，較平日運量高出32.9%。

觀光旅遊效益

- A19(桃園體育園區站）搭機捷看棒球，樂當Lamigo桃猿棒球隊10號隊友！

A19桃園體育園區站

觀光旅遊效益

- A19體育園區站比賽日運量，較非比賽日運量高出4.5倍。
- 為培養球迷搭乘捷運之使用習慣，推出「捷乘應猿」宣傳方案，搭乘機場捷運由出發地至棒球場，即可憑當日球賽票根於A19站換取回程免費搭乘機場捷運一趟。

桃園都會區大眾捷運路網

metro Taoyu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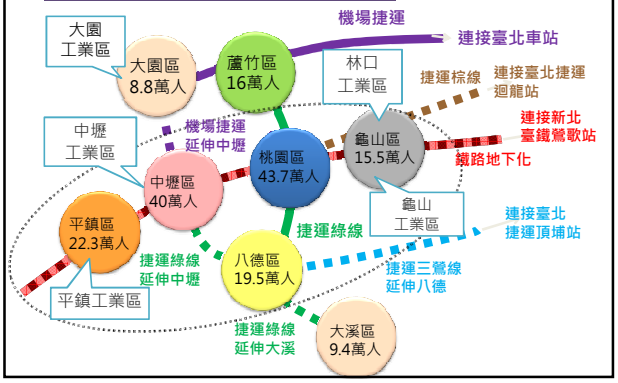
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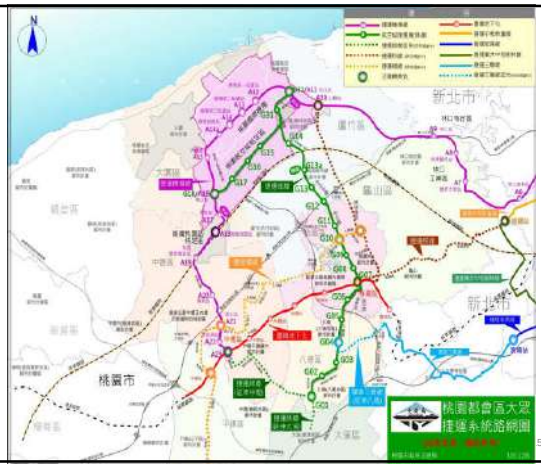
桃園都會區大眾捷運路網

- **服務人口及旅運量**
  - 桃園人口數由84年152萬人增加至106年216萬人
  - 龜山、桃園、八德、中壢、平鎮等核心區域，合計141.2萬人
  - 桃園及中壢車站旅運量僅次於臺北車站
- **工商發展**
  - 桃園市有七大工業區，工業產值更連續十年全台第一，總產值高達新台幣3.06兆元
- **交通現況**
  - 市區道路狹小且桃園特有的工業生產，衍伸出大量物流需求，目前桃園已升格發展，無法負荷頻繁交通，故急需軌道運輸

13

桃園都會區大眾捷運路網





5

桃園都會區大眾捷運路網

- 前瞻計畫
  - 臺鐵桃園段鐵路地下化
    - 計畫期程：106年至114年
    - 總經費需求概估為 964.09 億元。
  - 桃園捷運綠線
    - 計畫期程：105年至119年
    - 總經費需求概估為 982 億元。
  - 捷運綠線延伸線一(G01站延伸至中壢火車站)
    - 計畫期程：107年至117年
    - 總經費需求概估為 351.69 億元。

16

桃園都會區大眾捷運路網—鐵路地下化

- 透過鐵路地下化沿線設置通勤站，讓人口往桃園移動，舒緩大臺北的人口負擔。
- 桃園到平鎮間的原軌道將興建林蔭大道，可解決台一線的塞車問題，也能紓解桃園、中壢間高速公路的車流，外部效益顯著。

17

桃園都會區大眾捷運路網—桃園捷運綠線

- 桃園捷運綠線，已於今(106)年6月辦理統包招標文件公開閱覽，預計年底發包。
- 綠線為航空城聯外交通骨幹，提供便捷運輸服務，符合桃園未來都市發展與國際門戶所需。

18

桃園都會區大眾捷運路網—三鶯延伸線

- 「三鶯線延伸至八德」，由桃園市政府進行可行性報告，委託新北市政府代送交通部審查，目前交通部已經受理，預計8月底現勘。
- 未來透過三鶯延伸線，連結桃捷綠線，將為北北桃大眾運輸再建立一個新的路廊。

metro Taoyuan

19

桃園都會區大眾捷運路網—龜山捷運棕線

- 龜山捷運棕線可行性報告也已於104年通過交通部審查，106年完成綜合規劃，109年動工，預計111年通車。
- 桃園捷運路網建立後，桃園大眾運輸發展起來，交通更方便，雙北的人口才會流動，到桃園來居住、休閒，桃園路網的捷運建設可以幫整個首都生活圈的民眾提昇生活品質。

metro Taoyuan

20

桃園都會區大眾捷運路網

- 搭配「TOD」(Transit Oriented Development, TOD；以交通運輸導向之規劃)。
- 使地方發展重點從已發展成熟、規劃受限的舊市鎮中心，轉移到空間、機能及基礎設施規劃更佳的新區域(都市計劃區)，營造更有利民眾使用大眾運輸的環境。

metro Taoyuan

21

桃園都會區大眾捷運路網

- 區域內區域間有商業經濟活動，才會有旅次需求、才會有運量，也才能讓大眾運輸永續經營下去。
- 軌道建設能促進都市整合、都市再造，使原本區域中分散的城鄉連結成新的都市，並在軌道建設沿線上形成新市鎮。

結語

- **軌道建設搭配TOD**，活絡在地發展、帶動產業繁榮，桃園市能有更優質的生活。
- **軌道帶動經濟**，路網越綿密，桃園市繁榮的腳步就越快速。
- **軌道經濟的外部效益**
  - 軌道運輸解決嚴重的塞車問題，而且精準、準時的特性，對分秒必爭的現代化城市相當重要。
  - 低碳、節能的指標性交通工具。

metro Taoyuan

23

metro Taoyuan

24

A3 場次：參與式預算與地方議會

主持人：

趙永茂　國立台灣大學社科院政治系榮譽教授

主講人：

葉一璋　世新大學公共事務長兼教授

與談人 ：

方凱弘　世新大學行政管理系副教授

施聖文　台北醫學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江肇國　台中市議會議員

陳儀君　新北市議會議員

趙永茂教授

趙永茂：

在 line 群組上面提供 3 篇有關參與式預算文章給各位參考，這幾年，參與式預算在台北、新北市及台中都有推展，在實際操作的過程，可能有些問題。在目前，我們鼓勵政府跟公民社會之間有更多直接的溝通及更多的民主參與。在預算審查，我們引進巴西觀念及運作規則，參與式預算在世界各國發展的很好，台灣已有些基礎，今天我們請了學界和在地議會運作參與式預算的朋友，一起來針對參與式預算的地方議會在文獻上的操作有哪些問題？那些優點？我們要如何去改進？我們今天作進一步的探討，希望台灣在運作參與式預算的時候能更成熟。首先，我們請葉一璋教授來做主講，然後再來聽幾位學界同仁和議會實務上的朋友表示意見。因為時間的關係，所以我們葉教授主講人以 15 分鐘，其他來賓以

10 鐘的發言。

葉一璋：

主持人趙老師、兩位議員、陳議員、江議員，還有兩位在我們台北市參與式預算做的經驗非常豐富的方教授跟施老師。今天這個主題由我來談，基本上我大概只能做個介紹，談一下我跟這個主題結緣的過程，特別今天也很高興四位都是實際參與的，特別是陳議員在達觀里試行，她等於是我們的一個模式，是台灣參與式預算的一個模式，可以運用議員配合款，運用在里民的建設上。因為我本身在世新大學，方老師也是，我們行政管理學系在參與式預算，從過去的公民會議，審議式民主的黃東益老師，他現在政大，所以文山區是由他負責，我們有一個官學聯盟，叫陪伴學校，我們負責中正區，我們系上還有一位老師，他是南港社大，還有施老師，我們還有北投內湖等等，我們都是協助社群的人，一起來參與。

從過去公民會議、審議民主到參與式預算，我想參與式預算在台灣，從觀念的引進，大概是 2013-2014 年，短短的幾年當中，等於是遍地開花，去年還有一個不錯的六都的成果展，六都都有介紹這幾年他們在參與式預算的執行成果，我想六都都有不同的特色，也結合我們在全世界看到的一些模式。

等一下因為時間的關係，我先簡單的談一下參與式預算，因為我這個 ppt 內容有蠻多，實際上是趙老師給我 3 篇不錯的文章，方老師有 1 篇，我也拿了他那 1 篇，那 1 篇主要是介紹在台北市運作的整個過程，今天因為網路上線的關係，本來有一個超連結，是看台北市在參與式預算，整個審議過程，包含提案、公民培育這些系列的過程，這些我就不去談，我想等一下留點時間給方老師作補充說明，然後陳議員可以談一下達觀里的創新模式。台中市應該是都發局的那個案子，由江議員來分享。

趙老師有幾個主題，各位先看一下在主題裡面，本來有一個超連結，要先介紹我自己的博士論文指導老師 John G. Matsusaka 幾年前寫的一本書 For the Many or the Few: The Initiative, Public Policy, and American Democracy，內容主要是談到底所有的直接民主的制度，是為了多數人？還是為了少數人？

我想包含審議民主、公民參與，甚至參與式預算，都是在解決代議民主的一些困境。但是在美國，有蠻多的實證與聲音一直在談即便是直接民主，也很多都是 for the few，由少數人把持真正最後獲益都是特定的團體，或是少數的利益團體，或是參與式團體。他(Matsusaka)實證的結果，基本上是否決了這個看法，但是他運用的資料全部都是和費用有關，比如稅 tax 跟花費(費用)。所以特別在美國，如果你是運用直接民主，他是決策於所謂的稅收及支出上面時，基本上他得到的證據是，如果你用直接民主手段，即支持所謂參與式，而且你參與式運用在，特別是預算的決策，或者是支出的決策時，基本上他大多數受益的是大眾，而且整個過程，比較不容易被所謂的這些利益團體把持，這是他的一個證據，首先我

提他的證據來給各位分享。

接下來，因為我們今天討論的重要主題是地方議會，事實上公民參與，在某些程度和代議制度是一個競合關係，如何把一些競爭的關係，或者本來是零和的遊戲，就是說參與式預算，也拿了很多原來是議會的權力，我們如何在這個背景之下，能夠讓議會協助，將選民跟議員重新連結在一起，然後讓整個過程，最後不要變成一個零和。

在國外也有一些的聲音，基本上有蠻多的議會，通常傾向不支持所謂直接民主的制度，當然也有一些其它的原因。等一下容我提一個替代方案，在我的 ppt 上面，我寫著 Better Way Out。在美國最近這幾年，有一個運動叫 Moneyball for Government，它的講法很簡單，就是說美國基本上發現，每 100 塊政府所花的錢中，通常只有一塊錢是有理由，有證據支持該花的，有 99 塊錢，基本上通常都是決策者，包含主要的首長甚至國會，或者是地方的議會這些決策者，他通常受制於利益團體(Special Interest)，本著他自己傳統的經驗(Common Sense 或 Conventional Wisdom)，去使用納稅義務人的錢。

過去幾十年來，美國在納稅義務人的錢，都在很嚴重浪費。現在地方政府也好，中央聯邦政府也好，他的資源是非常受限的。在資源受限的情形之下，興起這個 Moneyball for Government，Moneyball 是一個魔球，那個魔球，簡單講就是說對於金錢的預算，或是納稅義務人錢的使用，都是以證據為導向。如同馬里蘭州州長，曾經用一個案例說，他在當巴爾的摩市市長的時候，議會給他 20 名警察，如果他是一個很公平的市長的話，他會公平的分配在各區，如果他有一點政治性格的話，他會把 20 名放在初選人口最多的那一區，如果他非常非常有強烈的政治性格的話，他會把 20 名警力放在他的選民最多的區域，但是他說，他對其他地方政府一般會用的方案，都沒有使用，他最後將警力配置在犯罪最嚴重的地方，就是證據顯示出犯罪最集中的地方。這個案例，就是所謂的 Moneyball。

現在我們的大數據，或這是地方的資料非常的豐富，犯罪的熱點，交通的熱點、流量、空氣等等，這些一般公共服務都可以用，比如說地理資訊系統，或是證據來支持的，所以就興起了美國這樣的一個運動。這個運動有所謂的一個 Moneyball All-stars 聯盟，由地方首長加上地方參眾議員，都在這個聯盟裡面，這個聯盟現在有一些成果，它每一年發表成果，成果的好處剛好印證我講的，特別對金錢的使用，如果透過類似像這種以證據為基礎的，或者是所謂我們叫公民參與，事實上他是有一定成效的。

本來我的想法是想結合以證據為基礎，因為我們現在的參與式預算，民眾事實上是有一個提案的工作坊，讓民眾透過比較審議的方式，針對一個議題的了解跟資源的分配使用，他的過程當中，是不是有很多的 Moneyball 的證據資料 Evidence Base 進來，我覺得可以把它涵蓋進來，然後可以讓參與式預算，在這樣的背景跟的制度之下，可能議會也比較能接受，然後民眾也比較能夠接受，所以

我直接把結論講出來，等一下讓各位來討論，如果有時間的話，我再來回應過去我們在台北市政府所參與的一些經驗，謝謝！**(葉一璋教授演講簡報檔資料，附在本文後面)**

MONEYBALL FOR GOVERNMENT

THE PROBLEM

Too often, policymakers rely on gut instinct, or worse, special interests, when deciding how to invest taxpayer dollars. Less than $1 out every $100 spent by government is backed by even the most basic evidence that the money is being spent wisely. At a time when our nation is facing enormous social and economic shifts, budget constraints at all levels of government, an increasingly competitive workforce, and growing demand for government services, young people, their families and communities are especially vulnerable. In an era of across-the-board budget cuts which reduce funding for effective and ineffective programs alike, how can government make better decisions and get better results with existing resources?

THE SOLUTION

Government, at all levels, can take a cue from Major League Baseball and Billy Beane, the legendary general manager of the Oakland A's. Beane forever changed baseball by using data and statistics to overcome a tremendous financial disadvantage. Government can drive public resources toward programs that demonstrate success, and away from those that fail – in short, government can play Moneyball!

Today, we know more about what works for young people, their families and communities than ever before, but too often, government doesn't use that information to make spending decisions. In order to make an impact on long-term challenges, more must be done to drive resources toward high-impact solutions that get results.

Like Billy Beane and his Oakland A's, America can use this time of fiscal scarcity to get better results. We need to spend limited taxpayer dollars on the most effective and efficient solutions to address the great challenges facing our nation. Together we can bring Moneyball to government and get better Results for America.

Learn more at www.MoneyballForGov.com.

THE MONEYBALL PRINCIPLES

To improve outcomes for young people, their families and communities, Americans across the country believe that government at all levels should:

- Build evidence about the practices, policies and programs that will achieve the most effective and efficient results so that policymakers can make better decisions;
- Invest limited taxpayer dollars in practices, policies and programs that use data, evidence and evaluation to demonstrate they work; and
- Direct funds away from practices, policies and programs that consistently fail to achieve measurable outcomes.

MONEYBALL ALL-STARS

In addition to grassroots support, a growing number of local, state, and national leaders from across the political spectrum have signed the Moneyball for Government principles and joined the bipartisan Moneyball All-Star team:

Founding All-Stars: Michael Bloomberg (Former Mayor, New York City); Peter Orszag (Former Director, 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 President Barack Obama); Jim Nussle (Former Director, 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 President George W. Bush); Melody Barnes (Former Director, White House Domestic Policy Council, President Barack Obama); and John Bridgeland (Former Director, White House Domestic Policy Council, President George W. Bush);

Federal All-Stars: Former U.S. Senator Mary Landrieu; U.S. Representative Todd Young (R-IN), U.S. Representative John Delaney (D-MD), Margaret Spellings (Former Secretary, 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President George W. Bush); Richard Riley (Former U.S. Secretary of Education, President Bill Clinton); Gene Sperling (Former Director of the National Economic Council for Presidents Barack Obama and Bill Clinton); Austan Goolsbee (Former Chairman of the White House 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ors, President Barack Obama); and Glenn Hubbard (Former Chairman, White House 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 President George W. Bush);

Learn more at www.moneyballforgov.com

趙永茂：

謝謝葉教授為我們做了一個大概的說明，讓我們了解在美國運作，從間接的代議民主，繼而補強間接的代議民主，可是直接民主在程序上又有很多的問題。剛剛提到的 Moneyball 案例非常好，透過很多的審議及與管道的開放，有的可能真的沒有辦法解決，最後才進入到直接民主，有的時候看政策的衝突到什麼程度，這個不是代議可以做的最後決定，但是基本上，這些政策有不同的層次，我們藉這個機會，給幾位包括我們這些江議員、陳議員來表示看法，他們都曾在國外唸過碩士，都很優秀，接下來按照這個次序，請凱弘老師。

方凱弘：

主席趙老師，今天的發表人葉老師，兩位議員，施老師大家好，我想今天有機會來這裡，跟大家分享台北市的經驗，不過剛剛葉老師提出了一些想法，我過去沒有認真的思考過，我想就順著這個想法，一方面自己發想自己省思，跟大家

就教。

方凱弘教授

參與式預算、代議民主跟直接民主，是不是一個競合關係？這個其實已經聊蠻多了，包括在台北市民政局也跟台北市幾個陪伴學校的老師，我們也真正開過研討會聊這個議題，在這個階段可能還是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想法，不過剛剛葉老師提到那個 Moneyball 我覺得蠻好玩，因為我自己也是一個棒球迷，它裡面其實是有一個核心，就是他是不是可以透過一些統計，去找到一些平常大家比較忽略，對棒球的贏球是有幫助的，但是比較少被提到的這些統計關鍵的數據，來提升用比較少的資源，達成比較多贏球的可能性，包括這些我們常講的像全壘打，我們講的可能是打擊率，Moneyball 就提出上壘率，上壘率過去因為不是很重要，所以你找上壘率高的球員， 就可以花比較少的錢，把他們簽下來。

如果順著這個角度想，我就思考參與式預算，是不是也可以達到這樣的功能？結論是也許可以，至少我在台北市的參與經驗裡面，就有兩個很直接的感覺，第一個感覺是，當有機會跟民眾在住民大會作互動的時候，確實可以聽到很多我在學校裡面，在課堂裡面，或是我當立法委員助理時，我沒有機會跟民眾在那第一線的場合裡面，直接請他們把他們的生活需求說出來，說出對公共議題的了解跟想法，我覺得很不一樣。他們提出他們生活中所關切的議題，也許是他們鄰里的一些問題，有一些人會提比較多的是跨鄰里的問題，在這個過程當中，他可能可以協助政府找到過去沒有被關切到的問題，這個是我從 Moneyball 去做一個思考。

另外一個感覺是，我覺得可以思考的問題是過去我在學校教書的時候，或是我去參與公民參與的時候，為什麼公民在和政府溝通的時候，會有那麼多的落差？當然過去從公共行政的角度，我們覺得民眾對政府的運作，可能是不夠了解，我

們可能要去教育民眾，去做一些宣導，讓民眾知道政府怎麼運作，這樣才能夠妥善的把他的需求，轉化為一些政策，包括我過去在當立法委員的助理時，我也是從這個角度區作思考。

不過參與式預算讓我的人生產生另外一種形式，就是其實民眾的問題，他們不會去分專業，不會去分局處，不會去分部會。他們不會想這些事情，而是政府有責任把這些東西串起來，這也是剛剛我跟施老師在聊的時候，政府一些局處怎麼樣可以透過自己內部的協調，透過自己的分工，把他們在業務本職上內應該做好去把它完成，而不是在某種程度上，因為政府的專業分工，也許是大家都應該管而最後大家都不想管，而讓公共服務的利益流失，我想這可能是政府可以去做的一個思考。所以從這樣一個角度來看的話，我想至少我過去參與的經驗，覺得參與式預算在台灣，如果要能夠持續發展下去，議員的支持和地方首長的支持可能是最重要的。

畢竟在這兩個條件之下，才有可能使得跟民眾第一線接觸的這些會議，才能夠再持續的辦理下去，而且這些民眾出來的時候，他們的意見也才會有真正有執行公權力的人去聆聽，這是第一件事情。在這個邏輯之下，我們來看就議員的支持來講，陳議員在新北市所運作的模式，議員大家都很熟悉。在台北市模式裡面，在我們把民眾的需求匯集到區的層次，然後到台北市的層次，最後需要各局處介入協調的時候，台北市政府的市長室，其實有派一個王專員，他承市長之命，幾乎參與很多我們在跨局處溝通的會議，最後也跟民政局、台北市研考會共同希望能夠把包括第一年第二年通過的案子，能夠把它落實。

可是過程當中，即使市府出了這麼大的力量，投入那麼大的人力、物力，甚至市長直接的指示，它還是很困難，(陳議員插入提問題)因為局處之間業務屬性的關係，第一個想法就是這不是我相關的業務，(陳議員插入提問題)即使市長指示，他還希望各局處談出一個他們之間能協調的方法，如果直接下指示…。(陳議員插入提問題)公民參與委員會的角色比較多是在提供政策的諮詢，畢竟公民參與委員會還是一個體制外的委員會，我認為他其實是屬於市長諮詢的角色，跨局處最終還是要回歸到市長和市長室的官員中去協調各局處把這些政策落實，確實是這樣的一個過程，畢竟是我親自參與親眼目睹，我也可以感受到市長對這件事情的關注，還是發現他還是那麼難做到。

所以我覺得在沒有市長關注的情況之下，因為大部分民眾的問題，其實是不會有市長關注的，他可能被忽略，即使被重視到，無法妥善處理的狀況可能更多，包括今天早上李鴻鈞部長也提到，過去在新北市擔任副市長的時候，在推動很多政策的時候，在規劃的過程，大家是覺得很理想，但是到跟民眾接觸，跨局處在談的時候，他今天在談到一個案子，就是他在當部長的時候，有一個案子到經建會去拖了好幾年，我想能夠到經建會的案子，至少院長應該也是很重視，可是在跨部會溝通的時候，公共行政他就會產生一個困難，有重視當然是比沒有重視好，

這是台北市的模式，到區之後，最後還要台北市來做整合，在其他的地方政府，除了剛剛講的議員模式，台北市政府的模式之外，台灣還有一種，像包括台中市、新北市跟桃園市、高雄市，比較多的還是在局處的層次，他針對某些弱勢的議題去做關注，台北市也有，台北市這兩年都是做新住民。

葉一璋教授(中)，沈建文教授(左)

這樣的模式會不會比較好，其實我也不知道，不過某種程度上，他可以由市政府先決定某一個特定的弱勢議題，然後由某一個專業局處來做，至少可以避免掉的是跨局處的整合協調，由局長或處長直接來協調他所屬的科，我相信他的困難度會小很多，這個大概是我過去比較沒有去思考的地方。今天在這個場合剛好聽了葉老師的想法。我想也可以提出來，我後續自己在做參與式預算的工作推動上的一個想法。

最後我再省思一件事情，就是在台北市的經驗裡面，包括在國內外文獻比較少談的一件事情是，實際的參與內涵，到底什麼是參與？是不是把民眾找來開會討論一下，就叫做是參與，到底他討論的廣度跟深度，包括我覺得最核心的是承辦人員，他在過程當中怎麼引導民眾進行討論程序，他精緻到什麼程度，對我來講，他其實花了很多的時間在做準備，包括兩年經驗下來，到今天為止，我都覺得我們做得還不是很好，常常開完會之後，覺得好像還虛虛的，好像還可以再談多一點。

其實基於時間的限制，我們也覺得很難再花多的時間讓大家討論，所以我覺得第一個問題是在參與的過程中，誰來參與？這在台北市遇到過，我相信在其他的地方也會遇到，到底要邀請誰進來？在台北市我們曾經討論過，是不是要把要把一些人排除掉？比如說不要讓里長動員，我們要讓更多的弱勢的人進來。目前我的想法是，其實我們應該是擴大參與，盡量把更多的力量納進來。當願意參與

的人愈多的時候，自然而然那些我們比較不覺得應該為他做參與式的力量，自然就會被稀釋掉，也許這是我目前的想法。

第二個就是剛剛講的，如何參與？如何參與大概是目前相關文獻談得比較少的，也就是我們怎麼樣讓整個討論的過程，第一個是採平等發言，怎麼讓大家都能講到話，怎麼樣讓那些來參與，但不願意提出想法的人，能夠盡可能地都表達他的意見。再來就是在討論的過程當中，怎麼樣讓他們能做審慎思辯，這也是要回到葉老師剛提到的，我們是不是有辦法提供資訊，不過這也確實很難。民眾現場提出一個問題，我們怎麼有能力在現場提供一些專業上的意見或資訊，來讓他們能夠思考或思辨。另外一個角度是，我們希望他能夠回來第二次，我認為其實那在實務上是更難，這個要怎麼去處裡？這些可能都屬於後續的工作。在台北市用了很多的時間來談決策，那決策現在來講，就只能投票，內湖區有一次依照選舉的規模，把那個票匭搬出來，進行秘密投票。

為什麼這樣？因為有一些區像包括我住的中正區，一要進行投票的時候，就可以看到現場有一些里長在拉人，有一些其實想投別人，因為礙於里長的關係，就投給里長要的人。內湖區有一次就做了秘密投票，其他區也做了一些調整修正，至於怎麼投比較好？是複數投票還是一人一票等等？這些其實裡面都有很多的細節可以去思考。

當然就政治學來講，投票的方式就會影響到結果，我們怎麼樣確保讓投票的方式，更符合我們在參與式預算所希望能達成的目標，至少能讓參加的人能夠信服，也讓我們花很多的努力來籌備承辦業務的人，覺得我們做了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我想這大概是我在參與過程當中，在第一輪先提出來。

最後我想參與式預算，這幾年在台灣很熱門，很多人在談，但畢竟它還是政策工具，所以不管是議員模式，還是台北市政府直接下去執行的模式，或者是包括台中、新北、桃園所謂的這個局處的模式，我想都是可行的，只是說在什麼機會，在什麼時間點，用一個我們認為比較好的方式，讓這個政策工具，能夠協助我們解決政策的問題、民眾的需求或是弱勢的照護。第一輪先這樣，謝謝！

趙永茂：

謝謝方老師，因為他除了專門研究，也實際參與過，今天他也提出幾個很重要的觀點，特別是我們在政策過程裡面，包括今天李教授所提的，我們學理上叫做顧忌，就是局處內部之間的溝通整合。另外一個，就是外部的這些政府行政跟立法之間的溝通整合。為什麼內部的溝通整合會是一個關鍵，就是因為他要負責執行，執行不好，你再好的溝通都沒有用，剛才我們陳議員也有提到類似問題，這個部份的確是非常重要，像中國大陸現在有一些學校，有六七個副校長，當然可能沒有那麼多的必要，也有人講行政院副院長才一個是不夠的，包括副市長，功能性的副市長很重要，他要去整合，把東西逼出來，做出來是最重要的。

會議現場

所以參與式預算可能是滾動式,第二次再補強一些參與,但是重點是要執行,這個參與把一些政策弄得比較完整可行,包括很多來自學界或利害團體之間,跟議員政府官員交叉提出來。所以剛剛方老師也提到重要的一點,參與資訊的開放,也許不太方便,或是二次的、網路的,或是追蹤的專案的相關意見跟反映,這些事實上在推動預算,是管理或是一般治理的時候,是要編列治理預算的。

有些為了執行為了追蹤,像我們台灣大學有 2000 位老師,我的助理有 3500 個,他這些人把一些計畫執行出來,是要一批人進場,所以在治理上面應該要編預算做一些審查資料的追蹤,或是審查者的一些反映,主要還是協助執行的工作完成。政策的完整和執行的徹底,是非常的重要,這個部份,我們在技術上怎麼來克服是很重要的。還需要很多政策性的工具跟過程來完成這些東西,包含組織的調整及很多協助這個政策的形成跟政策執行的這些公務員、約聘顧問、助理來完成,這些配套也很重要,這一部份台灣還在發展當中。事實上,真正審議式民主及審議式預算都不是美國會運用,從學理上來看,目前只有民主的小國家會用審議式民主及審議式預算,像巴西、丹麥都是民主的小國,也就是說台灣本身也可以發展一些新東西,接下來請施老師。

施聖文:

大家好,我很佩服方老師,在實作之餘還可以寫研究,像我都快忙死了,都沒有辦法寫這些東西,但是我覺得這兩年忙,對台中來講不是沒有幫助。我舉兩個例子,第一個,去年 10 月我去西班牙,代表台灣民主基金會去參加世界民主全球論壇,在那一次的交流中,他們對於台中以及對於台北的操作,都有蠻好的印象,因為在一般的歐洲或者是南美,或是北美,他們所設立的行政區的人數,大概不會超過 10 萬,可是以台中和台北市一個行政區,像豐原就超過 20 萬的人

口，其實他們都非常的訝異可以這樣子的操作，我覺得這是台灣在國際上做參與式預算的亮點。

方凱弘教授(左)，施聖文(右)

第二個是，在國外做直接民主過程，多半都是在做一些各種對時局、對政府上面的缺漏進行一些抵抗。在那一次的全球論壇當中，尤其是西班牙，他們透過許多的網路技術，透過許多政府資訊公開的模式，喚醒西班牙一些年輕人，對於政府治理的一些漏洞，一些黑箱，然後喚醒他們起來做一些事情，所以網路技術這件事情，成為西班牙那一次論壇非常重要的主題。台灣在做 Open Government 及 Open Dada 在國際間是有一定的知名度的，這是第一個我要提的例子。

今年 2 月，台灣民主基金會邀情一些北美的學者來台灣介紹跟參與式預算有關的操作，其中有一個單位就是紐約的一個參與式預算的組織，叫 PBP (Participatory Budgeting Project)，PBP 基本上是全球研究參與式預算最重要的基金會。上上個禮拜我們接到 PBP 的執行長，特別把台中的 PB 放在他們的執行地圖底下，待會如果議員有興趣的話，我可以秀給你們看，大概是台灣唯一放在 PBP 地圖裡面的就是台中。

台灣這 3 年，從 2014 年開始，我們根本不知道為什麼台灣突然就做起參與式預算，但做公民參與是其來有自，已經是蠻久的事情。其實台灣做參與式預算，在國際間是有一些亮點，我們也跟其他人做一些交流。我們在台中市，扣除第 1 年的試辦計畫，第 2 年正式執行之後，開創 4.5%的投票率這件事情，連芝加哥市市議員 Alderman Joe Moore 議員都嚇一跳，所以他們也在想這個東西怎麼做，。

在台中做參與式預算，我們一直在問的一個問題，就是直接民主這直接兩個

字到底要怎麼做？我們花了很多的時間，就像直銷商一樣，先把市政府、區公所提供給我們的所有各種人民團體名單，這個名單不管是有立案的，沒有立案的，只要有電話都可以用，有媽媽的烹飪教室，我們就一個一個的打電話。我記得我們第 1 年，常被人家說我們是詐騙集團，第 2 年慢慢的在中區有迴響，然後包含市政府在中區也做出幾個民眾質詢的案子，到了第 2 年執行的時候，台中中區就幾乎只要宣傳單發一發就可以了，人數也不會比第 1 年還少。

所以重點其實在於對參與式預算，除了我們之前講的社會組織技術，以及公民社會組織技術之外，還有一個最重要的重點，就是市府對於民眾提案執行的承諾在哪裡？江議員最清楚，因為有時候市府他很容易就想要敷衍了事，他不去跟民眾去解釋現在市府的一些提案計畫。我舉一個例子，今年豐原地區想提一個鐵馬道的案子，但是鐵馬道在市府已經有一個整體規劃，所以都發局在溝通的時候，提案人也覺得原來市府已經有這樣的案子，所以他就主動的撤案。所以民眾他不管你局處是什麼，他只是想要知道在這個溝通的過程中，市府對民間的提案到底有哪些想法？以及做怎麼樣的溝通？

2015 到 2016 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市府在溝通一直沒有到一定的位置，我想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下，台中一直在朝向做一個公民培育的工作，從 2015 開始一直到今年，我們就開始一直不斷的想，希望能夠在這一個社會技術上做很多的突破，包含我們和社造單位合作，包含我們進入到一個台中市社造的委員會裡面，包含把參與式預算也納入社造的課程裡面去，一直希望充分的把各種民間能夠動用相關的培育組織串連起來，這是台中現在想要執行的。

當然這個模式也開始慢慢的走到一個瓶頸，這個瓶頸，大概就是出在兩個層面，第一個層面是我們到底要拿什麼樣的資訊跟民眾討論？這個所謂 Open Data 這個事情，應該是這兩年每一位都會市長都一直想要做的事情，但是 Open Data 我覺得這是一個專業的技術，而不是我現在掛了一大堆 pdf 的資料，然後要大家自己去查，目前有很多的單位就是這樣去敷衍這一件事情。Open 絕對不是那麼的單純，我把厚厚的一本預算書放在上面，請問誰看得懂這個東西？他們現在也在反省，到底是誰在看？看完以後要幹嘛？其實這些反省，都在這一年當中慢慢的開始凸顯出來，這是我們在跟民眾做培育、做討論、做各種溝痛、各種的說詞的時候，遇到一個很大的麻煩，就是我們到底要拿什麼東西，跟民眾講什麼東西？

我舉一個例子，比如說我們在談社造，在做社區工作的時候，我們看到傳統的社造，喜歡蓋牌樓，喜歡做彩繪圍牆，可是這個東西在社造已經越來越不想往這個方向走，除非你有一些配套，比如有駐地藝術家等等的方式，可是民眾他不會那麼快，民眾以前看到別的社區這樣子做，他也一樣這樣子做，在這過程中，民眾可能就是支持他的提案，他的提案就過了。這個東西要怎麼在之前的討論，就可以把新的一些社造的概念引進跟他討論，這個就是我剛剛講的，這個開放的技術到底在哪裡？我們也一直跟社造中心在談這一件事情，包含這個東西已經不

是市政府層級的，我記得我在文化部做社區營造審查的時候，每一次都碰到這個問題，這個社區到底領了多少的補助？沒有人知道，我覺得這是台灣目前很麻煩的一部份，就是我們根本不知道政府的資源在什麼地方？補助有多少錢？很不清楚。

所以我們在台中市參與式預算裡面有做了一個網站，我們希望未來，如果把參與式預算當做 10 年來看的話，至少這 10 年每一個案子，我們都可以知道在什麼案子，我們用了多少錢？所以會有一個 Open Data 的東西，而且他是一個 Open 的，他的整個程式碼都是 open 的，也希望大家可以共用，這是在制度面上的部份。

我想跨部會的協調，剛剛方老師已經講很多了，台中市也遇到一模一樣的事情，然後也有很多很好玩的模式，比如說研考會督考民政局去督考其他單位的執行狀況，這是一個非常奇怪的模式，但是這就是一種運作，反正行政之間就是要給他一點的時間做協調，這個部分剛剛趙老師也提到，需要更高層級的人出來帶這樣子的一個推動平台。

最後我想要提的是，整個參與式預算，議員在台中市的一個衝突。我想大家都知道參與式預算，我們在 2015 年的時候，我就想說服民政局把這個部分編成常務預算，不要用二備金的方式，因為二備金一年就執行完了，算是短期的。但是去年就遇到被刪減的問題，我覺得這個東西會凸顯兩個問題，這個問題，這 10 幾年在巴西都有發生過，這是牽涉到議員預算決策權的問題，第二個是地方建設的監督權這兩種權力。但是我很想為台灣的參與式預算做一個小小的，再退回一點，其實我們根本沒有扯到預算這件事情，我們還沒做到預算這件事情，姑且我們可以說是參與預算的執行。

依照台中市參與式預算來講，民眾決定的事，或是相關的計畫，它分為三個預算可以執行，第一個就是原本今年度行政單位在去年議會就通過的預算項目底下，符合民眾的執行項目就可以執行。第二個，如果這個部會真的沒有錢，他可以跟市長簽二備金支應。第三個，真的都沒有錢也沒有非常嶄新的預算，那就提到今年的議會底下。所以我們都還沒進入到真正的預算分配這件事，而是既原有的預算項目去做執行，所以我們希望議員能夠瞭解這件事情，我們沒有想要奪取議員的預算決策權，我們還沒有到這個層次，我們只是希望讓行政層級在執行預算的時候，能夠讓民眾進來而已，這個預算是去年議會都通過的，這是第一個部份。

第二個地方建設監督權，我們真的很希望當民眾提完案之後，議員來幫我們監督，因為就我們民間單位，或是推動的廠商，根本沒有去做到這個為位置，所以我們一直希望議員來監督，跟提案人一起監督行政單位到底怎麼做？這裡面就出現很多的狀況，就是行政單位有時候根本不了解參與式預算，然後就亂講話，反而把台中市政府打了一巴掌，所以這個東西也要牽涉到我們希望參與式預算，

可以跟議員一起做一個公共服務的創新服務模式，就是說大家可以結合起來。

就為民服務這個部分來講，我覺得現實一點，第一個他至少可以打破某種樁腳的模式。第二個，我希望這樣的模式其實議員可以在參與的過程中，他可以更理解民眾要什麼？社區要什麼？而在這個過程當中，我相信可能他也就不會陷入到一種黨派的問題，我真的覺得參與式預算不是黨派的工具，但絕對是議員的工具，因為這個東西是由下而上的，議員可以一起共同的參與，我想就此做一個分享，謝謝！

趙永茂：

非常感謝施老師，在實務上，他操作很有經驗，結合學理提出幾個重要的觀點，尤其是 Open Data。Open Data 在很多方面就是 Operation Data，政策形成過程，本身也是要有一些預算才能完成。台灣很多民主才剛開始，特別是程序民主，我們才剛開始，所以還是有賴年輕的議員，將來能夠不斷的，不要說前仆後繼，但總是每一代每一代都要有他的貢獻，我們到這個階段，如何跟世界連結，讓台灣的政治長新的芽出來。台灣民主不只是要政治上的民主，也要讓社會上的民主進來。政治要跟社會民主結合，就像這幾年我提倡的要讓社會的代議來協助政治的代議。而這個打開政治的過程中，就是要讓社會所需要的政策，能夠結合審查跟議事的專業，跟很多研究專業的學術機構，一起共同來形成，來發展，而這些發展都是為我們台灣的社會及下一代，這一部份施老師提的都非常重要。

關於 Open Data，很多 pdf 資料掛進來，也有它的好處。像昨天台大這邊，我們要建立評估地方政府相關的指標，我們在國際上要做網路連結的時候，也出現這樣的問題，發現很多個案操作的意見用 pdf 掛進來，很多老師的研究就靠這些凌亂的資料。從這些資料中，有系統的知識就產生出來了，進而再促進某些這方面的理解，若產生某一些問題，就再做進一步的釐清，這樣不斷的研究，其實也有它的一些功能。台灣的 Open Data 世代來了，我們怎麼連結這些年輕人有價值的研究跟社會的討論，這些材料還是有他的價值。

我們希望在參與式預算及社區營造上面再做努力，事實上，這些都是未來民主的資產，只是我們怎麼樣在操作過程，透過像今天的討論，很多的技術層面及組織內部的整合，讓相關的預算變成在審議式預算裡面，或是在預算審查裡面，也就是說他本身就是在一個 Package 裡面，而他原來審查的預算還是可以適當的加大，而且審查還是議員在審查，即使是輔助或協助，但是最後還是政治代議在做依法決策。我們透過實驗透過經驗，尋找一些觀念的改變，讓審查依舊由議員審查跟議會審查，但在行政階段先決定先執行那一段，也要保留一些相關的社會參與跟民主參與的空間。這些的反省，事實上對台灣是很重要的，我想很感謝施老師，這些很有價值很具體的論述。

現在我們請兩位議員提供你們的高見，每一個議員的體驗是不一樣的，資深

的議員有他的獨特的經驗，資淺的議員的感受跟敏銳度及受的教育都不太一樣，大家都受到很好的教育，台灣的確需要很多的年輕人來參與，來進一步使原來舊的政治有一些改變，讓新的政治新社會的發芽，能同時讓議會跟社會、學術一起長進，我們先請陳議員。

陳儀君：

趙老師，施老師，方老師，葉老師以及各位來賓，大家好！我想就施老師剛剛講的，先做一個回應，基本上我是以一個實驗的態度，開始搞一個達觀里。104 年的 3 月處理一個建議款，大概花了半年的時間，3 月到 8 月完成，8 月之後投完票就是所謂的問卷調查之後，就去執行到了，年底 12 月的時候，竟然在審計的那一塊，我們就被打臉說，他的 3 個案子掛在帳上，沒有去核銷，實際上是政府的合約廠商，雖然已經做了事，還沒有去做核銷的動作而已，審計就說還沒有執行完，可是在前端的行政已經做完了，那時候我就覺得有一點怪怪的，就是外面調查完，但是在執行這一塊我自己也沒有再跟進往後去盯。

2 年後，到了去年 105 年，我就把我的區塊放大到整個行政區 66 個里，在達觀里是 3000 人，60 萬元放進去，讓市民來決定用途，我是從 7 月份開始，我就公開說我拿出 500 萬元，新店區有 30 萬的人口，66 個里，我自己下去操刀，原來的達觀里是里長在操刀。

呼應剛剛趙老師說的，要有一個費用，因為後來我發現說，都是我辦公室的行政費用，我以前做議員都只是負責去罵人，可是自從我做了這個參與式預算以後，我覺得好辛苦，所以其實我很佩服各位老師下來做委託單位，然後陪伴著我們一起去決定公民參與，我要說的是其實我自己在整個過程中，比如說一個提案人或是一個團隊來，這個提案人他的一般的提案，我就是要陷在兩個極端兩個局處，這麼小芝麻的事情，我就讓市政府去做，所以我在去年 7 月到 12 月，我辦了 33 場的說明會，邀請的是不特定對象，我們用張貼廣告的方式邀請，有的時候參加的人真的很少，我就覺得這樣子可能不行。

因為原來規劃的 33 場的主題，有 10 場跟教育方面有關的，所以我就到學校裡面去做宣傳，我們就一起坐下來討論，通常我確定了方向以後，我就會向相關的人來做邀請，大該有三分之一是教育類，其他就是新住民類，因為我有一個婦女團體，要關注弱勢。

這樣子我每一個禮拜要辦一場，整個辦下來，我會收到 131 個提案單，裡面有 39 個成案，就是市政府各局處裡面，找不到就是這個東西做不來，他想要創新的，我就進去裡面做投票，其他就是很小的，政府可以下去做，我就發現他真的是跨局處的，他可能是民政局，可能是經發局，也可能是水利局，或是任何一個，在那個過程中，依我做新店市市民代表開始 9 年和市議員 8 年的服務經驗，我很清楚哪邊有藏錢，哪邊有什麼，我覺得我們議員來做參與式預算，就像剛剛

有人講的，可以很快的達到目標，

可是過程中要花很多的時間陪伴一個提案人，他不會寫企劃，可是他很有想法，如何讓他的想法落實成為一份企畫書，都要拜託助理來幫忙做，其實我的這一套實驗構想，是來自紐約，為什麼說來自紐約，因為開始在達觀里的時候，我們就找了中山大學的萬毓澤教授，海洋大學的吳建中老師，他們的觀念都是來自於紐約的。

今年的時候，我到紐約市議會，我覺得紐約市議會，會從 5 個人到去年 25 個人，今年 30 個人，我覺得重點在於他們有 51 個選區，每一個選區有一個議員，我的選區有五個議員在做的時候，有 4 個議員認為我幹嘛要做這件事情，我覺得說我做會有一些困難，因為我服務蠻久了，會累積一點能量，我會跟這些市民有一些互動，我覺得這個過程中，確實是由議員來推動參與式預算，是會比較容易達成。

但是有件事情也讓我有一點矛盾，我以前只要罵市政府，可是現在我現在覺得罵他沒有用，我直接自己來做，可是那個轉換點，是因為我長期覺得公務人員，他沒有辦法去完成他的工作，乾脆我自己做，我覺得我那個角色會轉換，好像我是一個公民，正好我是議員，就很容易去完成我們要做的事情，走到這條路，我覺得當然議員做參與式預算是快，就是說不會到議會就被否決，可是就是有些議員，他們不知道怎麼執行？

我們那時候去紐約觀摩，不管是國民黨的議員，還是民進黨的議員都說很好，我們也可以來提案，可是到了議會就做不出來了，因為他們沒這個經驗，不知整個 SOP，我偷聽到他們說不可以現在推動，因為明年就要選舉了，如果現在推動的話，到時候我們的網站上就只有陳儀君的名字，所以他們就認為以後再努力就好了，以上，謝謝！

趙永茂：

接著請江議員。

江肇國：

主持人趙老師、葉老師、方老師、施老師還有我們陳議員，我今天要講的其實就是剛剛施老師講的內容。因為他畢竟是實際參與者，我和施老師之前幾乎沒有遇到過，我們一直到今年預算被刪的時候，才在一起討論如何把它救回來，進入到中區我的選區，做了這樣的一個計劃過程是沒有跟民意代表接觸的，他們會去一通一通的電話打，但是不會打給民意代表，其實我是一個很超然的旁觀者，那也是因為觀察，才肯定這個團隊在做事情，也會支持。

所以我也跟施老師講不用太沮喪，議會不支持並不是你們做得不好，而是像剛剛講的，當然某種程度，議會的預算被分享了，或是預算決策權被架空了等等，

但是那些都是極少數的人，他們其實背後比較大的思考點，是他們認為這樣好像比較像在綁樁腳，透過發錢，運用這樣的一個模式，把錢發給他們想要給的人。

會議現場

換句話說，他們還是認為參與式預算是黑箱，盡管我們做得再怎麼公開公正，所有的案子，先公展再第 1 階段第 2 階段投票等等，但是在部分的民意代表眼中，或是一些媒體，或是沒有參與的民眾眼中，他們都認為這是一個黑箱的過程，他們不認為是直接民主，所以會導致今年度，本來要給你們 500 萬做這個的錢，拖到今年 8 月臨時會才通過，而且還刪掉剩 200 萬，根本就來不及，也沒有時間做這樣的事情。所以我認為在民意機關，或是社會大眾，對於參與式預算因為不了解而產生的誤會，這還是有長的一段路要走的，不是因為政治菁英今天突然想做了，感覺我們這兩年非常的蓬勃發展，還登上了國際的能見度，但是其實我所了解的是，知道這件事情的人其實不多。

台中市為什麼連續 2 年都選上中區，因為小，是一個非常適合的地方，其實市長他還是很保守，他想先做小規模的嘗試，中區不到 1 平方公里，人口不到 2 萬，但是他是過去台中最繁華的地方，但過經二三十年迅速沒落，人口外移，他剩下 19000 多人。

在這樣一個場域去實驗這樣的做法，其實很容易帶動，每一個人都覺得好像自己都有參與權，再加上這是一個沒落的舊城區，過去每一個市長都說要救中區，沒有人可以救得起來，民眾現在認為有機會自己來救自己了，所以他們提出一些，包括產業的、社會福利的、基礎建設的、文化等等的各式各樣的提案，提案有大有小，有的跟經濟有關，有的跟生活有關，但是他們在這個當中，尤其參加施老師你們所有的各項會議，不管是客廳會議、地方說明會議，還是培育課程過程當中，他們得到一個自我的提升，而且還得到一個宣洩，他們覺得好像看到了一個

可以自己作主的機會。

我覺得到現在，只走了 2 年，要說結論還太早，但是我看到中區的民眾，他們開始相信可以自己作主，這是我認為參與式預算，對於我自己的選區選民最大的影響，連帶的我們開始籌組中區經濟振興論壇，或是一些大大小小為中區再找回過去繁華的組織，像我們成立發展協會跟論壇等等，這些賦權帶給他們參與上的自我滿足，這是一個提升且很正面的效應，我很肯定施老師這 2 年來和整個團隊的付出。

另外一點我觀察到的現象，就是說中區的民眾他們得到的一些自我參與的滿足跟信心，但是他們決定不再從參與式預算裡面去想，因為他們否認這個管道。這個就是我們剛剛講的執行的問題，民眾千辛萬苦的學了一些東西，討論了很久，動員拉票一大堆有的沒有的，一大堆的程序走完了，市府好像不當一回事。

剛剛在講的很多東西用二備金完成，譬如運動局樂活健康舞蹈那個案子，本來為 100 萬的案子，運動局最後只給 3 萬，那我就說你們運動局是在打臉市長，最後市長自己只好簽核二備金下來。很多案子已成案通過的，要進入討論時候，官僚直接壓下來，比如說，今年有一個大城社區關懷據點的案子，因為我們現在的長照 2.0 計畫裡面，也有籌設關懷據點，所以他這個案子一進來之後，官員就說你跟我們現在要做事是一樣的，可不可以請撤案，這個事民眾已經定案且已經投票了，照理說政府要負責任去執行的，政府卻要求撤案。

另外在去年的情況也是很不好，一個課輔，票選社會局第一名的邊遠地區學童的課輔問題，也是成為 100 萬的規模，到最後只給了 19.8 萬，然後只輔導了 15 個學生，那個場域也只能容納 15 個同學，讓民眾很失望。諸如此類的事情，我曾經在業務質詢都發局，他們回答說，他們的業務只到辦完活動為止，至於後面的執行業務就不屬於他們，都發局的業管是社會、建設或文化等等，跟他們沒有關係，如果你要追蹤，要去列管研考會。

這就像剛剛方老師講的，沒有人管這個東西，究竟是誰要來整合協調，我也很訝異，剛剛老師也說台北市政府委員會竟然沒有實質的效果，我本來也是說是不是走委員會的方式，成立一個比較高層次協調監督的單位，才能夠去統整各局處的不同的意見。剛剛陳議員也說，如果台北市不成功，是不是把層次提高到副市長。前端我們需要老師們，或是團體來幫我們培育，包括培訓公務人員，包括形成提案還有投票等等，其實我們需要一些團體的專業幫忙，我們還是會讓渡我們的決策及預算，後續的追蹤列管其實應該還是要回到市政府，當然我們還會行使我們的監督權，這樣的一個體制，如果能更確定的話，我覺得參與式預算推動，可能機會會更好一點。

但是我還有幾個問題想要請教，因為我發覺我自己在看他們的預算，他們的提案，第 1 年有 29 個提案，經過篩選剩 13 個，投票出來剩 6 個，但是其實我看

這些提案，我個人都覺得有些案子的成熟度不夠，我不知道老師的團隊在參與討論的時候，會不會直接給予指導？

其實我是建議行政官員提早進場，他們一開始應該就法令上、預算上給一些可行性的評估，然後再給建議，但是這時機點到底是要一開始就切入？還是什麼時候再切入？現在的情況是案子已經確定中選之後，行政官員才進來，他進來看看不行就開始打擊啊，調整啊，本來要做一個光廊的，結果只吊植栽就好了，因為燈光維修有困難等等。今年就提早進場，很多案子在討論過程就不見了，這是我想知道的，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是說產生的方式，我們是不是還是走投票？我們中區過去有一個很有名的地方叫做第一廣場，現在叫東協廣場，在車站前面，現在已經是成為依賴移工維生的地方，那裡幾乎有百分之八十的經濟活動是靠移工撐起的，所以市長直接改名叫東協廣場。

一些新住民團體或是外配團體，他們對參與式預算也有提案，但是在投票的時候，就限於有戶籍的人，所以他們不可能有任何決定的機會，但那個地方某種程度他們應該要有決定權的，所以我們產生方式，是不是只有投票？因為他們不算住民，他們算是消費者，還是要用什麼樣的方式去定義他們在這塊土地上的人？

還有就是說代表性的問題，我們講是直接民主，其實他們所代表的只是 1 個人，或 5 個人，他可以比一個鄰長的朋友還要少，為什麼他就有代表性？這也是一種管道，他 1 個人就可以代表很多嗎？這在理論上，我覺得還需要些自我說服。還有就是在執行上，流於一些有政治動員能力的人，他們在主導整個議題參與的最後結果，這部分怎麼樣更擴充這樣的參與，包括我剛剛講的，怎麼樣提高他們的能力等等。

法國巴黎第八大學政治學教授依維 辛特默（Yves Sintomer），他說參與式預算要成功，第一個很重要就是說政治人物，不要趕流行或是做秀，我想這個很重要，我想現在其實是蔚為風潮，是一個趕流行的狀況。再來就是我們台中不斷的透過執行的過程，去檢討流程，我想也是我們今天理論跟實務對話的一個原因，也是一個未來可以改進的方向。

最後一個，在座很多都是公共行政或政治系的教授，要用什麼方法導入參與式預算，讓公務人員覺得這是一種行政革新，在我們政策決定過程當中引進這樣的一個魔球理論。但是要怎麼樣讓公務人員知道，這是一種對行政效能的革新新作為，公務體系也才能比較正面的看待這件事情。

總結來說，參與式預算要能夠讓大家瞭解，我認為現在大家的了解程度，還是太低，這有賴大家一起來思考，以上報告，謝謝！

趙永茂：

非常感謝江議員，他蠻有經驗的，在地方上也參與及推動參與式預算，累積了很多的經驗，等一下第二輪，我們再繼續來討論。我有幾個感想，就是包括剛剛有議員提到，我們現在透過合約的方式，引進一些廠商進來，可能也有一些學術界，結合相關的團體進來投標，那麼這標裡面把很多預算的經費，包括參與式預算、審議式預算，也可以包含在裡。

因為隨著參與式預算跟審議式預算的發展，將來在合約上慢慢的變成有一個執行的計畫，等於幫政府做一個初步的審議及審查的開放討論，我想這部分，將來的經費怎麼樣落實？從實質的前期規劃，到後期的行程跟考核，外包出去跟到行政機關裡面來，要形成計畫方向，最後再編成預算。變成預算有時候也很難，因為基本上他有政策的優先順序，這個優先順序哪一個比較完整的，或者是市長他看法怎麼樣，關鍵都在政治領導的決定。我們也不必要過度的灰心，這是沒有辦法的，但是我們看到明天的社會，明天的經濟，明天的政治，在地方的發展上，我們是必須要堅持的，就是說更多元的。

剛才陳議員也有提到，從英國的經驗來看，感覺到很有意思的是說市議員他不是個別來推動，聯合幾個議員也就是以更開放式來結合，也就說我們開放式必須把公共性拉出來，盡量能夠減低個人考慮的東西，整個大發展趨勢也是如此，他不但聯合同級的議員，甚至也聯合下層議員，比如說鄉鎮的民意代表，或是其他組織一起來，這就所謂的開放性，慢慢可能也會朝向這個方向來推動 。

所以我們的地方議員，很重要的是慢慢的從一個政治市場來講，都要做政治行銷，行銷自己，以公共的角度來做行銷，市民為什麼要支持你呢？他是你的外圍支持者，想到你就想到幾個議題，就要找你，相信你對事的某些政策發展就要靠你，因為你提出很多的政策出來，不管有沒有實施，但是大家都相信你。

特別是江議員提到，政府行政跟公共治理會有一些落差，行政人員不一定能夠感受到，政策領導也不一定能夠感受到，也就是因為這樣，所以我們才要結合社會來提出一些看法。行政人員很容易進來的，像我們各學校推出一些專班，一些行政人員甚至像我們一些議員朋友，他都會回到學校一起來討論進修。慢慢台灣也在做這方面的發展，所以有一些行政的進化，一些政治的進化也會在進行。

所以我們要有一些耐心，來看待未來的發展，有這樣的一些堅持，以更多的合作，更多的分工，共同來推動，促進成功。成功不一定要在我，因為你心中沒有私心，只有公共，所以會受到人家的尊敬。

像剛剛江議員提到的這些可行性的評估，這些改革方案的提出，我們要盡量考慮可行性，也就是說不是只邀請學界和這些利害關係人，我們也可以邀行政機關來參與。

我有一次參加台北市一個發展河川的管理，我很意外的是它是民間辦的，結果 11 個局長都來，我也嚇一跳，後來我跟他們說，這一些人你以為他是洪水猛獸，他是搗蛋的，沒事抗爭的，結果他發現真正擋一些地方勢力跟經濟力量的是這些人在擋，而且他提出很多的理念，放在預算裡面，變成很新的觀念，很有意思。

所以我們結合很多學界，很多的社會的 NGO，這是台灣未來很重要的趨勢。開放討論，大家私有性慢慢就會降低，運用這種公共討論，來壓制政府行政跟財團之間私的東西，讓公共討論 Open Data 這個力量出來，這個力量會是台灣未來很大的希望。審議式預算，不客氣講只是工具，我們甚至會被利用，審議式民主後來會被搞壞掉。因為我出來推的時候，我代表審議式民主，然後我推了以後，發現有些人會用一些御用的學者，所以我就罵你們這批人是御用的學者，而且審議式民主幾乎是他們在轉轉轉，他們跑出來用的時候，很多人就不去參加了。為什麼？我一些學生講，因為談的都是舊的東西，也沒有什麼新的東西，也沒有真的成效。所以必須把審議式預算的工具，變成功能又有發展性，能夠讓它產生一些成效，來促進大家的發展，提高公共性，大家會看他有沒有成效，而不是說你提倡什麼的，事實上可行性不是很高，學術上操作的時候也不是很理想。審議式預算我覺得都非常好，它公開，有不同的各種批評，大家一起成長，更多的結合，更多的審查，讓這些行政機關或立法者，或者是選舉出來的行政機關的領導，有更多的學習。

我想這些操作的過程是可以學習的，這個部分剛剛幾位老師有提到，各國和我們台灣的做法很類似，台灣應該把更多的經驗寫成英文，讓國際人士可以看，讓他們來學習，讓他們也願意來台灣一起協助我們。在研究地方治理的時候，發現你不要去小看菲律賓、印度，他們在操作的時候，比我們還好。他們早期是殖民地的系統，而且現在這幾個國家，還有很多專家願意來協助他們，我們和國際很缺少這種的聯繫，當然和中共的打壓是有關係，基本上我覺得可以透過民間團體，透過學術團體，他們跟我們溝通會更開放，更好，所以有些部分還是需要國際上的聯繫，讓他從一些工具式的審查，政治上的工具變成發展上的工具，變成一個功能性工具，但是怎麼樣讓它的開放性及公共性能上來，未來的發展可能會有很大的成效，我想回應兩位議員寶貴的經驗。接下來，幾位老師是不是還要再回應？

施聖文：

第一個，實務上我知道那個推動是很辛苦，我自己去年 12 月結束之後，我們團隊就沒有任何其他計畫，現在是我自己掏腰包，發給他們最低工資，然後一直到現在，現在大家還一直在 4 月接辦文化部的案子，然後 7 月我們接辦桃園市東南亞移工的案子，靠這樣子在撐。

但是我覺得年輕人，在這一塊真的可以投入，他們的熱情，是真的很好，我

還真的很羨慕，台北很多像老的助理能有很多的協助，台中地區的資源確實少一點，在這一年要做的工作，並沒有因為計畫結束而結束，我們花了很多的時間和學術單位聯繫，包括靜宜大學，然後東海大學的建築、逢甲的建築，所以我們現在在學術這一塊有很多的聯繫。

施聖文(右)

這樣的推動是導因於 2016 年，我們希望民眾在第一次提完案的時候，學術界學者專家就能進來，所以我們設計了兩個模式。

第一個是學者專家在還沒有投票之前，學者專家他就會提案，提出書面意見。公部門同樣的提案，公部門也會做書面意見，這兩份書面意見，我們都會給提案人，提案人會再辦一個公部門的協調會，提案人跟負責的局處單位聯繫，然後在那一天，我們的人在旁邊，讓兩邊修正共識的提案，修正完成，這個計劃才會正式進入到投票的提案，但是我們這一次的操作，那個操作的期限在剛剛講的那一個階段，只有三個禮拜就要完成，根本不可能，而且最麻煩的是，我們民政局是看到計劃，就直接說這可能是誰的，這有可能是誰的，就發了，沒有剛剛議員講的那個推動平台，因為這個東西在第一年的時候，為什麼局處單位會做，因為那是市長直接簽准，可是因為今年太多案，總共 70 多個案子，74 個區 70 多個案子，報到各局處，然後各局處都要去提案人討論這個案子，對公部門來講，他們也覺得工程浩大。

可是就我們在做這樣子的協調會過程當中，我們有算那個出席率，就是有一個統計，局處單位出席率大概都 70 以上，提案人出席大概是百分之 50 多，所以至少都 5 成以上，讓局處單位跟提案人討論，可是那個時間確實是太短了，我覺得就算討論完，局處單位回去還要做內部的討論，所以這個我們一直希望民政局能拉長時間，所以去年 6 個月的執行時間，未來我們希望能到 8 到 9 個月的時間，

按照巴西的經驗，他們都是 8 到 9 個月的時間，所以這個部分，我們可能要跟市府來好好討論，這是第 1 個部分。

第 2 個部分是，公部門的進場這件事情，以及我們之前跟民眾討論的時候，如何做一些提案，第 1 年 2015 年的中區沒有，原因是我們沒有任何的經驗。第 2 年我們在做這個部分的時候，主導團隊已經開始有這樣的經驗了，他會跟民眾討論提案的內容，今年我希望他們更加強民眾對提案的認識。所以今年他們都在上各種的課程，包含社造的課程，想辦法培育他們內部自己的能力，我們希望在提案的時候，他的想法、怎麼樣執行的這個部分，在討論的初期，就可以有一些討論的機會。

當然這個部分，我們還希望能夠公部門的一些行政一起帶進去，否則我們有時候就會太過於理想，然後這個提案可能執行度不高，所以我們也希望，把目前的一些公共政策帶進去，這個部分我們希望能夠時間拉長，當民眾有一個構想出來，輔導團隊去找相關的資訊，我希望我們能夠做到這一點，雖然累，但是最後的品質會好一點，這個東西也是在 2 月的時候，有大陸的學者一直在談我們的提案品質，是不是很粗糙，但是我覺得這個東西，跟社造的一些朋友，跟一些像經發局跟做社會創新的老師們，開始做連結的時候，能夠培訓一群人去做這件事情，精緻度會越來越高，但是這需要時間，但是我們還是願意去做這件事情。

最後就是代表性的問題，這也就是我們一定要跟議員合作的原因，(再強調一次)一定要跟議員合作，因為所有的這樣執行投票，我們雖然找到一群熱心地方公共事務的人來面對面討論地方公共事務要怎麼樣做，雖然他們人數夠多，但是他們的代表性還不是一般民眾對選舉民主代表性的思考，所以我們希望和議員來合作，更增加他的代表性和可信度。

最後一件事就是投票這一件事，2016 年我一直建議民政局要開放新移民投票，因為我們在投票設計底下，除了一般的投票之外，我們還設計行動投票，也就說只要你打電話來，我們可以帶電腦去給你投票，但是民政局就說技術有問題，沒有辦法做這件事情，我也沒有辦法去說服他們，我一直跟他們說，這個事情做出來，就是全台灣第一，現在已經讓桃園是領先做了，所以這些東西並不是沒有建議，而是有些行政方面公務人員無法創新。

趙永茂：

對不起，我們時間有一點不夠了~

方凱弘：

我想針對剛剛江議員所講的投票的身分，台北市目前的作法是，只要在那個方案的區設籍、居住、工作或就學，4 個只要符合 1 個就可以在那個區域投票。我想擴大政策利害關係，就是剛剛施老師講的，只要跟談的案子有關的人，都要

被允許可以去參與投票。

最後我補充一個例子，印象中，今年我在第二輪的審議工作坊，有一個商業理事長，他的想法是大同區大稻埕迪化街一帶應該做路標，讓大家很好走，結果他想到的是旗海。在開會的時候環保局就說，根據台北市相關的規定，旗幟最多只能掛 15 天，最多能延長 1 次至 30 天，講到後面講到很多類似的意見，他最後才說他的想法很簡單，他只是想引導國外的觀光客，把他們引導到他想要去的地方，也不一定要做旗幟，也不一定要做路燈，只要能達到這目的，誰能告訴我們要怎麼做？而不是告訴我，我想的方法都不行。我想這是我們將來要努力的方向，謝謝！

趙永茂：

非常感謝幾位老師跟議員，談得非常的實際，非常深入，而且也有許多具體的分享，來了解跟推動一些觀念，謝謝各位！

參與式預算與地方議會

葉一璋
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教授兼公共事務長

參與式預算的定義與內涵

- 參與式預算的概念包含了參與以及預算兩個面向。前者關注民主治理、審議式民主的實踐，希望藉由直接民主的參與機制，改善或補充傳統代議民主回應性不足的問題；後者則是關注預算資源配置的公平性(方凱弘、陳揚中，2016)
- 強調透過開放「公民參與」來讓民眾了解政府預算內容及過程外，參與式預算也希望透過讓公民在參與過程中的相互辯論協商來反饋政策建議，讓公民在政府資源應用分配上扮演更直接影響的角色（蘇彩足、孫煒、蔡馨芳、陳思穎及廖唯傑，2015）
- 參與式預算具有提高預算透明度、增進居民參與並降低社區資源被地方派系把持的問題(朱澤民，2015)

參見:000000

民眾參與政府決策的意義

- 所有公民都具有參與的權利，而社區組織並不具備任何特別的地位或特權
- 參與式預算的參與是由一組結合直接民主與代議民主的規則所規範，而其地點則是一個定期運作，且由其參與者決定內部規則的機構
- 資源投入是根據一組基於一般性標準與技術性標準所組成的客觀方法進行配置，並由行政部門執行。其中，所謂一般性標準是由參與機構為了界定政策優先順序所建立的具體標準而技術性標準則是由行政部門，或是基於聯邦、州或地方之法律規範所界定之技術或經濟可行性標準

(參考 de Sousa Santo,19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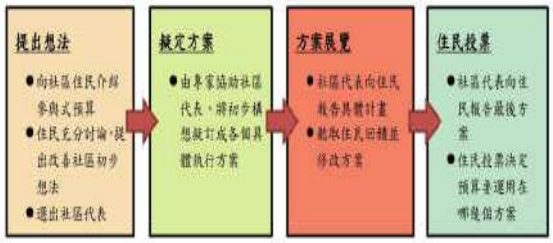
參與式預算的發展

- 參與式預算從1989年的巴西愉港市經驗開始
- 在世界各地推動迄今已超過2,000個政府單位陸續採行
- 我國文化部、部分地方政府與公民團體也在近年投入參與式預算的推動，例如：文化部推展公民審議及參與式預算實驗計畫
- 臺北市、新北市、臺中市、高雄市等地方政府也全面性地或在特定業務上推動參與式預算
- 新北市新店區達觀里以及臺北市北投社區大學也都已經具有參與式預算實際之操作經驗

各地經驗摘要

國家	城市	推行期間	參與式預算實施項目
巴西	愉港	1989～迄今	全市預算（人事費、公共債務、基本建設服務、公共投資與市政發展）
英國	Salford 市	1994～迄今	步道建設
法國	Poitou- Charentes 區	2005～2010	高中與高職的預算
德國	柏林 Lichtenberg 區	2007～2013	集中於特定公共建設投資，提供志願團體與教會
美國	芝加哥市	2009～迄今	交通、公共安全、校園與環境、學校與圖書館、藝術等
	紐約市	2011～迄今	與芝加哥類似，惟每項計畫要能夠維持 5 年，金額要在 3.5 萬以上，才能列為選項
加拿大	圭爾夫市	1999～迄今	社區服務或小規模的基礎建設
	多倫多市	2001～迄今	社會住宅相關設施的維護以及提升
	蒙特婁市 Le Plateau-Mont-Royal	2006～2008	公園、文化中心、街道和人行道的養護等
澳洲	豈梨 Heathcote 區	2009	社區營造補助經費
	加拿大灣市	2012～迄今	四年期施政計畫
	傑拉爾頓市	2013～迄今	長期性基礎建設計畫與中小型支出計畫
日本	市川市（Ichikawa）	2005～迄今	補助非營利組織社會服務活動經費
韓國	蔚山市東區（Dong-gu, Ulsan）	2004～迄今	決定地方自有財源的用途，約佔所有支出的 12-15%

參與式預算運作基本流程



我國推動參與式預算的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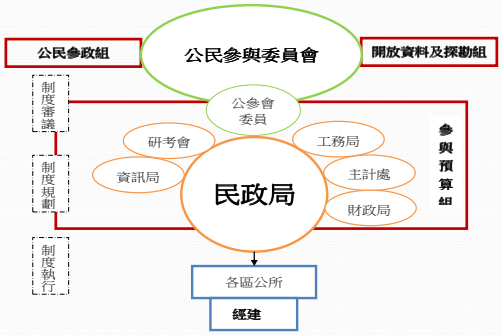
- 議員建議款模式：將過去被指認淪為收取回扣和選舉綁樁溫床的議員配合款，透過參與式預算的方式由公民參與提案，讓議員更貼近地區民眾的需求和想法
- 委外模式：即俗稱的「標案」形式，以政府採購流程，委託團隊規劃參與式預算提案程序及執行該筆預算。委外模式的案例為：文化部2015年「推展公民審議及參與式預算實驗計畫」、高雄市政府研考會「濱線文化廊道：參與式預算實驗計畫」、新北市政府經發局「節電參與式預算計畫」、新北市政府勞工局「身心障礙者就業促進方案參與式預算試辦計畫」等案
- 行政機關模式：由行政機關主導和執行整個參與式預算流程，在三種推動模式之中，行政機關模式的負擔和挑戰最大。目前臺北市政府和臺中市政府採用此一模式

參見 蘇彩足 (2017)

不同地區推動的參與式預算形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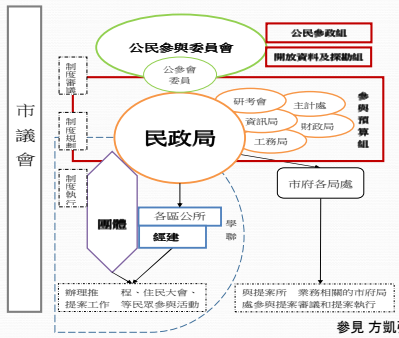
主辦人／主辦單位	文化部	臺北市民政局	新北市城鄉發展局	桃園市青年事務局	臺中市都市發展局	高雄市研考會
推動模式	委外	行政機關	1. 委外 2. 議員配合款	委外	委外	委外
辦理範圍	台灣幾個特定社區	臺北市全市	新北市特定社區	全市青年議題	特定行政區	跨行政區（特定議題）
提案議題範圍	社區營造	議題不設限，但須為市府合法的職權範圍*註1	1. 特定局處辦理為特定議題； 2. 議員配合款之議題為不設限	青年事務	該行政區特定議題	特定議題
經費來源	文化部預算	市府各局處預算	1. 各局處 2. 議員配合款	主辦局處	主辦局處	研考會預算
培訓模式	任務型	制度化	無	任務型	任務型	任務型，但納入各局處及市民團體

臺北市推動參與式預算制度組織網絡圖



參見 方凱弘、陳揚中, 2016

北市推動參與式預算組織實務運作網絡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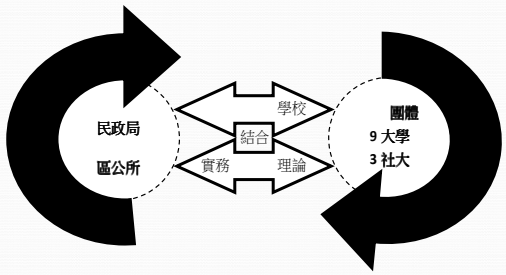


參見 方凱弘、陳揚中, 2016

臺北市參與式預算之制度設計與運作

- 臺北市參與式預算提案審議工作　操作流程圖
- 臺北市參與式預算制度公民提案與審　作業程序
- 臺北市參與式預算提案　程

參與式預算官學聯盟



謝謝聆聽　敬請指教

MONEYBALL FOR GOVERNMENT

THE PROBLEM

Too often, policymakers rely on gut instinct, or worse, special interests, when deciding how to invest taxpayer dollars. Less than $1 out every $100 spent by government is backed by even the most basic evidence that the money is being spent wisely. At a time when our nation is facing enormous social and economic shifts, budget constraints at all levels of government, an increasingly competitive workforce, and growing demand for government services, young people, their families and communities are especially vulnerable. In an era of across-the-board budget cuts which reduce funding for effective and ineffective programs alike, how can government make better decisions and get better results with existing resources?

THE SOLUTION

Government, at all levels, can take a cue from Major League Baseball and Billy Beane, the legendary general manager of the Oakland A's. Beane forever changed baseball by using data and statistics to overcome a tremendous financial disadvantage. Government can drive public resources toward programs that demonstrate success, and away from those that fail – in short, government can play Moneyball!

Today, we know more about what works for young people, their families and communities than ever before, but too often, government doesn't use that information to make spending decisions. In order to make an impact on long-term challenges, more must be done to drive resources toward high-impact solutions that get results.

Like Billy Beane and his Oakland A's, America can use this time of fiscal scarcity to get better results. We need to spend limited taxpayer dollars on the most effective and efficient solutions to address the great challenges facing our nation. Together we can bring Moneyball to government and get better Results for America.

Learn more at www.MoneyballForGov.com.

THE MONEYBALL PRINCIPLES

To improve outcomes for young people, their families and communities, Americans across the country believe that government at all levels should:

- Build evidence about the practices, policies and programs that will achieve the most effective and efficient results so that policymakers can make better decisions;
- Invest limited taxpayer dollars in practices, policies and programs that use data, evidence and evaluation to demonstrate they work; and
- Direct funds away from practices, policies and programs that consistently fail to achieve measurable outcomes.

MONEYBALL ALL-STARS

In addition to grassroots support, a growing number of local, state, and national leaders from across the political spectrum have signed the Moneyball for Government principles and joined the bipartisan Moneyball All-Star team:

Founding All-Stars: Michael Bloomberg (Former Mayor, New York City); Peter Orszag (Former Director, 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 President Barack Obama); Jim Nussle (Former Director, 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 President George W. Bush); Melody Barnes (Former Director, White House Domestic Policy Council, President Barack Obama); and John Bridgeland (Former Director, White House Domestic Policy Council, President George W. Bush);

Federal All-Stars: Former U.S. Senator Mary Landrieu; U.S. Representative Todd Young (R-IN), U.S. Representative John Delaney (D-MD), Margaret Spellings (Former Secretary, 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President George W. Bush); Richard Riley (Former U.S. Secretary of Education, President Bill Clinton); Gene Sperling (Former Director of the National Economic Council for Presidents Barack Obama and Bill Clinton); Austan Goolsbee (Former Chairman of the White House 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ors, President Barack Obama); and Glenn Hubbard (Former Chairman, White House 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 President George W. Bush);

Local All-Stars: Richard J. Berry (Mayor of Albuquerque, NM); Kasim Reed (Mayor of Atlanta, GA); Stephanie Rawlings-Blake (Mayor of Baltimore, MD); Michael Hancock (Mayor of Denver, CO); Karen Freeman-Wilson (Mayor of Gary, IN); Stephen Goldsmith (Former Mayor of Indianapolis, IN); Sly James (Mayor of Kansas City, MO); Eric Garcetti (Mayor of Los Angeles, CA); Greg Fischer (Mayor of Louisville, KY); Mitch Landrieu (Mayor of New Orleans, LA); Bill de Blasio (Mayor of New York City, NY); Michael Bloomberg (Former Mayor of New York City, NY); Michael Nutter (Mayor of Philadelphia, PA); Angel Taveras (Former Mayor of Providence, RI); Ben McAdams (Mayor of Salt Lake County, UT); Julian Castro (Former Mayor of San Antonio, TX, current Secretary, U.S. 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 and Ed Murray (Mayor of Seattle, WA); and

Non-Profit All-Stars: More than 60 non-profit leaders from all across the country have signed our Moneyball for Government Principles; view the full list of All-Stars on the Moneyball for Government website: www.MoneyballForGov.com.

PLAYING BALL!

Some of our early successes include:

- **Book:**
  - In order to change the way government works so that policy and funding decisions by governments at all levels are informed by the best possible data, evidence and evaluation about what works, Results for America spearheaded the writing and publication of a new book, *Moneyball for Government*. The book includes jointly-written chapters by former Obama and George W. Bush administration Budget Directors Peter Orszag and Jim Nussle, U.S. Senators Kelly Ayotte (R-NH) and Mark Warner (D-VA), former Obama and George W. Bush domestic policy advisors Melody Barnes and John Bridgeland; former spokesmen for the Mitt Romney and Hillary Clinton presidential campaigns Kevin Madden and Howard Wolfson; former Obama and George W. Bush economic advisors Gene Sperling and Glenn Hubbard; and Obama and George W. Bush policy experts Robert Gordon and Ron Haskins. The book also features profiles of innovative government and nonprofit leaders and organizations across the country that are successfully leveraging data, evidence and evaluation to get better results.

- **National Articles**:
  - All-Stars Peter Orszag (Former Director, 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 President Barack Obama) and John Bridgeland (Former Director, White House Domestic Policy Council, President George W. Bush) discuss the Moneyball principles in The Atlantic Ideas Issue and Politico;
  - New York Times Columnist David Bornstein writes on benefits of Results for America's work in "Can Government Play Moneyball?"
  - White House Blog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explains the growing evidence base for investing in what works.

- **Original Videos**: All-Stars Melody Barnes, Stacey D. Stewart (U.S. President, United Way Worldwide) and John Bridgeland, narrate three original animated videos: "Continuous Learning," "Moneyball: A Lesson for Washington" and "What Works";

- **Twitter Town Halls**:
  - All-Star Stephanie Rawlings-Blake (Baltimore Mayor) participated in a Moneyball for Government Twitter Town Hall in January 2014 on how cities like Baltimore are using data and evidence to improve outcomes for young people, their families, and communities.
  - All-Star Stacey D. Stewart (U.S. President of United Way Worldwide) featured in Twitter Town Hall in June 2014 on how nonprofits like United Way and others utilize data and evidence to improve outcomes for the people they serve; and
- **Events:**
  - On November 12, 2014 Results for America sponsored "Moneyball for Government: Can Data do for Public Policy What it Did for Baseball?" a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with panelists Karen Freeman Wilson (Mayor of Gary, IN), Stephen Goldsmith (Former Mayor of Indianapolis, IN), Gene Sperling (Former Director of the National Economic Council and Assistant to the President for Economic Policy) and moderated by Megan McArdle.

Join Us!

Sign the Moneyball for Government principles at www.MoneyballForGov.com.
Follow our campaign on Twitter (@Moneyball4Gov) and Facebook.

Learn more at www.moneyballforgov.com

A4 場次：各國地方議會運作最佳實務

主持人：

卓伯源　前彰化縣縣長

主講人：

九位與會國家會長、代表及議長

與談人 ：

王振軒　中國文化大學推廣教育部教授

陳立剛　東吳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兼主任

陳牧民　國立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教授

黃盈智　嘉義市議會議員

厲耿桂芳　台北市議會議員

林晉章：

我們現在就開始下午 A4 場的論壇，今天下午也有三場的分組論壇，我們九樓的這一場，就由我們彰化縣的前縣長，也是我們前立法委員卓伯源卓縣長，來為我們擔任 A4 場的主持，我們以熱烈的掌聲來歡迎卓縣長。

卓伯源：

首先，我們要共同感謝林晉章林理事長，能夠為大家建立這樣一個平台，讓亞洲地區，各個政府的地方議會派出代表，大家來互相交流集思廣義，共同為擔任地方民意的喉舌，能夠在這邊有一個廣泛交換意見機會。

接下來，我們 A4 場題目是各國地方議會運作最佳實務，對於議會運作實務，我們今天早上，已經有了第一階段的意見發表，大家有一個初步的了解，我們原則上就是延續今天早上的議題，由各國議會代表及各團的代表，今天下午又加入我們台灣的學界菁英前輩，還有我們台灣地方議會的代表，大家共同來集思廣益。

當然我們題目跟早上是類似，但是又不是完全一樣，我們今天下午的題目是，地方議會運作的最佳實務，這個題目應該是比早上的範圍更大一點，也可以說，我們在下午有更大的發揮的空間，舉凡我們議會的運作，包括我們議會的議事規則，我們議會的開會秩序，還有基本民主運作的原則，或者是我們議會民意機關跟行政機關之間，必須合作中有監督，監督中有合作這樣的尺度怎麼樣來拿捏？還有我們議會運作，如何來展現真正的民意？滿足民意的需求，我想這是我們大家有興趣也希望了解的，在不同的國家不同的制度，不同的風土民情，不同的習慣宗教，大家運作的實況如何，我們希望各國的代表，能夠提出寶貴的經驗，請多多指教。

主持人卓伯源先生

接下來，就依照我們的發言順序，由八個國家的代表及議長來進行發表，延續我們早上的議題，如果說各國的代表議長，早上已經發表過了，下午也可以請該國的團員來進行發表，依照發言的順序，第一位我們請蒙古烏蘭巴托市議會的議長代表來發言。

B.Tsolmon：

大家午安，蒙古的人口大概有 300 萬左右，烏蘭巴托就有 160 萬人，烏蘭巴托裡面有 9 個區，在首都的話我們就有 45 個議員，謝謝！

卓伯源：

蒙古的代表就這樣簡單的發言，有沒有要補充的？我們原則上每一位發言是五分鐘，我們蒙古的議長代表就發言到這邊。接下來，為各位來與談的是馬來西亞槟州立法議會的劉子健議長，劉議長請。

劉子健：

謝謝主持人，我這邊想跟各位分享立法議會的一些資訊，其實槟城是馬來西亞的一州，我們人口大概也是 160 萬左右。在槟城裡面，我們有 40 名的州立法議員，每一個議員代表的是一個區，在這 40 名議員裡面，有 30 名是執政黨，有 10 名是反對黨。

馬來西亞檳州立法議會的劉子健議長

這邊要跟各位分享一個比較特別的議會規則，160 萬左右的人口，選出 40 位的議員，代表 40 個選區，在檳城的議會現在 40 位的議員當中，30 位隸屬於執政黨，實為屬於反對黨的議員，因為馬來西亞的政治情況是聯盟的情況，所以在 30 位議員當中，也分別隸屬於不同的政黨，其他 10 位議員也屬於另外一個政治聯盟，其實在馬來西亞是一個多種族、多宗教、多元語言文化的社會背景，所以蠻特別也蠻複雜的。我們在處理立法會內部事務的時候，因為每一個議員都代表不同的種族，不同的宗教信仰，這也使我們的立法會更有趣，也更複雜，但也因為我們已經是這麼複雜的情況，所以我們也需要一些特別的議會規範。

我這邊跟各位分享我們的一些做法，我們的議會因為有多元宗教的背景，不同的議員在議會裡面，其實有時候是非常令人頭疼的，不過也有有趣的地方，這些議員有時候搞笑的時候，個人的口味也有所不同，我跟各位舉一兩個例子，在我們議事規則裡面，賦予議長有怎麼樣的權力，來處理一些看起來非常敏感煽動，足以讓族群之間產生緊張不安定，或是一些語言，足以煽動個別的支持者進行仇恨的這些言論，要怎麼樣來處理。在我們馬來西亞國會裡面，我們的議事規則，非常清楚規定一些可能引發剛剛講的這些不安，或是煽動的這些語句，其實是不准在議會裡面來使用的。

所以當議員提出這樣的言論的時候，議長會馬上制止，或是議長沒有意識到他的言論有這樣的成分，而議員發現也可以要求議長處裡，要求馬上制止，甚至要求那位議員收回剛剛的言論，所以以這個例子來講，就是在處理像馬來西亞這種族群之間張力很緊，我們過去有不愉快的事件之後，累積的一些經驗，不得已一定要把他寫在議事規則裡，不容許這些迫害社會秩序的言論在議會裡面來發表，所以這可能跟單一民族的國家不一樣的地方，也是我認為比較好的，能讓議事能

順利進行的一個明文規定的條文。

所以在這樣子的背景之下，議長也可以適時來阻止，議員不論是資深或資淺的，他們也都知道這樣的言論是不被允許的，如果議員不願意收回自己的不當言論，也不願意道歉的話，我們也有自己隸屬於議會的特別委員會，針對議員在議事廳發表違反議事規則言論，可以透過議會的表決，移送去到所謂的特別委員會，來重新檢視你的言論，然後做一個處理，再送回議會來表決，最後決定如何處分，這個處分可能是一個會期不准再踏進議會，最重的可以終止議員資格半年，依此類推，我想在這裡跟各位分享，我們跟其他國家可能比較不同的規定，提供各位做參考，謝謝大家。

卓伯源：

我們謝謝馬來西亞的劉議長，能夠針對馬來西亞他特殊的多元文化，而有他們特殊的作法跟議事規則，我們謝謝劉議長給大家的分享。接下來，我們請韓國議長聯合會的秘書長，也是全州市議會的議長金議長發言。

金明志：

大家好，我是大韓民國全州市議會議長金明志，相信大家剛吃飽都很累，謝謝大家熱心的參與。今天參與這個活動的最主要成員是市議員，因此如果能夠提高市議員的力量，那就可以讓市議會更發展，我上午的時候，已經稍微跟大家分享過了全州市市議員研究團體的例子，這也是我下午想講的內容，就是這些研究團體，他們如何去提高地方議員的力量。

全州市市議會在 2008 年，通過相關法令之後，一共有六個研究團體成立，以前有的 4 個研究團體繼續留下來營運，這些研究團體包含把各地的熱門話題政策化，及協助法案以及發言等等，這些研究團體也持續的跟其他的地方議會交流，在 2009 年也有跟台北市議會，合作舉辦了一個預算政策相關國際學術交流活動，每一次的交流活動都有民眾以及各個領域的專家參與。

換句話來說，舉辦的活動具備有民主性跟專業性，全州市研究團體的這個案例，引導了很多方向的進步，同時也打好了未來發展的基礎，不只在提高一些力量上，或者是一些計畫上進步，其實也有全方位的進步，未來的議會研究團體最主要的方向，有以下三點，第一點，提高議員的專業性，第二點，持續發展以及強化議會的力量，第三點，要強化以及支援對外的溝通管道為目標往前進，我相信未來會有更大的發展機會，謝謝大家聆聽。(發言人演講資料，附在本文後面)

韓國議長聯合會的秘書長

卓伯源：

謝謝韓國的金議長，提供了一個很特別的韓國議員研究團體，也把他的功能性，跟大家做了一個非常詳細的介紹，我們謝謝金議長的分享。接下來，我請下一位吐瓦魯國的首都府富納富提市的酋長，來跟大家分享。

Siliga Atiake Kofe：

謝謝主席，吐瓦魯以前叫做埃里斯，一個島群的殖民地，那是 70 年代的事情了，我們在 1915 年到 1976 年之間，是殖民地的地位，之後我們跟其他的島群分離，獨立成立了吐瓦魯，所以吐瓦魯可以說是從 1976 年開始立國，我們之所以跟另外一個島群分開，是因為我們有一些差異，有不同的種族，他們是克羅埃西亞的族群，而我們是波麗尼西亞人，總之我們在 1976 年脫離另一個島群，到 1978 年正式宣告獨立，我們人口大概是 1 萬人，這當中有超過 5000 人已經移民到澳洲、紐西蘭、斐濟等國，或是到美國的夏威夷。

我們的 GDP 大概是五千萬美金，這個是 3 到 5 年前的數字，而我們的 GNP 超過 1 億，也就是說我們得到相當多的援助，我們透過這些的援助，可以去支應在吐瓦魯所需要的各項服務，當我們成為一個獨立的殖民地之後，我們的地方條例地方法律，就是一切做事情的基礎，也就是我們的地方自治是根據我們地方自治條例的法律來執行。

瓦魯國首都府富納富提市的酋長 **Siliga Atiake Kofe**

基本上這個條例跟英國的法律是一樣的，基本上就英國的地方自治法，英國相關的地方自治法，也在我們很多的地方適用。在 1999 年的時候，我們通過了宗族領袖的法律，這個法案的目的，是讓權力可以從中央下放到島的地方層次，而各島就由宗族的領袖來領導，而我就是其中一位宗族的領袖。我的島是富納富提，也是吐瓦魯國的首都，這樣的權力下放的地方自治，讓我們宗族代表，可以制定自己宗族的法律還有政策，除此之外，也可以自己編列通過預算。在這邊，我想跟大家談一下我們制定預算的部分，藉此來更加說明我們有非常好的問責制度，在編預算的時候，問責的制度做得非常的好，大家知道編預算是先從行政層級開始，以島為等級的行政單位要預估收支大概是多少，未來這一年的收支各有多少，這是由行政單位來進行，也就是各島的行政單位來進行，這也是我們宗族領袖的行政單位，當行政單位編好預算以後，就交給我們的宗族代表議會，代表議會會去看預算，要嘛通過，要嘛駁回，這個是我們做事的方法。

在我們的法律裡面，提到所有宗族審查預算的場合，是 18 歲以上的人都可以參加，只要他們有登記成為選民的話，他們都必須要出席，要參與審議預算的過程，他們也有權利投票。從民主的角度來說，這一點非常的好，做到了促進參與，也就是大家都可以做到參與式預算，不過也造成一些問題，會影響到我們宗族領袖的運作的穩定性，因為很多人他們只來參加審預算的場次，剛剛有說到這些審預算的場次，大家都可以來，年輕人也可以，他們可以投票反對，如果他們投下了反對票，就表示他們對這些宗族領袖的不信任，當然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發生這樣子的情況，可能是因為這 52 名的宗族領袖代表，都是各個家族的酋長，他們的宗族開枝散葉以後，由最年長的女性或男性來做宗族的領袖。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到目前為止，沒有人投下不信任票的原因。這些酋長在跟

宗族內解釋這些政府的政策重要性的時候，他們會很清楚地去溝通，希望我們不去投下反對票，我想這樣子的運作方式，對於吐瓦魯的民主制度，是一種還不錯的做法，但當然從管理的方式來看的話，或是從治理的方式來看，我反而覺得這不是一個很好的發展，謝謝！

卓伯源：

非常感謝吐瓦魯的酋長，來為我們分享吐瓦魯一個特殊的制度，接下來，我們邀請斯里蘭卡地方當局政務聯合會的會長，來為我們大家分享。

Seyed Ali Zaheer Moulan：

斯里蘭卡地方當局政務聯合會的會長

謝謝主持人，大家午安，我是斯里蘭卡政務聯合會會長，我們有 165 個地方政府，之前我也曾當過市長，我也獲選當局政務聯合會的會長，我現在也進入了議會，我們在管理上有三層的議會立法會，我們有 9 個省，對地方政府而言，地方治理當然是一項最重要的議題，另外政府的去中央化，也充分的授權給地方政府去執政和做管理，地方政府就是在各個方面，滿足人民生活的需求，我現在是一個議員，我代表我的選區，但是我曾經做市長的時候，我曾經幫草根基層的人民，去照顧他們，我感到很榮幸。

因為我們是能夠直接影響到別人的生活需求，所以我覺得去中央化非常的重要。昨天我來台北之前，我還要去議會投票，其中的一項法案，就是授權地方政府的一項法案，在這邊我想分享的，就是我們處理的事情很多，比如說市民的健康，我們有乾淨的水，還有足夠的能源，確保每一個人有平等的權利，我們每天處理如此多的地方市政事務，所以我才會說我們要確保完全的地方自治，我們不能只是仰賴省政府或是中央政府。因為每一個市長或是市議員若能獲得更多的賦

權的話，他們就能夠更貼近人民的需求來服務市民。

今天早上，我提到了要永續發展的目標，其實在全國 32 項的工作中，有 17 項是地方政府要負責的。但總的來說，這也是一個藍圖。每個城市有很多要做的工作，保護地球世界和平等當然很重要，但是國家對於市民的生活需求也要很重視，因為我的市民會告訴我們，哪一個排水系統應該修，哪一個馬路要鋪設，或者是哪一個地方沒有乾淨的水源，這些都是每天的生活需求，市民會跟市長跟市議員去反映，所以我們的市長市議員要有一定的權力，所以所謂的治理的去中央化，讓在地地方政府有自治的能力，這就是我今天一再重申，而且認為很重要的想法。

今天我們不只在全球地方議員論壇和亞洲地方議員論壇這樣講，不管在哪裡，我們斯里蘭卡代表，都會講說我們必須賦權給地方政府，所以在座的各位我們市長們市議員們才能夠更貼近人民的需求，去服務他們。

我們也要確保我們的工作的透明度非常的高，來屏除可能的貪腐情況發生，另外地方政府在服務人民的時候，要屏除有可能造成腐敗的情況發生，這樣才能確保有好的管理，我就分享到這裡，有任何的問題可以問我，我們一起來討論，謝謝聆聽我的分享，謝謝大家！

卓伯源：

謝謝斯里蘭卡的會長，他提供了一個大家很重要的共識，就是地方政府的權力要多一點，我想我們在座的人沒有人會反對，但是不曉得我們這個會長，將來到中央去了以後，會不會堅持你的理想，因為依照我們台灣實踐的經驗，我們很多的大城市市長，當他在地方當市長的時候，他要求中央給他更多的權力，要求給他更多的預算，但是有一天他到中央去了，不見得會記得他過去要求的事項，這是台灣實踐的經驗，跟您分享一下，台灣有一句俗話說，換了位子會換了腦袋，謝謝斯里蘭卡，接下來，我們邀請菲律賓議員聯盟的全國主席，Danilo 主席。

Danilo Dayanghirang：

謝謝主持人，今天早上我有提到一些募資的作法，需要私部門的參與，需要他來做出建議，比如說他們需要稅務上的優惠。下午我想跟各位分享一些基本預算的規則。我想錢對任何的政府都非常的重要，當我們談到需要錢的時候，總是沒有錢，所以我們才要把一些預算，聰明的花在刀口上，所以如果是從中央政府拿到的預算，比如說是一些反毒的和經濟發展的計畫，這些都是讓地方政府去運作，但是這些計畫如果沒有預算是不能執行的。

另外比如說，我們地方政府的一些法案，有充分的賦權由地方政府來做運作，這整個預算的安排，都是掌握在市長市政府手上，我們菲律賓政府，分為三個層級，第一個，就是執行面的市長，第二個是監督的市議會，如果這兩者有衝突的

時候，我們還有第三個司法系統，所以是有司法立法行政三大體系。

最後審查結果會送到市長那邊，我們可以將送到市長哪邊的案子撤回來，我們可以撤案，但是我們不能增加案子的內容，所以預算案審查通過，送到市長那邊以後，市長有 15 天的時間可以否決市議會的案子，如果 15 天市長沒有否決，那就表示全案確定。至於 15 天內經市長否決的案子，市長必須要附上他的意見，將案子退回市議會。經市長核定的案子，我們就會公告周知。

菲律賓議員聯盟的全國主席 Danilo Dayanghirang

之後，核定的案子送到全國性的部門審查，然後開始執行。接下來預算通過了，就可以撥款給執行單位，如果在預算執行的時候，有任何的問題，譬如說發生了貪污的問題，我們有一個憲法層次獨立的稽核會的單位來檢查，對這個單位的稽核，是總統都不能干預的，如果有發現貪污的情事，稽核單位可以移送司法機構來調查，也可以把這個案子呈交給監察人，他們會去調查政府官員的作為。

在此同時我們還有其他的機制，剛剛為大家介紹的就是菲律賓政府預算的編撰的過程，希望大家都能弄清楚，就是從市長那邊先提出預算，然後送到市議會去審查，再送回給市長，市長可以同意或否決，同意後預算就會公告，預算公告之後就會撥款給各個執行單位，之後還有稽核委員會進行稽核，並提出報告，希望以上的資訊對大家有幫助，謝謝！

卓伯源：

謝謝菲律賓全國的主席 Danilo 主席，為我們分享詳細的制度，下一位我們邀請日本的代表加地邦雄(Kunio Kaji)，他是來自福岡縣的議員，請日本的代表。

加地邦雄 (Kunio Kaji)：

我是福岡縣議員，我叫加地邦雄，請各位多多指教。今天有這樣的機會，能夠參加這樣的盛會非常的榮幸，對 ACF 的林晉章理事長，以及各位的先進，個人表示由衷的感謝之意。

現在我就福岡縣議會的國際交流現況，跟各位來做一個簡報，我們福岡縣人口有 511 萬，我的選區是福岡市的南區，大概有 150 萬的人口，可以選出 4 個縣議會議員，我們議會有 160 席。議員國際交流部分，我們和國際其他地區的議會都有進行合作，其中也和包含韓國、中國、美國及泰國、台灣等等國家的議會聯盟。

福岡縣議員加地邦雄

我自己是擔任了 2 年的台灣議員友好聯盟會長，包括故宮博物院兩年前去日本九州的展出，和捐獻給台北市青年公園 100 株櫻花樹，這些都是台日最近友好的交流事項。

70 年前，台灣是日本的殖民地，日本戰後已經逐漸被遺忘的武士道精神，我覺得在台灣還找得到，做為一個日本人對台灣還保有古老的日本精神，感到非常的驕傲，我每一次來台灣，我都覺得我們日本人應該和台灣人，學習過往的日本精神，我也一直抱持著感謝的心情來跟台灣人學習。

有關我們國際交流事項，各位可以看手邊我們分發的資料，由我來為各位進一步的介紹，第一是由福岡縣負責的亞太青少年會議，今年已經是第 29 年了，這是民間交流事項之一，1998 年平成元年，剛好是福岡市改制 100 周年的時候，日本召開一個全國大會，我擔任理事，創辦了亞太青少年會議作為改制 100 周年的紀念，各位手上的資料中有詳細的介紹。

第一次的會議，大概有 45 個國家參加，總共有超過 111 名的青少年與會，

我也擔任過兩屆的理事長，今年是第 29 屆的大會，迄今有超過 12900 名的青少年，到日本福岡參加過這個會議活動，日本也有超過 3000 名青少年到亞洲其他的國家做交流，這是我們所推動的國際交流工作中很重要的一項，這個活動有 15 天兩個禮拜的時間，讓各國的青少年可以到日本去，其中有兩三天的露營等活動，讓各國的青少年了解日本的文化歷史，傳統慶典，其他 10 天的時間，外國青少年可以到寄宿家庭去訪問，整個活動的行程大概是如此。

除此之外，我們還有設計很多，包括到日本小學去進行交流等等的活動，關於整個會議的組織架構，在資料中也有詳細的介紹，包括邀請的團體預算等等，整個活動每年大概需要 1 億 6000 多萬的資金來因應活動所需。

而且我們已經有 29 年的時間了。今年來到第二屆亞洲議會論壇，我們也認為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交流平台。我相信透過這些交流，我們可以更好地相互理解。我們可以在地方層面解決問題，從根本上改變國家和全球。我相信市議會確實發揮了重要的作用。講到這一點，我要感謝林主席主辦第二屆亞洲地方議員論壇，因為這確實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們在市議會，我們可以為世界和平做出貢獻。早些時候，我跟你談過亞太青年大會，這只是地方一級交流的另一個例子。再次，這是一個來自不同國家的青少年，可以更好地學習日本的事件。從長遠來看，這可以為世界和平做出貢獻。29 年前，剛開始的時候，我們認為二戰期間，日本真的給鄰居造成了很大的痛苦。二戰之後，我們發誓我們永遠不會再發生這種事情。所以我們舉辦這樣的活動來表明我們對世界和平的承諾。這是我們主辦亞太青年大會的原因之一。就像我說的，我們明年要舉辦第 30 屆會議。

在日本，有些人正在修改我們的憲法。他們認為，日本已經向世界顯示了我們對和平的決心。我們地方政府、地方議會和國家政府一起工作，即使有憲法修正案，日本也絕不會再發動戰爭。這是我想傳達給這裡所有代表的一個重要信息。我們正在為其他原因修改我們的憲法，絕對不會發動另一場戰爭。這是我想要傳達的重要信息。我希望你能幫助我們得到這個信息。非常感謝你。(發言人演講資料，附在本文後面)

卓伯源：

我們謝謝日本代表加地邦雄議員的分享，他其實很重視國際交流，地方議會可以促進世界和平。修憲不等於要發動戰爭，這是他發言的重點，我們的主講人，8 個與會國家的代表都發言完畢，接下輪到與談人，我依照表定的順序，第一位我們邀請王振軒教授，他是中國文化大學推廣教育部的主任，我們請王教授。

王振軒：

我們敬愛的，台灣最大縣的彰化縣縣長卓縣長，林理事長，來自亞洲各國的

議員先進,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大家午安,剛剛聆聽了 8 位各國議員的高見之後，我也願意簡單的，把我個人在台北縣也就是現在的新北市，擔任研考會主委兩年半的時間，和議員的互動經驗，和大家做一個分享。

我想在台灣的議會，有一個非常特殊的現象，就是他的多元，他代表各種不同的利益跟弱勢團體，這是來自於他的投票制度，現在我們議會的投票制度，是單記不可讓渡，複數選區的制度，在這種制度之下，我們就可以產生各種代表，弱勢團體代表，各種利益團體的代表到我們的議會中來。

在議會中還有一個非常特殊的現象，就是共識決。任何的議案，如果有一個議員反對的話，幾乎就可以把這個議案擋下來，至少共識決成為我們所有議會運作的方式，在我的經驗裡面，我們的議會很少動用表決權。

王振軒教授(發言者)

我記得曾經表決過的一件事情,是淡水河疏濬的一個預算,他只有 3000 萬，很小的一個預算，可是這個預算，在我們的新北市的議會裡面，辯論了七天，最後不得已才動用表決,用投票的方式,這是在台灣地方議會運作裡面很少的方式,大部分採取共識決，所以每一個議員的意見，都在議會裡面獲得高度的重視，這是台灣地方議會運作，基本的一個很大的特色，我覺得我們的議會，在整個政府的體制裏面，如果套用美國政治學者 David Easton 的系統論來說明的話，政府的施政政府的運作，他要得到很多民意的支持，跟民意的需求，透過政府的機制，產生了預算，產生了政策，生生不息的在做運作。

在這個過程當中，如果我們的民意跟最後這個政策與預算的距離越小，會產生的民怨也會越小，也能夠對國家的福祉做最大的提升，但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們看到一個很特別的現象,我個人的經驗是,議會對於整個政治發展的一個貢獻,

是在他的一個協調，促進了整個地方政治的合作。

我們知道整個政府的機制，公務員的行政上，通常都是很保守，稍微與法律有所不合的時候，很多具有興利特質的一些案件，在地方上通通不能通過，而在地的議員，恰恰就扮演這種協調溝通的能力。

最近碰到幾位政界的前輩，他說目前台灣政治發展的一個現象，就是任何一個案子，牽涉到兩個部會後，幾乎就很難推動，所以我們看到很多在台灣的案子裡，牽涉到不同機關，不同部會，不同局處的案子，最後幾乎都是透過議員召開跨部會跨局處的協調，透過這種機制，使得很多地方應該興革的事項得到推動，我覺得這是議會最大的貢獻之一。

議員由於非常貼近民意的執行，在很多的施政作為裡面，他最能了解整個民間的需求是甚麼，我記得我們在新北市，曾經推動過智慧城市，全民免費學電腦的案子，在資訊化的時代裏面，還有一些年齡比較長的公民，他沒有電腦執行的經驗，所以我們大規模的推動免費學電腦的一個案子，普遍的在地方基層開班，這個班推動的過程當中，我們得到最大的支持，是來自各個議員的辦公室，各個議員的辦公室，他最貼近民意，所以他也知道這種班次的推動，能夠符合整個地方發的需求，所以在我們的一個行政的經驗裡面，得到很多議員的支持。

今天還有一個研討的重點，就是社會創新，在一個新興資訊快速發展的時代裡，公務體系能夠掌握資源的反應的時間，跟新的創意的產生，遠遠落後於民間，所以很多的施政，要靠民間的創意，使得我們各種的預算，跟各種的政策，能夠在最低的成本之下，得到民間的支持，能夠快速的來推動，所以民間資源的挹注，社會資源的產生，都是未來施政的一個重點，而在這兩個面向方面，地方議會也扮演更多更重要的角色，我想今天參加這個會議，聆聽各個國家議員，對整個議會運作的實例，讓我們收穫非常的豐盛，再一次感謝大會，我的發言在這裡告一段落，謝謝！

卓伯源：

我們非常感謝王教授的發言，他兼具理論與實務還有寶貴的地方行政經驗，接下來，我們邀請陳立剛教授，他是東吳大學政治系的系主任，請陳教授。

陳立剛：

因為這裡有很多國際來的朋友，我就用英文來發表好了，我很榮幸能夠來參加今天的亞洲地方議員論壇，還有台灣地方民代公益論壇年會，我們謝謝林理事長讓我可以有這樣的機會來分享，再一次歡迎從日本來的朋友們，從菲律賓來的朋友們，我記得去年在馬里拉的時候，我們相處得非常的融洽，也謝謝各位給我的招待，我也歡迎你們來台灣。

身為政治學者，我並沒有一些從政的經驗，但是因為我是研究地方治理，還

有地方議會的一些趨勢，在這裡我發現兩個比較特別的趨勢。第一個就是所謂的開放政府，就是公民參與的開放政府，第二個趨勢是地方議會的公民參與，我想就來談談這兩個趨勢。

第一個趨勢，在開放政府部分，主要概念就是希望讓政府更透明、更健康，沒有腐敗貪腐的情況。從我個人觀察的角度研究來講，我覺得開放政府有一些特色，第一，所有的地方政府，都有地方議會還有議員，大家都會有開放政府網頁網站，這樣就可以讓所有的地方公民獲取這些相關的資訊。第二就是線上的資訊必須要有人去蒐集，這些資訊必須是數位化的資訊，就是所有政府的文獻等等，都可以用數位化的方式呈現在政府的網站上。

陳立剛教授

所有的電子通訊的部分，還有地方政府跟地方議會溝通的一些資料，都必須認為是公共文獻，如果是所謂的公共文獻的話，就必須把它保存下來。

另外像議員，還有官員，都必須把他們的行程表公布出來，如果他們有一些社群媒體的話，也必須是開放式的，來確保執政透明度。

另外關於政府的相關會議，也都必需要公開，比如說議程等等都要先公開。整個開放政府的目的，就是要讓所有的在地居民，都能獲取到這些資訊，有開放政府的話，我們的居民才能夠獲取相關的資訊，同時促進他們參與在地的決策。

第二個趨勢，就是透過開放政府，我們讓公民可以參與在地的議題，所以接下來第二個，就是在地議題的公民參與的趨勢。在過去的 5 到 10 年之間，我們有很多不同型態的公民參與，在 2015 年，TCF 論壇上一次在這邊(台北市議會)舉辦論壇的時候，我們就有談論到 i-voting 這樣的平台，還有這種參與式預算，這兩個其實都是很重要的一種形式，也就是公民參與的形式。

就 i-voting 而言，現在已經有越來越多的地方政府，或地方議會，他們會有公開的對話，來討論市政議題，然後請在地的居民來投票或者是來發聲，表達他們的意見，透過這些在地議題的討論跟意見的反應，就可以讓這些地方議會，能夠去聆聽更多在地的聲音。另外參與式預算的情況，也是讓我們的公民，有更大的話語權，就我們的預算審核跟預算編排等等，能夠有更多的意見反映，所以即便是在地預算的編審，我們的公民都可以參與，這種所謂地方參與式預算，我認為對未來地方議會來講，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跟做法，因為它讓我們這些地方議會，可以聽到更多人民的聲音，當我們在做決策及預算編審的時候，更能夠去回應到居民的需求，我覺得這兩者是非常重要的一些實務的做法。就一個政治學的學者來講，我想再一次的謝謝各位讓我來參與，也歡迎所有的朋友來到台北，謝謝！

卓伯源：

我們謝謝陳立剛系主任，陳立剛教授針對開放性政府，提出很多實際的案例跟具體的實踐，謝謝陳教授的分享。接下來邀請陳牧民教授，來自國立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

陳牧民：

謝謝主席！我是來自台中中興大學，我叫陳牧民，接下來我用中文發言，今天我到這個地方，來參加這個會議，我的角色是與談人。

我剛剛有聽了幾位議員國際貴賓的談話，我大概有幾點觀察，還有幾點可能算是問題，提出來也許等一下有機會，可以跟各位討論一下。

關於地方政治地方議會的運作，剛剛各位提出來的許多經驗，我想跟台灣都很類似，我雖然沒有在議會或政治界服務過，但是在台灣這樣一個開放的社會下，以及在透過各種媒體的報導，跟加上我自己也有學生在政府單位工作，大概都比較了解。

我覺得這幾年一個比較新的趨勢，至少我剛剛在聽各位的報告中，沒有完全提到的一點是網路媒體，這些社群媒體，他對於現在我們政治生活，會產生的影響，在台灣這是一個很新的主題，包含很多的年輕人，他們都使用網路，使用 FaceBook，在台灣我們都用 LINE，在國外都使用 Twitter，像這樣一個新的網路傳播的方式，他對於地方議會的運作，他產生甚麼樣的影響，其實我非常的好奇，特別是在台灣，我們未來的政治發展，包含選舉等等，越來越多需要仰賴這種新的媒體跟資訊的宣傳方式。在各位來自的國家，你們自己有沒有感受到這樣子的衝擊，這是我心中一直有的一個疑問，也許等一下各位貴賓可以給我們解惑。

第二點，我從剛剛的一些發言裡面，發現比如說來自斯里蘭卡的朋友，就談到有關中央跟地方，你所面臨擁有資源不同的問題，在台灣我們都知道，地方政

府他所擁有的財政預算，遠遠不如中央政府。

所以在進行重大的公共基礎建設上面，地方政府往往要想辦法跟中央政府要更多的預算，這在台灣是一個沒有辦法完全解決的問題，我也想知道在其他國家，在地方跟中央的財政分配上，是不是也有類似這種，必須要用更多的方法，去爭取更多的財政預算補助的策略，也許有機會的話，也可以聽聽各位的想法。

陳牧民教授

另外剛剛日本的朋友加地邦雄議員說，台灣跟日本因為過去歷史的聯繫等等，現在台灣跟日本都是成熟的民主國家，雙方的民間的人員交流很密切，因為我是從台中來的，所以我知道台中也跟日本做很多的交流，包含台中跟名古屋開通直飛航班，另外雙方高中也辦了很多的青年交流團。

我認為在未來要談到亞洲城市的交流，這種透過城市與城市之間的聯繫建立的交流，是一個很好的模式，現在我們做得最好的是跟日本，未來也許可以跟其他的國家，建立相類似的交流模式，以上是我一點小小的心得，在這邊提出來給各位參考，謝謝！

卓伯源：

謝謝陳教授寶貴的意見，包括現在包括社群網路，還有預算的問題，以及城市交流等等很多寶貴的意見，現在接下來專家學者的部分，已經發表完畢，接下來，我們邀請地方議會的代表，依表訂名單，先邀請嘉義市議員黃盈智黃議員。

黃盈智：

卓前縣長，理事長，還有各位亞洲地區的議員，大家好，我是嘉義市的市議員。我今天要講的內容，和剛剛王教授講的有一點相關，就是在議會中我們議員

的職權到底有多大有多深。大家都知道，議員的職權有監督市政，監督預算，但是，目前的法律並沒有明確的規定，議員的權力有多大？跟政府的牽涉能有多深？像剛剛教授講的，目前議會是採共識決，以大家的意見為主，並不是以投票來表決。

我遇到就是說在監督市政跟預算上，市府要推行一個政策，就要有預算，但是議員要知道的，就是預算要花在哪裡？市政建設要做哪些東西？議員才會讓你過，不是說市政府提出一個計劃出來，議員就給他過。在這樣的情況下，如果議員大家都有不同的意見，結果政策或是預算就會討論很久也不會過，因為每一個議員的觀點都不一樣，都要市府提出很明確的施行細項。

嘉義市議員黃盈智黃

比如說一個公園的改造，就要說明改造的詳細內容，做到甚麼程度？一直要到大家都滿意了才會過關，這樣就會產生一個問題，就是一項市政建設會拖很久，甚至到好幾年才能定案，不同的議員或者是不同的黨派有不同的意見，造成施政不能有效率的執行，這是和預算有關的。

就算是和預算沒有關係的，比如說現在市府組織要改造，要成立新的局處，有些部門要合併，有些部門要消滅，就算不涉及預算編列，每一個議員也還是有意見，有議員會問市府新的部門要用多少人？要做甚麼事？舊的部門人員如何安排等等，都要市府提出說明，才有可能通過，結果就因為共識決的緣故，像這樣一個案子討論了很久，還是不會通過，所以造成市府有很多的施政就無法進行。

因此我就想和各位討論，議員的權力到底在哪裡？議員的監督權可以干涉到市府的行政權嗎？我的意思是，議員的權限到哪裡？應該有一個明確的劃分，不然會造成議會中，因黨派不同而有不同的意見，市府施政也因此而停滯，以上是

我的意見跟看法，謝謝大家！

卓伯源：

謝謝黃盈智議員給我們的寶貴意見，他提到一個很有趣的問題，就是地方議會在議案有爭議的時候，會不會影響到政府的效率？在議會對不同的意見無法整合時，政府的政策如何來推動，這是黃議員給我們提出的很重要的議題，接下來，我們邀請台北市議員厲耿桂芳議員來發言，請厲耿議員。

厲耿桂芳：

第一例子，是關於環保，大家知道市政府比如說為了要興建道路工程的時候，會修剪樹木，甚至是砍樹來進行工程，當我看到這樣的狀況的時候，我覺得這是不對的，所以我會提出相關的提案，比如說保護樹木的提案，這是一個跨黨派的議題，所以對我來說，比較能夠得到大家的共識，當然我也知道有一些市議員，因為不同的黨派，有不同的立場，而且個別的議員，也有他們個別的意見，但是說到環保的議題，我相信大家都可取得到共識，這邊我要說凝聚共識這一點，非常的重要。

在凝聚共識方面，我們要看的是議題，比如說保護樹木，這是大家都不願意反對的，像我提出的一個法案就很容易的就通過了，這已經是十年前的事情了。

第二個例子和大家分享，大家知道我們有很多的眷村，對於眷村文化的保存，我要求市府以及中央政府要保護眷村，不只要保護歷史，而且從文化的角度來看，眷村也相當的值得保存，這些眷村也許有 60 年的歷史了，我是相對保守的人，我希望舊眷村可以保留下來，這個議案我也成功地推動了。

第三個例子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在 6 月我們議會也通過了一個議案，這跟我們的經濟息息相關，最近我們的景氣不太好，很多建商有兩三百個單位的建物，都賣不出去，而市政府的角色就是跟他們收稅，我們有房屋稅或是屯房稅，是百分之 3.6，如果建商不把這些房子賣出去的話，就要抽這樣子的稅，但因為現在經濟不景氣，房子賣不出去，所以那時候我就提案，希望能把這個屯房稅，從百分之 3.6 降到百分之 1.2，這是一個蠻大的一個幅度。

提出了這一個提案我也面臨了一些困難情況，當然不同黨派的議員，不見得會同意我的提案，我必須要盡更多的一些努力，來跟他們溝通協調，然後讓他們了解現在的情況有多糟，讓他們感受到這些投資人，他們對於希望能夠止血的迫切，甚至很多時候都想要跳樓的這種感覺，如果他們都了解到這個情況，真的有這麼糟的時候，議員們才同意來討論這個提案，經過蠻多次的辯論，花了一個半月的時間，才終於能獲得大家的共識。

所以身為一名市議員，我覺得應該有更細膩的心思，來了解到市民的需求，以上是我個人的親身體驗，和各位分享。

我覺得身為地方議員，應該提供在地市民的服務，服務是我們第一大的重要責任，我也完全同意剛剛檳城的劉議長說的，一些不乾淨的字眼，是不應該出現在議會中的，這應該是我們要去形塑的議會文化，我蠻羨慕他們，因為在台北市議會，常常會有話就直說的人，有時候我可能不太同意他們的用字遣詞。

台北市議員厲耿桂芳

我個人一直認為，我是一個好的文化的保存者，我希望教導年輕人有好的修養，所以我希望用這樣的軟實力，來教育我們的下一代，我覺得我們除了一些其他的技能之外，還要有好的本性，好的人格，然後成為一個好的公民，所以我也很強調教育這一塊，今天因為時間的關係，我跟各位分享到這裡，再一次歡迎大家遠道而來，我也很高興看到 9 個不同國家的旗幟在我們大會飄揚，真的是一個很好的機會，讓我們能聚在一起，我們聚在一起，努力讓世界變得更好，謝謝各位！

卓伯源：

非常感謝厲耿桂芳議員的精彩發言，厲耿議員是台北市議會，非常資深優秀的議員，他也同時是我們中國國民黨的中央常務委員，謝謝厲耿桂芳議員。我們 8 位主講人，還有 5 位與談人，都已經發言完畢，本來希望能有更多的討論，但是因為時間的關係，剛剛跟理事長請示，這場的會議就進行到這裡為止，謝謝大家的參與，謝謝大家！

Session A4: Best Practice in Your Local Council

Chair: Chair: Cho Po-yuan (卓伯源)

Former Magistrate of Changhua County

Speaker：

All Invited Foreign Chairpersons or Representatives

Discussants:

Wang Chen-shiuen　王振軒

Chair and Professor, School of Continuing Education,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Taiwan

Chen Li-kanz　陳立剛

Chairperson and Associated Professor, Dept. of Political Sciences, SooChow University, Taiwan

Chen Mu-min　陳牧民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Taiwan

Huang Ying-chih　黃盈智

Chiayi City Councilor

Li-Keng Kuei-fong　厲耿桂芳

Taipei City Councilor

Lin Chin-chang (林晉章):

We're about to start the A4 session discussion. There are another three sessions on the third floor. If you want to, you may go down to third floor to attend those discussions. In this place, A4 will be moderated by former magistrate Cho Po-yuan of Changhua County, who was also a former legislator. Let's welcome him with a round of applause.

Cho Po-yuan (卓伯源):

Firsr of all, I would like to thank Chairman Lin for building this platform for the local councils in Asia, where we can exchange and brainstorm together on how to better reflect the opinions and voices of our citizens. And it's a great opportunity for us to exchange our views and experiences.

Our topic in this session is the Best Practices in Your Local Council. This morning, we already shared on Best Practice of Collaboration between Local Councils and 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s. So, to follow up on our discussion in the morning, we will

invite representatives from the different local councils, as well as some experts and scholars from Taiwan and representatives from local councils in Taiwan to share with us our different experiences.

Obviously, the A4 topic is a little bit similar to the one we had this morning in the Global Councils Forum, but it's not exactly the same. In this session, we are focusing on the operation of local councils. Comparing to the one we had this morning, the scope of the A4 session is broader. We can share a little bit more accordingly, and we can share on the operation of local council's perceiving rules and regulations and our democratic models and how we can cooperate with government administration and how we reflect the opinions of our people. I believe we are all interested in these issues, and we want to learn the different experiences in different countries, where we have different institutions and we have 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s. We are going to invite the representatives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to speak up. Please share with us your valuable experiences and knowledge.

This afternoon session, we're going to reverse the order of our speakers. The first one in this session is Mr. Tsolmon from Ulaanbaatar City Council.

Mr. Tsolmon:

Hello. Good afternoon ladies and gentlemen. Mongolia has populations over 3 million and in Ulaanbaatar City there's 1.6 million there population from populations. And we have 9 districts and from the 9 districts we have capital city. In capital city we have 45councilors. That's my supplementary information.

Cho Po-yuan (卓伯源) :

Thank you Councilor Tsolmon. Do you have anything else to share? Basically, you have 5 minutes to share with us how the councils operate. Okay,…that's Mr. Tsolmon from Ulaanbaatar. The next will be Penang State Legislate Assembly representative Mr. Law Choo-kiang. Let's welcome Speaker Law.

Law Choo-Kiang:

Chairman, I would like to say some of the information regarding Penang State Assembly for everybody. Penang is one of the states, one of the 13 states in the Malaysia, and we have 1.6 million in population. In Penang state, we have 40 state assembly men which represent the 40 districts. Out of the 40 assembly men, 30 members are government's state assembly men, and 10 members are organization state assembly men.

I would like to tell you something regarding some unique standing order in my state

assembly. Penang State is one of the 13 states in Malaysia and we have 1.6 million in population. And basically, we have 40 legislators representing 40 different districts. Right now, out of the 40 legislators, 30 are so-called government legislators, and 10 are the opposing party. In Malaysia, we have political alliances. The 30 so-called government legislators come from different political parties. As for the opposing party, the opposing legislators also come from a political alliance. They come from different parties. Multi-races, multi-religious, multi-cultures background, such unique we have. Under such complicated situation, we handle a state assembly with different background, races, religions, it makes the state assembly more complicated, but somehow it is more interesting. To deal with such a complicated situation, our standing order must have some special rules of procedure to maintain the order in assembly.

With such diverse cultural backgrounds, though it's complicated, sometimes it is very interesting when we are at the legislative assembly. I would like to raise one or two examples on the proceeding rules. The speaker is authorized to deal with the more sensitive subject matters during the meeting. In order to prevent friction between races or ethnic groups, we want to steer clear of some of the more violent languages. In Malaysia, in our national assembly, it’s clearly stated in the rules that some words or terms that will trigger racial friction are strictly forbidden to be used in the assembly. When the legislators are using or citing such terms or ideas, the speaker must stop them right away. If the speaker overlooks such action, fellow legislators have the rights to remind the speaker to stop the legislator, and take back what he or she has said. So this is a good example on how we deal with the high tensions among different races in Malaysia. We have accumulated some experiences over the years after painful experiences, so we have these rules clearly stated in our proceeding regulations. All of these words and speeches that will harm the harmony of our society are strictly forbidden. Comparing to other countries, I think this is one of the more unique practices that we have in Malaysia. We agree this is a better tool for the speakers to ensure smooth proceeding of our national assembly. Fortunately, we have these rules clearly states, and with these articles in the rules, the speaker can stop the legislator’s talk right away if what he/she says is not appropriate.

When a legislator is newly elected, they learn quickly that these actions are forbidden. So whether we are engaging in discussions or debates, these people will reframe from speaking such words. If the legislator refuses to apologize, we have the special committee in the assembly that will review the actions and conducts of our legislators, and they may be penalized. Basically, the actions and conducts of the councilors will be reviewed by a special committee, and the proposed penalty will

then be voted in the Legislature Assembly. The legislator may be forbidden to join later sessions. If the case is more serious, the privileges of the legislator will be taken away for 6 months. So, here is just an example from Malaysia.

Cho Po-yuan (卓伯源):

Thank you, speaker Law from Malaysia. He talked to us about some rules of engagements that they have in Malaysia to accommodate the multi-racial setup there. Next, we would like to invite Mr. Kim Myung-gi, Secretary of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Local Council Chairmen (NACC) in Korea.

Kim Myung-gi:

Hello, my name is Kim Myung-gi. I am the speaker of Jeonju City Council. Thank you for participating in this discussion, especially after a hearty lunch. Local council is of course composed of local councilors. We need to empower local councilors so that they can in term help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ity. This morning, I briefed you about our Jeonju City Council. I talked about some projects. This afternoon, I would like to talk about how we empower city councilors.

After some final amendments, in 2008 the Jeonju City Council established some working committees. Now, we have six such working committees or working groups still working. These working groups help us with policy drafting, and have exchanges with other City Councils. For example, in 2009 we had exchange activities with Taipei City Council.

These exchange activities are participated by councilors, as well as residents. In other words, our activities are both democratic and professional. The project that we mentioned about this morning laid a very good foundation for us. We have not only empowered councilors and residents. We also got a lot of progress across different spectrums. Going forward, we are going to focus on three key points. First, to increase the professionalism of our councilors, second, to enhance the resources of our council, and number three we want to establish better links with outside groups. Today, we're at the Asian Council Forum and we expect there will be more progress and more events like this.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attention.

Cho Po-yuan (卓伯源):

Thank you very much Speaker Kim. You talked about your working groups or research groups affiliated with the Korean JeonJu City Council.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sharing. Next, we'd like to hear from Mr. Siliga Atiake Kofe from the House of Clan, Funafuti Tuvalu.

Siliga Atiake Kofe:

Thank you, chairperson. Tuvalu used to be part of the Gilbert and Ellice Islands colony way back in the 70s. Since we became a colony in 1915, up to 1976, when the Ellice part of the Gilbert and Ellice islands separated and became Tuvalu. Tuvalu really started in 1976. The reason we separated was because we were different racially, ethnically from the Gilbert Islands. Gilbertis people who are Micronesians and we are Polynesians. And there is another Melanesian group in the Pacific. So, we became separated colony in 1976, and became independent in 1978. Our population is about 10000 in residents, but there are about 5000 or more Tuvaluans living or have migrated to Australia, New Zealand or Fiji and other countries in Hawaii at the west.

Our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 was around 50 million in the 3-5 years ago. Our Gross of National Product (GNP) is over 100 million, which indicates that we receive a lot of aids to pay for a lot of our services and things which we do in Tuvalu. Since we became a colony, our Local Government Ordinance has been the law that governed everything on the island level, which is like the state.

The Local Government Ordinance was basically the same as the laws applied in U.K., which were adopted en masse. That's how we've been governed. In 1999, we passed what we call a FALEKAUPULE Act. This translates like a House of Leaders Act. The purpose of that act was to devolve the power from the nation level government down to the island level. The island levels are governed by the FALEKAUPULE or House of Leaders, of which I am a chief in the island of Funafuti, the capital island. This devolution basically gives the House of Leaders the power to make its own by laws, make its own rules and policy and approve its own budget of the year. Today, I would like to illustrate we have very strong conductibility requirement in the budget making process. As we know, budgets start at the executive level of the island. Each administrative sector will make estimate of what the expenditure and income would be in the upcoming year. Each budget will be passed to the House of Leaders for discussion, and then the House of Leaders will either reject it or approve it. This is how we do regarding the budget.

In the Act, it requires that in every budget session of the House of Leaders, all those who are 18 years old and above and are registered in the registered voters can participate in the budget reviewing and have the rights to vote. It might be very good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democracy, participation and the budget allocation for the island. However, it's a bit problematic for stability in the House of Leaders, because people coming for this budget session could vote against the regular members of the

House of Leaders, which means that people have no confidence in the House of Leaders. Fortunately, it has not yet actually happened, possibly because all the 52 chief members of the normal members of the FALEKAUPULE are from their own family. The oldest male or female of the family are usually chosen as the chief.

Vote of no confidence has not happened in the government, because the chiefs have been very strong in explaining to their families why it's important not to turn down or vote against the government. That's a practice which I consider is worth looking at. It's good for democracy, but beyond that, it could be a problem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managing and administering, the island and the affairs of the island. I think that's it. Thank you.

Cho Po-yuan:

Thank you Mr. Kofe for sharing with us your unique system in Tuvalu. Next, we would like to welcome Mr. Seyed Ali Zaheer Moulana from Federation of Sri Lanka Local Government Authorities.

Seyed Ali Zaheer Moulana:

Good afternoon to you all. I am representing here as Chairman of the Federation of Sri Lanka Local Government Authorities. We have 365 local governments. When I was mayor of one of the city, I was elected as a president representing this organization. But right now, I am part of the parliament, the legislator. We have three levels in governess. One is national parliament. In order to devolve power, we have 9 provinces. These local governments are one of the devolved subjects. The centralization from the center has been given to local government. As I said in the morning, local government is dealing with people's need in every aspect. And you know, although right now I am a legislator, member of parliament, representing in parliament for the entire district, I enjoy my serve as a mayor of a city, doing so many things for the grass root level, people in the grass root, people's day to day life.

Most of the councilors will agree you're directly involved for the need of the people. That is why the decentralization is very important. The day before yesterday, before I left for Taipei, I had to work in parliament for one of this act in empowering the local governess for sometimes. Now what I am trying to say here is now there are so many things we are handling, ensuring the health of our city people, ensuring people are getting water, people are getting energy, and people are getting quality health situation, equality, gender, everything, day by day, we are handling in the local level. There are so many matters when you are handling it. So, this is what I say, when you ensure total autonomous to be given to the local government, you can depend on

the center of province. Every councilor and every mayor of the city, if they have more power, they can then and there resolve so many matters of their people's need.

In the morning, I mentione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al goals. There are 32 items given to all the countries, but only 17 items are coming directly under local government. But overall, this is a blueprint. We are talking about sustainable developmental goals, very important things: people, planet, peace, prosperity, partnership. Everybody, including us, have to be ensured. Even identifying a development, if you are asking your citizen, every citizen will come to you, "Sir, this road has to be done, this drainage has to be done, there is some kind of shortage and we are getting water." So, when these matters are there by you, day by day, every day, by new councilors and mayors, you have to have certain powers. This is why we are always emphasizing the decentralization to the local government. Autonomous has to be given to the local government. This is my main point we are advocating.

Now, we are so happy our Asian Council Forum and Global Council Forum are here. Even also, I am participating in Commonwealth Local Government Forum. Every forum, wherever we go, we emphasize that decentralization of local government has to be strengthened and empowered, so you councilors and you mayors can deliver more for your own people. That's all.

In that practice, transparency and proper accountability must be maintained. Transparency and proper accountability can avoid corruption. That is, the local government, when they are dealing with people every day, in consultation with people, there are no chance for them to do any kind of corruption. Good governess means proper accountability, and then the transparency. With these words, if there are any questions I can always answer. And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giving me this opportunity. Thank you. Thank you.

Cho Po-yuan (卓伯源):

Thank you. You mentioned one very important point, in which you said that we need more autonomy of the local governments. I think we all agree with that. My question is, if you take over a position in the central government, will you still insist on autonomy for the local governments? Based on our experience in Taiwan, if we have a local magistrate, they always demand for more empowerment. Once they take a position in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hey change their stance. So that's our experience. So, we have a saying that when you change a position you change the way you think. Next, we would like to invite Chairman Danilo Dayanghirang from Philippines.

Danilo Dayanghirang:

Thank you very much, sir. This morning I discussed about how to raise funds. It's about the participation of the private sector to recommend to the government. Some concern particularly on tax incentives. This afternoon, I would discuss some of the fundamental rules in budgeting as far as the local government is concerned. Money is fundamental and basic for the government to operate. However, when we talk about money, it is always lacking. We have to use it based on priorities on the government program. The local government you need to operate funds based on the national program of the government. We have the policy direction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republic on peace and order, on anti-drugs, economic development. This will cascade down to the local government unit. But this program cannot put into action if we don't have budget. Now, as far as the delegation, devolution, the Philippines is already advanced from this.

We have the local government code of which to empower the local government enough laws, including operation. The process of budgeting in the local government unit, we start from the office of the city mayor. In the Philippines we have three branches of government: the legislative, the one who will enact laws, the mayor, the one who will implement laws and who has executive power. If these two parties or branches have some conflicts, we have this judiciary. So, we have executive, legislative and judiciary branches of government. The only source of budgeting in local government unit is coming from the executive department, because it's the implementer of the project. The budgeting process will start from the mayor, and from the mayor this budget will be sent to the legislative department. In my case, in the City of Davao, I am the chairman of Committee on Finance and Ways and Means. The mayor will send a document to the legislative department, and I will conduct committee hearing. We have to consult and come up with a consensus with the department head included with the people concerned about this project. Once all these hearing were conducted, the committee will make a committee report. This committee report will be passed upon by the city council in general assembly. I will be the one who will response the same. In my case, usually I would make the committee report, and then defend the committee report in the city council assembly in session. I will be asked questions coming from my colleagues on how this thing has been operated.

The power of the legislative is limited. We have the right to delete or to remove the items needed by the mayor, but we cannot introduce a new budget, a new item in the same budget. I want to repeat, we can remove any item submitted by the mayor, but we cannot introduce a new one. However, we have the right to reduce the

budget of the mayor, but we cannot increase. That is the general rule. As far as local government is concerned, we have the right to reduce but we cannot increase. Once this budget is approved, this would be sent to the mayor for signature. In my case, it is the mayor of the city who will sign the documents. And after singing the documents, the mayor has the power to veto or disapprove the budget approved by the city council, and he has 15 days to act on it. If no action from the mayor within 15 days, the budget is consider approved by the mayor. However, if he wants to disapprove it, he has to veto and sign it and return it back to the city council within 15 days with the reason why he disapprove the project. However, once the budget is approved by the mayor, this would be published in the local newspaper. These are the samples of the publication.

After the publication, this budget will be sent to the Department of Budget and Management. It is a national government agency that will more or less review. Based on the autonomy of the budget of local government unit, this kind of budget is generally considered proved by the Department of Budget Management and once it has been approved, it will be put into action. As such, the head of officers can start dispersing the funds out of the budget. Now, if there is problem in budget implementation or project implementation, like corruption, this will be caught by the commissionable audit. The commissionable audit is an independent party, a constitution party. They cannot be removed by the President. It is only through impeachment and they can recommend prosecution, either in the court or some recommendation for disciplinary action in the Office of the Ombudsman. We have a special court, the Tandorkisis Office of the government officials. On the other hand, administration officials, this is under my department of interior local government of which all the LGUs and the Philippines is under the same.

This is the process of budgeting in the Philippines, as far as the local government unit is concerned. I hope it is clear that the budget is coming from the mayor, to be submitted to the legislative, and then it will be returned back to the mayor, and the mayor has the option of approving or disapproving. In terms of the Department of Budget Management, this will be published and thereafter the head of offices can start dispersing the same, through the budget office, the city treasurer, and, of course, the post audit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audit. That's all. Thank you very much. I hope that this information will help us a lot. Thank you.

Cho Po-yuan (卓伯源):

Thank you very much. We thank Mr. Danilo Dayangghirang for the remarks. Next, we would like to invite the councilor Kunio Kaji from Fukushima to give us his comments.

Kunio Kaji (加地邦雄):

I am the city councilor from Fukushima. Good afternoon ladies and gentlemen, it is my distinct honor to be here. I would like to give my special thanks to Mr. Lin, Chairman Lin of TCF.

I am in charge of international exchange activities of Fukushima City Council. In Fukushima, we have 5.11 million people. We have 2 major cities. And this is my district. In my district, the population is about 1.5 million and we have 160 city councilors altogether for Fukushima. I am responsible for international exchange activities. For example, we have exchange activities with city councilors from the US, South Korea, Vietnam, Taiwan, etc..

I am personally responsible for establishing the alliance with Taiwan city councils. I've been doing this job for 2 year. 2 years ago, there was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exhibition in Japan. The exhibition was in my city. We prepared for 2 years for that exhibition. Also, we gave 100 cherry trees to a park in Taipei.

70 years ago, Taiwan was a colony of Japan. We were of the same country. In Japan, the spirit of the samurai is lost. However, in Taiwan you can still find examples of the spirit of the samurai. I am impressed with that every time when I come to Taiwan. I often feel that we have a lot to learn from the Taiwanese, especially the spirit of the olden times. When it comes to internal exchanges, well you have the information sheets that we are distributing right now.

Please refer to that information. I am talking about APCC that's taking place in Fukuoka. And this year we are celebrating the 29th year of this event. This is one of the exchange activities that we conduct. In 1989, the city of Fukuoka established a pacific exhibition. At the time I was also involved. I was the chairperson of the youth council, and I participated in the Asia Pacific Youth Conference. Please refer to the information package that you have.

For the first conference, we got representatives from 45 countries and we had 111 teenagers participating in the conference. I served as the chairperson for this conference. This year we are hosting the 29th Asia Pacific Youth Conference, and we have more than 12000 people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event. They enjoyed home stays in Japan. We have about 3000 teenagers from Japan going to other countries in Asia. This is an example of the international exchange activities that we conduct. For about 2 weeks, these activities take place. We welcome many teenagers to Fukuoka. They can spend 2 nights with host families. They can also enjoy camping. Through these activities, they gain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Japan, our tradition, culture and

our festivals. They have about 10 days where they spend time with their host families.

They can learn more about Japanese households. We also design a lot of cultural activities for them. For example, our visitors can go to elementary schools in Japan and have exchanges with their counterparts in Japan. When teenagers spend 10 days with host families, they truly learn a lot from their peers, as well as their host families. Here you can refer to our organization chart. It's in the information package disseminated. Here you see our different departments and you can also see a very clear list of our budget. You can also look at the budget of the 29th conference. We have a fund about 70 million Japanese yen. We also recruit volunteers and we gather donations. Every year, we need about 160 million Japanese yen to conduct these activities.

We've had such activities for 29 years. This year, coming to the second Asian Councils Forum, we also believe this is a very important platform in which we can conduct exchanges. I believe through these exchanges we can better understand one another. We can solve problems at the local level and in term change the nations and the global. I believe city councils do play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making this happen. With that in mind, I would like to thank Chairman Lin for hosting the second Asian Councils Forum. Because this really serves a very important role. At city council, we can contribute to world peace. Earlier, I talked to you about the Asia Pacific Youth Conference. This is just another example of how exchanges can happen at a local level. Once again, this is an event where teenagers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can learn better about Japan. And in term, this can contribute to world peace. 29 years ago, when we first started this, well at the time, we recognized that during World War II, Japan really caused a lot of suffering to our neighbors. After WWII, we vowed that we would never make that happen again. We host such activities to show our commitment to world peace. That's one of the reasons we've been hosting the Asia Pacific Youth Conference. Like I said, we are going to host the 30th conference next year. In Japan, some people are taking about amending our constitution. They believe Japan has significantly showed our commitment to the world that we are peace makers. We, local government local councils, work together with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Even if we do have constitutional amendments, Japan will definitely not start another war. This is an important message that I would like to get across to all the representatives there. We are amending our constitutions for other reasons, definitely not to start another war. This is an important message that I'd like to get across. I hope you can help us get this message across. Thank you very much.

Cho Po-yuan (卓伯源):

Thank you very much, the representative from Fukushima. Yes, at the local level we can also contribute to world peace. Now, we've heard from 8 different countries. Now I would like to call on our panelists. The first one is Professor Wang from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Wang Chen-shiuen (王振軒):

Former Magistrate Cho of Changhua County, Chairman Lin, dear speakers and councilors from various countries in Asia. Earlier, I listened to the insightful comments of different countries. I would like to share with you some of my experiences working at New Taipei City.

Specifically, I'd like to talk about my experiences interacting with the city councilors. In Taiwan, city councils can be very representatives of the diverse composition of our constituents. Due to our election system, representatives are elected to represent different interest groups. Our councilors have very diverse backgrounds.

In Taiwan's city councils, everything is based on consensus. If a resolution is opposed by one counselor, that proposition will not be passed. As such, everything comes down to consensus.

In New Taipei City, we really voted. The only thing that we voted on was the budget on the restoration of the Tamsui River. It was about 30 million dollars NT. It's a small budget, but in our city assembly, we debated for 7 days, and then we finally resolved to a voting to make a decision. It rarely happens. We usually try to forge consensus, so every councilor's opinions are highly valued in our local councils. I think that's one of the unique traits of the local councils in Taiwan. Think within the government system, if we use the system theory to explain the local councils, the government, the input end, the overall operation of the government needs support from the citizens. These demands of the citizens are reflected by the councils, at which develops budgeting proposals and project proposals.

Basically, if our final decision does not deviate from what the people want, then our implementation will be met with minimum resistance. However, in our experience, we realize that the local council's greatest contribution to the democratic development is that the legislators or the councilors are able to negotiate among themselves and facilitate cooperation between government agencies.

As we know that the public employees tend to be more conservative. If there's any doubt in terms of legal concerns or more innovative projects, they tend to be rejected at the local level. The local councilors play the role of a negotiator and the coordinator.

I've recently met with some senior politicians in Taiwan. They reflected that it seems that most of the proposals are being delayed, if it involves more than one agency. We understand that interagency proposals most of the times need councilors to conduct a meeting across different agencies, and negotiate and coordinate in order to implement these projects. I think that's one of the greatest contributions of the local councils.

Because the local councilors are closer to the citizens, they understand the needs of the citizens. In New Taipei City, we try to launch the smart city free computer classes for all citizens. In this digitalized age, there are still some older citizens who are illiterate in terms of using a computer. That's why we launched a free learning program and trying to educate all these senior citizens. We have all these classes. Over this program, we gain support from all the councilors, because the councilors and their offices understand the needs of the people and they understand that this projects meets the needs of local development. We gained lots of support and assistance from our local councilors in this project accordingly.

I know today the theme in this forum is about social innovation, and in this era of rapid development of new technology and digitalization, I think public employees sometimes are a step or two behind what's really happening in the society. So that's why we need to rely on some innovations and creative ideas from the private sector so that we can minimize our cost, but gain support from our society and implement our projects. And that's why we need private resources and support. Local councils have a greater role to play in the future. Today, we listen to the different experiences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the best practices on the operations of different local councils. I believe we've all learned a lot. I am very thankful for your presentations and sharing.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Cho Po-yuan (卓伯源):

Thank you Professor Wang. Thank you for sharing with us your experience as well as some of your knowledge. Next, we have Professor Chen Li-kanz. He is from the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of SooChow University.

Chen Li-kanz (陳立剛):

Friends all over the world. I'd like to speak in English. Hopefully it can help you in communications. It is my greatest honor to participate in this ACF and TCF forums. Thank you Mr. Chairman Lin Chin-chang for the invitation to this specific session. I also like to express my warm welcome to all my friends from Japan, particular my friends from Philippines. We had very good time last year in Manila. Thank you so

much for your hospitality. Thank you so much.

As a scholar, I don't have the political experiences as the local city councils. But since I am scholar of local governess, I have observed some of the trends in local governments or local councils. At least, personally, I have observed two special trends. First trend is so-called open government to all the local citizens. The second one is the promotion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local council. I would like to address these two major issues in this forum.

For open government, the main idea for open government is for more transparent and healthier, non-corrupted local council. From the way I have seen or from my studies, I have observed some trends in this open government characteristics. First, all local governments produce concerts, and concerts dedicate open government website, which may allow our local citizens, public access of our local council information and easily access those information from local council. Second, online information needs to be correct, and hopefully will be maintained in the digital format to make available on the open government website in a timely manner.

All the council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 met with the local councils should be considered it is a public record, and should be well kept in local council.

Also, the elected official and senior administrator should be posted on schedule publicly. Maintain the open setting on social network side and commit to us culture of transparency.

And number three is that government bodies should make all the public meeting as open as possible, by posting agendas of the meetings in advance. The whole purpose of this open government is to make the information open to all the local citizens. Through this open government, local citizens could be more informed and also facilitate his participation in local decision making.

And then I would like to address my second issue. Through the open government we are enable local citizens to participate in local issues. The local issues will be community or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local events. For the past 5 or 10 years, there are so many different forms in the public local participations. As a matter of fact in 2015, and here in our forums, we talked about the issues on i-voting and participatory budgeting. These are the very important or very popular formats for local participations.

In terms of i-voting, more and more local governments, as well as local councils open the dialogue or the issue for local citizens to vote or voice out about local issues. With those local issues and voices, it may allow the local council to adopt more

opinions for local citizens. In the case of participatory budgetary, it allows our citizen to have more say in budgeting participation, even with local budget allocation. These important so-called local participatory involvements are very important in the future of local councils. It allows our local city council to hear more from the citizens in terms of local public policy making and local budget allocations. I think at least these are two major local council practices in the future. And again, as a scholar I would like to express my gratitude to join these important forums. Thank you all my friends for being in Taipei. Welcome to Taiwan, Taipei. Thank you.

Cho Po-yuan (卓伯源):

Thank you Professor Chen. Thank you for sharing with us on open government and the engagement of citizens. Next, we have Professor Chen Mu-min. He is from 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f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Chen Mu-Min (陳牧民):

I am from Chung-Hsing University in Taichung. Now, allow me to speak in Mandarin. Thank you for the invitation. My role here today is the panelist.

Earlier, I listened to the comments of our representatives. Here I have some observations, and I would also like to pose a few questions to spark some discussions.

First, regarding the operation of local councils, earlier we heard many examples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those examples are quite similar to those we see here in Taiwan. I, myself, am not a politician. I am not involved in council activities. Taiwan is an open society, and we have open media. I also have some students who work for politicians. So I can get some information.

In recent years, I've observed some trends and something that is not mentioned earlier is about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media, especially the social media's influence on the political sphere. These days, young people use social media, Facebook in particular, in Taiwan. In Taiwan, we use LINE and the instant messaging app. In other countries, maybe Twitter is more popular. With these new ways of disseminating information, do they have an impact on how local councils conduct their activities? This is something I'm very curious about. For example, with these social media effects, how are the election campaigns run? In your countries, have you felt the impact of social media? This is a question I would like to pose. Maybe later if we have time I would like to hear from the representatives.

Second, from earlier comments, for example, our representative from Sri Lanka, he

talked about different issues faced by the local government and the central government due to the different resources. We understand in Taiwan, local governments do not have enough financial resources. Their financial resources cannot compare to that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that is why the local governments always have to ask the central government for more money. In Taiwan, this is a problem that we have not solved entirely. And that is why I would like to ask our representatives, how in your country do you address this problem? How do you find more financial resources for local governments? If we have time, I would very much like to hear your comments on this.

Another point, our friend from Japan, the councilor from Fukushima, he talked about the historical link between Taiwan and Japan. Now, both Taiwan and Japan are matured democracies; our people have very frequent exchanges and we do believe we can still deepen our bonds. I am from Taichung City. This reminds me that Taichung City is actually actively engaging with cities in Japan. For example, there are now direct flights between Taichung and Nagoya. Taichung City also hosts a lot of exchange activities with Japanese high schools.

Going forward, I think exchanges at this city level can be very meaningful. Right now, I think we have the best bonds with Japanese cities. IN the future, we would like to establish similar bonds with other cities from other countries. These are my two stands. Thank you very much.

Cho Po-yuan (卓伯源):

Thank you very much Professor Chen for your valuable feedback. You talked about social media, and you talked about budgeting and also exchanges at the city level. These are very valid points. We've heard from the scholars and the panelists. Now, we would like to ask the representatives to respond. We want to hear from the local councilors. First one is the councilor Hunag from Chiayi County.

Huang Ying-chih (黃盈智):

Magistrate Cho, Chairperson Lin, dear councilors from Asia, good afternoon. My name is Huang Ying-chih, from Chiayi County. I would like to talk about something that was mentioned earlier. How much can city councilors do? Yes, we city councilors monitor the budget, and we also monitor the activities of the city government. However, in Taiwan, the laws do not clearly spell out the laws of councilors. For example, as one of the professors mentioned earlier, we also use consensus when we decide on things. We do not vote very often, and regarding budgeting, of course you need budget to make things happen at the city level.

However, we, as city councilors, want to know how the city governments spend each dime. We do not just blindly approve all the budgets proposed by the city governments. Given that's the case, if city councilors, each of them, have their opinions and ideas, you could have all the debates all day and does not reach consensus.

Each of the city councilor desires to have a very clear implementation rules of a project, such as, say you want to renovate a park, what kind of renovation are you talking about? What is the scale of your renovation? You have to really spell everything out, and there's a problem with that: the projects may be delayed for years, because different parties have different ideas. It's very difficult to move things forward. The foregoing issue I am talking about is budget.

Next issue I want to bring up is not about budget. It is about the organization reform of the city government. If the city government wants to create a new department, or combine some departments together, or eliminate some departments, the city councilors will have their own ideas about implementation, like the matters of personnel, allocation of old and new staffs and so on. The city government must give a very detailed explanation. It is obvious that repeating meetings will be held, and the councilors cannot reach a consensus because of all kind of different ideas. You will hear a lot of talk and we can never reach consensus. Things simply cannot move forward at the city level. We cannot implement policies.

Another issue I would like to talk about is the powers of city councilors. When we monitor and oversee the actions of a city government, do we have unlimited powers to stop city government to implement projects? Or perhaps we can have better division of labor. Otherwise, the city government has too many questions to answer. If the mayor and the majority of the city councilors are from the same party, things maybe go smoothly. However, if they belong to different parties, things become difficult and cannot move forward. These are my comments. Thank you very much.

Cho Po-yuan (卓伯源):

Thank you very much, Councilor Huang Ying-chih. He mentioned something very interesting between the councilors and the city government: if there are different opinions from the city councilors, will that have an impact on the efficiency of city government? If we cannot reach a consensus, how can we make sure that does not become an impediment to city government's actions? Next, we would like to invite Madam Li-keng Kuei-fong, Taipei City Councilor to share with us her comments.

Li-keng Kuei-fong **(厲耿桂芳):**

Mr. Chairman, all delegates good afternoon. Once again, I would like to welcome you all to Taipei. I hope that you feel comfortable and pleasant here in Taiwan.

As local councilors, you know that one of our major tasks and our responsibility is to serve our people. So, that would be very important to feel and to understand the need of the people, so that you can respond accordingly and effectively. I think that is very important. That's why I would like to bring up three examples of mine for your reference.

The first one, it is about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s you know, when city government wants to build a road, or they want to build a building, they have a construction, and they sometimes cut down the trees and clear out the land for the construction work. When I saw such situations, I don't think it was right to do so. As a result, I made a proposal regarding the tree protection bill. Because this is a trans-parties issue, so that's why it's easier for me to reach a consensus. Even though I know different parties had different stands and individual councilors had their own opinion, regarding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ll the councilors had the same opinions. We easily reached the consensus. I want to point out that reaching consensus is very important, and I think that because the issue is regarding protecting trees, no one will be against it. This is the first bill which I proposed and had it completely successful ten years ago.

The second example, as you know that in Taiwan we have many soldier villages. The topic I want to share is regarding the culture preservation. I asked the city government and even my country, the national level, to protect the soldier villages, not only from the historical perspective, but also from the cultural perspective. Although the villages we wanted to protect were over 60 years old, they wrote down the history. I am relatively a conservative, so, I want to have some old soldier villages to be reserved, and eventually I made it successfully.

The third example is that in June a bill was just passed in Taipei City Council. Due to the bad economy, recent months the housing market was not quite good for the builders. There were probably 200 or even 300 more units in the market, and the builders could not sell them out. To avoid the housing speculation, the city government intended to tax the builders by 3.6 percent if they did not sell out the house units. I thought the time was not good, because the economy was not good. Thus, I made a proposal decreasing the tax rate from 3.6% to 1.2%. It's a very large cut down.

I brought up this proposal. Of course, I have to go through a lot of difficulties because sometimes different party members did not agree with my proposal. I made extra

efforts, communicating hard with them and bringing out the bad situation the builders faced. The businessmen lose money, feeling frustrated in the bad housing market. I want the government to feel the heart of the investors. I brought this out to the council, and finally my colleagues agreed to discuss this issue. After several discussions and debates, through almost one and a half month, this proposal eventually reached consensus among the councilors.

So that's why I want to say, as a counselor, you should have a heart, a sensitive heart to sense the need of the people. The foregoing examples are what I have done and I want to share with you.

Once again, I would like to say that, as a councilor, we always have to work to provide our services to people. Service is our responsibility and is top priority for us. I quite agree with the speaker Law from Malaysia. He said dirty words are not quite right words. Disgraceful words never speak it out in the council. I totally agree with him and envy them the culture in the council. But in my country, even the city mayor, he said something unbearable.

I am a very cultural preserver, and I want to cultivate the students with good manners. It is soft power, and soft competitiveness built by the students. Students should be good, not only with the ability of competitiveness, but also with a good virtue, good character, good person and a good citizen. Education is far more important than anything. Today, because of the time constraint, I cannot say too much, but once again, I would like to welcome you all. I enjoy so much, and I am so happy because I have seen 9 different Asian countries' flags showing on the screen. How nice! It is a great event and a meaningful occasion that we meet and get together to make the world a better world. That's good. Thank you very much.

Cho Po-yuan (卓伯源):

Once again thank you Councilor Li-keng Kuei-fong. She is a very experienced councilor in Taipei City, and she is also one of the directors of the KMT. To this point, all the panelists and speakers have shared their thoughts and experiences. Originally, we hope to have more time at the end for Q&A and discussion, but I think since we are already behind schedule, we'll save the discussion for our tea break. And I announce the closing of A4 Session. Thank you.

Current status of 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Local council chairmen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Local council chairmen
(The Republic of Korea)

〈 Basis of establishment 〉

○ Article 165 of the Local Autonomy Act(local council of the association of chairmen and other organizations)

〈 Purpose of establishment 〉

○ To increase cooperations among City and Gun district counci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chairmen

○ To discuss common problems and issues with other local council association

○ To improve the local autonomy system and contribute to its healthy development

〈 Organization 〉

○ City- and Gun-district government council chairmen : 226 people

○ City- and Gun-district council and membership status

Unit : number of peopel

City/state	Total	City Council	Gun Council	Gu Council	Noumber of council
Total	**226**	**77**	**80**	**69**	**2,898**
Seoul	25			25	419
Busan	16		1	15	182
Daegu	8		1	7	116

Incheon	10		2	8	116
Gwangju	5			5	68
Daejeon	5			5	63
Ulsan	5		1	4	50
Gyeonggi-do Province	31	28	3		431
Gangwon-do Province	18	7	11		169
Chungcheongbuk-do Province	11	5	6		131
Chungcheongnam-do Province	15	8	7		169
Jeollabuk-do Province	14	6	8		197
Jeollanam-do Province	22	5	17		243
Gyeongsangbuk-do Province	23	10	13		284
Gyeongsangnam-do Province	18	8	10		260

〈 Constituents of the association 〉

○ Representative Chairman : 1

○ Senior Vice-Chairman : 1

○ Vice-Chairmen : 10

○ Auditors : 2

○ Secretary Generals : 1

〈 Assembly 〉

○ General Assembly(once a year)

- It is the highest decision - making organization where budget plans was approved, council rules are being made, yearly performances are being investigated and important decisions are both made and approved.

○ City and province representative meeting(every month)

- It is a standing decision - making organization where general regulations are being investigated and approved

○ Emergency meeting(when necessary)

- National assembly, other important events and representative meetings are beng called for

〈 Main Activities 〉

○ Gather opinions from City and Gun district councils to negotiate with the National Assembly and the cental government on law and policy chang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governments

○ Negotiate and mediate common interests for City and Gun district council

○ Hold scholarly conferences, policy discussions, public hearings and workshops to brainstorm ways to

improve the current policies for better cooperation with local autonomy related organizations, associations, conferences and professionals

○ Confirm the status of 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Local Council Chairmen and improve their performance, Support council activities and promoteional activities

〈 Address 〉

○ Hyundai topics B/D 12F, Wiryeseong-daero, songpa-gu, Seoul 05544 Korea

○ Website : www.ncac.or.kr

○ E-mail : ncac@chol.com

○ Tel : 82-2-3444-5910,5915

의원연구단체 사례 관련

2017. 8. 26

『지방의회 우수사례』

의원 연구단체 운영

대 한 민 국

전 주 시 의 회

(전국시군자치구의회의장협의회)

의원 연구단체 운영

1. 주요 현안 연구를 위한 의원연구단체 활동 추진(선택과 집중)

○ 예산정책연구회 / 조례연구회 / 기후변화대응연구회 / 제도개선연구회 등 지역 이슈 및 현안 관련 연구주제를 의원들이 직접 선정·추진

⇒ 예산정책연구회(지방자치단체 기준 성과주의예산제도 관련 집중 연구)

⇒ 조례연구회(의원입법 활성화를 위한 민생조례 입안 추진)

⇒ 기후변화대응연구회(기후변화라는 테마를 통한 지역적 정책대응 방안 연구)

⇒ 제도개선연구회(불합리한 제도 및 예산 수반 사례 등을 분석 검토)

⇒ 의정포럼(지역현안 및 시기별 이슈 정책을 집중적으로 연구)

⇒ 비전연구회(현안 문제를 중심으로 정책 제안 중심의 연구)

○ 매년 초 연구 활동 주제 선정을 통한 선택과 집중의 연구 활동 추진을 통한 효율성 및 생산성 강화

연구주제 선정 (연구단체 내)	⇨	테마별 쟁점별 연구활동 진행 (각종 간담회, 토론회, 세미나 등)	⇨	정책 발현 추진 (조례입안, 정책제안, 제안·권고조치 등)

2. 의회 내 정책 개발 시스템 도입(조례연구회를 중심으로)

○ **조례 입안 시스템 도입, 의회 입법 활성화**

※ 조례 입안 방식 :

① **제안 조례를 기준으로 자체 점검**

⇩

② **연구회 자체 실무 간담회 추진(집행부서 및 시민단체)**

▸ 추진상황에 따라 관련 조례 공청회 및 토론회 추진

⇩

③ **법무팀 문의 등 법률 검토(상시 문의 가능)**

⇩

④ **최종(안) 제출(의사계 제출)**

⇒ 조례입안 방식을 의회 차원에서 공론화 하였고, 현재 의원입법 관련 전반 현 시스템 적용하여 추진

○ 의정 성과 창출 효과

<2015년도 전주시 조례입안 분포 현황>

2015.1.21~2015.11.10 기준

구 분	의원발의	집행부 발의	총건수
건수	41건	81건	122건
비율	33.6%	66.4%	100%

※ 2015년도 의원입법 분포율 33.6%(집행부 66.4%)

- 의원발의 : 41건 / 연구회 소속 의원 발의 : 26건(63%)

⇒ 제9대 전주시의회 조례 의원발의건수가 75건에 불과했으나, 조례연구회 의원입법 연구 활성화를 통하여 큰 성과를 보임.

3. 타 지방의회(해외) 연구단체와의 지속적인 교류활동(대외교류)

○ 예산정책연구회에서는 총 10명의 의원으로 2009년 11월 2일부터 4박5일간 의원연수를 기획 대만 타이페이 시의회 및 카오슝 시의회와 예산정책 관련 국제 학술 세미나를 추진

○ 조례연구회는 9대(2011년 1월 28일~)부터 현재까지 지속되는 연구단체로서, 경상남도 창원시의회 내 '좋은 조례연구회'와 지속적인 연구교류가 진행됨.

▸ 제1차 연구교류 활동(2011.10월 31일) : 각기 조례입법사례를 통한 "조례연구회 성과 평가 및 활성화 방안 토론회" 진행 *연중 상호 연구 활동 사례 교류

▸ 제2차 연구교류 활동(2011.11월 01일) : 전주 완주 통합 관련 창원시(통합시) 의원들과 "시·군 통합이 미치는 발전적 미래 전망" 토론회 개최
*연중 상호 연구 활동 사례 교류

4. 시민단체와 관련 전문가와 함께 하는 연구 활동(민주성 · 전문성)

○ 기후변화대응연구회는 기후변화 대응을 위한 정책적 연구 시책 개발을 위한 총4개 분야의 분과를 운영 각 분과에 시민 및 관련 전문가를 포함하는 거버넌스 형태의 연구활동을 진행함

⇒ 1년의 연구활동 주기를 감안한다면 총 4회의 관련분야 세미나를 정례적으로 운영하였고, 관련 정책 사례를 5분발언, 시정질문에 적용하여 전주시 기후변화대응 시책의 다변화를 이끌었음

⇒ 매월 분과별 자문위원단을 따로 구성하고 전문가 중심의 연구활동을 지속하였고, 시민단체와 연합세미나 3회추진등 시민과 공감하는 의제개발에 앞장

참고	전주시의회 의원연구단체 운영 근거 및 현황

○ 근거 : 「전주시의회 의원연구단체에 대한 지원 조례」(2008.11.6.)

특징	주요내용	절차
구성 및 참여	- 7인 이상 구성 가능 - 2개 이내 가입 규정	- 매년 1월 31일까지 연구활동보고서 제출 - 특별 사유시 수시 제출가능
연구활동비 등 지원 사항	- 4개 연구단체 구성 기준 연구활동비 500만원 범위 지원 - 내부 규정으로 추진	- 활동계획서 제출 후 위원회 심사 후 집행
활동계획 및 결과보고 심사	- 전주시의회 운영위원회 (운영심사위원회)	- 등록 및 취소 사항 - 연구주제 조정 및 활동계획 승인 등 - 연구활동비 책정 및 배분사항 - 결과보고서 승인
자체 운영방식	- 자체 회칙 규정을 두고 준수 - 내부적 연구활동 방식 선정 후 자율적 운영	- 자체회의 추진 후 활동계획서 제출 방식 - 활동계획서의거 연구활동 진행

○ 역대 전주시의회 의원 연구단체 운영 관련 주요현황

연구단체명	활동기간	주요성과	비고
조 례 연 구 회	제9대, 제10대 (11.1.28.~현재)	-조례 입안 활성화 추진 -타 연구단체 교류 활성화 -간담회, 세미나 지속 추진	※ 지속
의정포럼'함께배움'	제9대, 제10대 (13.1.16~현재)	-현장 중심의 연구활동 -다양한 아이템 접목 추진 -월별 인문학 강의 등 추진	※ 지속
전주비전연구회	제10대 (14.8.20~현재)	-지역현안 관련 분과 운영 -최초 여론조사 추진 -정책제안 방식 연구활동	※ 지속
지방정치제도개선 연 구 회	제10대 (14.8.20~현재)	-지속적인 타 지역사례 비교연구 -정례적 연구모임 진행 -정책제안 방식 연구활동	※ 지속
예산정책연구회	제8대 (09.2.1.~09.11.15)	-월별 조찬 활동 -관련간담회추진 -국제학술간담회 개최	※ 종결 활동보고서
기후변화대응연구회	제9대 (13.1.16~13.11.15)	-체계적 맞춤형 연구활동 -분과 활성화 및 자문위원 제도 도입 추진 -의원별 결과보고서 완료	※ 종결 활동보고서

2ND ASIAN COUNCILS FORUM (ACF) CONFERENCE
AUGUST 25-28, 2017
TAIPEI, TAIWAN

SPEAKER

Hon. Danilo C. Dayanghirang, DPA, MDMG, PDM

National Chairman, Philippine Councilors League
Chairman, Committee of Finance, Ways and Means, and Appropriations
City Councilor – 2nd District, Davao City

BEST PRACTICE IN SANGGUNIAN

The Sangguniang Panlungsod shall enact ordinances, approve resolution and appropriate funds for the general welfare of the city and its inhabitants.

Implementing Rules and Regulations of the Davao City Investment Incentive Code of 1994

Article 3. Declaration of Policy.

1. To accelerate the sound development of Davao City
2. to establish a favorable and stable business climate consistent with the development needs of the City,
3. To encourage new investments or expansion/diversification areas
4. To provide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raise the standard of living of the people of Davao City, and provide for the equitable distribution of wealth.

AS THE CHAIR OF COMMITTEE ON FINANCE, WAYS AND MEANS, AND APPROPRIATIONS IN DAVAO CITY

- CONDUCTS PUBLIC HEARING ON THE AMENDMENTS TO THE 2005 REVISED REVENUE CODE OF DAVAO CITY, ORDINANCE NO. 158-05 SERIES 2005

PROCESS OF PUBLIC HEARING:

1. INVITATION

- Prepares invitation letters for various sectors to attend public hearing
- Invites representatives from the City Government Department, property owners, manufacturers, professionals and non-professionals, bankers, real estate brokers, contractors and other concerned agencies in Davao City

2. PUBLIC HEARING

- Conducts public hearing in a specific place at the scheduled time
- Discussion on the items of the Amendment to the 2005 Revenue Code
- Amendment on the following taxes:

a. franchise tax
b. business graduated tax
c. tax on idle lands, etc.

PUBLIC HEAR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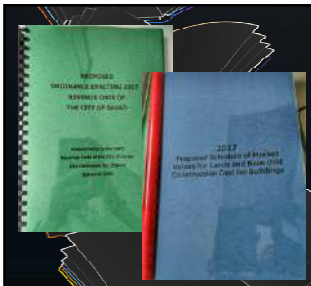
Representatives from the City Government Department, property owners, manufactures, professionals and non-professionals, contractors and other concerned agencies in Davao City

3. DELIBERATION

- Hears and listens to the income generating offices' views on the proposed increase
- Gives the people from different business sectors the opportunity to present their views and express their voices

DELIBERATION

THE TAX RESEARCH AND ACTION TEAM (TRACT) AND THE TRACT TECHNICAL WORKING GROUP (TWG)



4. CONSOLIDATION

- Extensive review and evaluation of proposals

5. COMMITTEE REPORT

- Preparation of Committee Report, Resolution and Ordinance

6. APPROVAL BY THE CITY COUNCIL

Approval of the City Council by majority vot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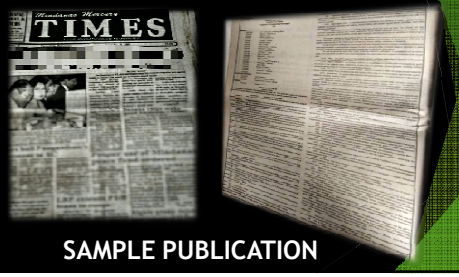
7. APPROVAL BY THE CITY MAYOR

- Approval of the Ordinance by the City Mayor

8. PUBLICA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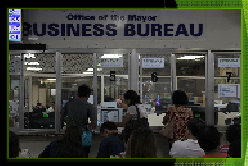
- The immediate publication is required upon its approval, as provided for under RA 7160, otherwise known as the Local Government Code of 1991

PUBLICATION



SAMPLE PUBLICATION

8. IMPLEMENTA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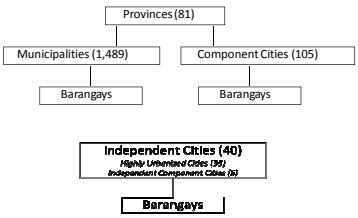


- Implements the Ordinance
- Increased Tax Revenue Collection by the City Treasurer's Office

DEPARTMENT OF FINANCE
BUREAU OF LOCAL
GOVERNMENT FINANCE

LGU Taxation and Revenue Practices

Philippine Local Governments



Total Number of Barangays: 42,028

Revenue Assignments of Local Governments

- Largely fixed (with maximum rates/ceilings) and not indexed to inflation
- Tax rates can only be adjusted up to 10% and once every 5 years
- Rates/levies must be legislated through local council
- Basis for real property tax is through a Schedule of Market Values, subject to revaluation/revision once every 3 years

Revenue Assignments of Local Governments

TAXES

Tax Base	Provincus	Cities	Municipalities	Barangays
Business	No	Yes	Yes	No
Real property	Yes	Yes	Share	Share
Idle land	Yes	Yes	No	No
Real property transfers	Yes	Yes	No	No
Printing and publication	Yes	Yes	No	No
Sand, gravel and other quarry resources	Yes	Yes	Share	Share
Delivery vans and trucks	Yes	Yes	No	No
Amusement places	Yes	Yes	Share	No
Professionals	Yes	Yes	No	No
Community tax	No	Yes	Yes	Share
Franchise	Yes	Yes	No	No

Revenue Assignments of Local Governments

FEES & CHARGES

Agricultural Machinery	Demolition Permit	Health Services	Parking	Special Cockfighting
Annual Inspection	Electrical permit	Holding of Benefits	Pedicab Operations	Storage of Flammable Materials
Bicycle Permit	Exhumation of Cadaver	Hospital fees	Permit & Solemnization	Tax Clearance
Boats Permit	Fee on Occupation or Calling	Impounding of Stray Animals	Physical Exam & Medical Certification	Terminal Fees
Building Permit	Filmmaking	Market	Plumbing Permit	Toll Fees & Charges
Burial Permit	Fire Certification	Marriage	Police Clearance	Towing Charges
Bus Terminals	Firearms Permit	Mayors Permit	Registration of Large Cattle	Traffic Violations
Carts and Sledge	Fiscal's Clearance	Mechanical Permit	Rental of Facilities	Tricycle Franchising
Certification	Fishing Permit	Mineral Lands	Sanitary Permit	Tuition Fees
Civil Registry Fees	Gaffers and Cockpit Persons	Mining Claims	Secretary's Certification	Video Tape Rental
Cockpits	Garbage Colections	Other Heavy Equipment	Sheriff's Fees	Water and Power
Court Fees	Hawkers	Parades	Slaughterhouse & Corrals	Weights and Measures

10-POINT SOCIOECONOMIC AGENDA

PHILIPPINE GDP GROWTH RATE

NUMEROUS INVESTMENT POSSIBILITIES

Through regional partnerships, we envision the growth of trade volumes between the Philippines and the mature economies of East Asia

Thank you!

Danilo C. Dayanghirang,
DPA, MDMG, PDM
Email: dannydayanghirang@yahoo.com
Facebook: Danilo C Dayanghirang
0917-507-8718
0917-838-3404

1. 第 1 回(1989)～第 28 回(2016)までの実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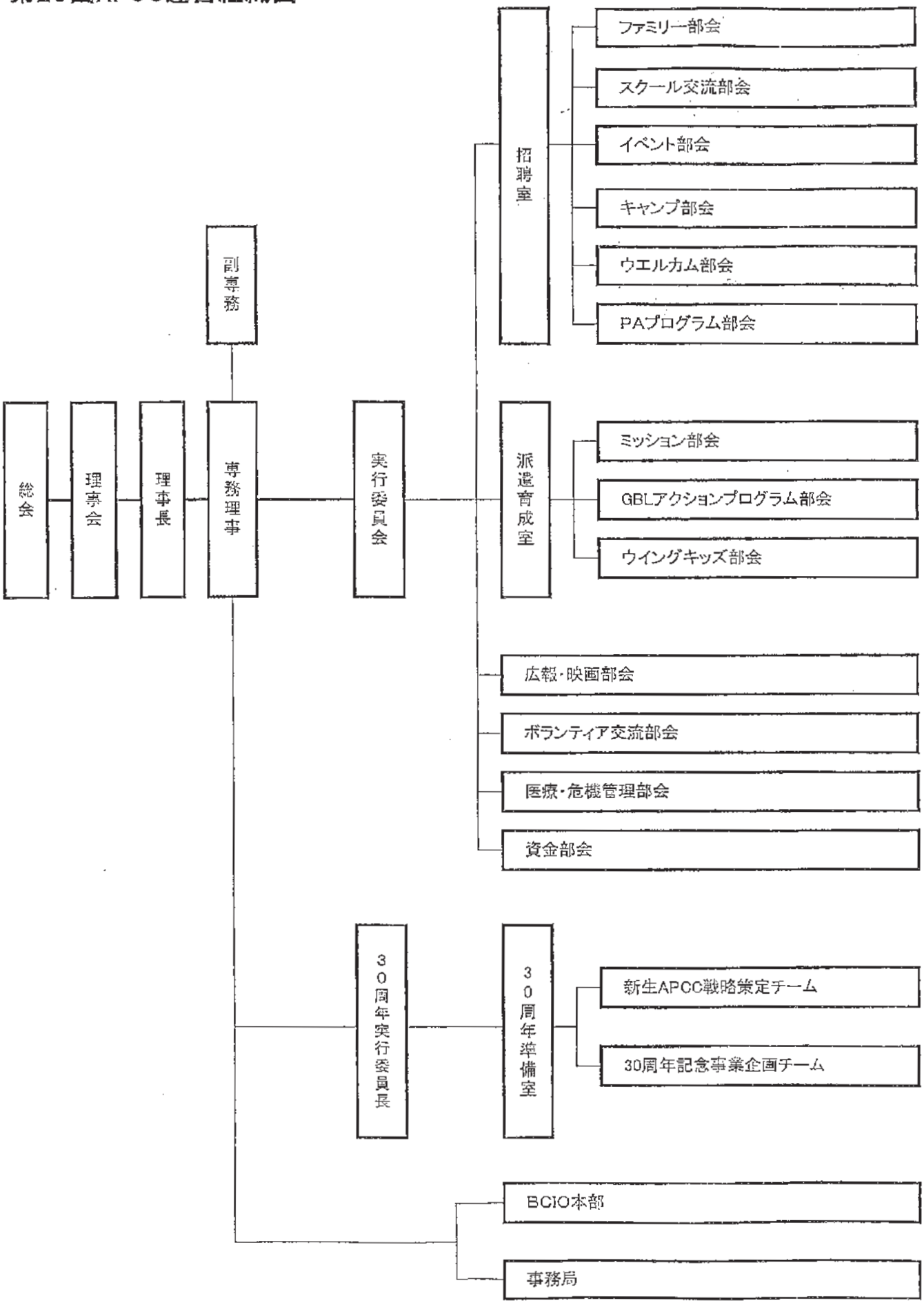
	招聘事業				
	国・地域	招聘者数			
			こども大使	シャペロン	ピース大使
2016 年 9 月末までの実績	55 か国・地域	10,939	8,923	1,336	680

派遣事業				
国・地域	派遣者数	ホストファミリー	ボランティア	同窓会組織(BRIDGE CLUB)
37 か国・地域	3,268	6,913	8,117	40

2. 招聘・派遣事業の推移(上表の年別内訳)

開催年	招聘事業					派遣事業	
	国・地域	招聘者数				国・地域	派遣者数
			こども大使	シャペロン	ピース大使		
1989 年 (第 1 回)	35	1,110	1010	100			
1990 年 (第 2 回)	40	398	319	79			
1991 年 (第 3 回)	41	491	410	81			
1992 年 (第 4 回)	42	501	417	84			
1993 年 (第 5 回)	41	367	326	41			
1994 年 (第 6 回)	43	387	344	43		10	276
1995 年 (第 7 回)	43	385	342	43		11	184
1996 年 (第 8 回)	44	386	343	43		9	182
1997 年 (第 9 回)	45	414	368	46		8	166
1998 年 (第 10 回)	44	475	361	45	69	7	145
1999 年 (第 11 回)	41	424	328	41	55	8	136
2000 年 (第 12 回)	41	428	325	41	62	4	82
2001 年 (第 13 回)	44	417	320	44	53	6	112
2002 年 (第 14 回)	44	420	329	46	45	6	134
2003 年 (第 15 回)	0	0	0	0	0	3	59
2004 年 (第 16 回)	43	409	329	47	33	5	91
2005 年 (第 17 回)	43	376	312	44	20	5	87
2006 年 (第 18 回)	46	399	332	47	20	5	89
2007 年 (第 19 回)	43	377	314	44	19	5	90
2008 年 (第 20 回)	44	388	315	44	29	10	176
2009 年 (第 21 回)	40	337	268	40	29	7	123
2010 年 (第 22 回)	42	287	216	42	29	5	87
2011 年 (第 23 回)	41	301	213	41	47	7	125
2012 年 (第 24 回)	41	291	214	41	36	7	126
2013 年 (第 25 回)	41	290	212	41	37	9	160
2014 年 (第 26 回)	43	295	220	43	32	11	185
2015 年 (第 27 回)	41	283	209	41	33	14	243
2016 年 (第 28 回)	44	303	227	44	32	12	210

第29回APCC運営組織図



第29回アジア太平洋こども会議・イン福岡 収支予算書

2016年10月1日から2017年9月30日まで

＜2017年1月現在＞

【事業部門】

（単位 円）

科　目	第29回予算額	第28回予算額	第28回決算額	備　考
Ⅰ事業活動収支の部				
1. 事業活動収入				
①事業収益				
公的機関助成金	78,500,000	78,500,000	78,500,000	福岡市、福岡県、都市圏
公的団体助成金	6,650,000	6,170,000	6,170,367	よかトピア、あすみん基金他
民間企業協賛金	4,430,000	6,350,000	5,959,448	
派遣事業特別勘定戻入	2,900,000	7,500,000	7,693,594	児童養護施設児童、チャレンジ基金枠児童派遣支援
管理部門繰入金収入	18,367,250	19,434,000	12,912,889	
その他	29,000,000	35,900,000	36,097,095	派遣事業、ウィングキッズ、GBLAP等プログラム参加料等
事業活動収入計	139,847,250	153,854,000	147,333,393	
2. 事業活動支出				
①実行委員会事業支出				
招聘事業費	67,500,000	64,900,000	62,733,264	
海外招聘費	45,500,000	43,000,000	41,883,241	こども大使、シャペロン招聘費
ウェルカム部会	1,300,000	1,200,000	1,017,050	国内移動費
ファミリー部会	900,000	900,000	822,043	ホームステイ事業関連経費
キャンプ部会	5,700,000	5,800,000	5,788,550	
PAプログラム部会	8,500,000	7,400,000	6,939,540	ピース大使招聘費含む
医療・危機管理部会	100,000	100,000	89,364	
招聘事業広告経費	5,500,000	6,500,000	6,193,476	
交流事業費	3,500,000	4,200,000	4,179,939	
イベント部会	3,300,000	4,000,000	4,021,666	
スクール交流部会	200,000	200,000	158,273	
派遣育成事業費	29,320,000	40,400,000	38,159,388	
ミッション部会	20,700,000	31,200,000	29,493,057	春8カ国
GBLアクションプログラム部会	3,000,000	3,800,000	3,519,408	ネパール旅費・現地活動費含む
派遣事業広告経費	800,000	900,000	973,540	
ウィングキッズ部会	4,600,000	4,300,000	4,065,383	ウィングキッズプログラム（8期、9期）
育成事業広告経費	220,000	200,000	108,000	ウィングキッズ参加者募集広報等
ブリッジ事業費	0	0	0	PAプログラム部会と管理部門へ移動
BCJ部会	—	—	—	
BCIO部会	—	—	—	ピース大使招聘費、プログラム運営費等
ボランティア育成事業費	600,000	700,000	582,178	
ボランティア交流部会	100,000	200,000	132,838	
ボランティア育成事業広告経費	500,000	500,000	449,340	ボランティア募集広報、ウェブ整備費等
② 広報関係事業支出	3,800,000	5,100,000	4,367,654	
広報・映画部会	100,000	100,000	95,298	写真展開催経費等
資金部会	—	—	—	
情報提供広告経費	3,700,000	5,000,000	4,292,356	記念誌、チャリティグッズ制作費等
③ 管理経費	35,127,250	38,554,000	37,290,970	
事業活動支出計	139,847,250	153,854,000	147,333,393	
Ⅱ予備費支出	0	0	0	
当期収支差額	0	0	0	
前期繰越収支差額	0	0	0	
次期繰越収支差額	0	0	0	

【管理部門】

科　目	第29回予算額	第28回予算額	第28回決算額	
Ⅰ事業活動収支の部				
1. 法人管理収入				
①事業収益				
収益金	4,100,000	4,500,000	4,063,449	チャリティグッズ売上、自販機収入等
②受取補助金等				
APCC支援の会助成金（会費・寄付）	16,000,000	16,000,000	15,000,000	
（チャリティゴルフ）	3,650,000	4,002,502	4,002,502	
（NPOへの事務委託料）	750,000	750,000	750,000	
APCCグローバル人材育成特別勘定戻入	5,000,000	10,000,000	5,000,000	
キャリアアップ助成金	0	0	1,000,000	厚生労働省助成金
法人管理収入計	29,500,000	35,252,502	29,815,951	
2. 法人管理支出				
①事業費				
30周年準備室	4,200,000	3,200,000	2,325,672	
新生APCC戦略策定チーム	3,600,000	3,000,000	2,325,348	APCC情報基幹システム開発費、運営費等
中長期構想企画チーム	—	100,000	324	
30周年記念事業企画チーム	600,000	100,000	0	会場予約金等
BCIO本部	100,000	1,000,000	1,169,723	
②管理費	14,397,750	13,546,000	13,102,233	
③ 事業部門繰出金支出	18,367,250	19,434,000	12,912,889	
法人管理支出計	37,065,000	37,180,000	29,510,517	
Ⅱ予備費支出	500,000	500,000	0	
当期収支差額	△ 8,065,000	△ 2,427,498	305,434	
前期繰越収支差額	12,743,058	12,437,624	12,437,624	
次期繰越収支差額	4,678,058	10,010,126	12,743,058	

アジア太平洋こども会議・イン福岡(APCC)とは?

【ビジョン】 わたしたち APCC メンバーは、OMOIYARI の心をもった地球市民となり こども達の笑顔あふれる世界を実現します

「アジア太平洋こども会議・イン福岡(APCC)」は、数多くの公的機関・行政、企業、団体の助成、協賛支援に支えられ、熱意あふれる県市民ボランティアが運営を担う、草の根レベルのこども国際交流事業です。APCC が目指しているものは、こどもの頃からの異文化との直接交流を通して「OMOIYARI の心をもった地球市民」を育て、「こどもたちの笑顔あふれる世界を実現」することです。この運動を推進するため、スローガンに「We are the BRIDGE～つなげます。世界の夢を」を掲げ、1989 年(平成元年)の第 1 回目開催以来継続して事業を行い、本事業年度(2016 年 10 月～2017 年 9 月)に第 29 回目となる招聘事業、24 年目となる派遣事業を行います。

1989 年の第 1 回アジア太平洋こども会議・イン福岡事業は、福岡市政 100 周年「アジア太平洋博覧会ーよかトピアー」の参加事業として、また青年会議所全国大会の記念事業として、(社)福岡青年会議所が企画、実施しました。この事業を発案した福岡青年会議所は当時、アジアの隣国に最も近い都市として古くから日本における大陸文化の交流拠点であった福岡の国際都市としての魅力をさらに高めるため、そして11歳という多感で純粋無垢なこども達に世界の多様な価値観に触れるチャンスを与えることで世界の人達と平和に共存する感性を持ってもらいたい、という熱意をもってこの事業を始めました。その理念は今日まで事業運営に携わる人々に脈々と受け継がれ、毎年事業は工夫と改善を加えながら発展してきていま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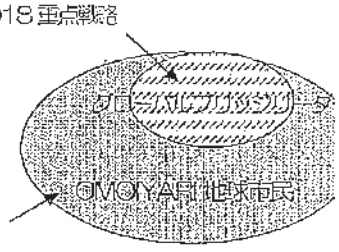
20 年以上継続して事業を実施していく中で、APCCは単なる国際交流イベントの域を脱し、地域や学校を広範に巻き込んで地球市民を育てるための国際交流教育プログラムへと変貌を遂げてきています。11 歳での交流を基点に、こども達にさらに知識を高め視野を広げてもらう学びの場を提供する『育成事業』、アジア・太平洋の各地での過去の参加者のヒューマンネットワークをさらに強め、「平和と共生」にむかって実際の行動を起こしていく場、『ブリッジクラブ(BC)』が各地で設立され、BCIO(ブリッジクラブ国際組織)を中心にBCメンバー間の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と交流を促進し、APCCの平和的メッセージを広めていくべく、活発な社会貢献活動を行っています。

日本で喫緊の課題ともなっているグローバル人材育成に、早くから取組んできた APCC ですが、25 周年を機に、今後はさらにその勢いを加速していく考え(NEXT APCC 構想)を公表しました。福岡に海外のこども達を受け入れて交流する事業と共に、来年以降、福岡のこども達を海外に派遣する事業を強化するなど、こども達・青少年に自然な形でグローバル対応の必要性や魅力に気づいてもらう機会をより多く作り提供していきます。

30 周年に向けての重点戦略 NEXT APCC 構想 (2013 年～2018 年)

NEXT APCC
The Asia-Pacific Children's Convention

APCCは、APCCグローバルブリッジリーダーとして
世界をつなぎ、福岡から日本をそして世界を変える若者を育てます。



APCC グローバルブリッジリーダーに求められる3つの力

CARe =	Communication	Action	Respect
	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力	行動力	理解とおもいやり

APCCグローバルブリッジリーダーは

- 自分の周りやグローバル社会の問題に関心を持ち、より良い社会に向けて自ら行動します
- 自分の考えを持ち、対話を通じて解決を見出します
- 異なる価値観や考えを尊重し、多様性を活かして、思いやりの心でお互いに支え合います

【育成環境の整備】

(1) グローバルブリッジリーダー育成ガイドラインと機会リストの作成および発信
(2) 海外担当窓口、ブリッジクラブと APCC のグローバルパートナーシップ協定
(3) BCIO の強化

【グローバルアクション】

(1) 派遣事業の拡大展開
(2) APCC 映画を活用した APCC ビジョンの世界普及
(3) グローバルブリッジリーダートレーニングキャンプの開発と実施

【フクオカアクション】

(1) ウィングキッズプログラムの拡充
(2) 英語による発信力チャレンジプログラムの開発と実施

<APCC25 周年式典での公表資料より>

B1 場次：友善的監督

主持人：

丘昌泰　元智大學社會科學學院院長

與談人 ：

丁仁方　國立成功大學政治系教授

汪明生　國立中山大學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教授

紀俊臣　銘傳大學社會科學院院長兼公共事務系教授

張壯熙　華梵大學副教授兼總務長

林亭君　台北市議員

陳光軒　苗栗縣議會議員

丘昌泰教授

丘昌泰：

現在我們進行 B-1 場友善的監督，這個監督不要動武，要非常理智的，非常有學問的，彼此相互監督，產生正面的力量，我想這是我們這一組最重要的討論主題。同時，我覺得台灣社會目前必須要學習正確的監督方法，產生正面能量的監督方法。

我們今天有很多學術界的先進，以及我們從事民意代表工作的議員在場。我們先請學者來做一個開場白，提供一些看法，我們先請丁仁方丁教授。丁教授其實是我多年的好友，他現在台南成功大學政治系擔任教授，他的研究做得很好，對台南政治生態瞭解得非常的透徹，這幾年來，他對兩岸關係議題的研究也非常的深入，今天他遠從台南過來，應該是賣趙永茂、紀老師的面子，在這裡非常的

謝謝！

丁仁方：

紀俊臣教授(左)，丁仁方教授(中)，張壯熙教授(右)

主持人，在場的貴賓及台上幾位與談人，非常的榮幸，今天來參加這樣一個非常有意義的論壇，很少能夠看到能夠結合學者和議員一起，我覺得是一個非常難得的機會，非常有興趣，所以特地一大早，就坐早班車從台南上來，坐在這邊聆聽，一方面追隨我們紀老師，到現在為止也學習到很多。

我今天要提四點觀察，跟四點建議，提供給與會先進來指教。長期關注台灣的府會關係，大概都可以注意到一些結構層面的問題，恐怕也不完全是議員個人的意願，他其實是受到這個結構層次的影響。

我第一個觀察，就是因為台灣府會之間的資源非常的不對稱，所以它的這種關係，有一點像國際政治中大國跟小國的關係，小國跟大國，一般我們說有兩種策略，一種是依附，一種是對抗，現在我們講有第三種策略，就是所謂的平衡，平衡其實也是一種低度對抗，其實你看台灣議會和政府之間，常常會出現一些比如說在縣市政府行政部門很核心的議題，就會反映出這樣一個結構，所以這是一個很關鍵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之下，其實說是有所本的去監督，其實有一個本質上的限制，這是第一個觀察。

第二個觀察是，我不敢說台北，我說的是台北以外的，特別是在中南部的一些議會的議員，幾乎所有的時間都耗在選民服務上，所以這變成是一個結構性的問題，比如說我們台南市的議員，他的當選與否，他的募款能力，跟他問政的好壞，基本上沒有太大的關聯，這是我必須要這樣講的。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議員服務一定要做好，行有餘力，再把問政做好，這是我的第二個觀察。

第三個觀察，像台南市是從省轄市升格到直轄市，所以市議員的助理現在可以拿到 6 個助理的名額，本來我們期待說，議員給他的經費多了，他應該更傾向專業的問政，更聘一些法案的助理，結果實際上，我昨天還特地問了一下我們跑議會的記者，他說現在我們台南市有 55 個議員，6 個助理名額還沒有聘滿，有的是用親友去兼的，真正有聘到法案助理的議員不到 10 個，其實有一些人是有心，但是沒有很認真地就一些議案做研究，某種角度，就是結構性所產生的問題。

第四個觀察是台南市議會特有，但其他議會也有這樣情況。特別是賴清德上任之後，因為他的風格，使得議會政黨對立的情況在加深。所以台南市議會，是全台灣最糟糕的議會，因為議員有很多都是我的學生或朋友，以前我們不管藍綠都一起吃飯，現在我如果參加甚麼活動，碰到藍的議員，綠的議員進來，不跟藍的議員講話。更扯的是，同樣是綠的議員進來，綠的議員也不跟綠的議員講話，藍的議員也不跟藍的議員講話，這是很奇怪的事情，這種政治對立在議會裡面強化，這也是我們面臨到的一個問題。

從我剛剛講這些結構面跟動態面，回到今天講到的一個主題，我有幾點建議。

第一個建議，就是我覺得我們議會中，一些比較有建設性的意見，我感覺比較像我們講政策學習時講的，如果沒有涉及到核心利益，或是沒有涉及到邊緣利益，屬於一種比較中間性的，比較有政策學習，比較沒有太多的衝突，那時候我們要怎麼做呢？其實我們可以來呼籲，像一些學者提到，就是設置一些專業論壇來規範他們，可以在一些議會裡面，創造一些平台，制定一些規範，讓議員更促進彼此的學習，讓他們的質詢、監督更有效率，我覺得這是可以期待的，這是第一個建議。

第二個建議是，我看到我自己以前在台南帶領的一個民間的協會，想要監督市政，但是我覺得有一個根本的困難，就是市府的資源太多，我們幾乎被市府的資源綁住，可是這幾年，我感到像台南一些青年的朋友很積極的參與問政，去年 10 月，有一個叫做台南新芽，社會民主黨前秘書長嚴婉玲當時特地跑到台南，去成立一個新的平台，很積極的去問政關心。我覺得這樣一個專業的公民論壇，很值得去鼓勵，如果這種平台，越來越多的話，我認為會對我剛剛講的議員，產生更大的壓力，希望他們在服務之外，能做好更專業的問政，這是第二個我希望這種公民團體能夠發揮影響力。

第三個，當然這有一點老生常談，說實在與其寄望議員來發揮影響力，不如來寄望其他力量來發揮影響力，所以第三個就是寄望我們的媒體，能夠發揮一個比較客觀的評價，比如有事沒事，對一些議員做一些客觀的評量，我相信這個可以敦促議員能夠更有效的去監督。

第四個，當然最重要的是，我們的選民跟議員要有更多的自覺，因為時代在變，潮流在變，如果不去迎合這些新的發展，我覺得很多議員，慢慢就會被超越，

被時代給淘汰。這個自覺性，相當程度也需要我們有一些力量去督促它。不過像我們學者的呼籲，公民團體的呼籲，我相信以現在這種問政方式，議員也都面臨很大的壓力，不斷在調整。我覺得選民也是一樣，如果議員只是在做服務，沒有專業問政的話，我們怎麼能夠期待我們的議員，對縣市政府能夠發揮很好的監督力量呢？這實在是應該我們一起來倡導的。

以上是我的四個觀察和四個建議，不是非常的成熟，在這裡就教各位先進，報告完畢，謝謝！(丁仁方教授的補充教材，附在本文後面)

丘昌泰：

謝謝我們丁教授非常清楚的發言，第一個就為什麼沒有辦法非常友善的監督，理由就是基本政治結構上的問題，包括第一個就是府會的資源不對稱，我們的議員沒有錢，沒有權，那只有兩條路，一條就是依附，另外一條就是對抗。第二個就是選民的要求，要做選民服務。第三個就是議員覺得既然選民服務重要，那就沒有必要聘用法定的立法助理。第四個就意識形態，藍綠的對立。

丁教授又提出幾個建議，我覺得也很好，第一個有一些比較中間性的議題，而且不涉及黨派的議題，比較容易友善監督，比如說發生地震災害，每個人都會支持，像這些議題，就容易取得最大共識。第二個是年輕團體、公民論壇的出現，這是一個很好的現象。第三個新的媒體，特別是社群媒體，發揮了很大的重要的關鍵力量。第四個就是選民本身的自覺，這一點，我覺得台北市議員相對起來，問政就比其他縣市輕鬆多了，有一些議員根本就不用做選民服務，只要在電視上講健康養生就好了。台北市議員真的很幸福，以前我記得新黨幾個議員，都是我的朋友，他們還做甚麼選民服務？沒有欸，他就是好好問政好好表現而已。

接下來我們請汪明生老師來談，汪教授談完以後，我想把這個棒子交給我們的議員好不好，因為我們很難得有一位從苗栗來的議員，請問一下他的看法，汪老師請。

汪明生：

謝謝主持人，丘副院長好像現在又升官了，是丘院長了。幾位議員，在場的各位先進，首先有幸來參加這個論壇，我也覺得蠻新鮮的，在座有多位是多年的好朋友，簡單講，我長時間待在高雄，在過去很長的時間，大部分是待在家裡，在場有幾位好朋友都知道，我比較往外走，是在過去的二十年在南部推進兩岸交流，兩岸當然又是一個大議題，可能又有一些複雜面向。

我在這方面提供了一個材料，各位可以看大會手冊，翻開第 193 頁，裡面大概是去年參加一些會，然後把它整理，這些東西就是在今年台灣的都市計畫期刊，有機會去投稿，就被接受了，因為我也不年輕，所以有很多東西，我也沒有辦法考慮得這麼細緻。

我要談一個其實蠻重要，但是現在蠻沉痛的話題，就是台灣存在的南北差距

問題，當然從年輕的時候，所謂的年輕差不多也就是快要 30 年前，因為我本來是台北人，後來美國回來才到南部，從對南部的好奇觀察，用心接觸，或者認識了解，很簡單的講，從正面解讀，因為我在南部待的時間比較久，所以從南部的角度來認識公共事務，如果我冒昧講得有不對的地方，還請各位包涵，南部看到的是台灣的真相，北部看的是台灣的表象，這話講出來會得罪台灣的一缸人，但是認為就是如此。

南部是台灣的真相，北部是台灣的表象，因為上個月台中的人口已經超過高雄，但是整個高雄除了陳菊出來講，因為國民黨重北輕南之外，整個高雄是沒有聲音的，不用講，北部是全台灣的首善之區，最重要的，但是除非把南部的問題改變，不然整個台灣會糾結一起，因為台灣的政治問題，大部分都在南部，南部的問題又是甚麼？可能沒有那麼多的時間來談，我們希望台灣的不只是地方政治，包含我們這個論壇講的議會民代，我們希望整個台灣真正走上一個，學界所講的所謂的善治，我想這方面可以探討很多，剛剛也講很多，但是還是要面對真實的情況，來這邊我可能不打算講太多，我們至少講我們真正希望像這場次講的善意監督。

所謂的善意，應該講在過去的 5 年，大約 5 年，也就是從太陽花年輕世代，大概已經開始了，算是覺醒，也上了檯面，現在大家口口聲聲要關心到年輕人，年輕人本來是一張白紙，年輕人也是一個國家城市的未來，怎麼樣讓他們去認識？這當然可能是教育的工作，但是這個教育的工作在這個時代，可能幾乎講有一點緩不濟急。

因為現在台灣的大學，可以說大概可以用一塌糊塗來形容，但是台灣的大學，這 20 年來我們只有一個條件可以具備，就是我們的師資還算不錯，除了師資，我認為其他都不夠，都老早偏離正常，當然所有這些問題的結，有稍微會觸及到剛剛我點到的這一點，今天我準備就是要談這個。

我認為大部分這些問題的結，就算不是百分之一百，也有百分之八九十以上，問題的結，其實就在兩岸問題，現在我也認為快呼之欲出了，我們希望台灣的公共事物，能夠走上一個正軌，我覺得用正面解讀的話，藉由這個非常難得刻骨銘心的機會，把問題搞清楚，但這個也是時間不夠，在我提供的材料裡面在 192 頁，應該講台灣這 30 年的變化，跟全球化以來，當然現在也包括大陸的變化等等，其實我們可以從剛剛抽絲剝繭這些類似的地方，假如我們可以把它理順，就是用學界來講是建模型，當然建模型又是一個大工程，但是這個工作至少我們是認為應該努力的，甚至大體上我認為是可以做到的。

我相信在座的各位，尤其在北部大多數的人，都很熟悉大陸，跟南部不一樣。大陸當然他們問題也非常多，當然這個當中，不管內部外部，有些東西他們也在變化中，但是不管怎麼樣，台灣是走在前面的，台灣是一個微型中國，至少我個人抱持的態度是，過去台灣有非常傲人的經濟，那不用講，對自己也好，對兩岸也好，對東南亞也好，都指引一個正確的方向，但是這 30 年，概略來講，就是

我們這個不成功的政治，或者說直接來講，就是我們的民主。

至少我們現在看到從全球化以來，原來西方的民主，我們重新認識以後，它有一些他要檢討修正的地方，我記得我剛回台灣的時候，北部的，抱歉我直接講，北部的政治學界，把民主選舉民主政治，描繪得非常的美好，高唱入雲，差不多30年前，喊了將近10年。

現在應該回過頭來，我們不去檢討，不去批評，而是把一個一個的案例，把它搞清楚，我剛剛已經提了一個具有挑戰性大，但是也是比較容易的工作就是建模型，那就不是光社會科學，連理工也要把它納進來，因為大部分的議題都是跨領域的，把模型一個個建立起來，把它搞清楚，至少我們是這樣認定的，絕大多數的問題當他搞清楚，就不難解決，我們現在大多數的問題，都搞不清楚，抱歉我必須這樣子直接講，在政治裡面，幾乎大家都不想把問題搞清楚。

所以我自認很驕傲我是在管理，管理裡面談的就是把問題搞清楚，但是也很遺憾，台灣這半個世紀來的管理，都圍繞在經濟跟企業，也就是只談企業管理，變成台灣的一般社會各界，甚至連學界一談到管理，腦袋想到的就是企業管理。可是台灣的發展，尤其是政治民主化以來，我們大部分問題，根本不在經濟，我的看法問題也不在政治，我們的問題其實是在社會，這是我的概略的看法。

南北其實就是一個社會問題，我們現在看到的年輕世代，我們要對外接軌，甚至全球化以後，我們看到很多問題，其實大概講，台灣這30年普遍忽略了社會，問題是出在社會，南部是處在全不同的發展階段，我提供的材料，當然也比較直白，南部基本上是在傳統階段，甚至是在原始階段，新竹以北是現代。

尤其是像太陽花這種青年人，他們當然希望介入，他們希望躍上檯面，他們對於未來當然有很大的寄望，大概就是在這二三十年，也就是在台灣最好時代出生的年輕人，幾乎到剛剛成年，所謂的成年大該都在現在30歲以下的年輕人，多半是在挫折中的，為什麼，因為大部分的訊息，坦白講很少去注意他們，那也實話講是因為台灣裡面這30年所謂的民主，忽略了選民這一塊，我們大部分的民主政治，都是著眼在政黨跟候選人，正面的，像新竹以北，會從政見去著墨，在場的人可能知道，以高雄的選舉來講，是不用政見的，現在在高雄看到幾個市長的看板，沒有一個是有政見的，講的都是非常溫暖的，看了就感覺很好的，只要這樣子就會有票。

那問題出在哪裡？不要去怪政黨的候選人，是因為選民的問題。很簡單的講，在半個世紀以來，南部，我想台南也差不多，這個應該丁教授比較了解，至少高雄的情況，半個世紀以來，有條件有企圖或是頭腦比較好，比較優秀的，多半都到台北來了，雄中畢業的學生，八成以上一去不回，到了北部以後，他不會再回高雄來，這種情況有半個世紀多，那你想想看，留在高雄的人口會怎麼樣？

它的結構老早就失衡了，如果我在這邊講得不對，當然也是接受批評，高雄根本不適合民主選舉的，不管哪個政黨來，都會做得比現在好，他不必再經營選

票，政黨內部總有監督，就算是一種利益的平衡，也都比現在好。南部跟北部更是處在不同的階段，台灣主政是在北部，台灣的面子工程是在北部，大部分的台北人，抱歉，我還是台北人，我在台北還是有家的，我還是有台北的情結，雖然我大部分還是在高雄。

我認為台北人，坦白講很感概，差不多都在國王的新衣，為了要對國際展現，他又是台灣的首善地區，在各種面向，我們看起來都是面子工程，比裏子還要重要，但是台灣經過這 30 年，兩岸大概是這 20 年，面子不能說不重要，尤其是在台北，但是裏子也一樣重要。

裏子的問題，就是我們台灣內部的問題，我們台灣內部的問題，我還是用簡單的這個圖，南部和北部根本是在不同的發展階段，時間關係我就不在這邊講了，我只跟各位報告，可能有一點點唐突，我提出來邀請，大概在今年的 11 月初，我們會在高雄辦一個兩岸的活動，至少這是我個人 20 年來一直的堅持，兩岸不必糾纏主權，統獨是選舉弄假成真的一個話題，大部分人關心的是發展，何況台灣現在已經發展不太好了，有良知有理性的人，應該把正確的方向指出來，就是回到發展。

回到發展，它當然需要一個努力的過程，只有這樣，它才是釜底抽薪，不然的話，根本問題不解，變成 20 年都在忙面子的工程，難道我們還要再糾纏這個問題還要 20 年嗎？何況台灣的局面大概維持不了那麼久，很快就有變化了，已經到了一些很根本的東西，所以就要提到前面我一開始提的，我們希望台灣的民主政治，他是一個正向的，他是一個能夠引領的。

但是我們的問題出在哪裡？有這個機會很難得，我就直白講，其實是出在人口結構，就是選民這一塊，出了問題。新竹以北沒有甚麼大問題，因為新竹以北，概略來講，他是現代的或是比較後現代的，可是濁水溪以南，跟新竹以北，完全是兩個世界，可是很少北部人，對這一塊去關心、去了解，為什麼？我自己也曾經是北部人，我到現在還常回北部來，對於南部包含我們的離島，這個已經吵吵鬧鬧 30 年了，根本的這些問題，假如我們台灣自己不能解，很冒昧講了又很犯忌話，如果我們自己解決不了自己的問題的話，恐怕就要別人來解了，這個當然就很感慨了，我簡單的報告到此，謝謝！(汪明生教授的補充教材，附在本文後面)

丘昌泰：

謝謝我們汪教授，他非常深入的談話，事實上，我認識他也有二三十年了，二三十年前，他就已經在講南北差距，到現在還是在講，雖然高雄有進步，比如說我在上一場(A-2)，有高雄市議員充滿了樂觀，捷運從紅線黃線輕軌等等。

反而是台中越來越鬱卒，我對剛剛汪教授講的看法有不少論點，不少論點我是非常的贊成，比如說一個唸到博士學位的人，你在高雄市除了學校，你哪裡能找得到工作？我到嘉義市，問一個拿到碩士的人，能不能拿到工作？他們說可以，

只有一條路，就是高資低就，就是你用碩士學歷，去找一個大學畢業的工作，所以整個台灣的區域發展，有非常大的失衡，這點剛剛汪教授的看法真的有非常大的參考價值。

只是今天我們談的是友善監督，若以這個主軸，來整理一下汪教授的看法，其實他有一點和丁教授講的一樣，很重要，那就是選民，要回歸到選民本身，到底你要的是甚麼？當你要的是政治，整個議會議員從事的一定是政治活動，做選民服務嘛，喝酒嘛，搞關係嘛，所以他講這個選民的政見，對地方建設的需求，這個確實可以和我們丁教授看法結合一下。我們現在是不是請中部苗栗來的陳議員，我們非常希望聽到新竹以下的意見。

陳光軒：

主持人丘院長，所有在場學術界的教授跟議員，我跟南部北部比較沒有關係，大家都會戲稱我們苗栗是苗栗國，前一陣子有出現一位國王劉政鴻，但是我的狀況比較特殊，我是第一次當議員，我是 2014 年當選，過去也是在台北當幕僚，老闆是現在駐日大使謝長廷，我自己本身是苗栗頭份人，後來也是一些因素，我自己也不是很願意，因為如果說站在政治利益的考量，在苗栗從政，其實對年輕的政治人物來說，不是一個很好發展的地方，但是基於說身為政治工作者，來看自己的家鄉的政治文化，政治生態，一天比一天還要惡化，所以才有感而發，覺得這個地方，應該看能不能真的做一些事情而試試看，最後才會回到苗栗這個地方從事選舉。

剛剛丁教授有提到，我們過去的議會的監督，傳統上就依附跟對抗，一個較新的概念是平衡，在苗栗基本上，我會更在意的東西，就是基本上我們看不到甚麼對抗，因為民進黨跟國民黨的席次差距很大，要對抗可能也很難，過去一直以來，我們處於的狀況，比較屬於平和。

苗栗真的是比較特殊的地方，從新聞的角度來看的話，過去 23 年來，如果有在看報章的話，大概都知道，我們苗栗過去 23 年，我們的總預算完全沒有刪除過，今天剛好有這個機會來到這邊，可以跟大家來分享，也是跟大家順便報告一下，我們苗栗議會實際上的狀況。

其實 23 年來從來沒有刪過任何一毛的預算，不是所謂的府會和諧，是監督上有一點失衡，更重要的是利益結構，利益之間的勾結，講好聽一點，是府會和諧，講白的互相之間，不管是政治上、金錢上的利益盤根錯節，不要說是 23 年，可能是 30 年、40 年、50 年來一直都是這樣。我們最老的議員有當 9 屆的，我還沒有出生，他就已經在當議員了。

我們在議會，我去年曾經在議事中，針對總預算，希望說有一些比較實質上的討論，不合理的地方，我們應該要求必須要刪除。在苗栗那個預算書完全是沒有在打開的，一直是整綑綁在那邊，從第一天到最後一天，是從來沒有開封過的，一直都是這樣子，基本上針對預算是不逐條討論的，我曾經提出過非常嚴正的抗

議，因為議長沒辦法主持，我們的主席是現在副議長，但是不論是議長或是副議長，都是會跟你一直強調，我們大家要維持府會的和諧，不要這樣子，縣長又要請吃飯，不要浪費大家的時間，你這樣子大家都沒有辦法吃飯，你要逐條審查，我們審到天黑都審不完。

我常常舉例，人家台北審到跨年夜都可以繼續審，為什麼我們苗栗，從早上到中午就受不了？但是沒有辦法，我一個人，沒有辦法對抗 30 幾個人，所以我經常就是很悶，我就覺得雖然我跟他們是同事，但是好像跟他們是不同空間，不同領域的人，每一次最後我都只有表示退席抗議而已，我說我沒有辦法為這樣子的預算案做背書。

我剛剛講的是我們議會目前的現況，剛剛也有討論到議員的服務問題，其實現在的選民是非重視服務的，所以可能會經常碰到以服務為主，專業問政為輔，甚至是完全不做專業問政的，但是以我一個實際上青年參政，尤其又在苗栗，我自身的經驗，我覺得要去改變社會，改變這個地方政治文化的企圖。

如果站在我的角度來說，既是民進黨，然後在地方上又不是政治世家，過去又沒有任何基礎，以前又長期在台北，後來才返鄉從政，照理說，主客觀的條件，我都不可能會當選，但是我當時下了個決心，就是這個地方他過去的沉疴很多，藏汙納垢的東西也很多，如果說我要用過去那一套方式去經營的話，很快的不是我腐敗，就是我選舉根本就選不贏，因為基礎上根本就不對等。

所以當時我的想法就是既然如此，應該是要去衝撞傳統的那種文化，所以我過去還沒有當議員，乃至於現在我在當議員的這樣一個過程，地方上的經營，基本上，就是大家可以想得到，傳統政治上應該怎麼樣做，尤其是民意代表要怎麼做的那些方式，我全部都不做。你叫我包紅白包，我也沒有包，比較抱歉，林議員在這邊，我也不知道大家是怎麼在經營，但是我是在講我自己的經營方式，我選舉的時候，我不插旗子，不跑宣傳車，然後我不炒米粉，所有你想得到的傳統方式，當然也不買票，這些我都不做。

當然在選舉過程中我會遇到很多的挑戰，有一些選民，門一打開直接就說多少錢？我說甚麼多少錢，五百一千我都說沒有，那他就說你不用選了，我就說沒關係，謝謝指教，但是我會去一直提出一些新的想法，當然選民很多時候是不看政見的，但是我會企圖用一些比較吸引青年來關注你這個人的方式，再去帶你的政見，比如說我辦一些電影會，或者說我辦一些音樂會，我辦電影會辦音樂會的目的，是想要傳達我要做的一些政見，或者我想要做得一些事情，當你辦了一些活動，他們就會到現場，他們就可能就會去聽你想要做的事情，進而去認同你的話，這個是我的經營方式。

但是我覺得在苗栗，如果你要去做監督的部分，我比較希望朝一個方向，就是說我剛剛也講過，在苗栗是完全沒有在刪預算，我發現有一個很嚴重很根本的問題，就是我們議事的進行，根本就是一個完全的不透明的議事程序，我們的議

會裡面的內規，就有明定說不得旁人旁觀、錄音、錄影，也就是說，當我們這些民選的代表在問政的時候，民眾不得而知我們都在幹嘛，所以我認為一個很根本的問題，就是當大家都不知道我們這些代議士在幹嘛的時候，就可以在裡面胡作非為，不用擔心有觀感不佳的問題。我一直以來長期在推一個東西，就是推動議事透明化。

如果我們要好好監督政府，應該先讓人民知道我們到底都在幹嘛，我一直在推動議事透明化，我們的議會，實質上要有議事的預告，會後的議事錄，每個議員一言一行，都要有記錄，議事錄要公告在網站上，在目前為止，苗栗市沒有，更遑論是議事直播，我也提案過很多次，但是提案歸提案，通過歸通過，在議會這邊永遠都是以我們經費不足，沒有預算，就是不願意去執行這樣子的狀況，我們現在至少已經把禁止錄影、錄音、民眾旁觀，很不合理的規則刪除了。我認為一個根本監督的問題，就是要把我們自己攤在陽光下，才可以讓我們的民眾知道，我們這些代議士在幹嘛，進一步給他們一些壓力，甚至下一次選舉的時候，民眾可以真正選出一些可能比較關心地方，比較有心，比較有前瞻，而不是為了自身利益來經營政治，或者是選舉的代議士，我們現在連立法院朝野協商都可以直播了。縣議會是連讓民眾進去拍張照，錄個影、錄個音都不行，我認為在監督別人之前，我們自己也應該要攤在陽光之下，這個是互相之間的監督，我們的政治才有可能產生一些質變，這是一點點的心得跟看法。

丘昌泰：

謝謝我們陳議員的分享。實際上陳議員的看法，可以印證剛剛仁方兄的看法，就是選民的政治文化沒有改變，還是過去那一套，今天社會那麼強調透明公開，但還是那一套黑箱作業的政治文化，如果這個政治文化沒有改變，其他的監督沒有效，謝謝你的分享，

接下來，兩位教授再提出他們的看法，最後我們也請議員再提出你的看法，這樣能給你更多的刺激，更多的 information，接下來我們要請紀俊臣紀教授，他是銘傳大學公共事務學系兼社會科學院院長，過去他曾經擔任過內政部民政司的司長，精省精簡台灣省政府，就是紀老師的傑作，當時弄了很多的法案非常棒，特別是地方制度法，老實說是樹立我們地方制度運作，非常重要的一個法規，他下來之後，這個法規都沒有看到有修正，就可以知道他這個法案做得很好，裡面有幾個條文，是屬於跨域治理，現在我們做跨域治理，就有一個法源，可以說走得非常先進，請紀老師提出您的看法。

紀俊臣：

主持人丘院長，各位教授，大家好，關於友善的監督這個題目，因為過去我也在地方政府服務過，有過到議會被監督的心情，我感覺當時台北市議員監督的情形，還是蠻友善的，人身攻擊蠻少的，不會有甚麼八卦的這種情形。我有一個感覺是，如果監督會成為一個問題的話，這個名嘴要負很大的責任，我們的名嘴

到處亂講，有一些根本他都不知道的事情，尤其是過去有一些事，我剛好也知道的事，他也能編出來，而且根本不是那麼一回事，這是很可怕的事情。所以講友善的監督，一定要排除名嘴式的監督，捕風捉影沒有根據的也亂說，這樣就不好。

還有不要高度的意識形態。我就是對的，你講的都不對，我覺得不管是執政的民進黨也好，或是在野的國民黨也好，對於這種監督，最好是專業性監督，有憑有據，比如說，這次大停電的事件，到底是甚麼原因造成的？除了這個專案小組去了解之外，我們這些要講話的人，要去蒐集一些資料，不要有這些八卦的消息，反而去誤導，明明是這回事，又變成那樣子就不好了。

紀俊臣教授(左)，丁仁方教授(右)

那怎麼樣能夠達到專業的監督？我覺得剛剛我們陳議員講得非常正確，一定要下功夫去了解，坦白講，台北市預算比較多，有 1600 億，要好好去了解是不容易，像立法院在審預算的情形，可能和苗栗縣差不多，也是亂喊的，因為我有去過立法院，他就會問你要刪多少？大概要刪多少，他會問你，3000 萬好不好？我就比個 3，他說我說 3000 萬是好，是不是？我說不是，是 30 萬，他就說通過，根本沒有在看，為什麼？因為他只注意到那些跟他利益有關的。

像警政署要買 7 艘海巡艇的案子，那時候還沒有海巡署，7 艘，你看那個利益有多大！300 多億，他們就先在那裡規劃，這個如果把它化整為零的話會怎樣…，所以他們只關注和他利益有關的項目，這些他們都很關心，可能 4 天都過不了，但是如果一般的來講的話，就很容易過。

我是覺得當然量大要選擇性，但是也是要專業，為什麼？因為畢竟要看緊荷包，如果你說這個不對，你要提出道理，我在台北市服務的時候，有一天，工務局的預算，為了買那個吸泥車，結果 4 天停會，工務局的這個預算還沒有過，後來他們找到我了，我覺得奇怪，工務局買車子，怎麼會找到我，原來他們本來一

輛吸泥車是 5000 萬，但我把它們變成 2500 萬，他們認為這裡面有鬼，照理來講減少應該是好事，5000 萬的車可以用 2500 萬買到變成有鬼，後來他們就問我，為什麼你要把它變成 2500 萬，你要說個道理，因為 4 天整個議會停會，我就跟他說明，因為原來是台幣是 1 比 40 買的，現在台幣已經變成 1 比 25 了(1989 年)，那請問是不是要減下來，我這樣一講，議員馬上就通過了。

我當時就問他，匯率從 1 比 40，到 1 比 25，是不是一定要減下來？因為當時我是在研考會，如果我不減，是不是就變成我不負責任了。所以議員要專業，行政部門也要專業，就可以把非常複雜的問題化解。你看那個市議會 4 天沒有審議，那個非常大的風暴就這樣停下來了，而且這是擋人財路的事情，你要怎麼樣把它化解，我是覺得這就是專業。

再來我們一定要公益性。我想各位都知道，現在台灣地區沒有工程配合款，只有台北市，還有嘉義市，台北市不是真的沒有，當時是他們一直爭著要就問我，我就說台北市已經發展那麼快了，像城中區議員，你要他發配合款，豈不是要把好好的道路，挖起再鋪上去，這樣有道理嗎？我就他們說明絕對不能每個議員都有配合款，像現在新北市每個議員是 1200 萬，不要騙我，表面上是沒有，實際上是有，這個就是說大家都站在公益的立場跟建立制度的立場來看問題，而且一定要堅持，剛剛我講的，如果不是我堅持不能夠有小額工程配合款，就會開放。如果開放以後，你要把它收回去，一定沒有辦法，這個很重要。

還有議員，有些有他利益的問題，我那時候有一天，有一個已經過世姓莊的議員來找我，說您曉不曉得我要連任，我有一條路就靠這條路才能連任，各位想這是麼道理，一條路就能連任，當時我就跟她講那條路我也去過了，沒有人走，結果他說就是沒有人走，我才要開，所以經過了解，他這裡面都有利益的糾葛的。

還有一個姓陳的議員在內湖，明明沒有人他也要開一條路，他就告訴我，那一條路不開不行，我這一屆就靠那一條路了，所以像這種利益糾葛，我們行政部門也好，或是其他的議員也好，一定要有良知來排除他，像我剛剛講的莊議員的例子，我就堅持那條路沒有人，開了路沒有甚麼利益，我講的是公益，他的是私利，其實背後因為要徵收土地，他就可以賺一筆，我說這個不可以，他說要不要去會勘，我說不要去會勘，因為我知道你也知道，到時候說出來更難看，要他諒解一下。

如果有機會就一定要說服他，所以我常常覺得說監督的問題，即使議員很兇，但是你自己一定要有專業，才能說服市議員。台北市有一個議員，為了關說他一個親戚的小孩到台北市政府去當雇員，結果人事室不理他，他連續四年都質詢那個問題，所以報紙都不會登，他有一天遇到我，他說他當市議員到現在，要爭取連任，但是從來都沒有上過媒體，我說你不要一直質詢一個題目，媒體不會有興趣，他問我最近有沒有機會上媒體？我說明天中午一定會上電視，他問我甚麼道理，我告訴他早上 11 點鐘一定要來，來了再告訴他。

各位都曉得當年台視是11點半，華視中視是12點的新聞，結果他來了以後，我就告訴他，你現在趕快提出權宜問題，他說要幹甚麼？我說那個楊金欉，那一天正好在醫院，我說你要提請議會，在議長的帶領下去，醫院慰問他，然後準備花，一定上電視新聞。

我提這個例子就是說，議員監督質詢，一定要有專業，有道理，去慰問楊市長，媒體當然就會認為是公益，不是為了私利，可以上新聞，所以我講這個事情，就是要說所謂友善的監督，一定要有憑有據，而且確實是為了公益的。

再來一點，你一定要做一個社會的表率，不要憑空捏造一些故事，而且講話非常粗俗的，或是搞一些道具，我覺得這些都不是必要的，如果能這樣，我相信我們整個議會的文化會改變，不過就整體來講，我在觀察台灣地區，我們台北市議會品質還是比較好一點，以前鳳山市民代表會，為了市長和代表會主席對立，拿糞丟到代表會的主席台上，我那天正好有事到高雄，親眼看到，我覺得像這種水準，怎麼監督人家？以上是我的報告，謝謝！

丘昌泰：

謝謝紀老師提供很多非常好的意見，我們最後再來做一個整合結論。接下來，我們是不是請張壯熙張教授，來發表他的看法，張教授現在在華梵大學當總務長，同時是人文研究中心主任，最重要是他在前台中縣副縣長任內，被監督的情況更多。

張壯熙：

張壯熙教授

謝謝丘老師丘院長，主持人，各位議員，各位朋友，我從紀老師剛剛那個故事來講起。在我的經驗，在我的觀察裡面，所有的監督都是友善的，好像還沒有

甚麼不友善的。

紀老師剛剛講的最後一個例子，其實可以提供給議員們做參考，你議員沒有辦法上電視，沒有辦法被媒體注意，其實有時候如果跟官員做好朋友，官員還可以教你如何能上電視上媒體，一天到晚搞它，還不見得可以上媒體。我是一個很務實很踏實的人。一般而言，大家在想像地方議員對於地方政府，或地方自治團體的監督，大概有幾件事情。

一是地方立法，二是預算的監控，三是地方軟硬體的建設，四是行政服務的好壞，五是當然就是指官箴官場那一部份，比如政府官員為非作歹，如果他沒有專業，內部控管沒有做好瞎搞，政風沒有做好，由外部的立法部門來監督處理。行政部門你在各種環節怠惰，或者是推託，其實那要內行人才看得懂，我可以讓一件事情，比如說丘昌泰老師要辦一件事情，到地方政府去，我可以讓他跑三個局兩天辦不出來，搞不清楚到底要去哪裡，無法問出個所以然來，基本上要有深入的了解，才能加速服務，讓行政工作通暢。

至於軟硬體建設那一部份，其實是剛剛各位談得很多的利益結構、選民服務，乃至於是自己本身，每 4 年要籌一次款，這很正常。至於預算控制那一部份，大概沒有那麼多人有辦法，不要說地方議會，立法院也一樣，現在更狠的是，不給你一整落(預算紙本)，你也不用解開，現在就給你薄薄三片光碟片，看死你了，怎麼翻啊，那個比紙本更狠。

基本上預算的問題，平常有深入往來，有深入交流的，他就很清楚知道說，丁仁方丁局長明年編預算的重點會是在哪裡，他也會知道我這個議員我就是貓貍國的，我要做甚麼東西？他會關照到我，我們兩個稍微 double check 一下都還能夠滿意，也就沒有甚麼要去解開那個預算書紙本，或去翻那個三片光碟了，所以將來不會有光碟片，將來會放在那個雲端，叫你自己上去看，反正影碟你也不會去看。

地方立法也是一樣，甚麼自治條例多困難，陳議員大概還沒有立過一條自治條例(陳議員回答說有：立了 2 條)，要立自治條例，得要多數人同意，立完以後還得要中央核定，認定那個屬於地方的事務，舉例來講，我現在到苗栗，只要進苗栗出苗栗要收錢，這樣的自治條例就一定不會過。在苗栗的水也有從太空流去的，或是從新竹流過去的，所以你說要在苗栗攔人家的水來收錢，一定有困難嘛！其實地方立法那個功能極其有限，真正的所謂監督，大概就是這幾項：地方立法、預算控制、地方軟硬體建設、行政服務、官箴官場的持續地觀察跟監督。

丘老師剛剛提到的喝酒，這個喝酒不是用來交朋友的，喝酒反而是來害人的，來觀察這個人的，喝完酒會怎麼樣的？我看過比方說 65 個議員，跟 35 個官員，65 乘 35 喝得很愉快，喝到都翻了，喝完以後，我是議員，換我質詢的時候，你們 35 個局長好像都是我的好朋友，但是現在 50 分鐘是我的質詢時間，通通站好，不要談朋友情感，我還是要罵你，那時候局長才突然間發現說，那時候的酒都白

喝了，所以喝酒，大家以為那個喝酒大家都喜歡喝，其實我看應該沒有哪一個官員或議員喜歡那樣喝酒，基本上，是在互相探測。

剛剛丘老師提到說高雄人對於捷運很高興，台中人很鬱卒，其實一點也不，台中人他們自己很驕傲，包括今年年底要算立法委員的名額，台中多一個，高雄要少一個，所以台中市長現在邁向總統競選之路，又往前邁進了一步，那個丁仁方老師，回去要跟賴神提醒一下。

剛剛那個是現象的討論，所以我的第一個哲學性的思維，就是說就是盤根錯節的結構有不好嗎？為什麼會說不好呢？因為我們沒有在那個結構裡面，因為我們沒有在那個結構裡面獲得利益，當然就希望改變那個結構，打破或推翻那個結構，所以他能夠持續運作 50 年、60 年，我們都曾期待於年輕的選民、年輕的公民會協助我們推翻那個盤根錯節的結構。

經過將近一甲子，為什麼沒有推翻呢？原來選民也會社會化，他從 25 歲的時候，看不起那些盤根錯節的利益結構，到了 30 歲的時候他突然悟懂了，我不如還是來賣砂石比較好，然後一年只要爭取到任何的馬路，管他有沒有人，只要爭取到任何一條馬路建設，管他是藍的綠的議員幫我爭取到，反正市面上又多了鋼筋柏油砂石的需求，不是我交的貨也沒關係，因為只要友廠交了貨，市場上就出現了空缺，所以當然是好事啊！這就是我所謂盤根錯節的結構。

我也曾經遇過有人問我說，如果你來選的話，如果選上因為你是讀書人，你會不會當地方首長，我說我會，但是我只有一個要求，你不可以告訴我你只會賣砂石，所以這個國家永遠將成為用水泥森林方法做建設，當有更進步工法，有更進步材料的時候，你有辦法就去做進步的材料，我假設成為地方首長，為地方往前進步，我就會堅持用新的工法新的材料，新的環保概念來處理設計，那你要跟上，你不跟上，賺不了錢不要怪我，所以是看怎麼樣處理在社會化過程中的事。

第二個哲學性思考，問政就一定要用各種規規矩矩地，好像就是我們想像的議事規範方法去問政嗎？其實我剛剛講了那些故事以後，大家就會發現我曾經碰到過一個議員很有意思，他永遠把名牌掛在前面，自己做個塑膠套，自己把自己的名字掛著，坐到官員前面，說你好我是某某某，我有一個事有一個選民服務，或是有個想法想和你討論一下，這是我覺得最好的議員，不是每一個行政官員，都認得哪個議員長得甚麼樣子，可是就是有很多議員會去罵官員，他媽的連我議員都不認識，不尊重我等等，看到那個很好的，他永遠融入到行政權裡面，在行政機構裡面，他了解到狀況，了解資源在哪裡？他了解現在的動態，他也有辦法把他想要推動的進步，乃至於他選民的託付，透過這種互動，他就夠解決，不需要在議事場上罵官員，好像去表演才能獲得選民的支持，我看不見得。

所以剛剛陳光軒陳議員提的苗栗縣縣議會，他們不對外公開所有討論過程，我幾乎可以想像為什麼，因為在鄉下有太多不適合講話，長得不漂亮，滿嘴檳榔渣的議員，但他真正是好人，那你叫他公布在討論的時候的發言，他講起話來永

遠是粗魯的，他講話開口就是國罵，如果公布在那個畫面上出現，他是完全吃虧的，這種議員比例愈高的時候，議會自己的內部規則就愈不會對外開放。

如果都像陳光軒這種帥哥議員愈來愈多，它開放的機率就愈高，但是那都是在持續社會化過程，設法去把從量變到質變，我從來沒有因為剛剛大家講得那多困境，而心理上那個希望跟光就消滅掉的人，我一直認為我們就務實的踩著腳步，看著希望跟光努力地往前進步，走一步算一步才是前途，以上是我的報告，謝謝！

丘昌泰：

這是張副縣長的現身說法，所以他採取的策略是融入，但是又不喪失立場，就是你越不融入，越想要用一種跟當地格格不入的方法去改革，反而改不成，我想我們懂他意思，最後是不是我們請林議員。

會議現場

林亭君：

謝謝主持人，各位先進前輩，大家好，我是林亭君，我跟陳議員一樣，是這次當選的，我是 2014 年年底當議員，只有三年的時間，在各位前輩面前發言，真的好像有一點不自量力，在關公面前耍大刀，所以等一下有講得不對的地方，還要請各位前輩多多指教。

首先要跟大家抱歉，前兩天剛好台灣民俗節慶，就是農曆的鬼門開，所以我先去跑了普渡，所以遲到很抱歉，之所以會提到這個，是因為像剛剛陳議員講到的，我們年輕一代的議員，很想要跳脫傳統的方式，但是現實生活中，這是不可能的事，因為不論我們在議會問政如何？地方人士都不會在乎。對你這個人的評價，就是我辦的活動，你有沒有出現？你有沒有關心？你有沒有送水來？有沒有送我們禮物？你有沒有送我們摸彩品？這才是他們對你有沒有關心的評價，我也

沒有覺得這樣是好或是不好，畢竟我是依照這條路而當選的。

如果我們年輕一代,想要走出我們自己的路,必須要整個選民結構有所改變,像剛剛老師說的，雖然一個甲子過去了，但是我個人是沒有看到有何改變的，從我的伯父選了 25 年到現在，我們的模式都是差不多的，只是現在因為網路的興起，年輕人在社群網站，幾乎已經不再看電視了，大家看的都是網路，有很多消息很多流傳的資料，說實在有一些資料是否正確，我們也找不到作者，在監督市政府的時候，我們也小心翼翼。

最近大家比較關心的，像道路容積移轉，或者是同性婚姻的部分，不論是遭受到政黨的壓力，或者是選民的壓力，我們其實在開委員會的時候，或是在簽法案書的時候,我們常常無法真的按照我們自己的意思,因為現在網路的力量很大,我們只要一反對，網路新聞立刻就出來，有幾個議員贊成道路容積移轉，好像我們收了地主多少錢，或是建商多少錢，但是事實上，我們也有我們自己的理念，我們也是看過整個法案，了解全盤的利弊。

因為我有真正的瞭解過，所以我是認為開放是對的，可是公民團體他們透過網路的力量比較大，媒體的力量比較大，我們也沒有辦法為自己辯駁，我們要監督市政府的時候，事實上我們也有被人民監督壓力存在，為什麼要說這個，因為在同婚的事件上，國民黨受到很大的壓力，因為大家把同婚跟性平畫上了一個等號，好像我不支持性平交易，就是反對同性戀，事實上是完全兩回事，可是我們完全沒有平台，沒有媒體可以讓我們來做說明。

另一個部份，在議會常常在表決法案時候，因為我們議會是採黨團政治，通常民進黨要，國民黨就不要，我們一定是尊重黨團，如果不尊重黨團，馬上就會被開除黨籍，議員也不用做了，所以說我們是不是真的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監督市政府，我覺得是在我當議員這段時間，常常遇到的問題。

再來就是選民，因為我在當議員之前是當伯父的助理，我是跑地方型的，才會對地方的活動這麼的重視，畢竟我們是這樣選過來的，但是我們在爭取預算的時候，我是真的沒有每一本都拆開來看，我確實也都是翻我關心的，我們幫里辦公室爭取的，我們幫大樓爭取的部分。

但是現在因為選舉是非常非常激烈，從里長的選舉到議員，到立法委員的選舉，大家一定一條龍要配合，所以我們也會受牽制於里長，隔壁里的人行道鋪面更新，那我這個里也要更新，雖然我的路還好好的，可是他不會直接跟你講，他會說隔壁里已經更新了，為什麼他可以更新？我不能更新？那我們要不要幫他呢？我們選區有 8 個議員，你不幫他，他找別人，以後路變成新的時候，沒有你的份，我們是需要選票的人，那我們該怎麼辦呢？不論是政黨、選民或是基層，其實在很多時候，我們也是被牽制了，被控制的，這個部份我相信這種情形，只要還有里長的選舉，有議員立法委員的選舉，都不會改變的。

最後剛剛提到苗栗縣議會的審查會，好像不是那麼的公開，我自覺在台北市

的部分做得還不錯，我們的議程每天都會公布在網路上面，開委員會的時候，我們也是確實逐條審議，席間也會有記者席，你想要過來聽隨時都可以過來聽，所以這個部分，是台北市做得比較好的。

接下來我想要討論的是，現在大家都在推崇民主政治，但是我覺得一般的民眾，普遍不相信他們選出來的代議士，台灣人認為我們有民主，有民主選舉，是一件非常值得驕傲的事情，但是立法院又同時被選為是台灣第一亂源，那表示你一方面推崇民主政治，但是又同時不相信在民主制度下自己選出來的民意代表，我覺得這很弔詭，我們要思考的是，民主政治難道真的是最好的嗎？以上是我個人一點小小的心得跟大家分享，如果有不對的地方，還請各位先進前輩包涵指教，謝謝！

丘昌泰：

我們時間差不多了，還有 3 分鐘，然後我們就到樓上去做總結報告。剩下的三分鐘，我把大家的看法做一個總結，如何做友善的監督，大概要從這幾塊去做檢討。

第一個就是要改變偏差的傳統政治文化，包括利益工程的黑箱作業，再來是選民的文化，選民要爭取預算、要服務的文化，營私牟利的部分，不法民意代表，小型工程配合款，還有藍綠對立，顏色都會影響應該改變。

第二個我們要去做監督，最好是有憑有據的去做監督，公益導向的監督，就事論事的監督，這是第二點。

第三點社群媒體，還有青年的監督，選民的自覺，也扮演重要的角色，特別是有憑有據的討論，我們要拒絕亂扯的編故事的名嘴文化，剛剛紀老師提這一點，我覺得真的很重要，同時我也希望改變對民代的刻板印象。事實上我覺得我們現在有很多的年輕的議員，都很不錯，包括我們陳議員，我覺得你在苗栗還是堅持你的做法，老一輩總會過去，隨這個社會愈來愈進步，我們期待會改變，林亭君議員，我覺得還年輕，將來發展空間很大。

最後一個是我們當事人遊走議會，可以做得很好的我們張壯熙張教授，其實他提出了很多不同的思維，既然現狀環境沒有改變，那你乾脆就融入，可以出汙泥而不染，我可以跟你混在一起，可是我沒有違法，我沒有踩到紅線，所以他提到的幾個策略，我覺得很好，跟政府官員不但不能夠把它看成是敵人，要把它當作是朋友，這樣對抓住他的預算要提意見，更可能被接受，特別是這些地方性的活動，議員去參加去配合，其實就是為你累積很多的人脈，所以這些不同的做法，和不同的思考，我相信在座的議員身經百戰，我們總是希望台灣的社會，能夠繼續往正面發展。

很高興今天參加的都是很年輕的議員，我們台灣的未來就靠你們了，我們非常謝謝幾位議員，更謝謝幾位與會，我們這一場就在這裡結束。

台灣縣市議會友善監督的策略作法建議

國立成功大學政治學系 丁仁方教授

本場次主題為「友善地監督」，主辦單位特別要求運用「開放空間技術」進行討論，以彙整具有共識的策略作法。以下我分成三部份提出我個人的觀點，首先是「開放空間技術」的操作與應用；其次，是台灣縣市議會運用「開放空間技術」的實踐可能性；最後，提出個人認為推動「友善地監督」的策略作法建議。

一、「開放空間技術」的操作與運用

「開放空間技術」的操作，是要以輕鬆、活潑、平等、自由的方式，創造出一個可以充分激發出參與者智慧與經驗的討論平台，並藉此找到有效解決問題的最佳方案。表現出輕鬆的討論方式之一，大概就是類似有如休息時間，準備咖啡、茶、和點心，讓參與者放可以鬆心情充分討論；活潑的方式如使用大量空白牆面或白板及隨手貼，讓大家可以把隨意的想法公開貼在牆壁或白板上；平等的方式表現在圓桌會議的型式，沒有誰的地位比較特殊；自由的方式最能表現在開放空間技術提出的四大規則：(1) 出席的人都是最適當的人，(2) 不管何時開始都是最適當的時間，(3) 不管發生什麼都是當時只能發生的事，(4) 結束的時候就結束了。

開放空間技術的運用比較適合學習性組織，而且組織中沒有太大利益與價值的衝突，實踐過程可能還需要經過不同階段性的醞釀，甚至可能經過雙環學習，才可能達到更好的運用效果。政治性組織如議會、政黨者，通常都有相當的利益與價值的衝突，勉強以上述開放空間技術的操作方式進行會議討論，如果沒有限定在利益與價值衝突較低的議題上，效果恐怕未必非常明顯。

二、 台灣縣市議會運用「開放空間技術」的實踐可能性

過去許多的學術研究都發現，台灣縣市議會政黨對立情況原本並不特別明顯，反而是互惠政治與利益共享等規範影響府會關係及議事運作。縣市首長因為掌握大量行政資源，可以相當程度在議會形成支持聯盟，其成員除了同黨籍的議員之外，也會包括一些無黨籍的議員，反對聯盟則從批判過程維繫其政治利益。近幾年，民進黨在許多縣市議會席次增加不少，加上一些政治議題的推波助瀾，國、民兩黨間的衝突加大，因此除了利益衝突，在縣市議會政治理念的衝突也逐漸轉強。以筆者所工作的台南市為例，近年因為一些政治議題，市議會國、民兩黨議員經常出現嚴重的對立，不但公開場合相互爭吵不休，甚至在私下跑攤場合，彼此碰到連招呼也不打，更不溝通交流，在這樣嚴重對立的氛圍之下，如何以開放空間技術提出解決問題的最佳方案？

我們可以美國學者Paul Sabatier所提出的「倡議聯盟架構」(Advocacy Coalition Framework, ACF)的角度，來思考議會中出現對立的利益或理念聯盟時，

如何產生政策學習？根據Sabatier及Jenkins-Smith等人的看法，不同的政策倡議聯盟構成政策次級系統，各自有核心的信念及利益，但可依照相對重要性分成深層、中間、及邊緣不同層次。如果政策論辯過程涉及到彼此核心信念或利益時，這時很難產生修正個別論證的政策學習，反而都是「先射箭再畫箭靶」，所有論辯只是為合理化己方的信念或利益而已。如果政策論辯涉及到邊緣信念或利益時，這時也不容易產生政策學習，因為不重要，所以彼此漠不關心討論過程。因此，最有可能發生跨越次級系統的政策學習是跟中間層次的信念或利益相關的議題討論。Sabatier等也提出，設置一個專業規範導向的forum，更有助於產生跨越政策次級系統的政策學習。

三、 推動「友善地監督」的策略作法

根據以上的分析，個人認為以開放空間技術推動「友善監督」，應該要有以下幾個策略作法：

首先，經過公民團體的不斷倡議，型塑對提升議會議事效率期待的社會氛圍。特別是在地方層級，一定要形成更多的社會輿論壓力，才可能迫使縣市議會提出更積極解決問題的方案。

其次，縣市議會不同政黨間建立解決問題的共識。可以先從前述不涉及核心信念及利益的議題開始，避免彼此始終在涉及雙方核心信念及利益的議題上糾纏不清。

第三，在中間層次的議題討論，建立專業規範導向的論壇，並且納入更多的專業人士參與，以有助於相互學習。

第四，以輕鬆、活潑、平等、自由的開放空間討論形式，提出更有建設性的解決問題方案。

(B1:友善地監督)

跨域治理途徑建構解析：

何謂跨域、如何跨域、為何跨域、及跨域養成

國立中山大學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汪明生教授 2017.08.16

一、何謂跨域

（一）知識專業領域

（二）觀察關切範疇

（三）社會發展階段

二、如何跨域：方法分析

（一）投入產出

（二）個體群體（公民治理）

（三）情境條件（發展階段）

三、為何跨域：問題分析

（一）問題情勢：經濟、社會、政治、政府

（二）問題界定：事實、價值、人際

（三）發展階段：傳統、現代、後現代

四、跨域養成：

（一）現代理性知識科技

（二）後現代感性價值人文

（三）中華傳統文化儒釋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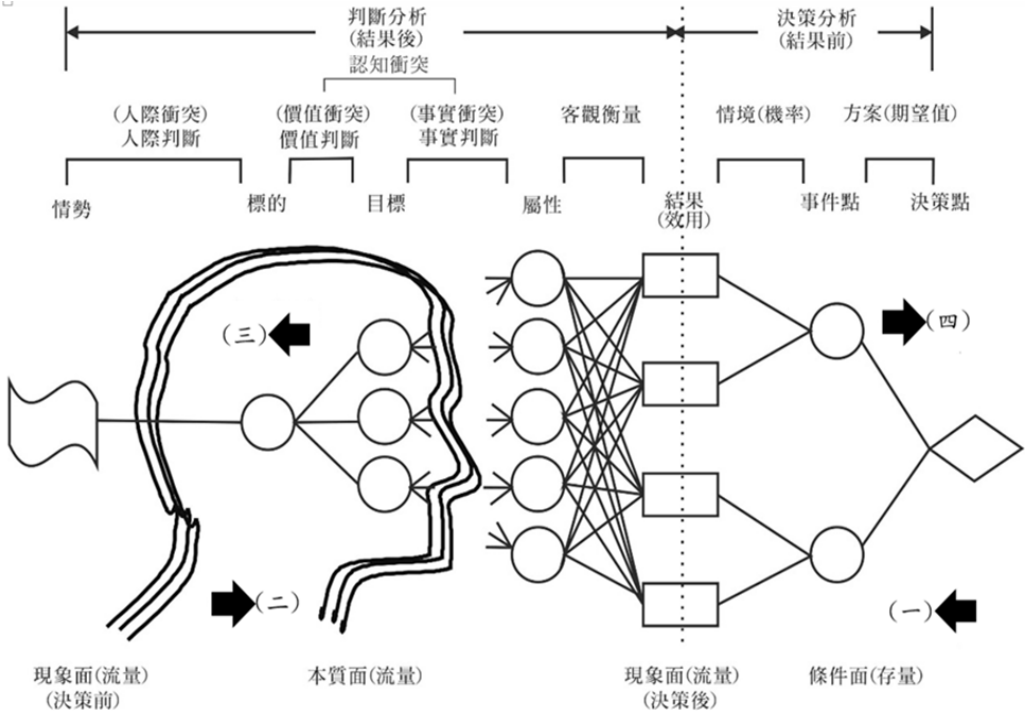
表一、個體角色與發展階段於治理結構中之對應

發展階段	治理結構、個體角色
後現代(治理)	多方當事人 → 公共管理者 → 複合領域專家
現代(管理)	公共管理者 → 多方當事人 → 複合領域專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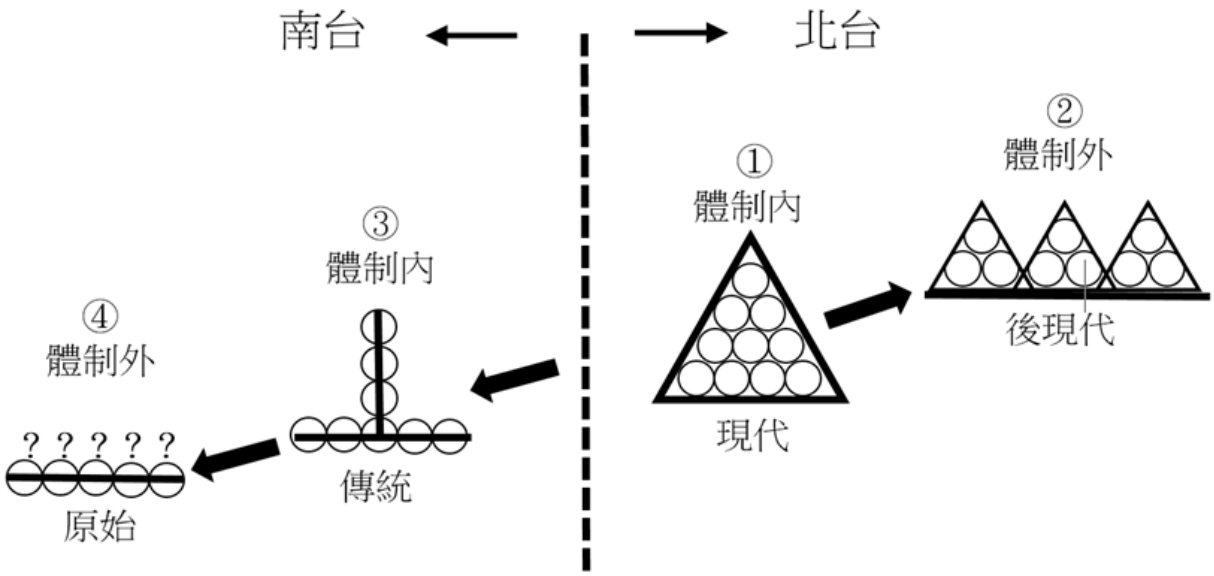
傳統(統治)	公共管理者 → 複合領域專家 → 多方當事人

資料來源：汪明生等，都市與計劃，44，2，P159

社會條件與發展階段



圖一、跨域治理應用研究架構（汪明生等，2012；汪明生，2013）



圖二、三十年來臺灣發展所形成之四種社會結構

資料來源：汪明生等，都市與計劃，44，2，P160

五、社會組成結構

檢視二、三十年來的臺灣發展已概略形成自北而南，及體制內與體制外的四種社會結構（參圖）；臺灣北部所觀察與關注的多是檯面上問題的表象，臺灣南部所感受與解讀的則實為檯面下問題的真相。若以上述社會條件下的社會發展態樣觀察，一般自然形成、正常發展的社會往往呈現常態分配的鐘型結構（圖中①），1970 年代的美國、1990 年代的臺灣、2010 年代的大陸大致如此。此等結構就群體而言既較穩定、亦能發展，而就其中個體成員而言，對於位居中層乃至上層者亦無問題，然需重視關注者乃係其中位於下層或基層、占比多數的個體。除非機會公平、階層流動，或至少雖不滿意尚可接受，否則這些基層個體往往成為社會變動不穩的根源（汪明生，2015）。臺灣二、三十年來對外（兩岸）閉關自守、對內個體意識高漲下所形成的三中一青[1]即係肇因於此（圖中自①而③而④）。

[1] 「三中一青」係泛指中小企業、中南部、中低收入及青年，爰引自 2012 年中華民國經濟部與青輔會合作的發展政策「三中一青希望工程」，近來亦被中共列為對台政策的核心重點。

圖五說明自 1990 年代迄今，二、三十年來臺灣發展所形成之四種社會結構。虛線右邊乃係濁水溪以北的北台，體制內（如中央、地方政府）為三角形之現代菁英社會（圖五中的①，如美、日）、體制外（如民間社團、企業）則有部分具有較體制內更為先進開放的後現代複合中心面貌（圖 5 中的②，如西歐、北歐），如主張反核、廢死、多元成家等各公民團體。經北台之強勢引領、資源主導、與媒體傳播，此等先進開放的價值意識自然影響全台，尤其是對北台以外缺乏自我在地深刻認識與獨立思考判斷能力的乏識階層如中南部與青年世代（即三中一青）。虛線左邊則係濁水溪以南的南台，由於原本產業即係初級與次級、人口則以農工階層為主，基本欠缺穩定成熟理性民主所需的多數白領中產社會結構。對於二、三十年來南臺灣城市的轉型發展，原本規劃之國建六年計劃、亞太營運中心等旗艦擘劃無一落實，加以戒急用忍、一邊一國等政策使然，致多年來城市發展轉型不成、產業出而不進、人口失血竭腦，社會結構已呈中產白領大幅流失萎縮後的倒丁字形（圖五中的③，幾如拉美），另除自力更生的私部門外，其他體制外者之經濟所得、知識觀念則多呈共慘均貧的原始社會（汪明生，2015），圖五中的④，外觀雖與②近似，然其個體本質檢視則大大不同，②係已然經由①之充實具備或謂現代階段已經達至的後現代階段，④則截然不同而不自知。

B2 場次：建設性衝突

主持人：

江明修　國立政治大學社會科學學院院長

與談人 ：

王宏文　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沈建文　國立中央大學尤努斯社會企業中心主任

陳敦源　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系教授

劉兆隆　彰化師範大學公共事務與公民教育系副教授

厲耿桂芳　台北市議員

蔡金晏　高雄市議員

江明修教授

江明修：

我們這一場的題目是建設性衝突，特別強調一下，今天到場來作與談的專家學者，都是在學界或是學會相當具有盛名的人，處理完衝突以後要有建設性的成果，有時候我們不是為了衝突而衝突，而是為了更高建設目標，這是我們這個場次的中心。

我們很高興請到幾位貴賓，我先特別一一的介紹一下，第一位是王宏文王教授，第二位是劉兆隆劉教授，第三位是陳敦源陳教授，第四位是沈建文沈教授，在這邊我想女士優先，我們先介紹厲耿桂芳議員，厲耿議員師是非常資深優秀跟

專業的議員，再來就是從高雄來的相當優秀的新秀蔡金晏蔡博士。我們就節省時間請宏文這邊開始。

王宏文：

主持人江院長，各位來賓，大家好！今天的題目是建設性衝突，事實上衝突無所不在，從我的老婆和我的小孩，還有父母還有學校到社會，真的是無所不在，傳統上，我們認為衝突之所以會產生，是因為資源或目標不同，所以有人受損害導致利害關係衝突，但是這樣子的定義，是不太好的。

根據 Morgenthau 的定義，他的定義是，衝突是不相容的行為，也就是說甲的行為阻擾干預傷害某乙的行為或利益，這樣的定義會是說，雖然他們甲乙有不同的動機，但是他們利益有部分可能是競爭性的，這部分就會導致衝突，但有部分是合作性的，這部分就可以有達成協議的誘因。

怎麼樣讓衝突更具建設性？以學術上來講如何解決衝突，要看利害關係人是如何看待他自己的利益目標和其他人相關人目標的關係，這個是最重要的，比方說，他要是把利害關係人的目標是正相關的，那這種通常叫做合作型的目標，或合作型的衝突，也就是說，A 達成會使得 B 更接近目標，這樣的情形會比較促成建設性衝突。

另外說彼此之間目標是負相關的，那就是競爭性的衝突，那就有可能變成零和遊戲。通常都會有一種不同的形式利害關係人，如何去看待自己的目標跟其他人的目標，這個關係其實會影響他後續的溝通，或是問題解決方法。我們當然會希望它是一個合作型的目標，怎麼樣促成合作型的目標，合作型的目標才有可能是建設性的衝突，簡單一句話，就是求同存異，也就是說可能要先型塑目標跟願景，分享資源跟資訊，在討論爭議的時候，可能要傾聽和肯定和考慮其他人的感受，然後最後的結果，也要能夠互相得到一份公平的報酬。跟今天論壇比較有關的是，地方民代作為調解第三方，他可以促進建設性衝突，我想這個比較實際一點。

我覺得有幾個步驟是我可以建議的地方，第一個，就是確認利害關係人，然後選擇對話的對象。這個選擇，簡單講就是要確立利害關係人的範圍和他的界線，因為如果太少人，你可能會失掉一些有價值的觀點，如果太多人，又可能不太能容易溝通。

選擇之後，第二步就是跟利害關係人建立關係，結束他們之間的惡意，冷卻負面情緒，改善氣氛。建立關係其實蠻重要的，可能是存貨也可能是新創造出來的，簡單講就是要能夠彼此信任，可以溝通。

然後第三步就是確定相關人都願意接受中介的調停，這個是蠻重要的，大家份量要夠，像院長或是議員，他們比較能夠接受，當然也是相關利害關係人可以接受的一個人。

再來第四點就是針對議題，來釐清不同人的觀點，必須要有專業的人來進行分析，有時候他們可能都有不同的訴求，不同的感受，一定要足夠的專業的人士，才能知道他們講的是甚麼東西，然後才能進行利害的相關分析。

最後則是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要建立團體討論的程序和形式，比如說我們先了解狀況以後，要坐下來談之前，對於如何談這個程序和形式，一定要大家都可以接受，完了之後，我們才可以進到實質的討論，如果這個程序和形式大家無法接受，就會發生困難，其他像場地時間等等，都需要一些配合，用專業來整合意見。

如果說議員或地方民代缺乏這些專業的話，可以請教相關的專家學者，然後這樣就可以達成協議，剛剛講到幾個步驟可以提供大家參考。

最後有一點，就是面對死硬派，因為衝突通常都會有一些死硬派，當面對死硬派時，我有幾點意見可以提供。第一還是要提供共同的願景和目標，我們要求同存異。第二個還是要他們的挫折和憤怒有一個出口，比如說，這個反年金的人士，還是要給他們一個出口，就像安全閥一樣，就是要慢慢降低他們的挫折感和憤怒，假如他們有出口以後，慢慢就可以降下來。

第三個就是要慢慢的降低他們的挫折和憤怒，假如他們有出口以後，慢慢就會降下來，不然也是要協助他們，並發展合作的意願跟能力，有的時候他們是很生氣，但是不知道怎麼樣來合作解決問題，雖然明明是衝突的，但是我們還是要去協助他們發展意願跟能力，不然最好還是要有一些合作性的討論，比如說公開討論他們不同的意見，而不是很不爽或是謾罵等等，甚至肯定對方感受跟意見，這種都會是一種好的討論方式，否則就會走到另外一邊去。最後一個就是要給他們一個下台階，維護他們的自尊和形象，這個好像在那個王家都更的案子中是顯得很重要，對於死硬派，還是要給他們一個下台階，維護他們的自尊和形象，讓他們在不需要抗爭情況下還坐下來解決問題，以上謝謝！(王宏文教授的補充教材，附在本文後面)

江明修：

我想宏文的發言非常有價值，是很好並突出的引言，我們就依序就請發言。

劉兆隆：

我敬愛景仰的江老師，沈老師，陳老師還有兩位的議員，以下是我的發言。所謂建設性衝突，我舉一些實際個案來說明，我在彰化服務，因為我自己做一些地方治理研究，就發現一件事情，其實很多議會裡面的衝突，有些衝突必須要看

它的目的是甚麼？它的目的有的時候是為更高目標達成，他不是說為了衝突而衝突，這是第一個問題。

王宏文教授(左)，劉兆隆教授(左 2)

第二個問題是在衝突當中，決定的是議題的對決，還是在利益的分配。所謂議題的對決是甚麼意思？就是說像剛剛宏文兄講的，我們可能是個零和遊戲，不是你死就是我活，這就是議題的對決。還有可能議題的目的是利益的分配，分配只要搞定的話，就是一個建設性的衝突，衝突的目的到最後就是為了利益的分配，當然到最後合作方案會是甚麼，這個就很有意思了，在衝突的過程當中，這個程序過程當中，是不是控制得不會失控？

我先舉幾個個案給各位聽，因為我自己在彰化服務，在彰化縣議會的府會關係是一個很有趣的個案，我們前縣長卓伯源縣長，跟現在的議長謝典霖，他們兩個政治人物有數不清的政治恩怨，可是很有趣的是，在卓伯源任內，他的預算被砍的比率，不管他們吵架吵得再兇，甚至拍桌子，最後預算被砍的比率不會超過百分之三。

可是現任的縣長魏明谷，他自己當過縣議員，當過立委，所以他自己的議事經驗，跟政治經驗不可謂不豐富，可是去年的社福預算被砍的幅度將近百分之二十三，然後你可以看到謝典霖跑到法院去按鈴控告縣長夫人，雙方吵得不可開交，為什麼會這樣子？我後來就發現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就是說為什麼他們雙方衝突會這麼激烈？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個案。

謝典霖家族他們經營有線電視，卓伯源任內和胡自強有一個相同的政策，就是調降有線電視的收費，光這個調降就會影響到謝家一個月幾億元的收入，可是在議事上面，他卻不會產生捉對廝殺的局面，我後來就思考這個問題，為什麼會

這樣子？從卓縣長的政策讓他們的樑子結得那麼深，可是現任的縣長，並沒有和謝家有那麼深的恩怨，可是社福預算卻被砍得亂七八糟，究竟為什麼？這實在太有趣了，這是第一個，我們要去思考這個問題，究竟是誰在控制這個程序？一般來說在建設性衝突當中，議長的角色是很重要的，為麼呢？因為議長他如果往往是著眼於私人恩怨，去處理這些問題的時候，那雙方就會陷入剛剛講的零和遊戲，如果議長他私人角色不是卡在私人恩怨，他是從議會的角度來處理這個問題的時候，就比較不會出現捉對廝殺的結果。

我舉個很有趣的個案，我們學校有一次向彰化縣政府爭取一項重大建設配合，教育部叫做國際學舍的案子，教育部說沒有錢，結果卓縣長就說沒有關係，十億元縣府願意支持，可是議會要過，最後就卡在議會一直過不了，當時彰化縣市財源非常緊的，結果縣政府還一口氣給彰師大十億，蓋一棟國際學舍，縣議會的角度非常簡單，就是他認為這樣會排擠到其他的預算，議會問縣府的論述是甚麼？縣長問我，我就問縣長這個工程是誰負責處理的？這個利益分配究竟是議會？還是縣政府？縣長回答是縣政府，我就告訴縣長這個案子絕對不會過，因為只要跟議員講，這個案子我們絕對不會有好處，就不會過，果然最後這個案子沒有成功，結果誰都沒有拿到好處，包括學校在內，所以誰在控制議程角色是很重要的。在這個個案中，我們學校也很努力地去爭取這個案子，還邀請立法院長王金平下來去協調這個案子，王金平和鄭汝芬立委交情也很好，也衝他面子通過兩千萬的先期規劃費，然後我們校長很高興認為應該有眉目了，可是我認為這只是院長的身價，不會有任何眉目，後來規畫完之後，果然沒有任何下文。

我要告訴各位就是說，在這個過程當中，你整個程序是怎麼走的，這是第一個，你是議題的捉對廝殺，還是利益的分配，有利益的分配，這個建設性衝突我們可以繼續下去，有分配才有談的空間，才有剛剛宏文兄所講的合作才能出現。

如果只是議題的捉對廝殺，那就變成了零和賽局，這是第一個。第二個，誰在控制全局？當然是議長，那議長的角色是甚麼？如果議長的角色在這整個建設性衝突裏面，是著重於利益分配，著重於雙方關係的建構，或是看議長的高度和角色，而不是以個人恩怨去處理這個問題的時候，因為我相信一件事，就是謝典霖跟卓縣長的恩怨，絕對比魏縣長更多，可是看到預算上卻是相反的結果，我們就會發現它們可能有其他的因素，所以這裡面就會決定一個事情，我們是去製造衝突？還是解決衝突？製造一波新的衝突？還是去解決新的衝突？當然在建設性衝突裡面，還有一個角色非常重要，就是縣長的角色也很重要，因為這個縣長就決定了這個子彈在哪裡？

我再舉一個例子，有一次彰化縣放出一個新聞，就是縣議員的出國參訪，出現所謂「夭壽好」內容的報告，然後議長就出來開記者會道歉，表示以後一定會善盡參訪的職責等等，當你削完議長的面子以後，他們回敬你的當然是今年的預

算就再見了，然後就再抓個小辮子去法院控告議長夫人毀謗，雙方就走向對決僵局的狀況。

所以在所謂建設性衝突裡面，我就以彰化縣的幾個新聞事件的個案來看，就可以發現到幾個重點，首先就是誰在控制這個程序？在議會當然是議長，府會關係要看議長和縣長，他們用甚麼樣的高度，來決定這個程序跟位置。

第二個雙方在一開始的時候，他們目的是為了解決問題？還是在議題上對決？例如說如果是在議題上對決，以我們學校那個個案，從頭到尾，議長沒想讓他過，可能縣長也沒有想讓它過，唯一開心的只有我們學校，最後還是空歡喜一場，它究竟是要議題對決？還是要利益分配？如果是當初縣長是要利益分配，我相信他談的方式不是這個，那就會是一個建設性的衝突。最後，其實在地方政治發展的過程當中，我們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說如果是我們是可以處於一個建設性衝突狀況下，其實衝突並不可怕，衝突有的時候是為了達到一個更高更好的目標，如果是議題對決，衝突就會遍地血腥，一事無成，以上是我個人的淺見，謝謝！

江明修：

我們繼續請陳敦源陳老師。

陳敦源：

王宏文教授(左)，陳敦源教授(右 2)，沈建文教授(右)

主席，現場的先進，論壇打電話來的時候，知道被安排在建設性衝突這個題目上，我有一點毛躁，我後來也答應參加這個討論，因為自己畢竟已經好多年沒有碰這個議會的研究。剛剛兩位其實已經分享蠻多的，我剛開始回台灣的時候，

其實我是想做議會研究的，後來發現全部是女生在做的，好像沒有我們的空間，所以後來就做別的了。

我想多談一點制度面的東西，這樣會讓我們更清楚知道，在一個民主國家，議會存在的根本目的。我每次看到衝突，都在想那個衝突背後造成他的原因是甚麼？這個原因其實很簡單，就是自由，民主政治不會只有一個單一的價值在支配我們社會，所以每一個人都可以有他的價值。

在行政上或是在實務上，要去推動一個政策的時候，它一定要有一個方向。要有一個方向做事情和容許大家意見很分歧這件事情，好像必須跟民主政治並存，當要並存的時候，事實上就是所謂自由的弔詭。我們要怎麼樣去處理這個事？我們通常處理這個事最好的方法，大概就是多數決的選舉，可是多數決，大家都很清楚，我只要超過百分之五十，我就贏了，這種勝者全拿，百分之四十九的人就會很不爽，他一定會想辦法來搞你，我想這個就是常態。

所以我們還要有一套制度，可以 cover 所有人的想法，但是這個想法的 cover 過程，就是盡量找出一條路大家來解決。我這邊就要談文林院這個 case，文林院這個 case 非常有趣，如果你真的用多數決來看，他是 36 戶等待 1 戶，他根本不是多數決，從這個就可以看到自由在民主社會是被保障到這種程度的。36 個人要等 1 個人，我們都去保障，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常常發生衝突，也不是甚麼令人驚訝的事，這是民主社會的常態，問題是我們要怎麼樣去處理？比如說後來文林院偷偷解決了，這個居住正義表面上是維持住了。

可是事實上，我常跟同學分析這個個案，我開玩笑講，我認為那個王家他只有兩個角色可以扮演，一種角色是死忠的土地正義保衛者，即使犧牲生命也願意，另外一種角色可能就跟你想像不一樣了，就是那種 holdout price sticker，你知道他有一塊畸零地，也許只是小小的一塊，不到 20 萬，但是他可以喊到 200 萬，究竟他是那一種?

後來新聞出來，發現王家分裂了，他有兩個角色要扮演，一個是聖戰士，一個是妥協(compromise)。有個諾貝爾經濟學者講的，長期來講人類社會很少發生打到一兵一卒(total war)，即使有，也是假的，到後來他還是會妥協的。所以我們站在這樣一個情況來講的話，民主政治的運作這是有可能發生的-人到最後，如果大家都各拿一點東西就 OK 的話，就不會再搞下去了，這是有可能的，不過這需要一些時間，還有一些制度。所以政治學上的 social privilege 一定會切到議會來的，議會裡面基本上是人類在運作民主政治的時候，會用一些制度來軟化(soft)這種自由吊詭的問題。

我下面就講三個制度，在台灣也有，在其他地方也有。第一個就是委員會的設計。很多的理論都告訴我們，如果今天沒有委員會，沒有分開一個一個 issue 來談的話，都混在一起的時候，那根本不可能有妥協，所以委員會制度的設計，

它本來就是在做建設性衝突的解決。如果國防的和內政的都混在一起，沒有一個層面(dimension)，那就不容易找到中間投票人(median voter)。所以為什麼我們在這邊只談國防不談教育，就是我們要試圖找出和國防有關的事情，先在這一方面取得妥協，把其它的事情先挪開不談。

第二個就是一些協商的機制和角色，這就我比較有興趣了，因為我從政治到公共行政研究，我就開始在想一些問題，後來我就發現每一個政府裡面，都有府會聯絡人，這個就很有趣，他在幹甚麼？他是公務員，但是他每天都不在辦公室裡面，他都在議會的一個辦公室，坐在那裏看大家在幹嘛，然後你叫他他就來。我曾經整個暑假，我就窩在議會 7 樓那個長沙發，在觀察，在訪談，發現一些非常有趣的東西，這些人就是在中間跑來跑去，把很多問題都處理了。

我那個時候在做訪問，大概 10 多年前，那時候正好碰到一個議題叫做擄妓勒贖，我不知道大家是否知道？就是警察風紀的問題，警察查到中國大陸來的妓女，然後兩邊要錢，這個事情剛出來的時候，警察局有 3 個府會聯絡人，有一個主任，還有兩個人，他們好像有一個蠻大的辦公室，他們就蠻緊張的在處理這個問題，後來好像處理得不是很好，他們主任就被換掉了，在換的過程，新的主任逐一拜訪議員的辦公室，我覺得這些都很有趣，我覺這些制度，都是在處理這些衝突。

府會聯絡人我做了大概 30 幾位的訪談，他們跟我講了一些東西，我覺得蠻有趣的，他們跟我講，你不要惹火議員，議員雖有的票多，有的票少，但是他們都總還是一席，資訊要給的時候就要給得很小心。

還有些狀況，就是他們在質詢前，就會先來了解質詢內容，他們那個關係在平常行禮如儀是 ok 的，但是正好那個擄妓的事件發生了，那個府會連絡人還想來要質詢題目，那小助理跟府會連絡人正要談事情的時候，大助理跑來說，這麼大的事情不要講，進來！所以在重大事情發生的時候，就要照規矩來。

我當時也看到說，我們其實是有一些機制在處理這些衝突，尤其是我們憲政體制上，本來就是要你們有所衝突的，但是經過你這個府會連絡人以後，關係變得那麼好，整個憲政體制都要被搞壞了，所以也不行，但是也不能衝突到行政立法用所有的資源和方法在對幹，所以中間有一些潤滑劑。所以我那時候寫了一篇論文，就是說行政立法之間，那個信任的肌腱，事實上是這個府會連絡人。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價值，這個府會連絡人他有專業，像很多的時候那個官僚體系裏面，是充滿了隱藏的知識，議員雖然在做質詢，但是有很多細節，他搞不清楚，他必須藉由行政部門提供資訊，他才能了解，這些資訊要怎麼樣去要？這個就是有一個專屬的機制在做。

最後我要分享一點，就是這個府會連絡人，他是一個組織，所有的人都是兼任的，但是這個臨時組織的預算，從來沒有被議會砍過，而且都照章通過，所以

你就知道議會有多需要這個體制去接近這個行政部門，我覺得這樣一個相互的架構非常有趣，我們知道有衝突，我們也同時建立一些制度，來協助處理這些衝突。

最後一個我要講，我們在協商的過程中，有很多時候每一個議員他有兩個面，一個面是公開的，一個是私底下的面，所以整個流程有沒有全部公開這件事情，也是一個制度的選擇。你知道最近立法院把所有委員會的討論過程都上網，點就可以看到，這個對民主政治當然是好事，可是我也不認為所有的事情都應該這樣子公開，比如說兩岸關係監督條例，當要審的時候，我覺得有一部份最好還是關起門來審，因為他那個意識形態的鬥爭太激烈，有一些東西在鏡頭面前是無法妥協的，所以有些事情就是要搬到幕後去做的。

就像德國首相俾斯麥說的，法律就像香腸(sausage)大家都喜歡吃，可是你最好不要看它怎麼做。曾讀過一篇論文說，協商的過程如果有第三者利害關係人在旁邊看跟沒有在旁邊看，出來結果是很不一樣，這就是民主政治代議的概念，裡面就包含資訊分享制度的選擇，像兩岸關係條例，關起門很快就可以出來一個結果，如果所有的都公開在那裡談的話，那一定完蛋。

本來社會上那個 privilege 價值就很深，真正要弄出一個比較務實的(practical)就比較難，這個就是第三點的制度面要和大家分享。我們人類知道要走這個民主制度不容易，我們有很多事情要妥協，但也都很努力的在建構一些制度來處理這些事情，以上和大家來分享，謝謝！

江明修:

我們應該門禁森嚴一點，不要叫教授亂講，我們接下來請建文，他的研究也做得很好。

沈建文：

主持人，各位先進，大家好！我的觀點可能比較不一樣，我是從管理學院出來的，不過我之前大學是數學系，後來到美國念書是工學院，現在在企管系，在社會企業中心，其實我自己本身就有很多角色的衝突，因為我們在學數學的方法，是很理性的，在工學院就是一套嚴謹的工程，尤其我又是學工業工程的，所以我必須要去遵守程序(follow procedure)，在管理工廠的時候，只要遵守規章(follow protocol)，但一碰到人的問題就會碰到很多的問題。

我們在講建設性衝突的時候，從管理的角度來看，我們把建設性衝突當作是創新的一環，所謂的創新，尤其在公司治理來講，公司有不同的部門，有財務，有生管，有製造，有行銷等等，雖然有不同的角度，但是大家在為公司想，如何為公司賺更多的錢？對公司未來的策略發展，對公司未來的定位發展，都會有不同的一些看法。

我在 8 月的時候，看到一本新書，是密西根大學商學院 Jeff DeGraff 教授出的書，書名叫創新的規範(innovation code)，副標題叫建設性衝突(constructive conflict)，他認為創新最核心的價值，事實上就來自於建設性的衝突，這個非常的好，剛好符合今天的這個主題，他研究幾個美國的大公司，發現其實最好的創意的團隊裡面，要來自不同的人，他把它做一個分類，他認為應該有來自四大類型的人。

第一個類型，叫做藝術型的人，他希望有天馬行空的藝術家性格人。第二叫工程師，也就是我們需要懂技術的人才。第三類型叫做運動家型，他可能要去衝鋒陷陣，做業務推廣的事。第四個是叫做智者，這個智者就是要當衝突發生的時候，他要怎麼樣能讓藝術家型，工程師、運動家型背景的人能夠有達到共識，這就是智者扮演的角色。

其實這個部分來講，我自己在很多設計思考產品創新的時候，其實我們也很希望我們參與設計思考的 Team 裡面的人，能夠來自不同領域的人，我們不會把工學領域的都放在一起，因為這樣一定不會有任何的創新，我們在做設計思考時大家有不同的想法，不同的領域，從衝突中再慢慢的把一些想法想出來，因為沒有衝突，一定不會有創新。

我們自己在做產品開發的時候，我帶過很多所謂的工作坊，我們會發現其實不同的 Team，就有不同的想法，不同的 solution，大家一定會堅持他的東西是最好的，藝術型的人說我做的東西就是要美，工程師就會說我做的東西就是要實用，運動家型的說做的東西要符合消費者的需要。這個時候需要一個頭，把不同面向的人，把它們整合在一起。當然，在公司裏面，建設性衝突的部分，如果有好的制度文化，也就是公司獎勵產品創新，也有跨部會的實驗室，這個實驗室可以來自不同的部門，大家針對未來的產品跟服務，提供一些創新的思考，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公司可以提供各式各樣的獎勵機制，這樣就是剛剛我提的書裡面，他認為是很多公司能夠持續創新的動力。

政治這一塊，其實不是我的專長，我覺得會比較困難一點，因為如果是公司的話，至少大家在一個公司中，會認為是為公司賺錢，但是國家的話，當然也可以說是為國家做事，但是目前在民主制度下，會政權轉移，在政權轉移的過程中，會有不同的黨派，就會有不同的利益，不同的利害關係，剛才我們講創新的方式，放在公司管理比較有機會，幫公司設計出具創新的產品，但是把建設性衝突，擺到國家裡面去做這個事，就比較困難，要怎麼去做呢？

我覺得一個所謂跨部會的創新的實驗室很重要，這個跨部會的創新實驗室，也可設計仿效在公司裡面運作一樣，把各個領域的專家找來，然後把國家目前遭遇到的問題，擺到這個實驗室來做創意式的思考，這樣的情況下，跨部會的實驗室，大家透過建設性衝突的方式，可以思考去找到解決的方案，這些解決方案，就可能可以用在未來的施政，我們現在是在國發會，發包給老師做一些研究，像

國家未來發展要怎麼作等議題。可是這些研究，都還是侷限在一個固定的思維之下，可是我們國家現在碰到很多問題，好像我們都是在跟隨而不是在創新，怎麼把創新的元素帶到國家建設發展領域，我覺得這裡面，大家可去思考的，這是我從管理學的角度，提供我個人的淺見。

江明修：

謝謝提供了一個不一樣的觀點，剛剛大家講的理論，都非常的好，提出的案例也非常的多，接下來我們就先尊重比較資深的議員來發言。

厲耿桂芳：

我想今天的主題，寫的是建設性衝突，既然是衝突，剛剛有講不是為了衝突而衝突，可是有的衝突，他就是為了衝突他才要去衝突，還有，就算是議會也好，立法院也好，其實都是一個衝突實驗的場域，因為你要做很多的選擇，當你在做選擇的時候，到底是 A 方案好，還是 B 方案較好，你個人也有衝突，那個衝突是一個建設性的，但是我現在想要講的是，剛剛聽各位專家學者講的這些很不一樣，因為我覺得你們講話非常專業，學術味很濃，主要你們有很敏銳的觀察力，把你的觀察，然後訴諸語言。

但是我們在議會這種場合，跟老百姓接地氣接觸的，都是第一層的，那個衝突都是活生生的，沒有甚麼裝飾，他們如果不高興，出口就是罵人，我當議員這麼久，經歷過無數的衝突。

我舉幾個例子，第一個衝突，那是永遠無解，那是政治立場的衝突，在我們這個國家，在現階段好像是無解，不管專家學者怎麼樣開藥單都很難。以前我們在台北市議會，就有發生過議員將國家領袖的相片，硬是將它拆下來的事件，那

就是政治立場的衝突，那場衝突造成很多議員受傷，有人腿也斷了，被送到仁愛醫院，這種衝突場面，我們也看過。

我再舉另一個例子，當初馬英九他在推行垃圾不落地垃圾袋，因為要用錢去買垃圾袋以達到垃圾減量的目的，但是對菜市場的商家就幾乎受不了，他賣菜以後所產生的大量垃圾，放在使用的垃圾袋，他就受不了，結果很多菜市場的商家攤販數百人，浩浩蕩蕩就來堵市長抗議，然後就以很多刺的榴槤放進垃圾袋中，故意把它們放進垃圾袋讓它扯破。他們的訴求，在議員的幫助下，也開公聽會進入程序，他們的訴求是真的有理，不能把家務的垃圾和市場產生的垃圾相提並論，所以就另外處理才解決這個問題。

我再舉另外一個例子，是我個人碰到的，我不知道我們蔡議員會碰到嗎？因為這個大巨蛋就長在這裡，我在一年前我就提出來，希望這個大巨蛋能夠如期的繼續往前走，讓它興建完成，在一年三個月之前，我認為若是政府是善意立場，要幫助這些建商解決問題，不要讓他違法，但是要協助他解決問題，他有可能在世大運前，就可以興建完成，現在變成一個大爛蛋擺在那裏。

我這樣一個提案，居然民進黨的議員周柏雅，每一次在開會的時候，就表示有意見，依我們議會設計的制度，提案要念內容，結果周柏雅一個人，每一次都有意見，一直到最近 7 月中旬，議會無聲悄悄的通過。

在這個過程中，我有另一個提案要把他壓制，就是說你不可以這樣，你一個議員不能代表其他 62 位議員，你一個人就否定別人的案子，我提的是一個方向的問題，沒有說去討好甚麼人，行政院 20 幾年前，就有說要興建大巨蛋，是我們國家的政策，我們當然要去往這個方向走，他就是要阻擋，我實在不懂，所以我就在 10 個月前，提了另一個提案，就是一個議員你不能夠超過三次提有意見，你如果一直有意見，可以請同黨的議員幫你喊，你有意見不能一個人喊了一年兩個月，我這個第二個提案，悄悄的放在那裏，最後被拿掉，這也是制度喔，這也就是說在議會裡頭，大家比較喜歡衝突的提案擺著。

我舉這三個例子，但是後來也讓我想到，剛剛教授提到的彰化魏明谷縣長，和謝典霖議長，跟這個卓伯源之間的恩恩怨怨，我覺得完全是因為人，其實我們做議員，解決那些衝突的，大多是服務案、協調案，要有很多的耐心、尊重還有人性的出發點，處理的都是甚麼被撞到，要欣欣客運賠償，他所要求的數目，有的時候是要 200 萬，欣欣客運只願意賠償 30 萬，這中間怎麼賠多一點讓受害者接受滿足等等，我們很多這樣的服務案例，當然還有很多的違章建築。

可是現在我看到事關兩岸關係的，到目前為止難解決，這是哪一個政黨得到政權，它有那個主導的優勢可以去主導，現在我們整個的兩岸政策就開始有一些轉換。另外我要講歷史課綱，也是哪個政權主政，有主導的優勢，就把現狀給打破，就變成它的政治的主張。

我還要再講這個歷史課綱去中國化，其實大家被中國兩個字給嚇住了，這個字也是從三皇五帝夏商周五千多前，中國文明就創建了，所以我是覺得大家怕中國這兩個字，以為大陸就是中國，這個東西也是難解。

再來是語言，國語是我們國家的語言，我們的外語就是英文。但現在我認為文化部越俎代庖，代替了教育部，他說基於文化的平等權，所以國語、閩南語、原住民語、客家語還有手語都是國家的語言，它變成五個主導的語言，我認為未來會是危險的，會有混亂，不容易達成一樣的標準，只能說精神上要求語言平等，但是國語或是其他的讓母語去輔助，去幫助保留母語，而不是提升它的地位。

大家要去看若干年之後，下一代的問題，以李光耀為例，他就是將英語當成是工具的的語言，華語當成母語處理，所以我認為我們現在的語言政策，也是充滿了衝突，其他的衝突都不用講，這是人民的態度、風向，還有一個趨勢，老百姓現在就喜歡看衝突，這怎麼辦呢？

這方面涉及老百姓的文化，老百姓認為說如果你這個議員，非常的斯文，在議場也規規矩矩的講話，沒有用，沒有媒體會報導你，只要打架、拍桌子、扔預算書在地上踩、拿一堆道具等等，反而受到注目。

甚至包括到現在，我覺得它不是叫衝突，像柯文哲以市長之尊，會講出那三個字，XX 蛋，我是覺得不好的。但是老百姓的文化也已經改變了，所以才有 48 萬人按讚，再來一句能讓 20 萬人按讚更難聽的髒話，那他豈不是就當選了？

所以我是覺得，現在我們應該思考，怎麼樣在教育上，在文化上讓老百姓的民風趨勢，或是哪那個風向朝著在議會以不衝突，不打架的議員為好的議員，現在老百姓，喜歡看議會衝突打架，我覺得是不好，我們這個國家亂了快 30 年了，我都快受不了。

我是 20 年的議員，我一路看到議會大小的衝突不斷，政治的衝突幾乎到現在無解，可是大陸一個世代，已經變成強勢的一個強權。新加坡也是一樣，他建國才 52 年，但是他用一世代的 30 年，只有新北市三分之一的土地，人口 352 萬，而新北市的人口是 399 萬多，新加坡可以從英國的殖民小地，成為世界一流國家，也成為一個外貿金融的重鎮，我覺很覺得不容易。

所以我是認為衝突對國家不好，所以我很感謝今天這個主題，以後大家不講衝突是不可能的，在人類的歷史上，很難去根除的，包括個人，為了選擇，自己也有小小選擇性的衝突，但是加上一點建設性，加上 positive，正能量的，所以我們常常希望社會和諧，學術界也發光發亮，多講一些建設性話，甚至要求我們的政府官員，一定要以身作則，讓老百姓如沐春風，而不是喜歡看到衝突的畫面，如果是這樣，那我們的國家就完了，這個國家就不會進步，這也是我們的國家目前的困境，我對於我們的國家，目前走到這個艱難的路口，每一個階層，每一個不同的世代都在衝突，我是覺得這樣是很危險的。我們的學者要具有使命感，站

在最高處，給我們一個明燈，常常發表文章，呼籲所有的政治人物，管你是市長，管你是立法委員還是議員，而且要教育老百姓，喜歡那些常常發表正面，具建設性內容言論的政治人物，而不是看到拍桌子罵人的議員，票就特別多，讓這樣有問題的政治人，會被選出來，這就是我所憂心的，謝謝！

江明修：

厲耿議員是很資深的議員，剛剛也提出很多很正面的建議，謝謝！接下來請高雄來的蔡金晏蔡議員。

蔡金晏：

台北市議員厲耿桂芳(左)，高雄市議員蔡金晏(中)，江明修院長(右)

謝謝主持人，各位與談人，各位來賓，我一向理性問政，應該沒有拍過桌子摔過東西，我認為還是就理論理。提到衝突，應該在府會之間難免會發生，把他轉換成對整體的公共利益提升的力量，那樣的衝突才有意義。

我是第 2 屆，我是 99 年縣市合併當第一屆，這屆連任，我想跟各位報告，我看到的府會關係，有一些可能是我自己的想法，請大家參考。我印象中，高雄府會關係比較差的是在上一屆，當然因為議長是國民黨籍許崑源議長，市長陳菊從現在民選 99 年到現在是的 3 屆，之前我們發生過砍預算，砍了 57 億總預算，大該是 1000 億到 1300 億，大概是 5%，結果果然就發生衝突。

至於這樣的衝突，究竟是不是建設性的衝突？我想用整個台灣議會運作的制度下，我相信砍預算應該是要常態性的，但是砍 57 億的過程中，我跟各位報告一下，我們當時是利用包裹式的砍法，57 億裡面，我就列出哪些項目把他砍掉，

其中有一大部分，是屬於文化局的預算，另外就是各局處辦活動的預算，還有勞工局補助相關團體活動的費用，印象中還有義警義消出去玩的活動費用。

我們把這些都砍掉過程中，市政府就透過甚麼義消的大隊長來遊說，至於為什麼我們砍預算，是因為大家也都知道，高雄市的負債是全台灣最多，坦白講，加上隱藏性負載債將近有 3000 億元，幾乎破表，這樣一個財政狀況確實不好，但是他還是可以運作下去，大型建設他還是要做輕軌，至於從前瞻去爭取，那另外一回事，我們之所以砍預算，是基於民意的要求看緊荷包。在那個過程中，當議長敲槌，確定砍掉 57 億預算之後，市府居然在市長的臉書上，以全黑的畫面，表示市府捍衛預算不力，這樣的說法，好像有一點角色混淆，根據制度捍衛預算的應該是議會才對，不是嗎？

我要講這一段，是因為上一屆議會，府會關係幾乎是處於衝突的狀態，至於這樣的衝突，有沒有建設性，那是見仁見智的，我們高雄市議會，也有一個好玩的現象，就是在國民黨要開記者會之前，民進黨也會去開一個相同內容的記者會，諸如此類，有一些好玩有趣的現象。到了這一屆，換成了民進黨籍的康裕成康議長，我個人看法，議會已經沒有所謂的建設性衝突，因為就是剛剛講的零和遊戲，不管怎麼吵，我們吵，23 席最後還是用表決的方式通過，民意代表畢竟還是反映民意，透過議會的問政產生衝突，再去轉換成建設，至少在議會政治制度運作下是這樣子的關係。

另外，我再提一個對市府看法的問題，我不知道最近大家有沒有去高雄，如果有去高雄，一定要去搭一下輕軌，這是全台灣第一個輕軌，在輕軌的建設過程當中，我發現政府部門，往往會把衝突給隱藏起來。我舉個簡單的例子，我們現在叫一階輕軌，輕軌他是一個圓形，他有一階跟二階，一階在做時候，有一個設備室，這個設備室，坦白講，沒有很危險，因為他不是所有高壓電經過的，因為他比較突兀，所以大家就認為是一個惡鄰設施，因為有民眾陳請，我才請捷運局來做說明處理。

結果我才發現輕軌這樣一個上百億經費的工程，應該有一個完整的施工計畫，沒有想到要設施工圍籬的時候，民眾才知道有這樣一個設施，所以未來包括二階要做，高雄有一條叫大順路，應該是 30 米道路，未來輕軌做下去，以後會增加 10 來米的寬度，像這樣一個議題，預算是 102 年就通過動工，大概是下一個月的事情，前後大概已經有三四年的時間，我在 102 年就跟市政府相關局處講，應該要趕快辦說明會，至少要先讓人家知道，將來這個衝突才能夠解決，往往這些所謂的建設性衝突，到最後變成不能建設，這往往是市政府單位，沒有把應該公開的資訊讓民眾知道，或是在處理過程中沒有掌握一些訣竅。

所以在輕軌做的過程當中，我發現公部門，在可能會產生衝突的情形之下掩耳盜鈴，他們可能認為蒙混就可以過關，這是比較要不得的心態。

另外，因為我比較關注輕軌建設，高雄的輕軌一階就有一站，車站下居然沒有人行道可以走，一下來就是馬路了，其實我跟捷運局的官員也聊過，捷運局其實很簡單，都是制度造成的，捷運局只管把工程做好就好了，需要橫向協調的事他們不會去做，所以一開始沒有好好去做的話，後來就會出問題，我認為公部門在橫向協調，有時候是來解決建設性衝突比較好的解方，不應該由代議部門來做，事前沒有做一個整體的協調規劃，等到民眾來陳請，才匆匆的改善，讓衝突沒有辦法轉換成任何建設，以上是我跟各位的分享，謝謝！

江明修：

謝謝非常精彩的發言，我們還有一點時間，我們讓與會的人來提問，先請那個愛鄉文教基金會的執行長顏易程。

顏易程:

我是顏易程，我之前在市長室，我自己觀察是這樣，我們選了政治人物進市議會之後，其實我面對的是一台非常大的機器，就是說我們在操作這台機器的時候，好像面臨大型機構管理的問題，所以剛剛老師有提到企業界一些運作邏輯，確實是可以有用，因為我自己在企業界待過 10 年，我進去之後就去觀察說，這個系統真正有的功能有哪些？就和我們的工務主管談了一下，對這個機器運作的理解，後來我就發覺說，其實我認為我們的公務員，對這部機器的理解程度，是非常的高，因為你只要告訴他方向，他大概都能做出來。

接下來，就是剛剛有人談到，公務員的執行態度問題，這部分我認為就是進到人治的觀念裏面去，這部分比較複雜，今天就不在這邊談，因為在我們專案執行的過程當中，確實常常是會有遇到衝突，不要害怕衝突，但是要有解決衝突的機制，當然不同領域的衝突，解決機制是不一樣的，但是解決衝突的工具，老實說，就只有那幾樣，這是大家可以理解的，

所以在我們想像是說，在我們去處理一個政治工具的時候，要把處理這些衝突的工具先拿到手上，再決定說發生這樣子的狀況的時候，應該要拿那些工具出來處理，我為什麼會提這一件事情？因為我發現，其實大家手上有的工具都不太完整，所以有的時候，我們會有一種衝突，就是策略性的衝突，但是對方沒有理解到這個狀況常常會出現。

因為剛剛老師都有提到，包括府會的關係，府內的部分我比較清楚，府內其實我們在做協調的時候，最大的困難，確實像老師剛剛有提到的，跨單位協調的時候，確實有一些問題，那邊而且總是會遇到同樣的問題，我自己理解到這個運作裡面，他最好的一個機制，依我個人淺見，是應該是機要系統，今天行政首長，如果有一個足夠規模的機要系統，就可以代表首長下去處理，需要和各個機關協調的事物，我觀察各地方政府，有關這方面沒做得很好，當然也包括我自己，這是我個人的建議。

另外在上一場，提到一個關於公民參與的機制，因為像兩位議員，常常會直接面對陳請的群眾，確實我們在公開活動，有一些機制去處理，府也有府處理的機制。

我舉個例子，比如說，北投公園的路行問題吵了很多次，很多民意團體對決了很多次，後來我就了解到，他們很清楚知道甚麼叫民間對話，但是首長告訴他們，我的目標就在這裡，你甚麼時間要完成，就把它解決掉了，這個如果不清楚的話，會增加在辦事時的困難，我希望如果未來有機會，跟首長對話的時候，這兩件事情必須要很清楚。

最後一點，我想要提的，就是關於政治責任這件事，我也感覺到，台灣對於政治責任這件事的定義太過於模糊，我們常常會聽到說要負起政治責任，大家都直接會聯想到首長要下台了，其實我覺得政治責任，除了下台以外，你也可以自己想出一個理想的解決方案，把這個問題解決掉，不一定非要下台才能處理。

如果你沒有辦法處理，你要承認說這已經超出我的能力範圍，但是我希望民間來協助解決，這個部份就是目前政府跟民間連接，所需要加強的部分，所以，不見得都要從下台這方面去思考，以上是我對面對衝突過程的一些理解。

最後我想回應一下厲耿議員，關於王八蛋說這件事，我自己是鄉民，我自己的觀察，關於王八蛋這件事情，你可以看到那個 48 萬的讚，那一則裡面其實沒有王八蛋，所以他的重點，不是在王八蛋，而是他加了一個人進來，聽得懂我的

意思嗎？他寫的是你和那些反年改團體裡面，在我們來看的是，如果我們今天對於反年改團體理解是一致的時候，你卻站在他們那一邊，我就把你告進去，他做這個動作，所以我們支持他，他的概念是這樣子來的，而不是那三個字，這是我個人的觀察，謝謝！

江明修：

謝謝！另外一位是林家瑜女士。

林佳諭：

主席，大家好，其實我剛剛有一點遲疑，要不要發言，因為在場的每一位每一位都是我的前輩，都是我的不管是人生，或是參與公共事務上的前輩，我覺得不應該在關公面前耍大刀。

我自己在 2014 年，有參選中正萬華區的市議員落選，當時，國民黨民進黨提名共 8 名，都當選連任，然後我是落選頭第 9 名，當時是 11 月 29 日投票，我是在 9 月登記的時候，我才開始跑，在 8 月底才決定要參選，在那之前，我對於公共議題，對於社會議題和政治議題，完全沒有經驗，我是太陽花運動才了解的，我是北科環工碩士，對於政治或是社會議題，不管是操作還是論述或是解決衝突，我覺得我是完全沒有經驗。

從我 2014 年開始參與選舉，一直到投票那段時間，其實對我就產生非常多的衝突，因為落選，後來跟我爸爸產生了各種的衝突。剛剛有一位與談人就提到衝突分為兩種，我的理解是，第一是為了衝突而衝突，第二個是在討論可能是為利益的事情而衝突，可能我的個性比較直，曾經發生過我們要去開一個記者會，記者會內容，是要去質疑放流水排放標準修改的正當性，當時我認為那個排放標準，看起來是沒有甚麼問題，但是我們組織內部，認為用這個議題可達到打擊另一個對手的目的，所以就產生了衝突，組織內的人認為社會大眾對真相不見得會了解，只要讓對手受到傷害就好，針對此事，我覺得蠻生氣的，我個人一直處在類似這樣的衝突中，所以我覺得不管是學術界，還是在場的學者前輩，應該很常遇到這樣的衝突，其實我現在還處於這樣子的狀態。

所以我第一個問題是，如果發生類似剛剛我講的那樣的衝突的時候，各位前輩處理的原則會是甚麼？雖然我不知道能否得到答案，我還提出來請教，

還有就是我也要提到關於柯市長講王八蛋的事，因為我是一個資深的鄉民，我認為 48 萬按讚的鄉民，應該不侷限在台北市，在網路世界裡，也有可能是身在其他國家的鄉民，所以我認為這 48 萬人，並不代表 48 萬票，剛才議員姊姊說的，可能修正一下比較正確，這是我的理解。

厲耿桂芳：

台北市議員厲耿桂芳

謝謝兩位，我大概聽懂了，只不過台北市政府，有文化局和教育局，我們總希望整個社會有一個更好的呈現，柯市長講完這句話後不後悔，我都不在乎，但是都已經發生了，我認為做為一個政治人物，尤其是一個直轄市的市長，這樣的發言不太好，不可以，那都是跟一個人的教養有關係。

所以我說社會病了！因為你是在做示範，所以剛開始的時候，我就講這個社會是病了，大家都喜歡看議員拍桌子叫好，像我剛剛講大巨蛋，既不是在圖利任何人，而是對一個二十幾年的國家建設政策，應該要往前走，希望不要一直擺在那裡。

另一個提案我還沒有講，就是王世堅的提案，要拆掉大巨蛋，竟然通過，繼續興建完成的提案居然不通過，這只是一個方向而已，像這樣還有甚麼是非可言，拆掉大巨蛋後續的處理問題，市長還有議員可否有想過？我認為政府對於任何建設案，應該都是站在嘉惠民眾的立場考量，我只是好心而已。

再提到北門案，是郝龍斌任內規畫的，只是限於任期無法落實，到了柯文哲才施做，他很有效率，我也很讚賞，只是對市政建設，市長不能有刻板先入為主的看法。大巨蛋是行政院 20 年就定的既定政策，希望讓台灣成為一個棒球王國，結果拆掉的提案通過，而繼續完成的提案，卻經過一年三個月不能通過，我只是以這些來做舉例，那王八蛋是不好的言語，學校能這樣教學生嗎？直轄市市長這麼講，我還是堅持這是不可以的，我剛才在 9 樓的議題討論中，聽到馬來西亞的議長劉子健說，在檳城州議會，如果口吐髒字要叫他離開議會，所以馬來西亞都有這樣子的文化不吐髒字，當然有的時候我們也會因為自己的修養不夠而吐髒字，社會上有好幾層人物，我們總希望社會能更優雅，更和諧，同心協力往這方面走，

我今天是強調那個核心的價值，那個行為判斷的價值，那個文化的價值還是要好。

江明修:

謝謝今天各位的發言，應該是水準很高，開始的時候，是建設性很強，到後面要結束的時候有一點點活潑。

陳敦源：

剛剛那個場景，我必須要把詮釋一下，如果把場景般美國，因為美國現在是高度衝突社會，我可能要談一個概念，就是如果衝突是無解的，那要怎麼辦？

我覺得剛剛厲耿議員，有講到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有些事情在人類社會是無解的，但是有趣的是，政治人物在選取選票的過程，他要切割他的市場的時候，他會專門找這人來，把他燒起來，因為一燒完之後，你絕對不會去投給我敵營的候選人，就好像牽涉剛剛在講，搞選舉你都贏不了，你理想要怎麼講？這是一個很馬基維利的說法。

所以妳(指林佳諭)剛剛另外那些朋友做的事情，不一定是壞事，因為他可以協助一個有理想，有抱負的人，站在那個位置，做更大的事，但是這就是手段的問題，可是人類社會，本來就存在這樣的問題。我看過一篇論文，他講說美國現在發生甚麼事情？他背後是兩個最大的價值衝突，第一個就是傳統的價值，另外一個就是世界主義，個人自由極大化，就是年輕世代的看法，這兩個衝突是人類社會無解的，可是我們就可以去玩這個東西，可以去擷取我們的選票。

所以衝突對民主政治來講，事實上它是汽油，它讓那個引擎可以轉動，你有這樣一個衝突的狀況在的話，你就要去面對去處理。大家都在講審議民主，可是審議民主有它的極限，有的時候，有人認為把審議民主搬出來，大家就可以妥協，事實上不盡然，因為他背後的這些價值衝突，甚至專業的問題，有些時候民眾他不是很願意牽涉到這個衝突，他有很多剛剛講的，專業上有很多他不懂，他也不需要懂，如果他都懂的話，那內政部的審查，很多本國國民的標準要變很高，環工要學過，甚麼都要學過。我很喜歡邱吉爾的一句話，他說民主政治是一個很爛的制度，但是跟其它已經試過的制度比較起來，它還是不錯的。人類本來就是不完整的，可是我如果能夠動心，看到這個去經營他這樣子最重要。謝謝！

王宏文：

所謂建設性衝突，重點應該是那個建設性，但是那個建設性怎麼樣定義，我自己覺得，其實從台灣這幾年的發展，其實我們發現是一個專業精神的喪失。

也就是說，當我們在講很多政治的時候，其實你把專業給丟掉了，這個衝突，大家有不同的觀點，不同的價值，但是我會覺得一個好的政治人物，應該是用他

的政治手段去保護專業的精神，政治上有很多價值的衝突及利益的衝突，但基本的，比如 A 溶於水，這是科學事實不能把他給丟掉了，今天你把他丟掉以後，其實後面都是指鹿為馬，你可以放掉這個精神，你得權以後會變成什麼樣子？我不是很清楚，但是我覺得，即使你在獲利的分配，那都是手段，最後的一個目的應該還是福國利民吧！謝謝！

江明修：

我先做一個結論，待會我們還有總結的圓桌論壇，可以在那裏來談。基本上，佳諭剛剛那個問題，她展現是一個高度的政治家風度，她以不傷害別人為原則，對一個學者研究來看，就是會說妳好傻，本來可以贏的，為什麼不贏呢？

但是政治家和政客的差別就在此，我不是罵那個陳老師，他講的是一個很實際的分析，但是一個政治家的理想性格很重要，宏文老師講的也是這個。整體性來看建設性衝突的話，從基層設計到實際利益的分配，其實我們是期待說，尋找各種同意的不同意和不同意的同意之可能性，這個妥協的藝術是要學習的。

剛剛厲耿議員有提到一點，就是民主的公民教育，我想這不是一個道德教育，應該是一個民主的規範，我們如何在不同的意見之中，如何和平的，甚至很善意的相互支持活下去跟建設下去，我想這是我們要學習的，這方面對我們台灣的公民社會來，我們是有信心的，即使在我們某些政治領域裡面是有點失望，或者是公民教育看起來不是很成功，但是我是覺得說，我們每一個人在互動的過程，我們都希望有一個美好的社會時候，我們一定會著重在這一部份，今天很謝謝大家，本來我覺得我們的題目會不會訂得太枯燥了，沒有想到大家談得這麼精彩，非常謝謝各位！

2017年「全球地方議員論壇」暨
「台灣地方民代公益論壇」

如何使衝突更有建設性

王宏文 副教授
台灣大學政治學系及公共事務研究所

1

如何看待衝突

- 衝突無所不在
- 傳統定義：因資源有限、目標不同、或受損害，導致利害關係人之利益相衝突
- Morton Deutsch定義：衝突是不相容的行為，也就是，甲之行為干預、阻饒、或傷害乙的行為或利益
- 雖有不同動機，但甲與乙的利益有部分是競爭性的，這導致衝突；但也有部分是合作性的，這部分提供達成協議的誘因

2

如何使衝突更具建設性

- 利害關係人如何看待他自己的目標與其他相關人目標的關係，會影響後續的溝通、問題解決方法、與結果
  - 合作型：目標是正相關的，A達成或接近目標會使B更接近目標，較易促成建設性衝突
  - 競爭型
  - 獨立型
  - 通常是上述皆有的

3

合作型目標與競爭型目標的差異

- 合作型目標：
  - 較易達成建設性的衝突
  - 過程：開放的心態與溝通、感到相似性、互相支持與幫忙、分工、正向感覺、信任接納、對共同利益的追求、不強調差異
  - 結果：決策品質好、關係良好、肯定、信心
- 競爭型目標：
  - 過程：封閉心態、避免討論、強制的作為
  - 結果：決策品質差、關係惡化、挫折、惡意、報復
- 以結果論，沒有絕對好壞，相關人所使用的策略仍很重要

4

如何促進合作型目標？

- 求同存異
- 形塑共同目標與願景
- 分享資源與資訊
- 討論爭議方式：傾聽與肯定他人的感受與意見
- 互相得利與公平的報酬

5

地方民代作為調解的第三方，如何可促進建設性衝突

- 確認利害關係人並選擇對話對象
- 與利害關係人建立關係，結束他們之間的惡意，冷卻負面情緒，改善氣氛
- 確認相關人都願意接受中介調停
- 針對議題，釐清其觀點，此外，要有足夠的領域知識與專業來進行分析
- 建立團體討論之程序與形式，討論，整合意見，並以足夠的專業來解決爭議
- 達成協議並執行

6

如何面對死硬派

- 要提供共同的願景或目標
- 讓他們的憤怒或挫折有發洩的出口
- 慢慢來降低他們的挫折感或憤怒
- 協助他們，並發展合作的意願與能力
- 合作性的討論，如公開討論不同的意見與觀點，肯定對方的感受與意見等
- 要給他們下台階，維護其自尊與形象，使其不需提高抗爭，而能坐下來解決問題

7

B3 場次：問題導向的溝通

主持人：

趙永茂　國立台灣大學社科院政治系榮譽教授

與談人 ：

吳偉寧　國立中山大學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助理教授

張峻豪　東海大學政治學系暨研究所副教授

曾冠球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公民教育與活領導學系副教授

蕭宏金　義守大學公共政策與管理學系教授

郭建盟　高雄市議會議員

賴佳微　台中市議會議員

會議現場

趙永茂：

問題導向怎麼樣來進行好的溝通，議員他們當然實際的個案特別多，等一下請議員從實務的立場來交換一下意見。這次的會議有一個重點，就是 4C，第一個就是 conflict，就是處在一個衝突的時代，很多的利益衝突，個別之間政黨之間的衝突，我們怎麼操作這些議題，而能夠比較公開公正的去解決這些地方的事務或政策。在這個衝突裡面，我們必須要面對一個新的開放政策的時代，所謂的 check，有更多的開放，更多的透明，更多的討論。

今天我們有很多的場次，上一個場次我們是討論參與式預算的後續，審查的問題在台灣如何落實，並與國際連結。溝通的途徑，以及合作的途徑，這個部分

在學理上在運用上很廣泛，大家也都了解，藉這機會我們希望針對這些問題導向，我們怎麼樣在議會過程、在政治過程裡面，怎麼樣在地方上做得更理想，我們怎麼樣來強調議會也好，行政機關也好，我們到底要怎麼樣讓這些地方政府，不論是議會或行政組織，能夠有這些政策的產出，政策的整合，政策的執行，在執行的過程，在議會的過程如何能夠更理想。

我們現在是不是按大會安排的順序，先請中山大學政公事所的吳偉寧老師發言。

吳偉寧：

吳偉寧教授(左)，葉一璋教授(右)

謝謝趙老師，我是中山大學公共事務研究所的助理教授吳偉寧，很高興來參加這個論壇，其實我大概看了這個主題，問題導向的溝通，我覺得是有兩個面向，就是問題導向跟溝通。

我從溝通這個面相先開始切入，講幾個我從公共服務的傳遞過程裡面，還有政府跟公民關係，這兩個主軸來探討，首先，我覺得在問題導向的溝通，民眾跟政府之間，創造一個互動的環境，有兩個很重要的議題。

第一個，民眾是不是處在一個多元的意見中？政府是不是可以讓民眾，他們很多問題都可以提出來？不管是好的，還是不好的，政治人物其實要有告訴民眾好消息的勇氣，還有壞消息也不例外，但是我覺得世界各國的政治領導地方領袖，往往都是想跟民眾分享好的消息，不想跟民眾分享壞的消息，這個壞的消息地分享的勇氣，地方領袖應該要有。

第二個，民眾是否願意主動的參與，跟討論與分享訊息給地方領袖？我現在

做很多參與的議題裡面，剛剛上面場次(參與式預算)，誰來參與？誰來分享？誰願意傳遞訊息？誰願意當政府的夥伴？這都是這個溝通之下，其實如果有問題的話，會導致讓那些結果運作不好。

還有一個問題是，如果現在做的東西，政府如果還繼續做，其實民眾如果覺得是問題，那政府如何去做溝通協調？在實務的運作上，我們在推參與式預算的議題裡面，就遇到同樣的問題，像現在市政府在推一些政策，民眾的感覺，就是一個問題，公部門花了很多的時間在溝通，但是民眾還覺得這個問題，政府沒有了解民眾真正的需求，我覺得這是存在一個 gap，政府跟民眾間的認定跟溝通能力上存在一個 gap。

另外，在溝通的面相裡面，還存在一個訊息傳遞的時候，我們要的是 information 的質還是量？有時候你給民眾太多訊息的量，民眾會覺得這是一個很有誠意的政府，但是有些時候，其實只要傳遞正確的訊息，民眾就會感受到政府在某項公共政策的服務品質，或是任何訊息的溝通就是正確的，傳遞真正好的質的 information，或許才是民眾真正需要的，而不是只是大量的 Information。

還有現在很多的地方政府試圖用 ICD 跟 social media 要去做好跟民眾溝通，試圖搜尋民眾的資料，去了解公共服務的問題，但是我覺得政府學的東西，都是學一半，我所謂的一半，我們只有很多名字跟人家類似，但是學不到人家的內涵，可能是在預算和地方政府 capacity(能力)的問題，結果導致在執行上，讓我們跟國際的情況是有落差的，這會影響我們在瞭解問題跟蒐集民眾的資料會有落差。

還有一個重點，公民關係的管理，這在問題導向是很重要的。因為任何的公共服務，他有不同的特質，所衍生的問題也不同，該如何去管理？如何用不同指標的衡量標準，去告訴民眾說這個服務，其實面對到的問題跟績效，其實是符合事先所預定的。像有些不是那麼 positive 的服務，像被警察攔下來，跟民眾說是這是一種公共服務，但這套服務，如果用其他的服務指標衡量那是不對的，應該要去跟民眾說，我們的這項公共服務特質其實是不同，所以要用不同的指標去衡量，接著告訴民眾說在這一個指標裡面，訂下的結果是怎麼樣。

有一些人會說，我們怎麼樣去跟民眾說，訂下的指標是公正的，我想後續或其他的前輩，可能會提到像 Open Data、開放式政府，很多資訊都跟民眾講政府服務的績效，我們公部門是不是要把這些所謂的資料整理出來，告訴民眾說現在公共服務基於這些資料，發現了哪些問題？那現在轉到政府應該要把這些東西，放到肩膀上，然後做處置，可是現在遇到一個問題，就是我們有沒有整理的人才？還有這個技術是可以放在地方層級裡面，或許是我們所謂的六都可能有這個好的技術，可是若在像我們的雲林苗栗這些縣市，他如果別縣市在推一個所謂流行的公共政策，或是某一種的公共服務，他試著去模仿，可是他的人力和財力是沒有到位的，他做的東西就是很形式上，但是花了很多的錢，其實他找不到民眾真正的問題，卻花了很多的錢做這件事情，我覺得這也是各個地方層級政府應該思考

的。

別人有，我們就真的要有嗎？如果我們沒有，我們要怎麼民眾說我們為什麼沒有，我覺得這是各個縣市在政策模仿上，我們可能要思考，我們在這個溝通上，要怎麼樣跟民眾講，我們沒有，我們為什麼沒有？我覺得這是地方的領袖，在跟民眾溝通的時候，再多做一點的著墨。

然後有人提到說，政府的問題導向或溝通能力不好，造成政府反應能力變差，製造訊息去跟民眾溝通能力變弱，或者我們可以透過甚麼技術，或甚麼工具來協助政府，增加他與民眾溝通的能力。很多地方政府做了很多，包括剛剛提到的參與式預算，透過 mechanism 去蒐集民眾的資料，然後讓民眾意見可以監督公共政策的過程，有些人用了 social media 去了解民眾在網路上的態度和意見，對於某些公共事務的一個看法，有一些人做了民意調查，其實這都是好的，每一個工具，每一個工具都有優點跟缺點。

但每一個地方政府，在做任何一個工具的使用的時候，其實要考慮到這個工具適不適合？我講這個的意思是，我上個月去德州一個很小很小的地方政府，看到他們有一個 3D 的系統，我就問他們說，你們一個小小的城市為何要有 3D 的系統，他們告訴我，我們學的是 3D 系統，但是我們學的內容不一樣，我們在一個服務民眾的思維下，創造出我們自己的方式。

那我就問他們說，你們怎麼創造，因為我們講到 3D 的系統，就會想到台北市的 1999，民眾打去的時候，他會去追蹤你的服務，當你的服務問題解除，他會回覆給你。那他們小小的城市，他們怎麼做呢？他們設計了一個只有電話號碼，因為他們知道誰提出了這個服務，然後解決之後，他們就會在網站上公告，他不會公告名字。

只要問題解決了就上網公告，這樣一個小小的東西，他不需要一個很大的系統，像紐約那樣大的系統去處理，這個政府接受民眾的一個諮詢，但是他可以解決民眾的問題，他們也教育民眾說，如果你沒有很緊急，或是沒有很危急，千萬不要打進去。

他花很多時間，在教育民眾，他也告訴民眾，這個系統要如何使用，我們說教育民眾的層面，不是說找民眾來，他們走到校園裡面去跟民眾推廣說，我們這個系統使用，其實是一個很簡單的系統，當我們跟民眾說，我們可以幫你們做任何事情的時候，其實我們是在增加他們的預期。

當這個預期增加的時候，我們就把這個溝通的成本拉高了，我們把他們要讓民眾獲得滿意的標準給拉高了，所以我們會很難去讓民眾對於滿意度的提升，或是讓我們傳遞說，我們對公共服務的品質是低的。

我們如果發現一個公共服務的問題的時候，我們應該要確切去跟民眾說正確

的資訊，而不是跟民眾說：我年底就會出多少錢來幫你解決，因為講了這個之後，民眾的期望值提高之後，一旦有一些狀況發生的時候，會很難去滿足民眾。所以我是覺得公民管理這一套，我們不可以把他們當顧客，但是應該要把他轉成思維是，我們是不是可以把它用在公共服務的傳遞過程？

還有我們在問題導向的時候，資料整理是很重要，但是要有一些重點，我們要拿哪一些資料給民眾？這是我們要去思考的，全部給民眾，他們不會那麼多的時間去看，我覺得資料的選擇及資料的整理，還有用哪一種形式，其實都是我們在溝通問題發生之後，要怎麼去傳遞，是很重要的一個面向，我先敘述這幾個面向，後續要我補充，我再來補充，謝謝！

趙永茂：

謝謝吳偉寧吳老師，講得非常的好，尤其舉的案例也很好特別，在運用學校推廣這件事情上，更是有意思，我們像也有一個類似的案例，有的時候影響爸爸媽媽的，是那一個小朋友，他不但觀念有了，他回到家會由他來解釋，影響爸爸媽媽，阿公阿嬤行為的轉移，會幫助公共的緊張，和公共未來發展。

我記得我們台灣有一個案例，就是在屏東那裏原來是吃伯勞鳥的，後來到新的一代他們不是靠吃伯勞鳥，而是靠保護伯勞鳥，然後很多的遊客會來，他們就從中得到些消費的收入，這也就是說觀念的改變，是從學校下一代開始，這是一種教育，也是一種學習，包括這些 Open Data 的使用等等，政府跟民眾溝通的方式，有時候可以有一些創意的思考，接下來，我們是不是按排序來請張峻豪老師。

張峻豪：

張峻豪教授(中)

趙老師，各位老師，兩位議員大家好，我希望今天能多談一些實務面的內容，我盡量從實務的角度來，提出我的觀點。

我想針對這樣的一個題目，就是問題導向的溝通，我一開始看到這個題目的時候，我覺得這是一個蠻大的題目，就是說這個溝通，如果說從地方層級的幾個溝通對象來看，我想至少會把方向包括地方的部會之間及地方的議員之間，剛剛吳老師比較偏重在地方的人民和地方政府之間。

另外，就是我今天比較想談的是，在座的各位都是公共行政的專家，我從政治學的角度來看，我是覺得地方的議員和地方的選民之間也會是溝通上很重要的一個面向。舉例來說，今天賴議員在這邊，我也是從台中過來，我一直印象很深刻的一件事情，就是 2010 年當時台中縣市合併之前，我在台中縣議會做一些訪談，很多人都談到縣市合併改制以後，縣市文化差別那麼大，合併以後新的台中市議會和台中市政府之間的磨合期，當時有人跟我講至少要 50 年的時間。

這樣的講法，今天聽起來好像蠻誇大，但是其實還蠻寫實的，其實這就涉及到一個溝通的問題。這個溝通的問題，就涉及到府會之間，或者是議會之間，更根本就是說，來自於地方人民他實際的想法，也就是說他會去貫穿到一個議員，究竟要表現出來是他自己專業性的想法？還是說他要反映出選民的意見？

我覺得這個都會成為我剛剛所提到的，關於議員間、府會間的或是政府跟人民間，整個溝通最根本的來源。我想這也是我們剛剛在徵詢(台中縣市合併改制)時所提到一個議員，他到底要代表的是人民？還是他要的是一個專業性的角色？

所以我大概會從這樣的一個角度，來提出我一些從訪談跟實際上的觀察，所看到這個面向，在溝通所展現的特質。

如同我們在地方上，常聽到很多議員或議員服務處的主任助理，都常跟我們講，把事情做好或者是實際去解決選民的需求，恐怕都不會比服務做好來得重要，我們常常會聽到這樣的觀念。如果從這個觀點出發的時候，身為一個議員，要溝通要了解選民的需求，或是他去貼近選民的想法，會是開啟所有溝通的第一階段，這是基層的民意代表，和中央層級的民意代表最大的不同之處，也就是他跟地方民眾，距離是更近的。可能在理論上看來是如此，可是實際上卻也從很多實務上的觀察，發現說在地方層級上面的許多地方議員，很可能就基於這樣的觀念，所以他所展現出來的，在議會裡面，通常他承受很多選民對他的期待跟想法。

但是卻造成一個現象，就是很可能他就開始接受選民想法，然後會在議會提案，提案以後，他可以跟選民講說，我已經完成了你的需求跟想法，但是我常看到問題是，提案非常多非常的浮濫，議員可能會覺得我提案結束，我的責任就結束了。我就會覺得說，如果從剛剛說的議員跟人民之間的關係，這樣的一種溝通，能讓他更加的有效，還是回到那個根本，因為地方議員跟選民之間的距離是近的，所以我的觀察，認為一個有效的溝通，在議員的代表性問題上面，如果地方民眾

的距離是越近的話，這個溝通，才會真正的達到他的效果。

也就是說，比如我去提案，很多的地方民眾認為我就提出了想法，然後議員你去提案，但是後續的事情，到底民眾會不會想去追蹤他？或是民眾會不會實際去問議員說你的提案，到底後續有沒有得到了實踐？

所以如果從距離的概念來看，這幾年我看到了蠻有意思的這種人民跟議員之間的溝通模式。2012 年的時候，我到香港的區議會去做一些訪談，大家都知道，香港是一個非常地狹人稠的地方，他的地方區議員的服務處，很多都是在社區大樓的一樓，議員跟民眾的生活幾乎是重疊在一起的，也就是說我家住在上面，然後我議員服務處就在樓下，然後這個地方加另外一個地方就是我的選區，他的選民是每天就看著，甚至是知道他議員每天在做些甚麼事，所以我當時在做訪談，我就發現說當距離近了之後，那個地方議員在承受這個代表性的意義上，其實他的責任是非常大的，他的選民是看著他的，對他會有很多的期待。

當時訪談很多香港的區議員，他們都表示說，其實很多時候，地方民眾甚至可能不曉得你可以幫他做到些甚麼樣的事情，但是他每天會到你的服務處，當中會有各色各樣的民眾，他可能昨天跟他的太太吵架，可能說他家的水管不通，或電視機壞掉等等，很多甚至是生活層面的瑣事，他都會很想跟你講，他也會希望你能夠去幫他解決這個問題。我覺得這是實務上面在建構所謂議員代表性意義的環節，我覺得一個議員他可能不只是一個專業的立法者，他可能也會是一個社會工作者，他會是一個法律顧問。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當距離越來越近，當選民可以更看到議員的作為，議員承受到這樣的壓力時，一個地方議員可能在解決問題這個層面上，最重要的是他要去了解民眾的想法，去解決選民的心情問題，然後成為他生活上面的諮詢者，這個大概就回應到我剛剛所提到的，最有效的或是最能達到實效的溝通，就是在非常近距離意義之下來完成，這個部分，就可以再連結到後續去展現一個議員如何去表達他意見的來源。

我在香港區議會所看到的一些現象，發現其實香港區議會的議員，蠻像台灣的村里長，他其實是沒有實際上的權力，他只是在承受上級的提案，然後他去執行。雖然像台灣的村里長，但是就因為這個距離很近，所以當人民來找你的時候，你還是要想辦法幫他解決。我就看到議員服務處裡面，他說他一年累積的量有 2500 個案子，每天都有人進來跟我講，怎麼辦呢？他為了連任，為了選票，甚至會想去攻到立法會，所以選民這些東西我一定要想辦法去完成。就算我沒有權，我也要想辦法去完成它。所以他們區議員出現了很多策略性的做法，譬如說他就會去做跟市政府做大量的傳真，把選民的想法，傳真到中央，傳到特區政府去，透過大量的傳真，對中央施加壓力。

或者他們會做 facebook 的經營，形成民氣，然後讓政府不得不去回應，我

覺得更特別的是，一些地方議員，他為了得到年輕選民的認同，他就會去寫書，像我認識的鄺俊民議員，他太太選上立法會的議員，他就寫書，就標榜自己是一個文青，然後就可以得到選民的認同。

我又觀察到，香港區議員會號召很多的遊行活動，所以你會發現香港的遊行很多，他就是會帶著民眾上街去表達意見，抗議或示威，讓溝通開始非常有效。所以我覺得透過這樣的一個過程，近距離非常真實的一種溝通的內容，他其實可以讓很多地方議員，他會產生說不管是在他的主張，他的提案上，他可以去超越他個人的偏好，超越他的黨派，我覺得是他可以形成在後續很多的議案上面，可以跟人民結合在一起。我可能大概比較從政治學的觀點，可能沒有像吳老師這樣具體的談到很多機制的部分，希望能就教於各位，謝謝！

趙永茂：

非常感謝峻豪。峻豪老師也提出一些蠻好的觀點，貼近選民的需求，議員處理上有很多種的形式，峻豪對這些的形式，也一一的闡述，包括寫書，遊行抗議。地方上早期都很重視情感及一些地方上利益的爭取，有些是超黨派的，基於自己選區的利益，事實上在議會的功能也是這樣子的。當然議員還是可能和其他的議員有其他不同的政策，因為預算有限，所以他也可能沒有辦法達成自己的目的，為了選區的利益。有些是大選區的利益，有些是小選區的利益，不同選區有不同選區的利益，議員怎麼扮演角色，議員有時候也會自我矛盾，自己本身不得不考慮到自己選區的利益。

在議員本身，有些是大選區，有些是小選區的，怎麼樣讓人民了解，尤其是都市區和鄉村地區選民的素質及看法不同，公共性是越來越重要，有時候去溝通，他聽不進去，但是有些時候你也只能盡量為他們爭取一些利益。所以有些時候在地方訪問的時候，我們也看到說，為什麼說包括我們在開放地方議會的時候，有些議員就會極力爭取，他是要做給他的選民看，他必須要這樣子做，所以有些人就說是不是要公開，讓他有一個操作選民的機會，某些地方反而不讓他開放，所以有些時候也有他為難的地方，這政策性質，也需要解決他們某一些問題，這裡面難免有一些衝突，這個選區或者是跟個人利益比較相關的衝突，怎麼樣讓選民了解，有的時候也是教育選民。溝通角色有時候不好扮演。

早期在做派系的研究的時候，發現基隆的謝派他不是基隆人，禮拜六都開政治門診，他來的時候很多人都會進來，他要哪一個科哪一個局表示意見，他當場就表示，但是他也罵人，他會說你的小孩打人，還要我去協調，他說這個是不對的，他很霸氣反而得到很多人支持，私的部分他也解決，但是違法的部分不好的部分，他也會講人家是不對的，所以有各種不同的類型，不容易做，所以溝通方法及技術可以去選擇，很感謝峻豪，幾個精彩的幾個觀點，接著請曾老師。

曾冠球：

曾冠球教授

趙老師，在座的各位先進，誠如剛剛趙老師所提到的溝通不容易。有些不容易的原因有時候是來自制度上的矛盾，或是制度上的一些衝突，我以大家最近比較關心的參與式預算來說明。

我認為用參與式預算搭配我們今天的主題－問題導向的溝通，其實是很有意義的，因為相當程度它是可以反映出溝通上的問題。我們都知道推這個參與式預算，不管是我們的教科書，還是我們的常識裡面，我們都知道議會通常都會持比較保留的態度，因為推參與式預算以後，議員會擔心他們的監督權會被剝奪。

台北市也推了參與式預算，如果是從議員的質詢內容裡面去做一些觀察的話，很明顯可以看出來這裡面的溝通是有一些問題。因為我是以局外人的角度來建構這樣的溝通過程，所以我有一些的發現。我先把這些溝通的問題背景，跟各位做一個說明跟報告。在柯 P 在當市長之前，他就有白皮書說未來要推參與式預算，可能會花 100 億，我們知道台北是 1 年的預算是 1700 億，裡面的 100 億要來做參與式預算，這是柯 P 在選舉的階段說的。

後來柯 P 執政之後，就對外宣稱說，台北市政府會匡列 5 億的預算，這所謂匡列的意思，就是會在既有的預算書裡面，去找出來一部份的東西拿來做參與式預算，這裏面的金額加起來大概是 5 億元，這裡面有很多是來自於不同的局處，比如說有一些鄰里公園，以及一些道路整建等等。到了最後第一階段，執行出來的結果，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參與式預算事實上只花了 1000 多萬，只花了 1000 多萬是一個非常非常微小的數字，相較於 100 億元來講，其實是不足為奇的。不過問題就在這裡開始產生了。

從議員的角度來看，我剛剛有提到說，議會對這件事情會持有比較疑慮的態

度，一般而言是一個合理的反應，但是事實上從 100 億到 1000 萬元，這個數字差距是極大的，我們有 1700 億的預算，一開始只有用到千萬，所以換句話說，議員的反應所謂的監督權被剝奪，從我這個局外人的角度來看，這根本是一個不足為奇的東西，可是這個事情，至少在議會殿堂上引起軒然大波。

我舉幾種可能性，這個議員本身對於行政部門對外宣稱說推參與式預算的這個動作，他們有幾種質疑。第一種質疑，他們認為說民眾提出來的提案，最後交由議會來審查，但事實上議員不好砍民眾的這個預算，雖然說市政府宣稱還是要放在議會的監督框架下來執行這個預算，但是議員認為你這個簡直是在為難我，因為我是民眾選出來的，現在民眾提出的案子，雖然你市政府號稱我有監督權，但是我怎麼好去砍民眾的預算？這是一種說法。

第二種說法，因為你號稱說匡列了 5 億，那議員當然站在他的角色上來講，就會問你現在的執行率到底是多少？他會不斷的做追蹤，市政府一開始辦這件事情，一定是不會太順利，但是議員會認為執行率是一個關鍵，事實上就這個部分來講，也是市政府沒有跟議會講清楚的地方。因為當你說這個案子是 5 億，議員他們當然有這個角色每個月去關心執行程度。

我的感覺是市政府沒有把這個事情跟議會講清楚，因為這個所謂匡列五億的部分，我的理解是本來就有一些預算的項目，這些預算的項目，可以按照傳統的方式來做，也可以按公民參與的方式來做。市政府的做法是，如果按照公民參與的方式來做，這個就叫做參與式預算，但是你如果不按參與式預算來做，依循傳統的模式，就是專業導向的方式來做，譬如說開個公聽會，來聽一聽大家的意見等等，這就是傳統的方式，換句話來講，這裏面就沒有執行率的問題，但是議員在這件事情來講，行政和立法之間溝通就產生一些誤解。

第三個，議員會質疑你推這個參與式預算，民眾會有這個專業嗎？你們是政府才是最專業的，怎麼會讓民眾去做這些提案？他們能決定甚麼東西？有一部份議員在這個部分是很懷疑的，這個我們也是尊重，因為這個懷疑是有道理的。

第四種，他們會認為這種參與式預算，有些提案小不拉雞的，這個東西透過參與式預算好像多此一舉，勞師動眾還花了好多的錢，譬如一些提案的內容，是在某個區公所去擦甚麼油漆之類的提案，從傳統政治的角度來看，議員就會覺得這種東西，跟我講就好了，不需要去透過這種方式去辦這種東西。

最後一種，有一些議員質疑勉強來說是更有一些道理的事情，他們認為推這種參與式預算，投報率太低，譬比如說辦了多少場的會議，結果只來了 1000 多個人，1000 多個人卻提了 97 個提案，這 1000 多個人決定了多少的預算，他們會去換算這個報酬率，認為說這 CP 值很低。

我的意思是說，這是很典型的溝通本身出現一個很大的問題。你在推參與式預算的時候，行政跟立法部門對這件事情的看法，它其實有很大的一些落差，但

是我剛才前面強調的，其實議員最在意的問題是監督權被剝奪，但是台北市推這個東西，從目前的結果來看，它只是一種補充性的管道，短時間來講它占整個總預算的比例，其實是微不足道的，所以其實是無法去撼動立法部門傳統的既有角色。

但是在這個部分，一開始市政府是沒有去把對議會可能造成的一些衝擊，還有一些重要的觀念去跟議員溝通，比如說推這種東西的意義，它可能只是補充性的管道，其實市政府裡面已經有很多的公民參與的管道，比如說 1999，或市民信箱，或里民有約很多這種類似的管道，比較之下，參與式預算是比較直接，是一種補充性的管道，不是一種支配性的，說從今以後 1700 億的預算將來都是由民眾來做審議。我的意思是，從這個個案裡面，看得出來議員在這個事情上的一個質疑，從結果論來看，力道其實是不大的，但問題是行政部門為什麼會讓議員會有這樣一個不可思議的誤解，雖然有些誤解是有道理的，但有些誤解，我認為是想像出來的，但這個地方很明顯是溝通本身出現一個很大的問題，導致說這原本是很小的事情，被過度的誇大，或者是議員本身對這件事情的一個理解，比如說推參與式預算，當然官員的部分還是專業，很多的東西是民眾沒有辦法決定的，但是並不代表所有的東西，公跟私是完全沒有辦法協力的。這樣的觀念，是怎麼樣去跟議員溝通與報告，很明顯市政府在這一塊，可能私底下有，但是官方的資料裡面，是比較不容易看出來的。

我們在組織行為理論裡面，提到說一個溝通一定會有發話者和接收者，發話者會有編碼的動作，然後過某種管道，接下來也許叫做解碼，接收者會去解讀這個意義，我覺得任何一方在發話的時候，我指的就是行政部門，也許是市長也許是資深文官，在發言的時候要很小心去注意你在做這樣的編碼的動作的時候，別人到時候會怎麼樣子去解碼。

還有在甚麼樣的管道，也許你可能覺得這是一個話語權，誰先搶誰先贏，在媒體面前誰去做這件事，好像就拔得頭籌一樣。但事實並不是這樣，你的本意並不是打算要走這種行政立法對抗的路線，但以這個例子來講，行政部門一說，後面就會引起很多不必要的一些紛爭，我覺得這些東西都是在耗損很多的行政能量，因為仔細去看這一些議員的質詢過程裡面，發現有大部分的時間，幾乎有三分之一的時間，都在爭議這些，我覺得這些都是小題大作，事實上都無足影響議會的立場。以上是我做的一些簡單報告，謝謝！

趙永茂：

謝謝曾老師。現在有很多行政立法的緊張，一些溝通上的問題，容易被人家認為是一種政治上的傲慢或行政的傲慢，事實這樣也會影響到府會的關係，所以不只府會之間關係，還要結合社會相關的團體或專家一起來做討論，不需要做一些政治上的爭先。有一些政治人物就沒有辦法，只注意到自己的 credit。私和公之間建立共同的合作，共同推動新的東西和新價值，上一場我們討論到，溝通和

決策執行過程如何考慮到地方的需要、地方的發展，要能夠開放更多的協力，替代個別的爭先與衝突，這在溝通上面是很重要的一塊，很感謝曾老師提出很多寶貴的意見，接下來請蕭教授。

蕭宏金：

高雄市議會議員郭建盟(左)，趙永茂教授(中)，蕭宏金教授(右)

趙老師，兩位議員，三位教授，大家好，來這邊收穫很多，很高興來參加這個論壇，剛才三位果然是我們政治公共行政學系的明日之星，他們講完之後，我都不知道要講甚麼了。

我想大概有幾個重點，我做一個補充，因為今天的主題是溝通，然後就是問題的導向，對我來講，我認為溝通就分為三個層次。

第一最簡單的，最表面的，就是要資訊，就是 Data 問題。第二層就是情緒或思緒，第三層就是屬於理念，如果把他放在府會關係，或者是我們的政治生態的話，就是你的理想，你們政黨的使命等等，我們今天把他放到問題導向的溝通，問題就是們在行政學上，我也是學行政的，我們學行政的如果從行政來講，就一定要考慮到政治，社會，還有經濟，最主要就是這三個，每一種他所主張的價值觀是不一樣的，我想這是每一個地方領袖他們所要賴以選舉，或者是生存空間的一個合法性。政治人物應該比較講究的是在做分配的時候，我要了解的是他有沒有公平的問題，或者是不是有不符正義的問題，有沒有分配的落差，這方面就是我認知的問題的導向。

談這個問時候，像各位剛剛講的都很正確，公民、需求、最主要就是參與，我們現在是民主時代，因為是民主時代，所以我們才有府會關係，民主它就是參與，但是我們也發現隨著文獻越來越參與，我們發現有一些新的垢病出來，這些

很重要的人類的價值觀還是持續，可是人類也有新的科技，還有產生新的方法，所以說在促進溝通的部分，可以試著往前瞻，應該是要看到我們台灣未來發展的時候，我們需要甚麼樣的府會關係需要做甚麼溝通。

我大概考慮到兩個，因為如果從地方政府，就是從市政府角度來講，我會想到的第一個就是社會影響評估。社會影響評估我會看行政人員對這個社區，比如以高雄是來講，有三民區之類的，每一個區就是一個小社區，我們行政的資源，或者行政的提案或者方案下去，到底有沒有解決這個問題？這個問題我相信，一定就是剛剛偉寧還有冠球所講，一定會出現所謂的 Data，資訊就是溝通的最表面，我們這幾年都在講所謂的 Open data、開放式政府，開放式政府的就是那些可以讀的 data，透過人工智慧自動的學習，他學習之後會配合我們的地方問政，他可以從那個資料中，很快的撈出資料，知道哪裡分配不公平，導致失業的問題，為什麼我們的環保問題，pm2.5 會升高是塞車還是甚麼的…，這一些，實際上在國外先進國家，美國、歐洲、日本都已經使用，人工智慧不是使用在私領域，而是使用在我們的公領域，像交通、環保的問題。我記得匹茲堡有一套系統，他那套系統就是發現 pm2.5 值會升高是因為塞車的問題。

當然溝通產生的原因很多，有些是邏輯推演的問題，可是誰對誰錯呢？當然不是用嘴巴辯論就好，我們必須要做證據導向型(evidence base)，現代先進國家都是這樣子。講話都要有證據，你講的對跟錯，對公民的利益有沒有增長，我們把資料拿出來看，譬如解決停電的問題，我們用了很多電的方案，那你就把數字拿出來，我們就會支持。

這個會對台灣未來社會產生革命式影響，他的迫切性越來越強，以前我們認為小學生從小培養公民素質，像數學啦，英文啦，國文啦，但是你有沒有發現，現在不是這些，現在網路科技是公民素養最主要的東西。很多政治的重心，實際上慢慢的從實體移往虛擬的世界，所以我認為在未來的世界，比較先進的地區，台灣也一樣，這是我個人的研究，不一定是客觀，你會發現，選民比較會支持注重公平這些的，大概兩三年前，從那個甚麼花的運動開始，就顯現了這個價值觀。所以選民就比較不是在意我是不是傳統的方法提供服務，他可能會認為，如果你今天跟我的溝通，透過各式各樣的溝通的管道，可是你讓我看到的是，你就是在解決公平的問題，或是正義的問題，時代力量就是這樣的產物，所以它會當選，因為老百姓認為這就是一種溝通。

所以我認為如果可以考慮的話，就是人機合作的方式，他們是替代了所謂政策制定者的角色，雖然文獻上有人反對，但也有人贊成。我認為最主要的決策權還是在地方領袖手裡，這個工具它只是輔助，它具備蒐尋資料的能力，有引擎的功能，它把你的資料弄進來，然後會把它轉換，在過去二三十年，因為電腦的介入，我們的運算能力跟演算能力大為提升。所以變成說，如果這個問題採取的方案，它的結論會很容易被估算出來，預測能力很好。我們過去講的，政策解決問

題的選項沒有辦法很精準，但是現在就可以很精準了，如果他可以做得很精準，就是今天早先給我的資料，就會比較客觀精準，做得好，然後我們整個生產力會提高，以上謝謝！

趙永茂：

謝謝蕭老師提供很多寶貴有關溝通應該具備的價值觀，在公民正義公開性、協力性等等，在選擇政策的討論，非常的重要。這些在我們做很多決策的過程，溝通的對話過程，建立一些對話原則都很重要。審議式民主也算是一種直接訴求於社會的參與的溝通形式，過去是由行政主導，或是一部分由議會來主導，未來應該要結合社會來共同來執行這些政策的活動與討論。現在技術開放，審議式民主與參與式預算發展很快，上一場施勝文老師也提到，美國、西班牙及很多國家都了解台灣的發展，有些個案也都出去，與外面的溝通，引進外部的知識與技術，創造自己的溝通成果跟知識技術也是有可能的。感謝蕭老師的報告，謝謝！接著請兩位議員發言。

郭建盟：

趙老師，還有四位教授，很期待參加這個會議，也在主持人提供的資料情況下才開始進入狀況，知道今天我們要討論的議題。像趙老師先前提的，地方議會相關的論述其實不多。我自已在當民意代表的過程，都是遇到問題再學習，而且都是衝突之後發現問題，發現問題之後再去學習，這些學習過程當中，也不斷的在期待說，怎麼樣找到最有效的溝通方式，能在政府跟民眾之間扮演一個最適當的溝通角色，我們最大的成就感，是聽得懂民眾反映的問題，能夠把民眾的問題找到解決的方式，而且最大的能耐是你要去說服政府，你要去說服他願意照你的方式，或是他有更好的方式能解決。如果在我們共同的努力之下，能把這案子解決下來，那是我最大的成就。

我當了 10 年的議員，我發現這種成就不多，但是我試著在就沒有辦法達到這個結果，都清楚的記錄下來中間所有的過程，這個紀錄不會在這個時候開花結果，可是我們期待下一次可以開花結果，或是在哪一次機會來的時候，比如說發生了一個新聞事件，機會來了，那時候我們在反映這個問題的時候，當初大家不當一回事，現在出問題了，發現其實我們當初的建議是對的，所以政府更好做事，或是民眾支持的力量也多了，這樣我們就算是完成了，譬如說，伯勞鳥以前你說要保育伯勞鳥，肚子都顧不了了，你還在說保育伯勞鳥，你議員敢說這個，將來就選不上。但這時候(年代)，你敢去吃，你吃一次的下場可能就是選不上。

所以政策的推動，有時候都要各個方面的配合，剛剛幾個點其實都蠻重要的，比如說剛剛蕭老師提到大數據資訊，其實我對政府的瞭解跟實際上參與政策制定的經驗，我在市政府也服務過，每個政府早上的七點半八點開晨會，開會時手裡拿著新聞局 6 點半做的跟市府跟市長名字有關的簡報資料，並開始讀給與會的人

聽，但是現在因為數位媒體多了，所以他們就多了電視、批踢踢(ptt)、廣播各方面，把這些數據抓到早上開晨會的處理事項。

高雄市議會議員郭建盟

我參與這個過程當中，我就說其實要批評政府很簡單，找記者先寫，然後針對記者寫的問題，你只要會去鋪陳後面加溫的事項，這個政策就達成了，或者是養一群人在批踢踢(ptt)裡面一直罵，這樣子政府也會怕，所以這個有它的好處，也就是這些施政的過程，會更貼近民意，但是這個民意是真的嗎？還是民粹？政府會不會因此抓不到施政的重心。

我自己曾在陳菊的市府團隊裡面，陳菊施政的第一年的時候，我們都勸她甚麼事都不要做，討好選民討好市民，不要跟自己的選票過不去，第二年再來做。小英敢在第一年的一年多，就把該改革的所有事都做，她不是來討好選民的，小英會當選，不是她的支持率高，而是前面的政府太爛，她做了這些原本民眾反映給她，期待她要做的事情，到現在還堅定的在做，繼續觀察下去她還做得了多久？她現在做的事情，都是當初原本人家都期待她要做的，政府如果都是看著這些民調做事情，這些首長都愛這些批踢踢(ptt)，都愛這些報紙，我相信她小英就是把人民看不到的未來，帶領我們去到那個地方，如果都看著報紙在施政，看著批踢踢(ptt)在施政，我們還有未來嗎？或者是我們可以策略性的，就像某大報，可能已經是有特定立場的報紙，他就可以逐步用媒體報導的方式，去影響你的施政，那你要怎麼辦？這個可能就是我要在這裡請教各位的，也是我看到的憂心，

第二個問題是我自己在高雄實際上遇到的，可能跟台中的狀況不太一樣，因為我們是縣市合併，我們的市長現在邁入第 10 個年頭，她會執政 12 個年頭，在我們這次施政的結果，是完全執政，預算全拿，議會的發言權也全拿，那這樣子的結果，市長是政黨大老，你做一個執政黨的議員，你敢在下面說三道四嗎？你

會有這種壓力。

再來這個政府他會大到願意去聽民眾的聲音嗎？民眾聲音要大到他們在意的只有 ppt，或是報紙寫很大的篇幅，一些民眾反映的問題，稍微理性一點的問題，如果沒有這種衝突性的，政府會在意嗎？會聽得進去嗎？包括高雄，雖然我是執政黨的議員，雖然我也知道長期資源配置不公，還有長期重北輕南的問題，但我長期在財經小組，還身為召集人，我當了 10 年的議員，我看到我們這任的市長所借的錢，是所有市長最多的，再這樣借下去，高雄會跟苗栗一樣，你當一個財經小組的召集人，你一定知道快狀況了，你能不踩剎車嗎？你如果不踩剎車的話，哪一天如果真的出狀況的時候，那你當了 10 年的議員，你為甚麼都沒有發出警訊？那你的責任在哪裡？

苗栗倒的時候，除了罵那個縣長以外，也罵了那群議員，你們當初審預算的時候在幹嘛？我現在遇到這些難題，可是我們的市長現在很大，但是她是一個值得尊重的大，但是民主政治就是有這個極限，他就是你必須要去屈就這個現實，假設你現在敢去講太多的實話，民眾也不會站在你這一邊，民眾會去相信市長，他不會相信你所講的，既使你拿再多的數據，在情感上民眾還是會去站在市長那邊。

所以在這屆議員的時候，我發現我不能再這樣，我發現如果我沒有反映出來，哪天出事情的時候，我怎麼因應？我耗盡了好大的心力，我們每一屆會期，都有 11 次的質詢，我一定把我的質詢過程，清清楚楚的用質詢稿紀錄得相當完整，因為你要小心，你在議會講話的過程，你講了甚麼，你今天是面對執政黨的首長，千萬不要說過頭了，那就慘了，一定會影響到你未來的政治前途，所以你務必要準備好完整的質詢稿，要給你自己看以外，還要給大家看，給媒體看，給民眾看，給市長看，給官員看。

所以透過你的質詢稿，把所有的問題白紙黑字，即使他現在不接受，但是起碼留下證據，表示我反映了，哪天出問題的時候，我可以把他公布出來，而且我會要求把我的質詢稿，列入大會紀錄，我還把我質詢完以後，有官員答覆我的問題把它翻成逐字稿，併入我的質詢稿裡面的附件，要求列入大會紀錄，所以當民眾將來如果要去檢視這個議員的時候，可以完整地看到我已經盡力了，議員該盡的責任，官員不作為，市府不作為，我只是 64 分之 1 的議員，我能做甚麼？

所以我們只能在擔任議員的過程裡面，把記錄清楚的留下來，等哪一天新聞事件發生的時候，我就可以拿出來說，我們上會期都一起努力過，還沒有辦法達成，現在民意高漲了，是不是我們立刻透過立法來去做，雖然立法權在我們手上，那又麼樣？你面對的大政府你敢說你有立法權，他不要你修，就不要你修，在野黨他小，再加上也可能自己的努力不夠，在那邊用不適當的情緒性的方式溝通，所以也無法做到。

所以我期待我對民主，現在包括教授你給的文裡面有提到審計權，是不是修法回到議員身上，議員自己也不認真，連預算有的時候都搞不懂了，還怎麼審計？還有有些區域議員，他基於自己的利益，常常在審預算的時候，根本不在乎預算是否合理，只關心他關說的人事案有沒有過，常常用自己的利益交換預算通過與否，你萬一再給他審計權的話會砸掉，我當召集人的時候，常常有議員來跟我說，你哪一件可以讓他過，像這樣政府如何施政？剛剛我聽到參與式預算 100 億，我從來不會反對，你有辦法執行你就去執行吧，你準備拿石頭去砸自己的腳，100 億的參與式預算怎麼執行？他執行再多的參與式我都不反對，因為基層民眾的聲音太多了，你每一個人的意見都聽的話，聽完了整個會期也過了，所以民眾的溝通是要採傳統式的，或者是要公民參與式的，其實現在都在磨合中。

回來做個總結，我期待公民監督力量必須要更進步，公民監督的力量可以讓議員可以讓政府他們的施政不能和稀泥，而且公民的力量絕對不要流於民粹。公民千萬不要只有一個聲音，公民要有各各不同的聲音，不同的聲音現在又有社群軟體，都可以讓被聽的聲音聽到，被重視的聲音聽到，我認為這些都可以彌補代議政治的不足，或者是大政府過於蠻橫的狀況。

但回過頭來，我還是期待大家去解剖，小英政府現在的民調低，真的是她做得不好嗎？真的是嗎？我不是基於政黨，我覺得她不過是做了當初承諾民眾應改革的事項，如果現在大家都用表象式的大數據，沒有辦法反映真實問題，因為批踢踢(ptt)都是反對的人在說話，真正有時候他只是沉默的少數，他不會去講話，只要前面帶風向後面他就跟著走，如果施政開始往這個方向去，這個問題會是真的問題嗎？問題導向的溝通，那問題就確立是真正的問題，政府如果照著這個不是真的問題的問題去施政的話，那怎麼辦？如何防止這種事情發生，以上跟大家分享，謝謝！

趙永茂：

謝謝郭議員，剛剛提到他在面對這個大政府之下，很有勇氣又技術化提出他的真正建言，包括改革和討好之間，到底怎麼去做，這部分也是我們在議會推動溝通後續基礎性的發展上面，還要進一步的觀察。但是大體上，如同各位剛剛所提到，在公民監督發展之下，包括這些審議的民主，已經有一個很好的基礎，在政府議會和社會之間，慢慢的形成一些公共討論的空間及一些機制，未來希望建立更多多元的監督機制，台灣的發展還有很多待觀察的地方，接下來，請賴議員來發言，謝謝！

賴佳微：

趙教授，現場的所有教授來賓，郭議員，我自我介紹一下，我是第 3 屆，我從政 10 年，我大學畢業以後，沒有再進修，就從事這份工作。

我剛剛聽到幾位教授跟郭議員提到所有論點，讓我有一些想法，我從政前兩

屆是在胡市長(胡志強)任內，所以以前我是反對黨，這一屆我是執政黨，所以我的資歷跟郭議員不太一樣，他是一直都是執政黨。

台中市議會議員賴佳微(左)，高雄市議會議員郭建盟(右)

以前剛開始我就是學習做反對黨，到這一屆我學習做執政黨，而我第 1 屆做的是台中市議員，第 2 屆做的是縣市合併的市議員，這 1 屆是縣市合併後的執政黨。市議員對我而言，每 1 屆都像第 1 屆，我會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挑戰，剛剛有提到很多關於參與式預算，或者是大政府的優缺點。

討論到民眾的事件或問題的時候，我往往都會強調，那不見得是問題，優點不見得是優點，缺點不見得是缺點，他可能只是一個特質，到底是轎車好？還是摩托車好？還是腳踏車好？我想在田埂小路上，腳踏車一定比轎車好，所以到底腳踏車他是真的好嗎？還是轎車真的好？其實這只是特質，所以我簡單的做一個想法的總結，回歸到一個問題導向，拋出問題的人，他本身就已經內心既定這個問題的導向，他本身對於這個導向，內心已有想法，但是接收這個問題的，縱使我接收他的導向，我是否要照他的導向來，還是我要照我的導向來回應？

比如說網路上常常有人說一樓起風了，意思是說導向被改變了，常常有人一直罵一直罵，到後來罵的方向被改變了，為什麼？因為出現改變導向的人了，我們用十字軸線來說，中心的核心點，甚麼叫核心點？其實無論是政治，還是任何的事情，都可以套用在這個十字軸線上面。用東西南北來說，中間一定有一個中央，但是我們會有一個東南東北，或者是西南西北之類等等，這部分整體而言，我們要去思考的是，以現在台灣的型態，到底我們哪部分偏重了？哪部分真的已經過度忽略了？

剛才我們郭議員提到那重北輕南的時候，我笑了，其實在台中講的是，重北

輕南忘台中，那花蓮應該會說花蓮根本被邊疆化了，我想花蓮的議員大概就會這樣講吧！桃園也會說，我們桃園縣現在是六都了，為什麼我們會這樣？整體上而言，問題導向終究回歸如何解決問題才是重點。

但是解決問題要先撫平情緒，情緒撫平了才能真正以平和的心態，來面對面坐下來討論事情，情緒是很容易被挑起的，比如說我在議事堂上面，對討論一個事件的時候，跟私底下來面對討論一個事件的時候，在議事堂上，我就會越講越憤慨激亢，我常常會覺得這個事件，不是只有在我這裡發生，在很多地方也會發生，這是台中的大問題。

剛才郭議員有提到苗栗的事情，其實我在議事堂上，也有提到這件事情，我說你們不要看苗栗這個樣子，如果我們的社會政策一直這樣丟錢進去，你應該去思考，哪一個該花？哪一個不該花？這個政策是否該做？就將來就會變成像苗栗一樣，因為人民在思考這件事情的時候，贊成的人當下他可能急需要這筆錢，雖然我知道我不應該贊成這個，但是我真的很需要，最後在某種程度上我就同意了，那到底是對是錯？

其實回歸整體的大環境，這變成是一個大環境的特質，剛剛蕭教授有提到太陽花，其實在太陽花之前，就醞釀很久的所謂公民運動，公民自稱刁民，我心裡其實應該說是很傷心的，因為當刁了以後，這個社會就會失衡，社會需要的是動態的平衡，當你靜止不動的時候，這個社會就完蛋了。

比如說人只有在倒下去得時候才不動，甚麼叫動態的平衡？就像我們隨時都在動，包括像我雖然坐著，其實我也在動，這個就是動態的平衡，對於教育品德，人需要的是甚麼？所有在這塊土地上的人，需要的是甚麼？

每一個生命需要的，就是存在價值被認同，被尊重的感受，在苗栗他們當時為什麼那麼支持劉政鴻？劉政鴻當時是第一名，現在苗栗為什麼破產？他開的那些路，真的有用嗎？他的那些建設，真的有效益嗎？而這一些東西，劉政鴻為什麼要去做？他相信這些是長遠的，他終究以後會被傳誦的，他相信他未來他一定會有雪恥的一天，將來他被登記歷史上，這是劉政鴻在做縣長的思維，所以他才會蠻幹下去，導致於後來破產，讓接手的縣長和接手的民意代表傷透腦筋。

他想到的是，他將來沒有問題，這個將來是短期的，思考到某些短期效益，短期炒作，他認為這個短期就會回收，所以他敢做下去，而他認為這個短期中期，到長期都不會有問題，所以這個東西，終究回到我們講的人工智慧。

我現在三十五歲，最近我都有在使用 Face Book， Face Book 就就有運用到人工智慧，像 google 的搜尋功能，也是一種人工智慧，也是一種問題導向，利用關鍵字，他就會自動列出相關內容，但這真的是你要的嗎？

人還是終究是操作這些大數據的人，所以說在操縱和被操縱之間，到底是民

意代表操縱選民？還是選操縱民意代表？還是政府操縱選民後操縱民意代表？其實這都是可以思考的，因為每一個民意代表會被選出來，就是代表不同的族群，每一個族群也代表不同的特性，才會聚集在議事堂，他夠多元了。

我同意公民參與是一個補充性的管道，參與式預算重要的是教育我們下一代如何參與政府的運作，因為無論是誰，包括議員在內，我們沒有實質去了解一個政府的運作，沒有辦法了解他運作上碰到的困難以及他運作上真正需要去溝通的部分，因為縱使是議員好了，縱使是官員好了，縱使是溝通人才好了，我們都須了解到很多部份之後，我們才能夠去做有效的溝通，我相信應該這樣去講參與式預算，才有辦法讓人民跟政府，跟民意代表好好的去理解參與式預算的意義是甚麼。

因為就一條路來講，究竟為什麼舖一條路要那麼久？民眾會認為一條路剛舖好為什麼又要挖開？為什麼哪些管線沒有辦法一起做？為什麼同樣是市政府的一級局處，沒有辦法彙整？在彙整上出現了甚麼樣的困難？那個局處真的只有兩三個人？每個局處的大小月不一樣？甚麼叫大小月？有一些局處是二三月在忙？有的局處是四五月在忙？每件事情不同？月份輕重緩急就有所不同？

比如我的服務處開學的時候社會補助案子就特別的多，不同類型的服務案件反映的都是政府系統中間的灰色地帶，這些灰色的地帶，我的認知議員、委員其實代表的是政府跟民眾之間的一個窗口跟樞紐，我們是那個關鍵。

民意代表就是代議士這是一個很好的設計，這個設計本身被我們自己遺忘了，大家有沒有認真的在使用？我為什麼要一直的強調，我沒有去念那麼多的書，像郭議員提到的，就是接到就去解決，他解決的當下就是學習，每個人的學習的方式不同，有些人他必須先學習再去應用，有些人必須邊學邊做。

像我就可能不是那麼適合先學習再運用，我必須邊學習邊做，可能我適合的區塊是某個區塊，但是我會是那個區塊的人。我們說溝通的時候，里長的位置肯定不了解議員做的，議員縱使再理解市長的辛苦，也不了解市長他的狀況，因為他就不是坐在那個位置。我爸爸做兩屆的議員，我做的女兒也是坐在議員這個位置以後，才知道我爸爸為什麼常說，事情不是這樣做的，常常這樣的罵我們，但是我也是做了很多年了以後，我才這樣罵我的助理。

我們講縣市合併的磨合，這是文化，回歸到的就是教育，我必須講原本的市步調是比較快，原本的縣他的步調是比較慢的，合併以後，他的磨合我們不可能有一百分，當大家都認為所謂的菁英模式的時候，那個只是一個特質。 我必須再講一次，一百分真的好嗎？一百分有一百分所需要犧牲掉的，大家可以回想一下，自己童年你犧牲掉的是甚麼？但是學習成績平平的人，他有他所得到、所擁有的，但是你們也有所得的，每一個人得到的都不同，而是面臨自己擁有甚麼，然後去善加使用，而且去了解這個存在價值的重要性，我覺得這個很重要。所以

我覺得政府在這上面，有一點點的偏向民粹，但是並沒有那麼誇張，我為什麼會這麼說，從台灣大停電，我認為我可以看得出來，我們台灣人的守法的自主性，有很多要去思考的，其實有很多問題本身就是答案，這是我最後要講的，我們的教育、生活品質才是我們真正需要去紮根的，而這些紮根能夠有效的去在我們台灣，做一個有效的動態平衡，他就不會是一個大風大浪，謝謝！

趙永茂：

謝謝賴議員，賴議員提了她很多寶貴的經驗，我們知道賴家在台中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世家，而且傳統上都是站在反對的立場，但是到這一代也給我們一些新的觀點，另外有沒有老師有其他的補充，如果沒有，我們就在這裡結束，謝謝大家！

B4 場次：跨區域合作

主持人：

卓伯源　前彰化縣縣長

主講人：

九位與會國家會長、代表及議長

與談人 ：

王振軒　中國文化大學推廣教育部教授

邱榮舉　國立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教授

陳立剛　東吳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兼主任

陳牧民　國立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教授

高閔琳　高雄市議會議員

黃盈智　嘉義市議會議員

神奈川縣議會議員小島健一(左)，主持人卓伯源先生，TCF 理事長林晉章

林晉章：

接下來，我們請前彰化縣長，前立法委員卓伯源來為我們主持今天 B4 場的論壇，讓我們用熱烈的掌聲，歡迎卓前縣長。

卓伯源：

謝謝林理事長，謝謝各國的代表，我們國內的學界的先進，以下的議程討論的主題是跨區域合作，我們知道在地方政府地方議會，有很多跨國的合作，還有

簽訂城市合作關係姊妹市，以合作關係為前提，可以成為城市經驗作為分享。

今天跟上一個主題一樣,有8個國家的代表,還有我們台灣民意機關的代表，接下來的議程，就依照我們表訂的進度，先邀請8個代表團的代表，首先邀請日本代表團的代表小島健一議員，跟大家分享跨區域合作的體驗。

小島健一：

我是神奈川縣議會的議員小島，這次有機會，到這裡參加這個議會，非常的感謝，上個禮拜我們在橫濱，有遇到台灣到日本的女學生，這個禮拜輪到我來台北作客，能夠這樣的交流，非常的榮幸。

神奈川縣在世界各地都設有辦公室，在亞洲地區有新加坡，還有美國的北美地區馬里蘭州，還有歐洲我們也有辦公室，中國的大連、泰國的曼谷也有我們神奈川的交流辦公室，我們透過這樣的辦公室，跟各個地區進行交流，這個有很多的功能，包括觀光招商。神奈川在很多的地方有據點，我們也提供協助。所謂跨區域的合作重點在觀光，讓彼此的國家能夠繁榮，增進彼此之間的感情，有更多的觀光客，到彼此的地方去訪問的話更好。

大家都知道 2020 年東京要舉辦奧運，現在正在加緊準備工作，在東京的南邊就是神奈川縣，神奈川縣也幫助這個奧運，希望到時候能有更多的觀光客到日本神奈川來訪問。安培很重視觀光產業的發展，喊出觀光立國的口號，去年日本觀光業產值成長了百分之二十，裡面有很多的觀光客到我們神奈川縣去旅遊，神奈川縣為了迎接各國的觀光客到日來，旅遊業做了很多的準備工作，當然也進行相關的宣傳，我們的知事，還有橫濱市市長，也都到其他的國家去進行宣傳活動，上個月我們的知事，也到越南去進行觀光宣傳、招商引資的活動。

神奈川縣議會議員 小島健一 (發言者)

神奈川縣到底有甚麼樣的特色呢？我想在座的各位，可能有多人到過神奈川縣最大的城市橫濱市，它是一個近代的港口，還有箱根的溫泉，還有鎌倉市，這是以前武士居住的地方，我們也用這樣的宣傳，希望能吸引亞洲的觀光客，到神奈川來旅遊，事實上，現在已經有很多的觀光，包括中國，泰國等等，都到日本來觀光，我們也會盡最大的努力，來招待各國的旅客。

還有投資的事，我們神奈川的公司，希望到國外去設點的企業也很多，到國外設點的企業中國有 358，泰國有 144，台灣有 62，香港有 62，新加坡有 58，馬來西亞有 46，韓國有 54，菲律賓有 26，有一家公司在斯里蘭卡也設有分公司，這些都是神奈川縣的公司到國外去設點合作開創商機。

我們也希望海外的國家跟企業，也能夠到我們神奈川縣來設點，包括辦公室，我們也可以免費提供，還有提供很多的優惠措施跟服務，希望能夠吸引更多的外國企業，到我們神奈川縣來設立分公司，或設立工廠。我們現在有 900 萬人口，很僅次於東京的第二大都市，還有很多公共建設也很齊備，我們衷心的期盼，有多的企業，能夠到我們神奈川縣來設點，以上是我的報告，謝謝！

卓伯源：

謝謝小島健一議員，非常詳細的介紹神奈川縣，我們松田會長，要向大家發出邀請。

松田良昭：

非常感謝，我邀請大家到神奈川縣，還有就是明年的 5 月 27 日[1]，我們將會在日本舉辦第三屆亞洲地方議員論壇會議，非常歡迎大家來到日本，我們在東京見面。

卓伯源：

感謝日本會長的邀請，明年將在日本舉辦，歡迎大家一起到日本參加會議，我們也祝福第三屆的 ACF 論壇在日本能夠順利舉辦圓滿成功。接下來，我們要請菲律賓團的代表。

Danilo Dayanghirang：

我有幾點要和大家分享，第一點，這是一個很棒的機會，大家可以齊聚一堂，讓大家可以加深亞洲地方議員論壇和議會之間的連結，我相信我們必須要更團結，我們已經有組織了，現在應該要秘書處這邊，有更強的能力，可以來處理 ACF 相關的一些事務，讓我們各個國家能夠有更緊密的連結。

[1] 2018 第三屆亞洲地方議員論壇(ACF)的舉辦日期由於與主辦單位日本會議預定的一些行程衝突，原定 5 月底的時間，已經更改為 8 月 19-21 日，為期三天。

Danilo Dayanghirang (中)

接下來我們就要更急的動員，像剛剛日本已經發出邀請，我們明年到日本去開會，我這邊的提議，我們互相的交流，讓在地的政府能有更好的治理能力，像我們菲律賓，傳統政治世家來掌控，但是我希望，我們的中產階級，能夠有更多的賦權，我們市議員，應該也有更大的影響力，所以我們必須要更緊密的合作，才能達成這樣的目標。

第二點，就是我們這個組織，也要去加深貿易的連結，我們也可以互相舉辦企業媒合之類的這種活動，來讓我們這個地方層級，有更密切的貿易商業往來，這是兩點建議，第一點讓我們的祕書處運作能力更加強，第二點就是地方與地方有一個商務上的交流，謝謝！

卓伯源：

謝謝菲律賓團的建議，我們可以拿來當參考，接下來請斯里蘭卡的 Seyed Ali Zaheer Moulan 會長來分享。

Seyed Ali Zaheer Moulana：

我也同意這個區域之間的合作要更緊密，尤其是跨國之間的區域合作，我們真的要加深我們之間的連結，我也了解我們今天有超過 200 名地方議員，很多是從菲律賓、日本、香港來，雖然我是唯一斯里蘭卡的代表，但是我相信下一次，一定會有更多我的同事來參加這個論壇，今天早上，我有提到說這個同儕壓力這件事情，當我們都有同樣的挑戰，大家都有相似的經歷，必需要合作。

就像剛剛其他講者提到的，我們如果團結在一起話，我們就屹立不倒，但是如果我們分散力量的話，我們就可能被各個擊破。我們都在亞洲這個區域，我們

都面臨一樣的挑戰困難，我們自己的問題，我們可以從別人學習到一些解決的方法，所以當亞洲所有的國家聚集在一起時候，我們這個 ACF，亞洲地方議員論壇，我們的角色非常重要。

Seyed Ali Zaheer Moulana (中)

我跟各位分享不只是斯里蘭卡，還有印度、巴基斯坦，這個都必須要有更多的地方議員論壇，從今天開始，希望你們允許我們加入亞洲地方議員論壇，我們也歡迎各位隨時來參訪我們的城市，任何跟斯里蘭卡有關的問題，歡迎隨時來問我，我們斯里蘭卡是一個非常棒的島國，和剛剛馬來西亞的代表，提到的情況一樣，我們斯里蘭卡也是多元種族宗教的國家，有的時候，我們也面臨很多棘手的問題，但是我們都逐一的解決，能夠平衡的大家共存，避免一些衝突，所以我們談到的公私部門合作，我們都有相同的經驗，將來跟我們合作，我們的大門永遠敞開，我們希望創造雙贏的局面，透過我們跨區域合作，來讓大家都能夠獲利，未來我們希望能持續的參與亞洲地方議員論壇，謝謝！

卓伯源：

非常感謝斯里蘭卡會長給我們的建議，就是要加強區域合作，大家可以透過這個交流，得到共同成長的機會，接下來請吐瓦魯國的代表 Kofe 酋長跟我們分享。

Siliga Atiake Kofe：

謝謝主席，我們這一場討論的是跨區域的合作，我想這部分，我已經提過了，跨區域合作的確非常的重要，我們各國要密切的合作，在地方政府層級，或者是國家的層級，都應該合作，因為在地方的層級，我們更貼近人民，我們更了解人民，而人民也更了解我們地方的民意代表。

前面有提到，我們有很好的關係，我們的中央政府，也面臨相當多的問題，而中央政府距離人民，是比較遠的，因此我們認為應該加強關係，而且是在地方這個層次，如此一來，我們就可以服務人民，提供更好的人們福祉。亞洲是一個幅員廣大的區域，跟我們南太平洋的島國相比，亞洲範圍實在太大了，我們往往需要靠仰賴，像大哥哥一樣的這些國家，我們需要不同的援助，為了做到這一點，我們幾乎無可避免要先建立關係，才能有後續的合作，讓大家有更深的了解。本人非常的希望，我們太平洋區可以更加成長，彼此的關係，更加深厚，我們不管在國家的層級，還是在地方的層級，都能更加的深厚，謝謝主席。

卓伯源：

謝謝吐瓦魯的酋長代表，發出了友誼的呼喚，大家要更密切的交流。接下來，依照表定，我們邀請馬來西亞槟城州立法議會劉子健議長，來為大家分享，歡迎劉議長。

劉子健：

我想對跨區域合作這個主題分享一點意見，前面講到地球村，相信大家都同意，我們都住在地球村子裡，地球村裡面的各個村落，我想 TCF 台灣地方民代公益論壇，在這方面，做了很好的貢獻，加深各國間彼此的認識，比如說，我們今天共聚一堂，討論了這麼多的重要的議題，非常的有意義。

這邊提供一個資訊，給大家參考，在馬來西亞槟城，我們其實並沒有太多的友誼市，我們友誼市有台北、高雄，還有一個橫濱市，我們也有橫濱市的代表在這邊，我想跨國之間的合作，要具體落實，而不是單單簽屬，比如說備忘錄等等。我們的跨區域合作應該要更具體一點，比如說，我們建立起友誼市具體的行動。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些槟城跟他的姊妹市的有趣事情，槟城有 30 個友誼市，而槟城的州長也有相關的策略去跟這些友誼市合作，讓槟城的人民可以看到這些友誼城市，譬如在槟城，每一年舉辦一些活動，特定的一個月份，大家都到槟城辦活動，每一年會請台北來我們槟城組織一些活動，讓槟城的人更了解台北的文化，又如日本，我們也有日本的文化季在槟城舉行，槟城跟德國的一些城市也有合作。如此一來，我們就可以了解不同的國家的文化，可以看到他們的表演等等，在槟城每一個月，大家都可以看到不同的表演。我們希望跟友誼城市多做合作，讓我們槟城的人民，可以瞭解除了政治及國際貿易之外，也可以更促進人民之間的了解。

我想跨區合作的絕對不是國際貿易而已，希望能有更多軟性的交流和文化的交流，能夠更了解各國的文化，這就是為什麼我們非常高興很多國家都跟槟城建立友誼城市的關係，能夠在槟城展示他們的文化。除此之外，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從 2008 年以來，也把槟城認為是一個特定的文化城市，讓我們更能向全世界宣傳槟城，我們更希望國際的朋友，能夠來槟城體驗一下槟城，給大家舉一個例子，

檳城有一條街，我們把它取名為和諧街。

馬來西亞檳城州立法議會劉子健議長(右)，TCF 理事長林晉章(左)

和諧街是甚麼意思呢？就是在一條街可以看到伊斯蘭的文化，也可以看到超過一百年的華人寺廟，還有印度教及西方的教會，都有多年的歷史，而且他們還比鄰而居，這個是我們引以為傲的，我們可以共存不同的文化，彼此可以共處，這邊要誠摯地歡迎大家，希望大家找個時間來檳城看看，大家就會體驗到我們馬來西亞多元的文化，而且來自不同背景的人，都可以在同一條街上和諧共處，我們總會說假如想要對不同的文化做研究，可以到馬來西亞，甚麼樣文化都可以看得到，謝謝大家。

卓伯源：

謝謝劉議長，跟我們分享馬來西亞多元，跨區域合作的成就文化。接下來我們請台灣地方民代公益論壇的林晉章理事長。

林晉章：

大家午安，2015 年，我們 TCF 在台北舉辦全球地方議員論壇(Global Councils Forum-GCF)的時候，其中一場以地方議會擴大經濟整合為主題的討論時，我做了一個發言，我說我有一個直覺的經驗，若是經濟不好，現任議員就會選得很辛苦，所以經濟好壞，跟我們能不能順利當選連任是有很大的關係。2016 年 12 月，我們在菲律賓馬尼拉參加第一屆亞洲地方議員論壇，菲律賓主辦單位，以地方立法議會連合會在亞洲地區推動貿易及投資觀光機會的角色，公開提出這個題目來討論，就覺得很有意義。

當時我做了一個提議，也經過各國首席代表確認，也就是從這一屆開始，我

們希望能夠歡迎企業界人士，透過各地的議會幫他報名，作為觀察員的角色，來參與我們 ACF 亞洲地方議員的活動，這樣子下來在觀光、旅遊、貿易、投資議題上面，我們直接促成企業界人士對企業界人士，讓他們有直接面對面的機會，關於這點也得到各國首席代表的支持。

今天在會場上，也有很多企業界人士前來，希望在日本舉辦第三屆的時候，能夠有更多的各國地方議員，邀請你們國家城市的企業界人士，陪同你們去參加第三屆，不只是只有地方議員的議事溝通平台，也讓我們城市的企業界人士，能夠就觀光、旅遊、還有貿易投資，能做直接的聯繫，我相信他們賺了錢，下一次我們要競選連任，比較容易了，報告完畢，謝謝大家！(發言人演講資料，附在本文後面)

卓伯源：

我們非常的感謝林晉章，給我們很精彩的分享，接下來我請下一位王振軒先生發言，歡迎王教授。

王振軒：

大會主席，林理事長，各位議員先生各位女士，大家午安，各位先進剛剛就跨區域合作，做了很多精彩的論述，重複的地方，我就不再做說明，我這邊提出台灣地區做跨領域事項裡面，在過去的一段時間裡，有很好的合作成果的項目，跟大家做說明，也就是我們在 NGO 國際人道救援的這個領域上。

台灣過去在全世界各地的跨領域合作裡，我們有一個很好的成績。在這邊，我願意以路竹會資深顧問的名義，代表路竹會的會長劉啟群先生，向今天與會的代表，發出誠摯的邀請，路竹會在 20 年的時間，全世界的義診，每年有 6 次以上，所以已經有 25 萬的世界公民，曾經接受過路竹會國際醫療的人道服務，我們願意在這個合作基礎之上，去全世界需要的地區，從事醫療的服務工作

今天的與會國家當中，路竹會已經和日本簽屬災難人道救援協定，去年在外交部見證下，日本和台灣一旦有人道救援的事務發生的時候，路竹會是主要的合作平台，也跟日本的醫師協會簽屬相關的協定。過去我們也到菲律賓、蒙古、斯里蘭卡，去從事人道醫療的服務工作，我們很願意在這個合作的基礎上，追隨我們的理事長，前往全界各地參加會員國的醫療服務工作，這是我們這次會議中討論的跨區域合作，可以具體落實合作的一個項目，我們在這個基礎之下進一步和各位合作，以上是我的一個建議，謝謝！

卓伯源：

我們非常感謝王振軒教授，針對 NGO 跨區域合作，特別是提到這個路竹會，對於世界各個國家的醫療服務所做的貢獻，謝謝王教授的分享。下一位我們邀請台灣大學國發所的邱榮舉教授。

邱榮舉：

主持人卓伯源縣長，林晉章理事長，各位前輩先進，各位先生各位朋友，大家好，我幾年參與此類的活動，非常佩服感動，台灣地方民代公益論壇的創會人林晉章理事長，特別的熱心，結合了學術界，包括台灣大學副校長趙永茂教授等，共同來推動這樣的活動，今年舉辦的活動，有那麼多的國家代表前來共同商討，我覺得特別的感動。

陳牧民教授(左)，邱榮舉教授(右)

剛才也聽到明年要到日本舉辦，繼續討論來共同發展。我有一個建議，就是類似此類的相關的聚會、相關的討論，看怎麼樣子來推動亞洲議員的結合，創造雙贏局面。我建議以後相關的活動，各個國家能夠產、官、學、研共同組團，也就是有官方人員、相關學校、產業界人士，以及研究人員，共同來參與，可以讓這個會議論壇更優質，效果更好。世界各國的地方政府，包括地方自治的推動，最能夠貼近人民，所以觀光旅遊相關的投資，跨國聯繫合作，能夠發展相關國家的經濟、文化、旅遊、醫療等等。總之，這個活動將來能夠繼續加強產、官、學、研共同組團與參與，是我很高興的期待，謝謝！

卓伯源：

謝謝邱教授的指教，邱教授強調將來跨區域的合作，應該不限於地方議會，應該把這個層面更加的擴大，將產官學研能夠組團來參與。謝謝邱教授寶貴的意見。下一位我們邀請東吳大學的政治系教授陳立剛，他同時也是政治系主任。

陳立剛：

會議現場

謝謝主席，謝謝世界各地遠道而來的代表們，首先，我想恭喜各位，我們知道日本明年要接手舉辦第三屆論壇消息，明年我們可以在日本相見。

今天在座我們都有分享到跨區域合作的經驗還有想法，今天我想朝不同的面相來談國內的跨區域合作。為什麼我要用這個機會，來談國內的跨區域合作？因為很多的地方議會應該要討論如何合作，來促進這些區域的整合及合作，比如說台北這一塊，就有新北市、基隆市等地，甚至包括桃園市、新竹市，另外像馬尼拉這樣的大都市，其實是有超過 16 個小的城市，小的地方政府，像垃圾掩埋場、焚化爐這樣的問題，這些都是我們在地政府所面臨的一大問題。

當我們談到地方治理的時候，在這個區裡面的居民，他們能夠去決定去追求一些共同目標，但我們談到國與國之間的關係的話，就是東南亞、南亞、北亞、東北亞，追求的是一個區域共同分享的目標跟價值觀。我們把範圍縮小的話，比如說，大馬尼拉在地居民自己決定去追求他們的共同目標。我們這裡談到的區域治理、地方治理，其實不單單只是包括某一個單一的鄉鎮或城市，其實除了政府的參與，還有業界的參與、媒體、學術界、公民及學校，這些都是對於地方治理可以帶來貢獻的不同利益相關人。

焚化爐還有垃圾掩埋場，在台灣一直都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因為台灣只是一個小島，我們的土地資源應不充足，我們也沒有足夠的地方可以去做掩埋場所，所以我們必需要用焚化爐。在一縣一焚化爐的政策下，常常一個縣就有一個焚化爐，但是會有一些爭端，有些縣市認為他們不需要那麼多的焚化爐，也有縣市公益環保人士反對抗爭，也有當地居民反對焚化爐蓋在他們的城市裡，所以經過了這麼多年的時間，我們就有了掩埋場和焚化爐的合作機制。比如說，今天我們這個城市的垃圾產生量，並沒有達到一定的程度的話，我們可以把垃圾運到相鄰的

鄉鎮，付一筆錢使用相鄰鄉鎮的焚化爐，因為可能有些鄉鎮，有些縣市的焚化爐是超過一座的。這些垃圾燒完之後的爐渣，再運回去委託的縣市來做掩埋，所以這就是我提到的在地跨區域合作。

在地方議會，當然會討論要如何合作，如何去溝通與如何跟居民合作，來處理在地的問題。又譬如災害防治，有些地方議會或地方政府無法去處理這種澇旱的問題，必須要有跨區域、跨縣市的合作，這就是我所謂的小規模的跨區域合作，這個對地方治理也非常重要，所以我們要如何讓大家都能參與，在地解決在地問題，這當然也是值得我們討論的議題，這是我過去幾年的一點觀察

在剛剛的茶敘時間，有跟菲律賓的代表稍微聊了一下，其實透過 TCF 的祕書處，還有我們的主席，我覺得菲律賓代表可以去參訪，譬如台北市的焚化爐，就應該可以了解到，我們是如何的去做這種跨區域合作，謝謝！

卓伯源：

謝謝陳教授針對小規模跨區合作，特別提到這個焚化爐這個議題，菲律檳代表想參觀焚化爐，可以請林理事長來做安排。接下來，請國立中興大學陳牧民教授。

陳牧民：

因為我上一場用中文發言，現在我改用英文發言。今天的主題是跨區域合作，這不是新的議題，我研究的是國際關係，跨區域合作其實我們一直都在談，除此之外，我已是台中市國際事務會的委員會成員之一。據我所知，現在有以大網路，希望把城市連結起來，一個叫 UCLG，這個是亞太區的組織，也就是亞太區的政府聯盟，把亞太地區的城市連結起來，我已經參加過他們好幾個城市所舉辦的大會。

第二個網路叫做 CityNet，他是比較小規模的組織，台北市、台中市、高雄市都參與這個組織。所以不管是 UCLG，還是 CityNet，這兩個組織只有政府參與，市政府參與這些組織，市議員沒參與這些組織。今天我們是亞洲地方議員論壇，我覺得這個論壇有這個潛力，可以發展成一個新的平台，連結更多的城市，更多的市議員，我相信我們持續透過亞洲地方議員論壇，建立友誼的關係，我相信我們這個平台可以成長茁壯，可以做更多。

先前有人談到 ACF 可以做些甚麼？首先，我們把框架建立好，我們當然可以推廣觀光，我們當然可以邀請更多的國家來台灣看我們，也會鼓勵台灣的民眾，到各國的城市去看看。

另外，還有投資，我們東南亞的朋友及台灣的朋友可能都知道，我們的政府有一個新南向政策，就是我們要跟東南亞的國家，建立全面深厚的關係，特別是投資方面，像是菲律賓，就是我們相當重視的國家，也和我們有很深厚的關係，

我們有很多菲律賓的朋友來台灣工作，或是就讀，我覺得像今天的論壇可有更多的發揮的空間。

本人來自大學，我也有來自菲律賓及馬來西亞的學生。我總是希望促成年輕學子彼此之間的了解，我覺得這一點非常重要，像我們今天都坐在這裡，談到未來我們可以如何合作，而我們今天已經都建立起平台，我覺得我們何不吸引更多的學子參與這樣的活動，或者是成立一些團體，讓這些學子，在年輕得時候就彼此認識，甚至我們也可以在未來，舉辦一些文化交流的活動。

明年會在日本，未來接下來 ACF 可能在台灣，甚至在斯里蘭卡也可以舉辦這樣的活動，我要提的主張就是不要忘了年輕人，年輕人是未來的希望，不僅對台灣如此，對其他的國家也是如此，對於太平洋國家都是如此，我當然希望能夠持續舉辦去下去，我們希望更加強未來的合作，我也希望能看到更多年輕人的加入，謝謝！

卓伯源：

謝謝陳教授給我們很多寶貴的意見，我們要擴大平台的功能，同時也可以擴大年輕朋友的參與，謝謝陳教授的指教。接下來我們邀請高雄市議員高閔琳議員。

高閔琳：

首先要感謝理事長，有這個活動讓亞洲這麼多的城市代表可以交流，今天非常高興，跟各位分享高雄經驗，之後我會用中文發言，請大家使用口譯服務，謝謝！

我們的林晉章理事長，還有我們的會議主持人卓伯源，接下來，我會用中文跟大家分享我們高雄的經驗。各位與會代表，還有其他城市的議員，我們都知道，現在台灣的台北市正舉辦一個世大運，世界大專學生的運動會，所以有很多世界各地的大學生到台灣做運動方面的交流。

我來自高雄市，是台灣最南端的大城市，高雄市是一個非常大的城市，目前是台灣的第三大城市，有山、海、河港同時也是一個港灣城市。這幾年高雄市在城市外交，也有很多的努力，我身為高雄市市議員，我也非常的積極地在推動所謂的城市外交。我在高雄市議會，是第一屆擔任市議員，也是高雄市最年輕的議員，我被我們民進黨黨團推選為高雄市議會國民外交促進會的副會長，所以就常常在高雄市議會的工作裡，另外多負擔一個市議會的城市外交工作。

我常常接待來自菲律賓、日本(熊本市、三重縣等)、美國，包括夏威夷及波特蘭市，還有很多不同城市的議員，也進一步的跟他們有一些交流。

在 2009 年，高雄市舉辦世界運動會，我相信大家都記憶猶新。在 2013 年，

高雄市也舉辦亞太城市高峰會。在 2016 年也針對所謂的港灣城市，舉辦了全球港灣論壇，也就是希望跟地理條件各方面與高雄相似的城市多做交流，也期待我們在都市規劃上，或者是在城市的發展上，能夠有更進一步的激盪。

在 2017 年底，我們即將舉辦生態交通全球盛典(Ecomobility World Festival)，這是一個全球性組織，叫做 ICLEI，是結合城市永續發展(Local Governments for Sustainability)為目標的非政府組織，我也在這邊邀請大家，今年的年底有機會到高雄來參加。

前幾天我也剛剛從日本的熊本市回到台灣，也在議會的城市外交上有很大的斬獲，就是高雄市已爭取到在明年 2018 年舉辦下一屆的台日交流高峰會。像這樣的機會，我相信未來還有更多，可以跟日本議員作進一步的交流。

剛剛我細數了一些在高雄市承辦，或是高雄市和其他城市交流的機會，不管是議員對議員，還是城市對城市的交流，高雄市的姊妹市非常的多，大概有 30 幾個城市，包括韓國的釜山、大田，包括剛剛提到的日本熊本市、八王子市，菲律賓的宿霧，越南的峴港等等。在議會的部分，有日本的大阪、熊本、橫濱，韓國的仁川姐妹議會。在這些姐妹市之間，我們也時常交流，包括選舉的制度、議會的運作方法等等，都有很多不同的想法跟激盪。

最後我想談的是我們中華民國在外交上面的困境。我個人觀點是，要中央跟中央建立外交關係是非常困難的，甚至我們前一陣子又損失了一個邦交國，但是透過議會跟議會之間，或者是城市跟城市之間的交流，人民跟非政府組織的交流，我相信那才是最實際、最堅固的一種外交關係跟實質的合作。

我可以列舉一些高雄市對外的交流，比如說在農產方面，我們很積極的參與東京的國際食品展、阿布達比的食品展，希望能夠把高雄的農產品，優質的熱帶水果，甚至漁產、水產，能夠推銷到國際。

在教育方面，我們也很積極地跟日本推動海洋教育，因為高雄市有很多臨海的城市及學校，日本在海洋教育這方面花了很多的心思，特別是日本的三重縣，因此高雄市教育局經常會帶一些中小學校長及行政人員一同借鏡日本的經驗，彼此互相交流。另外學校跟學校之間也有姊妹學校，比如說高雄的三民家商、樹德家商等等，就跟美國的姊妹市，每一年夏天在波特蘭市的玫瑰遊行時，雙方都互相表演及競賽。

此外在交通跟都市規劃方面，前幾年，我曾經陪同陳菊市長到法國馬賽，馬賽是一個舊的港區，有一個舊的港，也有新的港區再造暨都市重建計畫，那時法國馬賽很積極地在推動一個歐洲地中海計畫(Euroméditerranée)，希望結合所有地中海的國家，推動讓過去的馬賽再生。馬賽和高雄在都市的發展一樣面臨港市無法合一的困境，所以我們就跟法國的馬賽進行交流。我們也在高雄市推出所謂亞洲新灣區的計畫，包括未來會有及現在已有的高雄展覽館、高雄水岸輕軌、流行

音樂中心，期待高雄，這個曾經是全球第三大港口物流的港口，能夠重新有一個新的面貌。

嘉義市議員黃盈智(左)，高雄市議員高閔琳(右)

在產業界，不管是石油化學、航太產業，還是我自己選區大岡山的螺絲扣件產業，都希望能夠跟世界有更進一步的交流跟貿易，事實上世界上最大產區螺絲扣件公司就位在岡山區，在產業界舉螺絲扣件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在港口部分，我們希望重新把物流這個產業重新帶起來，還有其他很多未來可以跟其他城市合作的，包括教育、交通、都市規劃、農產、醫療產業，甚至都市共同議題，包括都市規劃、垃圾掩埋、地下汙水處理，都是可以互相交流的經驗。

最後做一個簡單結語，2015 年蔡英文總統上任以後，一直在很努力推動新南向政策，我們也期許高雄市能夠成為新南向政策最重要的窗口，所以我們也很努力的推動和東南亞國家的互動。我認為以一個民意代表監督市政府的立場，我認為高雄市做得還不夠，應該要在新南向政策，尤其要在觀光產業、文化交流方面，要有更深的互動，同時針對新移民的部分，中南部有很多來自東南亞國家的外籍配偶及外籍移工，我們希望以城市治理的角度，推動新移民政策，運用新移民第一代第二代人口、語言、文化的優勢，幫助台灣、幫助高雄走向國際。

誠如剛剛學者說的，跨區域合作，不只城市對城市之間，不只海外，國內也要不同城市的交流，像垃圾處理、河川治理、災害防制，全球氣候變化、極端氣候影響下的特殊天災如颱風，都需要不同城市共同面對。所以在國內，期待高雄可以跟屏東、台南、雲嘉地區有更好的互動及交流。

最後謝謝林晉章理事長跟卓伯源縣長主持人，舉辦這個平台，讓我們能跟各

國的議員朋友交流，我很期待每個城市都有自己城市外交，讓中華民國讓台灣能有更美好的未來。謝謝！

卓伯源：

謝謝高閔琳議員的發言，他從高雄經驗出發，講到很多高雄跨區域的經驗，我想這不是一個議員的經驗，因為他還有在高雄市政府服務過的經驗，是一個難得的經驗分享，很感謝高議員。接下來我們邀請嘉義市黃盈智議員跟大家分享。

黃盈智：

嘉義市議員黃盈智(前排左)，台南市議員蔡旺詮(前排左 2)與右邊香港 4 位議員(逆時針:譚廣成主任、黃學禮議員、區諾軒議員、徐海山議員)

林理事長跟各位貴賓大家好，首先，我要以台灣地方自治的發展來看向來是各自為政，而且是大部分都以地方發展的議題觀點來思考。很少市長有國際觀，作跨區域的合作，雖然現在有人用行銷的思考模式認為治理一個城市要像行銷一樣，雖然是這樣，但是施行起來，還是有很多的問題，非常的難去執行，也就是說一個城市的發展，在腹地有限的情況下，若要發展得更好，就要和鄰近的城市合作，所以和鄰近的城市是息息相關。

有時和附近的城市合作又會出現兩個市長有不同的意見，很難去發展，真正要發展就是要兩個城市合作，才能創造雙贏，就像我的城市嘉義市，他相對的是一個比較高度發展商業發展的城市，和附近的城市比起來，附近城市有嘉義縣跟雲林縣，他們都是農業城市，在這個情況下，也是我提出來說要雲嘉聯合治理，雲林跟嘉義市，或者是雲嘉嘉三個縣市區域聯合治理，雖然他們為此事也常常開會，可是大家好像都心懷鬼胎，常開會卻沒又實際的效果出來。

所以我覺得說目前台灣首長都缺乏區域治理的概念，這都牽涉到首長本來要

合作但是換了首長以後，觀念個性不合，而使得原本要和合作的兩個縣市又開始競爭，競爭之後又產生對立衝突。所以我建議由中央政府來主導一個大的計劃，進行跨區跨縣市，甚至必須由中央來法制化，規劃明確的管理範圍，還有各縣市的權限在哪裡？這樣縣與縣或市與市之間，才能夠真正的合作，才能夠共同發展創造雙贏，以上，謝謝！

卓伯源：

謝謝黃議員針對跨區合作，包括全球化在地化的議題，還有區域治理挑戰的分享報告。我們還有一點點時間，開放給現場的夥伴自由發言，要發言以前麻煩先介紹自己，我們歡迎大家發言。

林晉章：

TCF 理事長林晉章

我補充一下，剛剛邱(榮舉)教授提議跟企業界結合，因為我今天有提到未來和企業界結合的事，但是我沒有特別提到學者，我們 TCF、ACF、GCF，幾年來都跟學界保持良好的互動，去年我們在菲律賓，看到 PCL(菲律賓議員聯盟)也跟學界保持良好的互動，甚至於 2015 年，我們去米蘭參加歐洲區域議會聯合會(CALRE)會議的時候，他們也是同樣情形，所以這個部分我們 TCF 沒有放棄跟學界保持良好的互動。

今天有來賓提到和官方如何結合，也有提到青年學子，我想這個都是我們未來可以參考的。另外陳牧民教授也提到一個組織 UCLG(United Cities and Local Governments)，我在早上開幕時有提到這個組織，我當 25 年台北市議員，知道每一個市長都很重視 UCLG，該組織是一個全球地方首長的聚會，是一個全球性的組織，非常強的組織，下面分成好幾區，有亞洲地區，現任全球會長是南非籍

的 Parks Tau，他是一個議員但是依南非的制度，議員可以擔任市長，因此他是市長又擔任南非地方政府聯合會(South African Local Government Association-SALGA)的會長，同時又被選為 UCLG 的會長，我們這一次也有邀請他來，可惜沒有聯絡上。

謝謝陳教授提醒，未來我們希望透過 TCF、PCL，還有日本的 JLCA，跟各國組成一個 ACF，包括韓國、馬來西亞、斯里蘭卡，還有今天參與的蒙古各個國家，我們把 ACF 組成，然後再跟歐洲的 CALRE，還有美國 NCSL(National Conference of State Legislatures)，還有加拿大的 FCM(Federation of Canadian Municipalities)，還有澳洲、巴西都有這樣的組織，然後組成全球的 GCF，我們希望將來全球的 GCF，能夠和 UCLG 一樣，一個代表全球的地方政府都是代表參加的組織，組成一個代表全球的地方議會都是議員參加的組織，我希望能夠透過個努力，讓這個夢想成真，謝謝各位！

卓伯源：

謝謝，我們還有一點時間，我來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來自彰化縣，彰化縣是台灣人口最多的縣，我之前在彰化縣擔任了 9 年的縣長，在這之前我也跟各位一樣，是地方議會的議員，所以我跟大家有很深厚的感情。

今天我們談到這個跨區域的合作，以我個人的經驗，我認為這是非常重要的，特別是對地方政府的進步跟發展是非常的重要。早上我們聽到李鴻源部長，提到地層下陷及氣候異常問題。彰化縣之前就運用跨區域的合作，把在台灣高速鐵路沿岸，特別是在彰化縣地層下陷的問題給解決了，我們是跟荷蘭合作，我們找到聯合國全球氣候變遷荷蘭籍主席 Dr. Hank，他在荷蘭有很豐富的治理地層下陷和預防海水侵蝕陸地的經驗，我們把這個地層下陷的問題作了一個有效的解決。

因為彰化縣也是農業大縣，所以我們也推動了跨區域的合作，到北歐，特別是畜牧業也很發達的比利時，他們對畜牧業的廢棄物的處理非常成功，所以我們和比利時合作，在彰化建立一個沼氣發電的示範區，這是一個跨區域的合作。

彰化縣也跟長野縣簽訂產業交流協定，還有群馬縣、高知縣、愛媛縣、靜岡縣、福井縣、北海道等等，都跟我們彰化縣是友好縣，特別要提到是宮城縣，日本在 2011 年發生東北 311 大地震，在大地震的那一年，我們把彰化縣全縣的捐款將近 3000 多萬的日幣，在地震發生的 3 個月內，就送到災區去，我們準備當地日本民眾最喜歡吃的熱帶水果，就是香蕉還有芒果，我們直接到難民的收容所去慰問他們，大家都很感動流下眼淚，這個看得出我們跨區域合作，我們感情的深厚，彰化縣是各國政府第一個在震災 3 個月之內就趕到災區去的。

另外 2010 年上海世界博覽會，是有史以來中國最大規模的盛會，我們彰化縣透過跟上海市的合作，也是上海世博城市發展論壇的台灣城市代表。同時，彰化是台灣自行車產業重鎮，彰化也跟歐盟(Euro Bike)進行產業合作，但是誠如剛

剛各國代表所提到的，其實我們地方政府，跟民眾是第一線的接觸，地方政府是可以福國利民,可以立竿見影的地方,絕對不能妄自菲薄,我們有很大發展空間、很大成功的機會，以上跟大家做簡單的分享，其他大家如果沒有意見的話，我們B4 組跨區域合作，就到這邊結束，謝謝大家的參與及指教。

Session B4: Cross-region Cooperation

Chair: Chair: Cho Po-yuan (卓伯源)

Former Magistrate of Changhua County

Speaker：

All Invited Foreign Chairpersons or Representatives

Discussants:

Wang Chen-shiuen　王振軒

Chair and Professor, School of Continuing Education,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Taiwan

Chiu Rong-jeo　邱榮舉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aiwan

Chen Li-kanz　陳立剛

Chairperson and Associated Professor, Dept. of Political Sciences, SooChow University, Taiwan

Chen Mu-min　陳牧民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Taiwan

Huang Ying-chih　黃盈智

Chiayi City Councilor

Kao Min-lin　高閔琳

Kaohsiung City Councilor

Lin Chin-chang (林晉章):

We will begin session B4. Again, we would like to ask former magistrate Cho of Changhua County to moderate the session for us. Please give him a warm round of applause.

Cho Po-yuan (卓伯源):

Thank you very much Chairman Lin. I would like to thank you all for your participation. Dear councilors from around the world and dear scholars, we will now begin the discussion of session B4. The theme of this session is Cross-Regional Cooperation. We understand at local council level there can be many opportunities for exchanges, for example, we have sister cities, we have exchange activities

between councilors. These are different platforms on which we can share our experiences.

Again, like the previous session, we have 8 representatives from 8 different countries. We will also hear from local councilors from Taiwan, as well as Taiwan scholars. Again, we would like to invite the 8 representatives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to give us their comments. First, we would like to invite the representative from Japan to talk to us about this issue. Let's put our hands together.

Kenichi Kojima (小島健一):

It is my distinct honor to participate in this forum. Last week in Yokohama, we received some high school students from Taiwan, and this week I am here in Taiwan. It gives me great pleasure to participate in this forum.

We have Liaison offices of Kanagawa Prefecture (神奈川縣) in different countries across the world. We have offices in Singapore, United States, Europe, Maryland, Dalian in China, and Bangkok in Thailand. We have our prefecture offices established overseas, and through these offices we exchange with different countries. These offices are multifunctional, like tourism, business, and commercial, and in different countries our prefecture offices provide our citizens assistance overseas as well. As for the interregional cooperation, we have our city councilors in attendance today and we have sister cities across the world, and through these relationships, we're able to deepen our ties with other countries and other cities. However, the main focus obviously is still tourism. We wish to increase these mutually beneficial relationships by visiting more major cities. I think it's going to help us even more.

In 2020, I think everyone knows that Tokyo is hosting the next summer Olympics, and obviously, we are in preparation for that great event. Since Kanagawa Prefecture is right next to Tokyo, we are going to host some events as well, and hopefully we can receive tourists in 2020. In Japan, because the national policy puts much emphasis on tourism, and our Prime Minister and Foreign Affair Ministry are all focusing on the promotion of tourism in Japan. Last year, the international visitors increased by 20 percent, and many of them came to Kanagawa Prefecture. We've done a lot in terms of promotion of tourism in our prefecture. Our mayor as well as the mayor of Yokohama (橫濱市), have also led delegations to other cities to promote tourism in Japan. Last month they visited Vietnam to promote tourism and business in Kanagawa Prefecture.

I think many of you have visited Kanagawa Prefecture, and the largest city in our prefecture is Yokohama (橫濱市). Yokohama is a modern harbor, and it has the

famous hot springs in Hakone (箱根), as well as Kamakura (鎌倉), which is an ancient capital of samurai politics. Through these features, we hope to attract more visitors coming to our prefecture. We have visitors from South Korea, China, Thailand, Taiwan, and we are seeing an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tourists.

Regarding the tourism information of Kanagawa Prefecture, we also hope our SME's,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to venture into oversea markets and explore oversea markets and expend our operation. Right now, the companies, our local companies with oversea operation, have 358 companies establishing offices in China, 144 branch offices in Thailand, 62 in Taiwan, 62 in Hong Kong, 58 in Singapore, 46 in Malaysia, 54 in South Korea, and 26 in Philippines. We also have one company with a branch office in Sri Lanka. These are our companies establishing operation overseas. We are trying to cooperate with local businesses to create a mutually beneficial relationship.

we hope that major international companies can come and invest in our prefecture. We offer free office spaces or subsidies, and we also have all these different incentives and services. Hopefully, we can attract more overseas companies to come to Kanagawa Prefecture or even open factories. Right now, we have about 9 million people living in our prefecture, and it's the second largest city or district second next to Tokyo. We have many tourist attractions, and we have ideal environment for investment and business. Hopefully, we can attract more visitors coming to Kanagawa Prefecture. Thank you.

Cho Po-yuan (卓伯源):

Thank you Councilor Kojima Kenichi. Thank you for your introduction to your prefecture, Kanagawa, and I think our chairperson mention that Mr. Matsuda is going to invite all of you.

Yoshiaki Matsuda (松田良昭):

Thank you. I would like to invite all of you to come to Kanagawa Prefecture. And also, in Tokyo next year we're going to have the third ACF on May 27, 2018[2], we will host the Asia's Councils Forum in Tokyo. I'll see you next year. Welcome.

Cho Po-yuan (卓伯源):

Thank you President Matsuda for your invitation. Next year on May 27, the Third Asians Councils Forum will be hosted by Japan, and we invite all of you to come back and get together. Thank you.

[2] The date for the third Asian Councils Forum in Tokyo Japan has been changed to August 19-21, 2018.

Thank you our representatives from Japan, thank you for your invitations, thank you. Here we would also like to wish great success to the Third Asians Councils Forum in Japan. Next, we will have a representative from Philippines.

Danilo Dayanghirang：

Thank you very much. My remarks on this matter, number one, this is a good opportunity for us to sit down together and strengthen the Asia Council Forum. As we know, we are at the level of awareness. All of us believe that we need to be united. We already organized. I think what it's more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secretariat. It's a secretariat that handled the affairs of this EFC, maybe one in the center office, EFC center of ACF and the other one in our respective countries. Because I still believe we need these following: awareness, organize, mobilize, and institutionalize. We have done on the first base, which is we are aware of unity and cooperation. we have organized ourselves, and I think we are on the process of mobilizing organization for the good for everybody.

The invitation to Tokyo for next year is a laudable move to continue and sustain the activity of this organization. I would like to suggest that other than strengthening this secretariat, we will proceed into establishing program among councilors. The Japanese can visit the Philippines and vice versa, down to the provincial and prefectural level. Because most of the time, by tradition, we are always at the mercy of the center government. The policy of our new president is to decentralize of the operation of the Philippine government. In fact, we are now campaigning for federal system of government. What we want to see is to strengthen the councilors, the middle politicians in power. Strictly Philippines is controlled by very few, very oligarchy, few families. But I think it is time now, under the president, to tell the administration to strengthen the middle class, the councilors. Not only the governors, not only the mayors, but the councilors should be heard and this can be done. This can be done if people are asked sweeter. I would suggest we continue our establishing program.

Number two, I would like to suggest about the investment promotion to be done by this organization. In our provinces, in your prefecture, in your cities, let's trigger an event where investors, businessmen and business sectors can visit our country and vice versa, to generate investment in our local level. Not at all times controlled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It should start from the provincial and city level, so that we can trigger the development in our countryside. So, there are my two suggestions. One is to strengthen the secretariat, and the other one is the establishing program among councilors. Number three is an exchange program on businessmen, a power

respective level in the prefecture or provincial or city. Thank you very much.

Cho Po-yuan (卓伯源):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your suggestions. I think these are wonderful suggestions and we can really start thinking on how to achieve them. Our next speaker is our guest from Sri Lanka.

Seyed Ali Zaheer Moulan：

I do agree with this regional cooperation, especially across the border. We all have to strengthen our relationship. I understand more than 200 participants today. More than 200 participants have come here, especially from Japan, Philippines, Malaysia, Hong Kong, including I, the single person from Sri Lanka. Next time it is going to be more from Sri Lanka as well. You know in the morning session, I was mentioning very clearly the peer pressure. We all have the same kind of challenges, so, we must work together.

My friend, my colleague mentioned we united, we stand, and we divided before. Asia has everything, and in Asia we have so many common things, common challenges. Nevertheless, we have solutions. For our own problems, we can find so much solution within ourselves and all the countries in Asia. Now ACF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today.

I am going to share this with not only with Sri Lanka, even with India and Pakistan, where we have SARRC countries (South Asian Association for Regional Cooperation) over there. As a director for Asia, representing Commonwealth Local Government Forum, we are today onwards. With your permission, we want to be part and partial of ACF, and at the same way we welcome you all anytime with our hospitality. Even you now hear about Sri Lanka is a beautiful island and like Malaysian, we also have highly diversified people like multi-cultural, multi-religious, multi-lingual. People are living over there and we have so much of matters. One time, we faced so many problems, but we have resolved all those problems in the post-conflict situation. We are peacefully co-existing over there and post-conflict development, the PPP (Private – Public Partnership), has taken place. You are welcome. You may be from Japan, Philippines, wherever you are. The PPP – the doors are open. We all will be in win-win situation with this cross-regional cooperation. I take this opportunity of welcoming you all, and we also will be part and partial of Asia Council Forum. Thank you.

Cho Po-yuan (卓伯源):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for your comment about strengthening regional cooperation. Yes indeed, through exchanges we can both learn and grow. Next, we would like to hear from the representative of Tuvalu, Mr. Siliga Atiake Kofe.

Siliga Atiake Kofe:

Thank you, chairperson. This program is about cross-region cooperation. I thought I had spoken already on that. Cooperation between our countries is very important at the local government or the state level. We are closer to our people, because we understand people better and they in return understand us. As such, we have good relations going on between us.

As I mentioned before, the government at the national level is dealing with a lot of problems. They may have been a little distant from the people. I think that we should reach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our countries at this level. That way, we should be able to serve our people much better. Asia is very big, comparing to our small island countries in the Pacific, in the South Pacific. We tend to rely on you big brothers out there in the rim countries of the Pacific for a lot of assistance. In order to do that, it is almost compulsory that we should work on building our relations to improve them to understand ourselves much better. It is my hope that we in the Pacific can grow more into this relationship between our countries at the level of states. Thank you Chairman.

Cho Po-yuan (卓伯源):

Thank you Chief Siliga Atiake Kofe for his call for better more enhanced relations among countries. Next, we would like to invite Mr. Kim Myung-gi from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Local Council Chairman, NACC Korea.

Our Korean representative would like to provide his slot for the rest of the representatives. Next, we would like to hear from Speaker Law Choo-kiang from Penang State Legislative Assembly Malaysia.

Law Choo-kiang:

Thank you Mr. Chairman. I think I would like to put in some comments on this topic, cross region cooperation. When we talk about the global village that means you agree we are living in the same village. When you talk about the village, you should agree that we must know those villages better than in our village. In this case, like TCF, it actually is doing good things to create better understandings in between countries. One thing for example, we are sitting together in a hall to discuss so many important and meaningful matters.

For your information, Penang in Malaysia has a few sister cities or friendship cities. We got friendship cities between Taipei City, Kaohsiung City and one more Yokohama City, who are sitting here. I think the cross countries cooperation should put it in more concrete movements and not just signing a certification or agreement, it should be bringing more when you set up a friendship city.

Now, I want to share something interesting on how Penang works with friendship city. Penang has more than 20 or 30 friendship cities, and the government of Penang has strategy to engage these friendship cities to show their existence in Penang, by reminding or asking the friendship city to set up certain kind of activity annually in a particular month in Penang. For example, like Taiwan or Taipei, every year we will ask them, "Please, you organize a program in Penang during a specific month to show your country or to show your country's culture." Also, like Japan, we have the Japan culture festival in Penang. We have certain city, like Germany. In this way, we can find each different country's cultures or performance or their countries' related activities each month in Penang. In addition to political affair as well as international trade, the people in Penang can get more from our counterparts, our friendship cities.

We think that cross-region cooperation is not just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economy. We would like have more soft culture from your country. That is why we are so happy to see so many countries which have friendship cities with Penang. They come and they show their cities to us. For your further information, Penang has been recognized by UNESCO as a world heritage city since 2008. That gives Penang an advantage to promote ourselves to the world, but more importantly is that we want our foreign friends to come to Penang to feel itself. I give you an example. There is street name Harmonious Street in Penang.

Why is it called Harmonious Street? The street looks like having a history of hundred years. Along that street, you got temples, like Chinese temples more than 100 years, Hindu temples, the western church more than hundred years in the same street, within a very short distance. That is why we are proud of our harmonious in Malaysia. I would like to extend a warm welcome invitation to you guys. Find a day and come to visit Penang in Malaysia, and you will feel so many different cultures who can live harmoniously just in one street. So that is why we always say if you want to start cross culture study, I would say please come to Malaysia and you get all. Thank you.

Cho Po-yuan (卓伯源):

Thank you very much the representative from Malaysia, Speaker Law. Thank you for sharing the experience of Malaysia, specifically on the diverse cultures there. Next, we would like to invite Chairman Lin to share with us his remarks.

Lin Chin-chang (林晉章):

Good afternoon. In 2015, in Taipei, we hosted the Global Council Forum. We talked about greater economic integration. As the city councilor of Taipei City for 25 years, at the time, I said based on my experience, whenever the economy is slow, incompetent councilors have difficulty getting re-elected. Last year in the Philippines, we attended the first Asian Councils Forum. One of the themes in the conference was about strengthening the trade links and tourism between countries. We talked about this very topic, and at that time we all thought that would be a very meaningful issue.

At the time, I submitted a proposal saying that starting from this year, ACF welcomes business representatives' registration as observers in the hope of promoting tourism, trade and investments. Local councilors can do more to establish business links, and we can offer more matchmaking opportunities. That proposal was supported by all the representatives.

And that is why today, sitting here we have many business representatives from Taiwan. Next year in Japan, we're going to have the third Asian Councils Forum. It is my hope that we will see more councilors inviting important business leaders from your communities to participate in ACF. Of course, it's important to share experiences among councilors. We also hope that ACF can serve as an important forum for business leaders, specifically on tourism, trade and investment. It is my belief that we can create business opportunities for these people. In the future, if the economy is good, the councilors would easily get re-elected.

Cho Po-yuan (卓伯源):

Thank you, Chairman Lin for sharing with us your thoughts. Our next speaker is Professor Wang Chen-shiuen from China Culture University. Let's welcome Professor Wang.

Wang Chen-shiuen (王振軒):

Magistrate Cho, Chairman Lin, councilors, ladies and gentlemen, good afternoon.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 speak today. I think we are talking about cross regional collaboration. And we've all shared a lot of opinions so I would not repeat what you've already said. I want to share that some practical experiences that we had in terms of cross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NGOs, the international human medical service, I think Taiwan has great experience in terms of interregional cooperation in many different areas around the

world. For example, as a senior consultant of our association, Taiwan Root Medical Peace Corps, I would like to invite you for our association the medical service Root Medical Peace Corps. We've carried out volunteer works around the world. We've already served 250000 patients around the world or received our services and aids. Our foundation is willing to go to any place in the world to provide medical services.

Among the countries in attendance today, our association has already signed a MOU on the disaster respond and aid with Japan. Last year, we both signed a MOU, and when we have any disasters or any events, at first events our association will be the platform on which we can facilitate cooperation. In the past, we've also visited Philippines, Sri Lanka and Mongolia for humanitarian works. On that foundation, we're also happy to be part of the delegation to visit the different forums and to also provide medical services to all the neighbor countries. I believe this is a concrete action that we can take in terms of interregional cooperation, and we are looking forward to deepening our cooperative ties with all of you. Thank you.

Cho Po-yuan (卓伯源):

Thank you Professor Wang. Thank you for sharing with us your experience in terms of the NGO, especially the Taiwan Root Medical Peace Corps where you provide humanitarian works in various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Thank you. Our next speaker is a Professor Chiu Rong-jeo from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He is a professor of graduate institute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Chiu Rong-jeo (邱榮舉):

Magistrate Cho and President Lin, colleagues, ladies and gentlemen, councilors, friends, good afternoon. I've participated in this kind of forums over the past few years. I am very much touched because the founder of TCF President Lin Chi-chang, is a very enthusiastic person. He joined forces with the academia to promote activities and events like this for the past 4 years. I am very happy to see so many representatives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coming over to Taiwan for the discussion. I am very happy to see all of you here.

We already heard that next year we'll meet again in Japan to continue our discussion. I am also very happy about that. I have a suggestion to make. With gatherings and discussions in a forums like this, how to promote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local councils to create a win-win situation for all countries? In addition to hosting related activities like these, I think all the participating countries should sent delegations consisting of representatives from the academia, industry, and the government to join the event. Representatives from all different sectors, including the government,

researchers and schools, form the delegations. In that case, when they get together and discuss the issues, I think they will be able to come up with better solutions. Think local governments around the world, including the promotion of autonomy of local governments. We are focusing on answering to the needs of our local citizens. And that is why interregional cooperation and overseas investment are great drivers to our economy. And we can also further promote exchange in terms of culture, education, academic exchange interactions and investment and business opportunities. So I look forward to more events like this. Thank you.

Cho Po-yuan (卓伯源):

Thank you Professor Chiu. He mentioned that the interregional cooperation is not just between local councils. We should expend this cooperative tie, and we can involve all different sectors. Thank you, Professor Chiu for your suggestion. Next, we have Professor from the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from SooChow University, Mr. Chen Li-kanz.

Chen Li-kanz(陳立剛):

In this wonderful forum, I would like to express my gratitude to all of you. Most of the delegates here have talked about the cooperation across the region, which means interstate regions. Particularly, I have heard next year the 3rd ACF will be in Japan. It will be a tremendous, good news for all of us.

But here I would like to squeeze my issue to a little bit different direction. I am going to talk about the cross-boundary cooperation in domestic area. The reason why I want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talk about the cross-boundary cooperation is because most all councils or most of cities within regions should consider this kind of issue. Take Taipei City, Taipei City has several different cities around it, such as New Taipei City, Keelung, even you can include Taoyuan City and Hsinchu. In Manila, metro Manila, you have more than 16 municipalities or more than 16 cities within metro Manila. So here I am going to focus a little bit different direction of the so-called cross-regional or cross-boundary cooperation among the local governments or local councils. How can we cooperate to facilitate the regional transportation? How do we facilitate regional dumpsite managements or garbage burners or garbage management? Or even we can talk about disaster management within the regions. They are all issues in local governess or in local council governess.

In terms of the regional governess, whenever we talk about the local governess, it means the local people of the regions determine and pursue their collective ends, means and values. If we talk about interstate governess, it means people of the East

Asia, Northeast Asia, North Asia or Southeast Asia pursue their common wide values, ends and means, and share one another. But if we put it in domestic scales, it would mean that, like in the Metro Manila, people in Manila will decide what the collective ends, means and values they want to pursue for the Metro Manila. In this case, the regional governments also involves not only government itself, not only city Macardi or Yonaluluyon, among others, it also engages so many non-government sectors. These sectors are businessmen,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academics, medias, civic and school, all of which play important roles in this so-called regional governess. I would like to use a few cases to illustrate the so-called regional governess or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my speech.

Dumpsite managements or garbage burners or refuse management is always a big problem in Taiwan, because Taiwan is a small island and we have very scarcity of lands, so we do not have land space to manage the dumpsite. We always burn the garbage to deal with the problem. For the past years, under the one-county-one-incinerator, local governments have set up incinerators in each county. However, through the years, there are some disputes among many different locals. Some local governments need more incinerators, but some don't. Because of the environmental protest or people's protest, they claimed by saying: Not incinerator in my backyard. As such, some counties have their own incinerators. Those who do not have enough incinerators need to seek cooperation with other counties to manage the matter of garbage and refuse. Through the years, we developed so-called dumpsite or incinerator cooperative mechanism, which means, if you don't have enough garbage, you can bring your garbage to other incinerator located in other county. Some of the counties have more incinerators. With the cooperative mechanism, you pay money to others incinerators to burn your garbage on the condition that the ash will bring back your own localities. I am using this dumpsite management to explain if we talk about region governess or region cooperation, it will be the future of the local governess or local council.

Going forward, the local council will discuss the matter of cooperation and handle the matter of communication with local citizen. Natural disaster management is another issue. No single government or single council can handle the flood and drought. They must incorporate many different local governments or many different local councils to help with disaster relief. So in the case of regional governess or regional cooperation, it has become a trend in the local governess. We bring many different sectors, local governments and local citizens, together to solve the local or regional issue. There's my observation for the past few years.

During the break, I have some talks with the Philippine delegates. If possible, I will

recommend TCF bring Philippine delegates to interview or to visit the Refuse Incineration Plant in Taipei City so that you will get the ideas how we cooperate the local regional garbage issue.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Cho Po-yuan (卓伯源):

Thank you very much Professor Chen. He talked about incinerators as an example for small scale regional cooperation. And of course, President Lin of TCF can arrange visits to our incinerators if anyone is interested. Next, we would like to invite Professor Chen Mu-min from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to give us his comments.

Chen Mu-min(陳牧民):

Thank you moderator and chairman. Last session I spoke in Mandarin. In this session, I would like to switch to English. Well, the topic for this panel, cross-regional cooperation, actually is not a new issue. I am a professor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e've been talking about this all the time. I am also a member of the International Affairs Committee of Taichung City. As I know, right now there are two major networks in Asia trying to bring cities and a lot of governments together. One is called UCLG, Asia-Pacific United Cities and Local Government. UCLG is a network uniting the cities in the region. I have been attending their congress and their meetings in several cities before.

The second network is called CityNet, smaller scale, but I think in Taiwan, Taipei City, Taichung City, and Kaohsiung City have been participating in this network. Either UCLG or CityNet, their problem is only the governments joined, excluding the city councilors. Today we are here to attend the Asia Councils Forum. I think that this organization has potential to develop into a new platform, uniting more cities and council members together in Asia-Pacific. I believe if we build up friendship through this forum, we could do more and we could do better.

Earlier, other speakers also talked about what this forum can do. Of course, if we can build a framework, we can promote tourism to each other. That is, we will invite more people and more countries cities to visit Taiwan, and we will also try to encourage our people to visit your cities.

And also, investment is another issue. You and probably particularly friends from Southeast Asia, you know that our government right now has a new strategy, called New Southbound Policy. That is, we try to promote comprehensive partnership with countries in Southeast Asia, particularly investment. Philippines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trade partners with Taiwan. In Taiwan, we have a huge number of people

from Philippine. They are here as a country workers, tourist and also students. Thus, I think a forum like this could do more. But I want to add one more thing.

Because I am from university, I have students from Philippine and also from Malaysia or from Southeast Asia. I always think that trying to help the young people to know each other is very important. We're all here to talk about how we can cooperate in future and now since we already have a platform, why not bring more young people here in the future. We could encourage some young students, and maybe we could form some groups and make them know each other. If possible, we could also organize and host some cultural programs in the future.

Next year in Japan, and perhaps in the future we will come back to Taiwan, to Philippine, to Malaysia or even in Sri Lanka. We can do all these kind of things. My point is not to forget young people, because young people will be the hope of the country, not just for Taiwan but for all countries in East Asia and also Pacific Region. I would say I wish this forum will continue, and we will try to build up more solid cooperation in the future, and we also hope to see more young people joining us in the future. Thank you.

Cho Po-yuan (卓伯源):

Thank you very much Professor Chen for your valuable feedback. We want to enhance our platform and we would like to also attract more young people. Thank you. Next, we would like to invite Ms. Kao Min-lin, councilor of Kaohsiung City to give us her remarks.

Kao Min-lin (高敏琳):

Thank you. First of all, I want to say thanks to the President of TCF, Lin Chin-chang.

Thank you for hosting ACF where we gather councilors from around Asia. I would like share local experiences from Kaohsiung with all the delegates. But later, I will speak in Chinese so I still have the translation. I think the time will be used more efficient so I will speak in Chinese.

All the delegates or city councilors from Taiwan know that in Taipei we are now hosting Universiade. This is the Olympic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So, many athletes from around the world are now competing in Taipei City.

I am from Kaohsiung City. It's the largest city in Southern Taiwan. It's now the top 3 city in Taiwan. Kaohsiung is a big city. We have harbors, mountains and the sea. It's a harbor city. In recent years, Kaohsiung has made a lot of efforts in establishing links with our international partners. As a city councilor, I've also done my part. I am

serving my first term. I am currently the youngest city councilor in Kaohsiung. However, I was elected by my party, the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as the representative for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So in addition to the city council activities, I also play the role of a city ambassador.

And I have received delegations from the Philippines, Hawaii, Portland in US or Kumamoto and other cities from Japan. I have received a lot of delegations from these different cities and had honor of having discussions with them. Kaohsiung City hosted an important sports events In 2009, as well as Asia Pacific Cities Summit in 2013. In 2016, we hosted a forum focusing on global harbor city forum. It is our hope that we gathered representatives from harbor cities around the world, and we shared a lot of similarities with other harbor cities. It is our hope that we can share experiences in terms of urban planning and city governess.

This year, at the end of this year, we are going to have another summit named Ecomobility World Festival. This is an event organized by ICLEI, a non-profit organization with the goal of Local Government for Sustainability. Kaohsiung City will host the Ecomobility World Forum at the end of this year. It's going to be an important conference and it is also a celebratory festival. I would like to cordially invite all of you to come back to Taiwan at the end of this year to participate in the events in Kaohsiung City.

Few days ago, I visited Kumamoto (熊本市) and I just returned to Taiwan a few days ago. This time, we, at the city council level, have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In 2018, Kaohsiung City is going to host the Taiwan Japan Exchange Summit. In the future, I believe we will have more opportunities to have deeper discussions with our Japanese counterparts.

The foregoing cases were just some of the examples of what Kaohsiung City has done to work with our sister cities from around the world, either based on the city-to-city level, or council-to-council level. It is also our hope that the citizens between the cities will understand one another better. Kaohsiung City has about 30 sister cities, including cities in Korea and Japan, like Kumamoto City (熊本市) and Hachiōji City (八王子市). We also have Cebu (宿霧) from the Philippines and Danang (峴港) from Vietnam. They are our sister cities. We also have sister city councils, like Osaka (大阪), Yokohama (横濱) and Kumamoto City (熊本市). We also work with Incheon (仁川), Korea. With our sister city councils, we exchange opinions on election campaigns and city governess, and these exchanges have proved beneficial.
I am sure all of you understand that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has some diplomatic obstacles to overcome. It's very difficult for our national government to establish

official diplomatic ties with other countries. Just a while ago, we lost another diplomatic ally. However, at the local levels, we can have exchanges among cities, city councils and peoples. I think that's the most solid ways to build ties among countries and cities. Here, I can list some of the efforts or projects that Kaohsiung City has embarked on.

For example, with agriculture we participate in the international food fair in Tokyo, and we also go to Abu Dhabi (阿布達比) to participate in their food exhibition. It is our hope that we can promote the quality tropical fruit and agriculture products from Kaohsiung to other countries.

In Kaohsiung City, we have a lot of areas that are sit on coastlines. In Japan, they also have a lot of experience in managing the coastline. Th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in Kaohsiung City regularly brings students and principals from Kaohsiung to Japan to learn more experiences from Japan. We also have sister schools. For example, some of our vocational high schools have sister schools in Portland. Every year, we send students to the US to participate in the annual float parade.

Regarding the transportation and urban planning, a few years ago, I accompanied our mayor, Madam Chen Ju, to Marseille in France. Marseille is also a harbor city. They have the new part in the city. They also have an older part. At the time Marseille was promoting a Mediterranean program. It is their hope to gather Mediterranean cities together and rebuild the harbors to regenerate Marseille. Kaohsiung City is a harbor city as well. We have our old harbor area, and we also have the problem of the harbor being managed by another government entity separated from Kaohsiung City. When you have the harbor and city managed by different government entities, it will cause a lot of urban planning problems. To address that issue, we had exchanges of ideas with our counterparts in Marseille. Now, we have a so-called Asia New Bay Area in Kaohsiung. In the near future, we look forward seeing new exhibition center, light rail transit and new music hall in the harbor area. We would like to bring back the glory of Kaohsiung Harbor. in my constituency

As for the industries, whether its chemicals, aerospace or fasteners industry, we look forward to have more interactions with the rest of the world. The world's largest fastener company is located at Dagangshan (大崗山) in Kaohsiung, where is my constituency. I think fastener is a great example in terms of Kaohsiung's industries. We also look forward to rejuvenating the logistics industry. Obviously, there are a lot opportunities where we can cooperate, communicate and trade with other cities, like education, transportation, urban planning, agricultural products, medical services and so on, even share and exchange some common urban issues such as urban

planning, landfills, waste water processing.

Here is a simple summarization, a conclusion of my sharing. I think after President Tsai took office in 2016, she strived to promote the new Southbound Policy. And that is why in Kaohsiung City, we look forward to becoming an important window towards the countries in the South Asia. Obviously, we look to deepen our relationships with these countries. As a city councilor, I believe that the city government hasn't done enough yet. I think in terms of tourism, in terms of cultural exchange, we need to work harder and invest more efforts in that area. When we talk about the so-called new immigrants, we have lots of immigrants coming over from Southeast Asia or South Asia, and some of them are immigrant workers. In view of the local governess, I think we should launch new immigration policies, and we can utilize their strength in terms of language and cultural knowledge to help us to deepen our diplomatic ties with South Asian cities.

Cross-region cooperation is not just between states, but also between oversea cities. However, in Taiwan we need to have interregional cooperation between cities as well, like the issue of garbage management, river management and disaster prevention. This morning, the former Minister Lee mentioned about river restoration and disaster prevention. I think cities in Taiwan need to get together, and local governments need to get together to deal with these issues. With extreme weather such as typhoon or natural disasters, or earthquake, the different cities need to tackle the problems together. Kaohsiung City Government looks forward to having a good exchange and communication with his neighbors, like Pingtung, Tainan and other neighboring counties, so that we can together march toward common goals.

And lastly, I would like to thank Chairman Lin, as well as our moderator Magistrate Cho, for such a great opportunity for local councilors in Taiwan and international councilors to get together and exchange the thoughts and ideas. I look forward to a brighter future, and we can work together. Thank you.

Cho Po-yuan (卓伯源):

Thank you Councilor Kao Ming-lin. That was a very detailed presentation. She talked about Kaohsiung City. She also talked about interregional cooperation. Because she served in the Kaohsiung City Government, that's why she has all these experiences. Thank you Councilor Kao. Our next speaker is Councilor Huang Yin-chih from Jiayi.

Huang Ying-chih (黃盈智):

Chairman Lin, distinguished guests, and councilors from around the world, good afternoon. First, let me focus on local development and the local autonomy in Taiwan.

I think local governments have long worked independently, and we focused and we looked at things from our perspective. So rarely are there any mayors with such broad perspective, where they seek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opportunities.

Now we are adopting a new concept to market our cities. We look at the governess of the city that we think we should think globally and act locally, but we still face lots of problems in terms of implement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a city in Taiwan obviously doesn't have enough land area. Therefore, to maximize our development, we need to cooperate with neighboring counties and cities. That's why our success is very much dependent on our relationship with other neighboring counties and cities.

However, when we talk about cooperation, when the two mayors have a difference in opinions, it becomes hard for us to have this collaborative relationship. While getting together and working together, we need to be able to create a win-win situation. In terms of commercial activities, Jiayi City is a more developed and we have the Jiayi County and we have the Yunlin County, which are both more of a agricultural counties. Some people mentioned that we should integrate the two counties, either Yunlin-Jiayi City or Yunlin-Jiayi County, or either the two municipalities or three municipalities. Even though many people proposed this idea, and we had lots of meetings discussing this idea, it seemed we all looked at this issue from our own perspectives, as well as our own agendas. We haven't made any progress accordingly.

Up to this point, I think the Jiayi mayors and Jiayi municipal magistrates don't share the vision of working together. Even sometimes when we decided to work together, once we elected a new mayor or new magistrate, the original cooperation plan could be changed from cooperation to competition, because the different ideas or concepts of the two new government officials. My suggestion is that we need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o launch a comprehensive project that's an interregional cooperation, or if possible, the central government should advise regulations and acts clearly, indicating the power and the rules of inter-municipal cooperation. Thank you.

Cho Po-yuan (卓伯源):

Thank you Councilor Huang. Thank you for sharing on interregional cooperation as well as local governess challenges. Now we open up the floor for questions. Before you ask the questions, please let us know your name, where you're from and your position. The floor is open, feel free to speak up.

Lin Chin-chang (林晉章):

I want to supplement some important points to my speech. As Professor Chiu mentioned this afternoon, TCF should work with the private sectors and businesses in the future. However, I failed to mention in our earlier speech that our TCF, starting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TCF, GCF and ACF, has been working with scholars, and maintaining great relationship and interaction with the academia. Last year in Philippine, we saw the PCL developing a great relationship with the academia. Even when we went to Milan in 2015 for the World Forum held by CALRE, we also realized the importance of establishing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the academia. You may rest assured that we won't let you down in connecting with academia.

And we talked about how governments can work together, and how we can involve young students. I think these are all great suggestions. Professor Chen Mu-ming also mentioned UCLG. As I mentioned this morning, I think all mayors value this organization. UCLG is a global organization with different continents in the structure. The current President is from South Africa, Mr. President Park Tau. In South Africa, a legislator or councilor can also be elected as the mayor of the city. And that's why he was also a President of a council's alliance (South Africa Local Government Association- Salga). Going forward, we know he was elected as the UCLG President. We have tried to contact him for this meeting, but regretfully we could not get in touch with him. I think if he is able to come here himself as a councilor, we will have nine foreign countries at this meeting.

I think I would like to thank Professor Chen Mu-min to remind us of the UCLG. In the future, through ACF initiated by TCF, PCL and Japan's JLCA, we can work with CALRE in Europe and our counterparts in Canada, Brazil,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and then go forward to establish a Global Councils Forum (GCF). Members of the UCLG representing its participants are all mayors in local governments. Nevertheless, in the future, the members of the Global Councils Forum will be the city councilors from over the world. Hopefully we can achieve our dream one day. Thank you.

Cho Po-yuan (卓伯源):

Thank you Chairman Lin. We look forward to expanding our operation and engaging more people and partners.

Since we still have some time, I would like to share my previous experiences with you. I am from Changhua County. Changhua County is the most populated county in Taiwan. I had been the county magistrate for nine years. Twenty-three years ago, I was a local councilor. So, I think I can share this part of experience with you.

When talking about the cross-region cooperation, I think this is a very important theme, especially for local governments. For a county to develop, it's important to work with neighboring counties. In this morning key speech session, former Minister Lee (李鴻源) mentioned climate change and the issue of subsidence. In Changhua County, we actually worked with other counties to solve the issue of the high speed railway subsidence. We went to Dr. Hank, the Chair of the UN Climate Change Commission, to seek his professional consulting. He's from the Netherlands, and he's a very experienced expert. So we worked with the Netherlands, and we worked with Dr. Hank to deal with our problem.

Also, Changhua County is a major agricultural county. That's why we also promote cross-region cooperation with Belgium. In North Europe, Belgium has very vibrant livestock industry and is very successful in terms of processing the waste. That's why we learnt from their experience and developed a demonstrative zone borrowing their experience.

Today, we have many Japanese representatives with us. Here, I would like to talk about our collaboration with Japan. For example, we worked with Gumma Prefecture (群馬縣), Kochi Prefecture (高知縣), Ehime Prefecture (愛媛縣), Shizuoka Prefecture (靜岡縣), Fukui Prefecture (福井縣), Hokkaido (北海道) and many prefectures from Japan. They are Changhua County's sister prefectures. Especially Miyagi (宮城縣), we understand that in 2011 the Tohoku Earthquake (東北地震) hit Japan. At the time, donation from Changhua County was about 30 million Japanese Yen. Within 3 months, we sent our donations to the disaster areas. We prepared the tropical fruits favored by Japanese people, for example bananas, and we sent those fruits directly to those disaster victims. This is another example of cross-regional cooperation. It also goes to show the deep bond that we have with Japanese people. The delegation of the Changhua County was the first one to the disaster area in Japan.

A few years ago, the Shanghai had the World Expo in 2010. Changhua County, representing as a symbol city in Taiwan, also participated in the City Development Forum at World Expo. Changhua County is also a very important hub for bicycle manufacturing in Taiwan. In that field, we worked with the Euro bike, a European organization. These are just some examples from Changhua County. Changhua County is just one of the municipalities in Taiwan. As many of you have said, as city councilors, we can understand what our people need. When we can benefit our people, we need to work hard for their welfare. I believe there is a lot that we can do for our people. Now, if there are no more comments, I would like to conclude session B4.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participation and feedback. Thank you.

跨區域合作
Cross-region Cooperation

TCF 理事長 林晉章

去年(2015)我們在台北參加 TCF 舉辦的 GCF 論壇(Global Councils Forum)時，安排了一場「地方議會與擴大經濟區域整合」的分組討論，主講者曾說:「在美國有一些州會指派一個代表那個州的貿易代表」，這個州代表並不是聯邦政府的代表。

在台灣正是如此，美國有很多州在台設代表，專門從事尋找投資、進出口貿易機會給台美兩國人民，甚至於此一代表也擔任該州的駐台觀光、文化代表。

我們台北市和世界很多城市 有締結姐妹市，包括菲律賓的首 馬尼拉市。我發覺這些姊妹市除了不定期互訪外，好似也沒有其他實質的交往。台北市近十幾年來設有駐市藝術家，目前 有優先保留名額給姊妹市藝術 家來申請。

美國有幾個台北市姊妹市，每年它的市長或議長 會帶一群該市各界 人士，包含企業界人士，來台交流找尋拓展投資與進出口貿易之一機會，他們的市長、議長就肩負著如何幫該市企業家拓展更多的事業機會，不會 被人批評為圖利商人，也不會被批為官商不分，因他們是公開、公正的 交流。

同樣在我擔任議員時期，也常隨市長、議長出訪姊妹市，可惜只有官式拜訪，頂多在當地和台灣去的僑胞餐敘，幾乎沒有公開探討如何加強 雙邊的貿易和投資。我們議員的國外出訪也曾安排參觀國外藝術學校、身心障礙學校、老人照護機構---等等，就連企業參訪 沒有，記得只有一次去美國亞特蘭大參觀可口可樂公司及 CNN 總部。為的 是怕被媒體批評議 員為圖利商人、官商不分。

今天第一屆亞洲地方議員論壇 ACF 在菲律賓舉行，而主辦單位能公開提出「地方立法議會聯合會在亞洲區域推動貿易及投資機會的角色」這個 題目來討論，我覺得非常有意義。

2015 年我們在台北參加 TCF 舉辦的 GCF 論壇(Global Councils Forum)時我曾在「地方議會與擴大經濟區域整合」這個分組討論會上發言:我有一個直覺的經驗，參選了二十五年，只要經濟不好，下一次要競選連任的時候，現任議員會選得很辛苦，經濟和我們能不能當選連任，也是有很大的關係。

所以，今天我站在這裡願就這個議題表達我的一點看法。

我們台灣 TCF 和菲律賓 PCL 有一個共通點，就是和學術界保持相當良好的關係，而這和 2015 年 10 月底我和日本、菲律賓的代表去義大利米蘭參加歐洲區域議會聯合會(CALRE)大會時感受到的一樣，他們也和學術界 建立良好互動關係。這 是我們這個組織非常正面的發展。

就今天這個主題，我想大膽提出建言，比如說在這 ACF 議員論壇，將來再舉辦時，除了維持原來和學術界既有的交往、參與及討論，就理論和實務交換意見外，如能得到大家支持，我們也可開放企業界以觀察員身分陪同議員來參與這個 ACF 論壇，和議員繳交同額註冊費或稍高一些的註冊 費也可。分組討論時增加「貿易及投資」的分組讓企業界來參加的觀察員 和議員自由選擇參與，這樣一來就可促成各國企業界人士直接面對面，只 要他們生意做成功，成功也不一定在我們，相信隨同議員前來參加的企業界人士回到各自的國內，仍會感謝我們這個組織提供他們這個機會。如果這個方式有成效，會有更多企業界人士參與，相對的也會帶動更多的議員來參與。謝謝各位聆聽。

以上是 2016 年 12 月我在菲律賓馬尼拉第一屆亞洲地方議員論壇（ACF)的發言資料。次日晨，參與四個國家地區的首席代表圓桌會議就通過了爾後亞洲地方議員論壇（ACF)將可由議員邀請企業界人士繳交較議員稍多一點的註冊費以觀察員身分參與本論壇，將來每次論壇都設有一組討論「觀光旅遊、貿易投資」以促進各參加城市這類議題的交流。

本次論壇我們也邀了一些台灣工商企業及觀光旅遊業人士參與，期待我們論壇能把這機制建立起來。

圓桌論壇

主持人：

趙永茂　國立台灣大學社科院政治學系名譽教授

發表人：

丘昌泰　元智大學社會科學學院院長

B1 場：友善的監督

江明修　國立政治大學社會科學學院院長

B2 場：建設性衝突

趙永茂　國立台灣大學社科院政治學系名譽教授

B3 場：問題導向的溝通

卓伯源　前彰化縣縣長

A4 場次：各國地方議會運作最佳實務

B4 場次：跨區域合作

分組議題主持人兼報告人：卓伯源(左)、丘昌泰(中立者)、江明修(右)

趙永茂：

謝謝各位，我們剛剛有 4 個場次，現在把大家的討論做一個結論，讓大家來了解一下。第一場友善的監督，請丘教授來跟我們說明。

丘昌泰：

主席，各位朋友，我們這一組的結論，給大家做一個簡單的報告。如何進行友善的監督，第 1 點，首先要確定監督的正確觀念，監督要有憑有據，要就事論事，同時議員最好配置公費的立法助理，這是第 1 點。第 2 點，要改變傳統牽拖政治文化，裡面包括現在的議事過程，很多的黑箱作業，利益共生的結構體，議員專謀私利，這些政治化都必須改變。第三點，我們在台灣的問政，太強調對於選民的服務，要參加選民的活動，專業問政不是一般選民的喜好，已構成了議員不專業問政。第 2 點在台北市沒有出現，但是在其他縣市就有出現，就是小型的配合款，也就是小紅包，就是讓議員拿到地方作公關之用，這種制度也要改變。

同時，有一個在台灣最不一樣的地方，藍與綠對立很嚴重，常常用顏色來決定問政的取向，這種改變是有必要的。第 3 點我們必須要強調社群媒體的監督，特別很多青年人，過去對政治很冷感，現在他透過社群媒體(WeChat、Line)，加強了對政治的監督，使得很多對政治不關心的人，慢慢有了公共意識，對公共議題感到有興趣。特別在台北市，可以看到他們很多透過社群媒體，去監督議員的所作所為，我們的委員，也有提到台灣特有的名嘴文化，尤其有一些名嘴，捕風捉影自編故事，破壞議會形象，這個我們也覺得應該要改變。

最後一點是，有些政治文化要去改變，也不是那麼容易，所以只有去接受他，融入他，可是又不自失立場，你跟他合流可是不下流，融入的過程中支持他，協助他，支持他，慢慢導引他這種錯誤觀念，這種友善監督的模式，或許就可以建立起來，謝謝！

趙永茂：

非常感謝丘院長，丘院長是元智大學的社科院院長，他是針對友善的監督這個題目，以上是他們這一場次(B1)討論的結果。其次，我們要邀請第二場次主持人江明修教授，江教授是國立政治大學社會科學院院長，有請江院長。

江明修：

謝謝主席，我們這一組的結論得之不易，我本來以為很容易達到建設性的結論，在場的學者專家及許多的政治領域工作者，看法非常分歧，但是最後我們勉強達到幾個結論。

第 1 點，在整個政治的領域裡面，利益的分配固然是很重要，但是如何形成一個合作的賽局也很重要，也就是說不只利益要衝突，利益也要合作，衝突和合作當中，彼此達到一個最大的優勢。有趣的是，我們有人談到卓縣長的案例，就卓縣長任內和議長之間的衝突是有目共睹的，但是他府會之間預算被刪減，根據學者研究，卻是彰化有史以來最少的。而下任縣長跟議會之間關係有很多共同利益，照理說應該預算上比較不會有問題，但結果是光社福就被刪減了百分之二十三。

有人分析這個案例發現，個人利益或政治立場的衝突固然是一回事，如果能用巧妙的，也就是我接下來要講的第 2 點，解決衝突的工具，如果有方法的話，

是有機會達到建設性衝突的，讓建設性衝突本身達到更優勢、更美好的均衡狀態，比如說權力的交換，甚至說有很多隱晦的知識，譬如哪些可以公開講的，哪些不能公開講的，哪些是檯面上可以講的，哪些是檯面下不可以講的，工具本身很複雜，但說穿了就是權力跟經濟的交換。從制度面的角度來看，衝突背後的原因是更重要的，要去分析，所有賽局者，要去研究為什麼會衝突，衝突的化解點在哪裡？雙方是象徵性的知識，還是實際上最後的決戰，所以解決衝突工具都要分析清楚。

在台灣有一種委員會的設計，有人批評沒有效率，但是委員會有時候是解決衝突，形成建設性衝突很好的一個制度。

另外一個叫協商機制，這協商機制是甚麼呢？比如說最常見的就是府會連絡人，府會連絡人這個角色本身有很多隱藏的知識，很多的衝突是靠府會聯絡人的溝通，先期的預見，甚至在過程中的化解。當然這些溝通只是一個開始而已，最終還有其他的背後，還有老闆，比如說我們有一位專家說，府會首長，尤其是市長的機要群更是關鍵，機要群如果說不管是在府內，或是在跟議會之間的互動，如果機要群有足夠的授權，代表這個市長去跟各局處長，或跟議員之間做談判的時候，這個流程會比較順暢。

第 3 個制度是流程有沒有公開？流程公開的程度在哪裡？有一種想法是引述馬基維里和邱吉爾首相的名言，就是說很多法律看起來很好看，但是製作的過程是臭不可聞，所以最好是不要問過程是怎麼來的，你只要知道，它看起來很好看就好了。

流程要公開到甚麼程度？我們的結論是甚麼呢？就是談到說到底所有的這些賽局的參與者本身，你是一個聖戰士？還是一個利益的堅持者？在所謂的道德的最高的一個境界，你實際利益的停損點上，你要如何的選擇？所以說有一個學者專家就提到說，很多建設性的衝突是創新的來源，他是從很多的學理來分析，建設性衝突本身，是一種打破舊思維舊制度的最好方法。

而這個部分，還有一些是涉及到政治責任的部分，整個結論是什麼呢？結論就是說，尤其是很多的首長，要負政治責任的時候，他會用一種比較衝突的姿態展現，然後他訴求的時候，會越過這些他對應的議員，他直接訴諸第一線的人民，這個時候，就是所謂的民粹主義，這個民粹主義的力量也是不可忽視，最後與會所有的人做了一個呼籲說，我們需要更多的公民教育，我們需要做更多的民主教育，雖然說像邱吉爾首相講的，民主不是最好的手段，但是它是目前世界上發展算是比較好的手段之一，這是我們這一場所有的結論，謝謝！

趙永茂：

現在輪到我來就我主持的那一場，有關問題導向的溝通，跟各位作一個報告。

第 1 點，貼近選民解決選民需求的，才是最好的溝通。基本上，地方議員變

成是非常重要的溝通角色，人民的需求及政府政策與政策執行之間，如何能夠表達更完善，還有一些建議性、批判性、協商性的，這些都是屬於溝通的職能。

議會的審查，剛才第 2 組提到有關府會之間關係的增進以及一些討論及審查等等，這些都是溝通的。也有些人寫書，或者抗議，來對公共的議題及公共的作為，表示他們不同的意見，希望能夠改變這些政策及政策的執行。當然有很多在形式上，包括直接參加預算的審查及政策的審議等等，這些都是一種溝通的形式，包括在一些政府計畫，外包或是執行，包括很多焦點座談及直話訪問，如何把民間的實際問題溝通反映到這些公共政策，或者是預算及相關審查過程裡面，這些都算是廣義的溝通內涵。

趙永茂教授(站立者)

第 2 點就是我們要如何把這些溝通的問題能夠展現出來，包括 Open Data 的建立及一些審議過程的機制及技術如何來改善，讓溝通形成一個壓力，可以長期讓大家參考的，可能是 Data，也可能是議員在質詢政府的作為所留下這些資料跟技術，包括政府跟人民的 gap 以及訊息的傳達，他的質跟量的問題，如何適當的來做一些審查，做一些保留，溝通的內涵及問題可以保留跟發展。

第 3 點，基本上我們(議員)很重視議會跟行政機關的溝通，但是我們(議員)也有來自區域選民的壓力，就是我們(議員)如何來表達們選民的需求。可是選民需求又有一些問題，就是說他要求你，你沒有做到，他可能不投票給你，他是基於比較選區的利益。可是你的議員有的時候要擔任一個大選區，包括考慮整個城市的利益，如何讓區域的選民能夠了解，這個公共性私有性之間，也就是公的利益跟私的利益之間如何有效的討論。有的時候不是行政跟立法可以解決，有時候要一些社會的，包括市民團體跟公民專業團體，一些意見要能夠進來，他們本身

從一個專業的，更開放的角度，而不要讓議員跟選民，如同剛剛第一組提到的被選票綁架。未來地方的發展，有哪些政策討論的空間，也就是在行政、議會跟社會之間，如何保持一個開放的、互動的溝通關係，這個也是很重要。

第 4 點，在溝通的時候，要有一些政策價值的觀念。公平正義的概念，分配的正義性，在哪一些公共議題上要拿出來討論。還要有公開性，而不是私了的，還有一個協力性，就是說他本身是處在一個協商狀態的溝通，另外除了私立性及公平正義之外，他可能還有發展性的問題，公平正義可能是分配性比較高，或者在某些發展政策也有，發展性的問題，就是在經濟其他的發展，也跟社會的分配同時要重視。

還有一個很重要，就是我們在溝通的時候，議會在討論的時候，政府政策的討論很重視證據取向，要有一些證據，要有一些數據，具體的來游說大家，因此溝通的工具，有關溝通的價值及方法也很重要。

第 5 點，我們有一些溝通，是隔代溝通的，德州的就有一些他的服務單一系統的，有一些政策他不是直接向公共的溝通，而是他透過中小學的教育，讓小孩子去告訴他的父親，或者是祖父母，這個也是很有意思的，有時候要接受一個新觀念，他有的時候不聽政治人物，他聽他的小孩的，所以有些溝通的方式，要透過學校教育來改變，這個部分是非常重要。像台灣南部，以前在屏東我們會吃那個伯勞鳥，過去吃伯勞鳥，現在是保護伯勞鳥，主要是透過學校的教育，下一代的教育，改變他的行為，從吃伯勞鳥到保護伯勞鳥。所以有一些政策溝通，要隔代溝通過，教育形式的溝通非常的重要。

最後，溝通還要有一個重要機制，要對政府有更多的公開及多元的監督，政府有預算權及決策權，不是純粹的靠議會監督，因為有一些地方市長的力量在政黨裡面是很有壟斷性的，議會也是他那個政黨在執政的，不敢挑戰市長。如何透過社會的力量，多元監督的力量，才能夠達成對那個政策的意見，讓人民的意見能夠表現出來，所以，要建立多元監督的管道。以上我們這一組的看法。最後，由前卓伯源卓縣長來跟大家報告。

卓伯源：

謝謝趙教授，還有我們林理事長，各位與會的代表，我們這一組有兩個議題，一個是各國地方議會運作的最佳實務，另外一個議題就是剛剛趙教授所說的跨區域的合作，我們這一組比較特殊就是有各國的代表，看到我們各國代表的發言，我覺得非常的珍貴，非常的難得，非常的有價值，所以我想利用這個機會把各國代表發言的內容作一個簡單的整理來跟大家分享。

在各國地方議會運作最佳實務方面，蒙古代表提到一個非常有趣的事情，因為我們一直在關心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的關係，蒙古國很特別，它的烏蘭巴托有 160 萬的人口，整個蒙古國只有 300 萬的人口，所以一個城市就有一個國家相當一半的人口，所以它是一個特殊的中央與地方的關係。

前彰化縣縣長 卓伯源

第 2 個發言的是，馬來西亞的劉議長，劉議長提到馬來西亞與其他國家不同的就是多元文化，多元種族，多種宗教的衝突。在這樣一個多元化的社會，它有一個比較特別是我們台灣難以想像的，就是他身為議長，議會定的議事規則，議員針對敏感引發衝突破壞社會次序的發言，議長可以制止，如果有這樣的發言，他們會把它送到特別委員會去處理，可能會給予懲戒，禁止其下一次的出席，或者是更嚴厲的處置，我想這也是馬來西亞比較特別的狀況，可以跟大家來分享。

韓國在議會運作實務，也有很特別的事情，因為韓國的代表，他提到他們最重的是提高議員問政的力量，力量如何來提升？針對 3 個方面，一是提升議員的專業能力，二是加強議會的力量，三就是暢通與民眾溝通的管道，我想這就是寶貴的韓國的經驗。

吐瓦魯的代表，他也一個很有趣的跟其他國家不一樣的經驗，吐瓦魯是在 1978 年才建國的，他們國際援助是很多的，他們原本都是適用英國地方自治的法律，一直到 1999 年，吐瓦魯通過了一個很有趣的法，叫做宗族領袖法，宗族領袖法就是中央的權力，要下放給地方吐瓦魯各島的領導，由宗族領袖來領導，就是地方有絕對權力的立法政策，他們實施直接的民主，吐瓦魯他們在 18 歲以上，有權在他們宗族議會，來參與法案的審核和投票，這是吐瓦魯很特別的一個狀況，來跟大家分享。

斯里蘭卡的代表，他非常的激烈表達，應該要去中央化，就是中央不要干涉地方太多，要充分授權給地方政府，來自由發揮的空間，這是我們斯里蘭卡的代表，提到只要去中央，充分授權地方就可以反貪腐，我不曉得是否他們的中央政府貪腐很嚴重？我不曉得。

另外，我們菲律賓的代表，提到菲律賓府會的衝突，是可以用司法來解決，所以他是一個典型三權分立的國家，當然在委員會通過的預算法案，議長會來審核。議長審核以後，他會來力挺委員會，這是菲律賓的特別的內容。

另外，在日本加地邦雄議員，他是福岡縣的議員，他提到他們很重視跟美國、泰國，還有很多周邊國家的國際交流，他特別提到我們故宮的國寶，到九州的國家博物館展出，他認為這是好的交流。

他特別提到日本的議會，很重視日本的青少年的會議，就是能夠邀到其他國家的青少年，到日本交流來進行 Home Stay。日本國的代表提到一點很重要，就是地方的交流，地方能夠改變國家，地方的議會大家能夠和樂融融，可以促進世界的和平，日本代表強調，他的這句話我一定要在這裡跟各位講，他說日本的修憲，引起世界各國的疑慮，他站在地方議會的立場，認為修憲並不等同於發動戰爭，日本是一個愛好和平的國家，愛好和平的民族。

另外我們的學者專家部分，我們王振軒教授，他在地方政府服務過，所以他提到議會協調的功能，就是共識決的制度。陳立剛教授提到公民參與的開放政府，他認為要公布首長的行程，公布整個政府機關開會的內容要公開。陳牧民教授也提到很有趣的議題，提到社群媒體，網路對於地方議會的影響，這是我們在討論上比較缺乏的。

還有地方向中央政府爭取預算，會不會影響到地方的自主？還有是不是會造成甚麼樣的困擾？參與的議員黃盈智議員，厲耿桂芳議員都提到，意見的爭議會不會影響到政府行政的效率？厲耿桂芳議員提到，之前他努力的包括，環保議題眷村文化的議題，還有他屯屋稅的議題，還有他重視教育品德，這個是我們第一個議題(A4)，大家討論的內容，我跟大家作分享。

還有我們另一個議題(B4)就是跨區域合作，日本神奈川縣的小島議員，他提到了神奈川縣，是日本的第 2 大縣，該縣有 900 萬的人口，他們與各友好城市來進行交流，而且神奈川縣他的國際投資非常的多，他們有 350 家企業在中國，62 家在台灣，還有很多的國外投資，這是他們企業投資的跨區域合作。

另外菲律賓的代表認為，地方議會要透過這個平台，加強互訪，而且整個國家政策的形成，要由下而上的形成，他也建議我們秘書處功能要加強。

斯里蘭卡也是強調，地方合作要加強，特別提到我們 ACF，這是一個難能可貴的交流平台。

吐瓦魯也提到，中央政府距離人民很遠，我們地方議會是站在為民服務的第一線，應該要更受到重視，馬來西亞的劉議長，提到跨區域合作，應該要是多元化的，多面向跨區域合作，不應僅見於地方的議會，包括我們的商業文化教育，還有各方面，都可以來進行合作。

林晉章理事長也提到，我們的跨區域合作，應該要擴大邀請我們企業家來參

與，我們王教授特別提到路竹會，到各國義診的成就。邱榮舉教授也呼應林晉章的看法，他希望不僅企業家來參與，我們的產、官、學、研，應該可以共同組團來，加入我們這個 ACF 平台。

陳立剛教授他提到地方上一直很困擾的問題，就是垃圾掩埋埋廠，和焚化爐問題，他說這個可以透過小規模的跨區域合作，來達成一個區域共同分享的目標，來解決這樣的爭議。

陳牧民教授他提到 UCLG 是政府參與，民代沒有參與，建議我們 ACF 可以擴大平台的功能。陳老師除了提到產、官、學組團的事以外，他也提到一個很好的意見，認為要擴大青年的參與面，青年也可以加入我們這個平台。

另外，我們有兩位議員，高閔琳議員提到高雄跨區域合作，因為高議員擔任議員之前，在高雄市政府擔任市長秘書，所以她有很好的經驗，她把這些經驗跟大家分享。

另外，黃盈智議員，提到了全球在地化的問題，還有區域治理挑戰議題，都是非常的珍貴。

以上是我把我主持的兩個場次，大家發表的寶貴意見以及各國不同的有趣經驗跟大家分享，敬請指教，謝謝！

趙永茂：

非常感謝我們卓縣長，第四組在整合下做了一個蠻完整的報告，特別是有關跨域問題，非常感謝我們四個組同仁的辛苦，我們這場的討論就在此結束，謝謝大家，接下來我們要交給理事長來進行閉幕的節目，謝謝大家！

Panel Discussion and Conclusion

Chair: Chao Yung-mau 趙永茂

Presented by:

Chiou Chang-tay 丘昌泰

Report on Session B1: Positive & Effective Check

Chiang Min-hsiu 江明修

Report on Session B2: Constructively Conflict

Chao Yung-mau 趙永茂

Report on Session B3: Problem-oriented Communication

Cho Po-yuan 卓伯源

Report on Session A4: Best Practice in Your Local Council & B4: Cross-region Cooperation

Chao Yung-mau (趙永茂):

Thank you. Since we did not set up the 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 for the panel sessions on the 3rd floor, it wasn't as convenient as the venue in this hall. We have 4 different sessions in this afternoon, and now we will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share with you the conclusions of our discussions. The first panel discussion is about Positive and Effective Check. Let's welcome the first report, Professor Chiou.

Chiou Chang-tay (丘昌泰):

We want to share with you some of the result of our discussion. How do we carry positive and effective check? First of all, we need the right mindset. We need to have valid evidence and we need to be topic interest oriented. And councilors should have an assistant on the government's payroll as well. Also, we need to clean up our political culture. We need to get rid of some of the existing cooperative structures between the business and politicians. We need to focus more on serving our citizens. We need to remain professional. We also need to educate our citizens on what's the professional conduct of councilors. In Taipei, I think we have this allowance for the councilors to give such as a red envelop. But that's not a good idea.

In Taiwan we have the ideological differences. The two political parties sometimes do not look at the subject matter. They simply object everything the other party proposes. We need to focus on the monitoring the social network. A lot of young people are now more interested in politics through social network and online media, like weChat and Line. More and more, young people are now more interested in public issues. Especially in Taipei, our citizens are monitoring the city councils

through social network. In Taiwan, we also have all these political critics and political pundits, and sometimes they influence the views of the public.

Sometimes we face the difficulties and we need to accept these difficulties. We need to deal with these difficulties. If we never stop something illegal and this action will have negative influence. Thank you.

Chao Yung-mau (趙永茂):

Thank you Professor Chiou. He's shared the ideas of positive and effective check. Next, we will have Professor Chiang Ming Shu from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School of Social Sciences.

Chiang Min-hsiu (江明修):

Thank you, Chairperson. Good afternoon. Our topic is constructive conflict. In our session, we have a lot experts and scholars and politicians. We have different opinions, but we eventually reach some consensus.

First, in political field, it's important to distribute benefits, but how do we have cooperate with each other? Sometimes we have difference in opinions. We also have conflict in interest, but we should still learn to work together to maximize our benefits. One of the discussants in our session took Magistrate Cho as an example when he was the magistrate of Changhua County. During Cho's term, he had the conflict with the Speaker of the Council. But based on the scholar's studies, Magistrate Cho's budgets was the lowest cut ever in Changhua County. In another case, there were a lot of interest in common between the next magistrate and the council. Theoretically speaking, there won't be any cuts in the budget, but the council cut 23 percent of the social welfare budget.

Second, I want to talk about the tool of solving conflicts. From the above-mentioned example, we understand that if we are able to utilize tools to solve conflicts, we'll be able to achieve constructive conflicts, and we'll be able to reach a better balance, for example, exchange of power or ambiguous knowledge. Some things we can share, yet some things are not meant to be clearly communicated. Basically, it is all about power and economy exchange. There are different means to solve the conflicts. We need to learn the cause behind these conflicts. And all the stake holders need to look into the reason for all the conflicts and how we can solve the conflicts in the short term, mid- term and long term period.

For example, in Taiwan there are many committees. Some people would say committees are not effective or efficient. However, I have to say that committees can

be a good platform on which we can resolve conflicts.

In addition, we have the mediation mechanism. in Taiwan, we have a liaison officer that liaises between the city government and the city council. Often times, it's up to the liaison officer to negotiate the conflicts between the city government and the city council. Communication is just a beginning. One of the discussants mentioned mayors play very important roles, and the advisors to the mayor also play important roles. If the advisors or the top-level staffs of the mayor get enough power delegated from the mayor, then these aids or top level staffs can negotiate with the city council on behalf of the mayor. Then the process can go more smoothly.

Third, we need to have transparent processes. Some people quoted Churchill: Laws are like sausages, it is better not to see them being made.

It's debatable how transparent a process you want, especially the legislation process. We talked about the game theory, and analyzed the roles of different players in the game. Are you fighting a crusade or you have different agenda? You have to think about your stop loss points in the negotiation of the game. One of the scholars mentioned that constructive conflicts can be sources of innovation. Constructive conflicts can get people thinking outside of the box.

Of course, we talked about the political responsibility or accountability. To conclude, we need to hold political leaders accountable. Sometimes, leaders choose to confront conflicts, or they try to circumvent councilors who do not share their opinions. Sometimes, mayors go over councilors to appeal to the masses that can be one example of populism. Democracy is not the best means, but it's one of the better ways of running a society. That is the conclusion from our session. Thank you very much.

Chao Yung-mau (趙永茂):

Thank you very much Professor Chiang. Next, it's up to me to report back to you on our discussion on the topic Problem Oriented Communication.

Many of you here are local councilors. Point one, you know your constituencies, and you solve the problems of your citizens. You solve problems for them. Communication is very important for local councilors. Councilors need to understand people's needs and make sure those needs are met. Sometimes, councilors need to provide critical feedback to the city government. These are all different ways of communication.

Regar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uncil and the city government, we talked

about how that relationship can be enhanced, and how the city council better oversee the activities of the city government. Some people also mention that some people resort to protests to make their voices heard.

These days, we have the participatory budgeting. We also have participatory decision making. These are all different forms of communication. We can have focus groups, and we can have qualified interviews. What really matters is to listen to the voices of people and have them reflected in our policies and implementations.

Point number two, how do we clearly make available the information that occurs during the communication? We need to make that information available to the masses, so that people who want to look at the data or information can get their hands on data and see how the government is doing, or they can see the performance of specific councilor. Everything needs to leave a trail, through that we can shorten the information gap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public. Of course, we need to check the different questions. We need to retain all the relevant information.

Point number three, we of course value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city council and the city government. At the same time, we also, as city councilors, face the pressure from our constituents. So, we need to reflect those opinions. Of course, you need to serve your constituencies. However, as a city councilor, you not only have to serve your own constituencies, you also have to think about the big picture. And how do you communicate that with your constituency? How do you strike a balance between the greater good and the smaller goods? Sometimes, this is not an issue that can be solves between the executive arm of the government and the legislative arm of the government. Sometimes, this is where NGOs come in. As Session B1's discussion (Positive and Effective Check), when you bring NGOs in, you can avoid a problem where councilors are only answering to their constituencies. These are all different ways to maintain open,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Point number four, we need to think about the values we believe in when we communicate. For example, the values of fairness as well as distribution of the resources. These values need to be implemented in the communication process. We need to think about fairness, and we need to think about equitable distribution of resources. We also need think about developments. How we can strike a balance betwee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justice. These are all different factors that we need to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Most importantly, when we communicate and when we have policy debates, we need to have evidence based. That is very important. Everything needs to be grounded. You need to persuade the other party

based on the facts. Thus, it's important to have relevant communication tools.

Point number 5, sometimes communication can be across generations. Some policies are not communicated directly to the public. Instead, some polices are communicated through school children. School children then in turn inform their parents or grandparents. This is very interesting. Sometimes people do not listen to politicians, but they would rather listen to their children or grandchildren. So we can also, through school's education, change people's thinking. In Southern Taiwan, we have a county called Pingtung (屏東). The residents used to catch migratory birds and eat them, but now residents there no longer catch those migratory birds. They now protect them. School children made the change. So, sometimes communication can be done through the younger generation.

Last, we need to have public and transparent information. We need to provide checks through different ways. The city government has the power to make budgets, and in some municipalities, the mayor is a very powerful figure in their party. So, city councilors in those situations may not be able to challenge the mayor directly. That's reason you need to leverage public opinion so that you can really reflect the opinions of the people. We need to utilize a variety of ways. The foregoing points are the conclusions covered in our sessions. Finally, we would like to invite former Magistrate of Changhua County, Mr. Cho Po-yuan, to report the conclusion from Session B4. Please.

Cho Po-yuan (卓伯源):

Thank you Professor Chao. Thank you President Lin. Dear participants. In our session we talked about two issues. The first session is the best practices of local councils, and the second issue is cross-region cooperation. In our sessions, we have representatives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their remarks are very valuable and insightful. Please allow me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summarize some of the valuable feedback for all of you.

First, best practices of local councils. Our Mongolian representative mentioned something very interesting related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local government. In Ulaanbaatar, they have a population of 1.6 million whereas the total population in Mongolia is 3 mill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laanbaatar and Mongolia's national government is a very interesting one.

We heard from Speaker Law of Malaysia. He talked about the multi-ethnic, multi-religion background of this diversity society in Malaysia. In their rules of

engagement in the Penang Legislative Assembly, there is a rule that stipulates councilors cannot have incendiary remarks in the council. If councilors violate this law, they are penalized based on the decision of a committee. I think this is a unique situation in Malaysia.

In South Korea, there's also something interesting. The South Korean representative, Mr. Kim, mentioned that they want to empower and enhance the capacity of the councilors. So they have three approaches: one is to enhance their professional abilities, and two is to enhance the power of the councils. The third one is to have great communication channels with the citizens. These are great Korean experiences that we can learn from.

Our representative from Tuvalu said they have a rather unique experience, because Tuvalu officially became independent in 1978. They have a different racial background with the other islands in the same area. It wasn't until 1999 that they adopted their own laws, rather than the autonomous law of the British Empire or the United Kingdom. In 1999, they adopted a new law that empowers the leaders of the different clans or the different families. They have adopted the democratic system. For all the citizens age 18 or above, they can vote on the different bills.

Our friend from Sri Lanka stressed the idea of decentralization and that the central governments should empower the local government's autonomy. That's what our friend from Sri Lanka believes that the central government with the decentralization can avoid corruption.

The Philippine representative mentioned they have the third pillar-jurisdiction. So when there's conflict between the mayor and the legislative body, the judicial power can intervene and resolve the issue.

From Japan, we have a councilor from Fukuoka. He mentioned that they value international exchange with neighboring countries, as well as the United States. And he mentioned that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has loan some artifacts to the Kyushu Museum. Also, in Fukuoka, they value the Asia Pacific Youth Conference. They value these exchange opportunities and they invite young people from other countries to stay in Japan for two weeks. He stressed local interaction between cities and local councils. He considered harmony among local councils will bring harmony in the world. He also mentioned that even though Japan is now amending its constitution, bu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local councils, it does not mean that Japan is going to make war. Again, Japan vows to keep peace.

From our scholars and experts, Professor Wang Chen-shiuen (王振軒), served in a

local government before, mentioned that it's important to forge consensus. Professor Chen Li-kanz (陳立剛) mentioned that we need an open government, and we need to encourage transparency of government meeting, official agenda, and engage the citizens. Professor Chen Mu-min (陳牧民) talked about the influences of social media on local councils.

How will local government's autonomy be affected by proposing budget proposals to the central government? We have fellow councilors, Huang Ying-chih (黃盈智) from Chia-yi County (嘉義縣) and Li-Keng Kuei-fong (厲耿桂芳) from Taipei City, discussing on whether the conflict among councilors will affect the efficiency of the government. Councilor Li-Keng Kuei-fong (厲耿桂芳) also mentioned some of her experiences on the issues like environmental recycling and education cultural preservation.

The second topic we talked about is cross-region cooperation. Kanagawa Prefecture (日本神奈川縣)Councilor Kenichi Kojima (小島健一) mentioned the Kanagawa Prefecture is the second largest prefecture in Japan, and they have 9 million people living there, and they welcome everyone to visit them. They have 350 companies investing in China and 62 companies in Taiwan and so on. And through these enterprises, they are able to carry out interregional cooperation and interaction.

The Philippine colleague mentioned that we need to visit each other more, and it should a bottom up direction of diplomatic relationship, and we should strengthen our secretariat.

The representative from Sri Lanka mentioned that we have more than 200 councilors coming to our meeting today, and it's a great opportunity for us to exchange.

Tuvalu representative mentioned that the central government is far away from the people. Local council is at the forefront of serving the people and should be given more attention.

Speaker Law from Malaysia said the cross-region cooperation should be multi-dimensional. We shouldn't just focus on the local councils, we should also involve different sectors such as the business sector, commercial, education, and culture.

Chairman Lin mentioned the cross-region cooperation should expend to invite entrepreneurs, businessmen and the industry.

Professor Wang (王振軒) mentioned interregional cooperation of NGO's. He shared with us some of the overseas achievements of the Luzhu Medical Association (路竹

會). Professor Chiu Rong-jeo (邱榮舉) mentioned that all sectors should get together and form a delegation. Hopefully, eventually we can build the ACF platform further. Professor Chen Li-kanz (陳立剛) mentioned the incinerator and landfill, and hopefully we can carry out small-scale cross-regional cooperation to achieve the goal of regional sharing and solve local issues. Professor Chen Mu-min (陳牧民) mentioned UCLG and CityNet, all of which only involve the city governments and officials, but it does not involve city councilors. He suggested we expand the scope of Asia Council Forum to not only involve the different sectors, but also engage young people, so that the young people can utilize this collaborative platform.

Go forward; we have Councilor Kao Min-lin. She mentioned the cross-region cooperation carried out by Kaohsiung government. Before she was elected as city councilor, she was a secretary in the city government. That's why she has lots of experiences in this area. We have Councilor Huang Ying-chih from Chiayi County. He addressed the issues of cross-region cooperation and local governance.

These are some of the ideas that we shared in our panel discussion, as well as some of the unique experiences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Chao Yung-mau (趙永茂):

Thank you Magistrate Cho. Thank you for your report and conclusion. Thank you for four moderators from four panels and your hard work. This marks the end of our round table discussion. Now, I am going to hand the microphone over to President Lin Chin-chang to close our forum. Thank you for your participation.

Please welcome the President of the Asian Councils Forum, Lin Chin-chang, to deliver the closing remarks.

閉幕典禮

主席：林晉章　台灣地方民代公益論壇理事長

TCF 林晉章理事長

林晉章：

各國首席代表，各位議員女士先生，各位教授學者，各位貴賓，大家辛苦了！我們一整天忙碌的會議，即將告一個段落。今天早上邀請李鴻源前內政部長做的專題演講，很多的貴賓都跟我講，他說的內容真的講得非常好。

今天早上，在趙教授的主持下，各國也發表他們精彩的言論。今天下午，我們有 4 場的分組討論，因為我們都只能參加一場，其他 3 場我們都不曉得內容，但是透過剛剛 4 位分組的主持人精彩完整的報告，讓我們雖然沒有參加其他 3 組，也能我們了解全貌，讓我們再一次以熱烈的掌聲，感謝他們。

今天內容非常精采，很多朋友告訴我：林理事長，這個活動舉辦得很成功，內容很精彩。我跟各位報告，我們 TCF、ACF 的特點，不管你今天參加與否，我們都會把會議的內容，以完整的中英文，用紙本記錄下來，同時我們會在我們的網站上來公布。

目前你從網站上，就可以看到我們 2014 及 2015 兩年的全部會議內容。我們希望今天大家的發言，都能夠透過網站上的全記錄傳播給全亞洲、全世界所有各位議員女士先生們。

最後我也要感謝日本的松田會長，在今天下午，他已經正式宣布，明年第 3

屆亞洲地方議員論壇，將在明年的 5 月 27 日、28 日、29 日，[1]在日本東京舉行，我們用熱烈的掌聲表示支持，明年大家日本見，再謝謝各位，我宣布第 2 屆亞洲地方議員論壇，到此圓滿結束，謝謝大家！

[1] 2018 第三屆亞洲地方議員論壇(ACF)的舉辦日期由於與主辦單位日本會議預定的一些行程衝突，原定 5 月底的時間，已經更改為 8 月 19-21 日，為期三天。

Closing Ceremony

Chair: TCF President Lin Chin-chang

Lin Chin-chang (林晉章):

Dear representatives, councilors, ladies and gentlemen, professors, scholars, and distinguished guests, thank you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2nd Asian Councils Forum. The forum is coming to an end. From early this morning, we invited former Minister of Interiors, Lee Hong Yuan, to give us the keynote speech. A lot of the guests told me that it was a very excited presentation.

With Professor Chao moderating our panel this morning, we have all the representatives share with us their unique experiences. In the afternoon, we have different panels because we could only be at one session at a time. But we have wonderful moderators sharing with us the conclusions of their discussion. Even though we could not be there, but we could still learn the different opinions and ideas. So once again, let's give a loud round of applause to our 4 moderators. Thank you for your hard work.

We have wonderful and exciting discussions in four panels. Many people share with me that, "Chairman Lin, this is a great event. We enjoyed the great contents of the forum." You can have my word that you won't miss any panel discussion whether or not you are here today. We are going to publish the meeting report online in English and Chinese. If you visit our website now, you can see the Forum meeting reports of 2014 and 2015. In the near future, you will see the meeting report of today on our website. All the people from all around the world could see what took place today.

This morning, President Matsuda has mentioned that the third Asian Councils Forum will be held in May 27-29, 2018 in Tokyo.[2] He's officially sent us his invitations. Let's once again thank Japan for being the host next year, and we will see you next year. Now, I announce the closing of the 2nd Asian Council Forum. Thank you for your participation.

[2] Due to a schedule conflict problem, the Japan Local Councilors Alliance (JLCA) announces that the date for the 3rd Asian Councils Forum (ACF) has been changed from May 27-28 to August 19-21, 2018. The meeting place (Tokyo) remains the same.

活動剪影 (Photo Gallery)

Welcome Party at Taipei Grand Hotel

Mr.&Mrs. Kofe (left & Middle), Limasene Teatu of Embassy of Tuvalu in R.O.C.(the second from the right)

PCL Delegates (Philippines)

Mr. Siliga Atiake Kofe &Mrs. Kofe (Tuvalu)

B. Tsolmon (Mongolia) & Maybelyn Fernandez (Philippines)

Seyed Ali Zaheer Moulana (Sri Lanka)

JLCA Delegates (Japan)

Taiwan Professors and delegates of Hong Kong

JLCA Delegates (Japan)

Delegates from PCL, Korea and Taiwan

Venue: Taipei City Counci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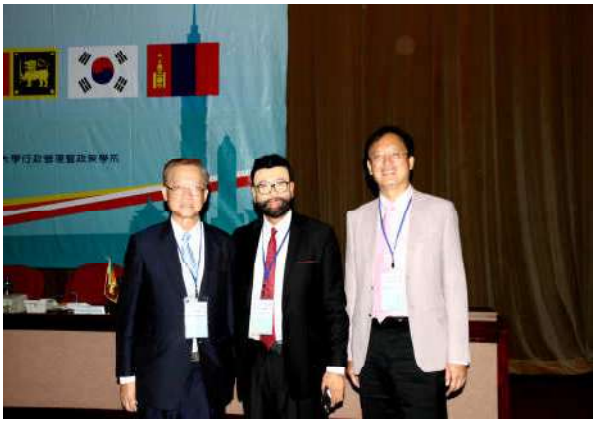
PCL delegates (Philippines)

JLCA Delegates (Japan)

PCL (left) and Hong Kong Delegates

PCL delegates (Philippines)

PCL Delegates (Philippines)



From right, Political Deputy Minister of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Dr. Francois Chih-chung Wu, Mr. Moulana and President Lin Chin-chang

JLCA and PCL Delegates

JLCA delegates (Japan)

Tea Time

Taipei City Councilor Li-keng Kueu-fong (厲耿桂芳)

From right, TCF consultant, Mr. Li Wei Lian (厲威廉),Former Mayor of Changhua County and the Chair of A4 & B4 Sessions , Mr. Cho Po-yuan (卓伯源)

Dinner Party

JLCA Delegates

Kaohsiung City Councilor Kao Minlin (高閔琳) with PCL Delegates

…. Digging the Dancing Queen

Sing, Sing a Song, Sing Out Loud

One-day Excursion Tour (River Cruise-Dadaocheng Wharf-Guandu Wharf-Guandu Temple)

Taipei 101

Discovery Center of Taipei (台北探索館)

During the Roundtable Meeting, the Japan Local Councilors Alliance (JLCA) announced that they will host the 3rd Asian Councils Forum (ACF) on May 27-28, 2018, but due to a schedule conflict problem, they decided to change the conference date from May 27-28 to August 19-21, 2018. The meeting place (Tokyo) remains the same.

第二屆「亞洲地方議員論壇」(ACF)活動各項連結

2017.12.12(最後瀏覽日)

照片(Photos)

- 2017.08.25 歡迎晚宴 (Welcome Party)
  https://www.facebook.com/pg/Global-Councils-Forum-391744064324282/photos/?tab=album&album_id=887850658046951
- 2017.08.26 亞洲地分議員論壇會議 (ACF Conference)
  https://www.facebook.com/tcf100/media_set?set=a.1386918161425223.1073741831.100003211561490&type=1&l=c06f163ad5
- 2017.08.26 慶功晚宴 (Dinner Party)
  https://www.facebook.com/tcf100/media_set?set=a.1387022468081459.1073741833.100003211561490&type=3
- 2017.08.27 一日遊 (One-day Tour)
  https://www.facebook.com/pg/Global-Councils-Forum-391744064324282/photos/?tab=album&album_id=888347777997239

影音全紀錄(Youtube)

- 第二屆「亞洲地方議員論壇」(ACF) 開幕式
  Opening Ceremony & Chairman's Remarks
  https://youtu.be/impLJNntUrg
- 李鴻源教授專題演講：4C時代的地方治理與社會創新
  Keynote Speech by Lee Hong-yuan (Topic Theme: Local Governance and Social Innovation in 4C Era)
  https://youtu.be/G1jAHoa3DEg
- 國際論壇(國際經驗分享)各國地方議會與民間協力的最佳實務
  Global Councils Forum (Theme: Best Practice of Collaboration between Local Councils and 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s)
  https://youtu.be/ruz_LoO1AgA
- 議題討論第 A1 場：地方需求與社會創新
  Session A1: Local Demand and Social Innovation
  https://youtu.be/ppWykGEvXgc
- 議題討論第 A2 場：地方觀光與交通建設
  Session A2: Local Tourism and Transport Infrastructures
  https://youtu.be/ary7tb2ngaw
- 議題討論第 A3 場：參與式預算與地方議會
  Session A3: Participatory Budgeting and Local Councils
  https://youtu.be/oK-vPzJPPpQ
- 議題討論第 A4 場：各國地方議會運作最佳實務
  Session A4: Best Practice in Your Local Council
  https://youtu.be/nTnMuOU89Ac

- 議題討論第 B1 場：友善地監督
  Session B1: Positive & Effective Check
  https://youtu.be/jEs-FYya1nk
- 議題討論第 B2 場：建設性衝突
  Session B2: Constructively Conflict
  https://youtu.be/uE-kBflVoww
- 議題討論第 B3 組：問題導向的溝通
  Session B3: Problem-oriented Communication
  https://youtu.be/xFgMwOn3kI0
- 議題討論第 B4 組：跨區域合作
  Session B4: Cross-region Cooperation
  https://youtu.be/GAqeyttv6Sg
- 圓桌論壇(各場主持人彙整報告)暨閉幕典禮
  Conclusions of Panel Discussion and Closing Ceremony
  https://youtu.be/1L4WQf9KAwE
- 《水果新聞》2017.08.26 台灣亞洲地方議員論壇 各國代表研討公共議題
  Public Issues discussed by Representatives of Global Parliamentary Alliances at the ACF Conference on August 26, 2017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QmvJOGDfp0&t=111s
- 《水果新聞》2017.08.27 亞洲地方議員論壇圓滿結束 八國議員 CITYTOUR 欣賞台灣風情
  Post-meeting Travel Itinerar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xmv-NkI44Y

《獨家報導》

- (網路新聞)第二屆亞洲地方議員論壇暨 TCF 年會 實踐地方參與發揮地方民粹力量 (2017.08.26)
  https://www.scooptw.com/11142/%E7%AC%AC%E4%BA%8C%E5%B1%86%E4%BA%9E%E6%B4%B2%E5%9C%B0%E6%96%B9%E8%AD%B0%E5%93%A1%E8%AB%96%E5%A3%87%E6%9A%A8tcf%E5%B9%B4%E6%9C%83-%E5%AF%A6%E8%B8%90%E5%9C%B0%E6%96%B9%E5%8F%83%E8%88%87%E7%99%BC
- (影片 Youtube)第二屆亞洲地方議員論壇 ACF 協助聯合國維護世界和平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v8uI_Ughxw (2017.09.21)

TCF 官方網站(TCF Website)

- (中文) http://www.tcforum.org.tw/
- (英文) http://en.tcforum.org.tw/

GCF 官方網站(GCF Website)

- (中文) http://ch.gcforum.org.tw/
- (英文) http://www.gcforum.org.tw/

全國性及區級人民團體立案證書

台內社字第 0990210950 號

台灣地方民代公益論壇業已依法組織完成准予立案

此證

計開

團 體 名 稱：台灣地方民代公益論壇

成 立 日 期：99 年 8 月 20 日

會址所在地：台北市長安東路二段 108 號 1 樓後棟

內政部
部　長　江宜樺

中　華　民　國　99　年　11　月

Accreditation Certificate of Civil Associations

Tai Nei She Zi No. 0990210950

The Taiwan Local Councils Representatives Community Forum has been organized as a civil association according to law. This certificate is issued as a proof for approval and accreditation.

Name of Civil Association: Taiwan Local Councils Representatives Community Forum

Establishment Date : August 20, 2010

Address : Rear Building, 1st Fl., No. 108, Sec. 2, Chang-an E. Road, Taipei City

Minister Jiang Yi-Huah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seal)

Issued Date: November 2010